

大風起兮

馬洪傳

◎ 馬雅

中共高層政爭內幕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內容簡介

建國之初，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中國如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很快出現政見分歧，毛打算進行權力調整，節制劉少奇和周恩來，便把高崗從東北提升到北京委以重任。馬洪隨高崗一同進京，任國家計委委員和秘書長。

高層權力博弈瞬息萬變，黨內多個派系忌憚高崗權力過大，聯手鉗制。高崗挑戰劉周鐵羽，毛澤東終認為高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決定把他犧牲掉。不便追究與高關係密切的林彪、彭德懷、陳雲等人，轉而將高崗部下所謂“五虎上將”作為替罪羔羊，馬洪也仕途受挫。

本書故事就從這裡講起。作者是馬洪的長女，將馬洪在高層複雜政爭和中國曲折歷程中的遭遇和作為娓娓道來。

馬洪，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早年得到陳雲賞識，後來得到高崗青睞。雖然一度被免職，但得到高崗的政敵薄一波的提携，參與許多中央文件起草，包括“工業七十條”；不過，高崗的另一政敵彭真卻看他不順眼，設置種種障礙；“文革”中馬洪更受批鬥七八十次之多。十年浩劫過去，雖然曾參與給高崗定罪的鄧小平反對給高平反，他與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等對馬洪的才幹卻頗為器重，馬洪參與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的制定和論證，提出很多重要意見。最終，他與早年拔擢自己的陳雲在計劃經濟問題上無法談攏，被免去各種要職，僅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與結下數十年友誼、結成兒女親家的宋平，也因對改革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

《真相》系列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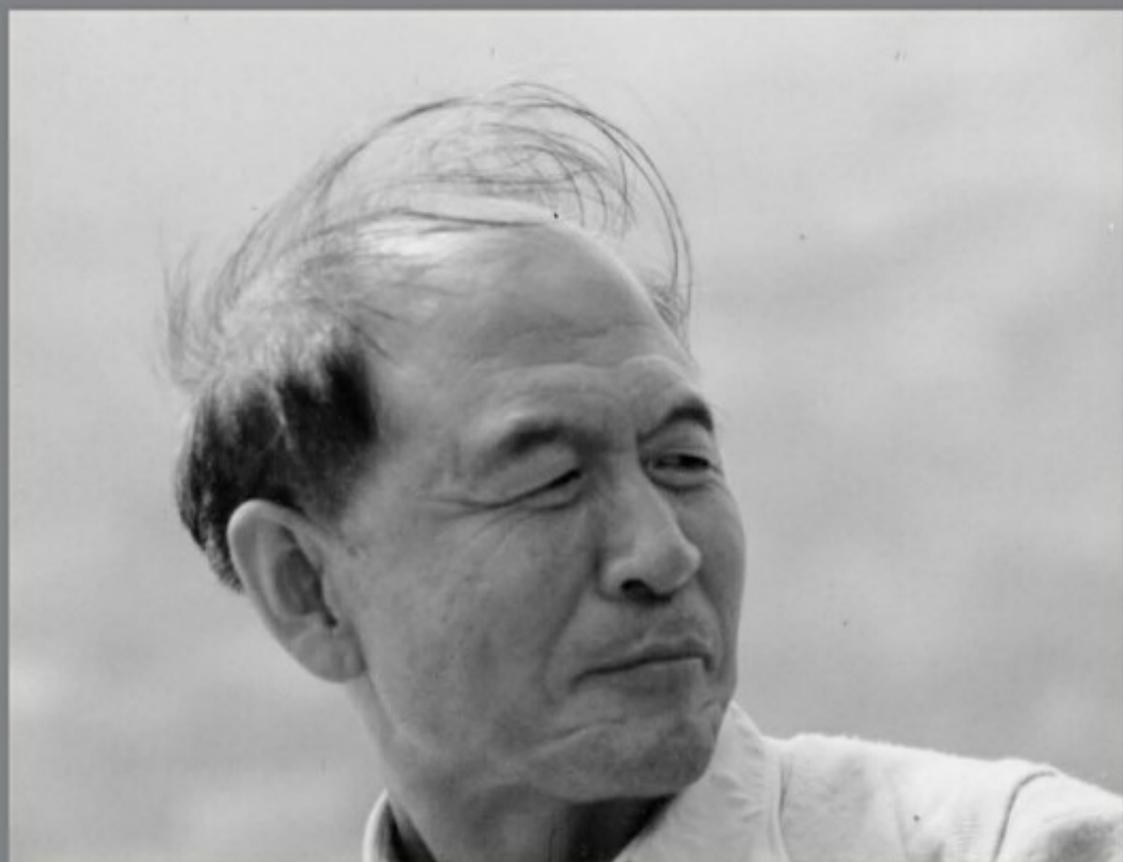
◎ 馬雅

大風起兮：馬洪傳

—— 中共高層政爭內幕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Dafeng Qixi: Ma Hong Zhuan

by

Ma, Ya

Published in 2014 by Mirror Books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940004-64-8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 S. A.

Phone: (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真相》系列 (91)

書名: 大風起兮：馬洪傳——中共高層政爭內幕

作者: 馬雅

發行人: 何頻

責任編輯: 史劍

校對: 楊茜

封面及版式設計: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SA.

電話: (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940004-64-8

定價: HK129 NT429

版次: 2014年6月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目錄

8 前言

10 第一章 “高崗事件”之謎

- 12 馬洪被控與高崗“同謀反黨”
- 18 昏迷中，他回閃早年的經歷
- 29 “五馬進京”，高崗得寵
- 34 毛澤東不滿劉少奇和周恩來
- 41 陳雲與高崗的私交
- 46 “兩會”——毛澤東試探劉、周實力
- 51 高崗泄密犯大忌
- 55 鄧小平率先舉報
- 60 陳雲反戈一擊
- 66 毛澤東猝然翻臉
- 77 高崗成了“集團”

82 第二章 忍辱負重

- 84 下放反而有了反思的機會
- 99 在國家經委“將功折罪”
- 103 七千人大會
- 116 《工業七十條》這樣出爐
- 123 被彭真揪住不放

132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

- 134 災難將臨，跟時間賽跑發奮著書
- 137 “文革”原來是要打倒劉少奇
- 140 被批鬥了七八十次
- 144 俠義的梅行
- 147 林彪不費一槍一炮把全黨全軍震懾住
- 150 毛澤東下了一盤國際大棋
- 152 神秘的“913 事件”
- 156 毛澤東設“挺鄧排周”格局
- 159 “接班人”何在

161 第四章 改革（上）

- 162 馬洪復出
- 176 大風起兮

222 第五章 改革（中）

- 224 政見不同，水火不容
- 241 “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

目錄

254 第六章 改革(下)

- 256 不求名但求成功業
- 270 “通貨膨脹”大爭議
- 283 中國第一個智庫
- 296 他帶出這麼棒的一群年輕人

306 第七章 晚年

- 308 “八九”風雲
- 314 青山不老
- 334 疾病·親情·友誼
- 350 宋平回憶馬洪
- 359 送他最後一程

361 後記

362 主要參考文獻

前言

從高崗事件發生到現在，整整 60 年過去了。作為高崗“五虎上將”之一的馬洪，也去世將近七年；他的女兒，我已經人過中年。

父親去世以後，我回家整理他的遺物。打開保險櫃，我看到的是一摞摞的稿紙和文件，原來這都是他在高崗事件中和“文革”中寫的檢討。這就是父親留給我們的遺物。

陳雲是父親初去延安時的恩師。改革開放中，雖然高崗沒有平反，父親沒有“正名”，陳雲卻曾有意啟用他，派他回國家計委搞計畫經濟。如果父親同意這樣做的話，他至少能得到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但父親對陳雲表示，“計畫經濟救不了中國”，開罪了陳雲。從此，父親被免去各種重要職務，只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趙紫陽下面作諮詢。然而，



馬洪，2000 年。

父親非常珍惜這個仍能為國家和人民報效的機會：他每天早上爬起來，照舊精神抖擻，照舊滿腔熱忱地去投身工作。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事後，一位老同志對我說，你父親是一位歷史人物，也是一位悲劇性人物。一開始，我並不想給父親寫傳記——追尋舊事，令人痛心，還可能惹出風波。但是後來，我花了一年時間，通讀了他的12卷文集，理解了他百折不回地奮鬥的經歷和境界。於是，我決定把他的生平記錄下來，對前人有一個交待，對後代也是一種鞭策。

馬雅

2014年3月



本文作者與兒子。

第一章

“高崗事件”之謎



1.1 馬洪被控與高崗“同謀反黨”

1.1-1 馬洪被派回東北揭批高崗

遼寧-吉林-黑龍江……火車疾馳。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1954年3月下旬，中共黨內第三號人物、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奉命去沈陽主持召開東北局高幹會，傳達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和中央高幹座談會的精神，深入揭批高崗的問題。高崗被指控分裂黨中央和反對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劉少奇。當時，高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在調任北京之前，他是東北局黨政最高領導。在中國的政壇上，高崗曾被公認為一顆上升的明星。現在，周恩來特意帶上了“知情人”安志文和馬洪回高崗的“老窩”參加會議，公安部長羅瑞卿作為聯絡員同行。

馬洪當年不滿34歲，高個子，紅臉膛，說話帶山西口音。1948年5月，他由承德市委書記任上，被高崗調往東北局；1952年底，他又由東北局副秘書長任上，被調往北京，任國家計委秘書長和專職計委委員。這次他回瀋陽，是根據中央的指令，作為高崗的重要助理揭發他，並作自我批判。

那天，馬洪單獨坐在一間軟臥車廂裡，埋頭寫檢討。連日來，他被帶往沈陽、長春、哈爾濱東北各大城市，參加鬥爭高崗的幹部會和群眾大會。因為高崗本人不在場，馬洪就從揭批高崗的角色，變成高崗在會場的化身，變成大小會批鬥的“活靶子”。會上，一些不久前還在一起工作的同志，翻臉不認人，並落井下石，來洗刷自己。

記得 1942 年在延安整風時，馬洪曾見過類似的場面，可當時他僅是一個參加革命不久的基層幹部，不過是鬥爭大會上跟著喊口號的青年。整風後，馬洪跟隨張聞天下鄉搞社會調查。他注意到這位不久前還擔任總書記的老同志，神情凝重，在調研中不斷對照從前的“教條主義”錯誤，不斷地作自我反省。由於馬洪出身好，參加革命以來又一帆風順，所以完全沒有黨內鬥爭的經驗，只是聞天同志紮實的工作作風和嚴格律己的態度，給他的印象很深。從 1936 年參加工運起，到 1954 年高崗事出，馬洪參加革命已將近 20 年，陰差陽錯地，如今開大會，他站在台上作檢討，沒說兩句話，就被群眾憤怒的呼聲所淹沒。面對著林立的拳頭、觸目驚心的標語，他自己竟如同當年土改時被鬥爭的地主！

鬥爭大會時間排得滿，轉換的場地又多，沒有功夫坐下來吃閒飯，於是馬洪被給予從朝鮮戰場繳獲來的美軍巧克力充飢。還因為東北地盤大，去下一個批鬥地點，常常需要搭乘火車。於是這間軟臥車廂，又專門供給馬洪寫材料，來進一步檢舉檢討、同高崗劃清界限——馬洪似乎竟享受著某種“高幹”的待遇。

忽然間，馬洪聽到走廊裡有人高聲喧嘩，用四川話說說笑笑。

旋即，車廂門拉開，羅瑞卿、楊尚昆一高一矮，一前一後，走將進來，再後還跟著安志文。

安志文原本和馬洪一樣，回東北協助中央揭批高崗。然而，鬥爭會上，馬洪總被放到台前“發言”，挨批挨鬥，安卻與其他人員坐在台後，好像會議的工作人員一樣。即便上了火車，馬洪被關在單間裡寫檢討，安則走東串西，行動自由，甚至與秘書、警衛人員一起打撲克來消磨時光。而提起作為下級與高崗的關係，安遠比馬同高崗密切。高與安是陝北同鄉，高給馬布置工作時，幾乎總有安在場。尤其在出事以後，高仍舊托付安給上面傳遞消息，代為求情。高崗對安志文的依賴，和高崗事發後上級對馬洪和安志文不同的態度固然原因諸多，但安志文（小安）的兄長是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大安），大安掌握黨內人事大權，且是劉少奇的親信，這層關係顯而易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高崗是劉少奇在黨內的勁敵，小安卻是高崗的心腹。

羅瑞卿時任公安部長，在此之前，他長年作中央保衛局長，那一職務剛被汪東興接替。羅大高個兒，英武挺拔，人稱“羅長子”。早在 30 年代紅軍時期，一次，他率兵衝鋒在前，腮部中彈，打穿動脈，血流如注，硬是被戰士們強行拖下火線，由楊得志背到部隊的醫院裡搶救過來。由此毛澤東說，羅是“閻王爺都不要的人”。據說主席還曾有這話：“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著！”因為是主席的愛將，軍內許多資深將領，甚至如葉劍英、林彪，都不被羅放在眼下。

1.1-2 被打成同高一道的“反黨分子”

只見羅瑞卿黑著臉，將手中厚厚一疊稿紙，往桌上重重地一擱，那是馬洪多日來寫下的檢討。

“馬洪，在高崗反黨反中央的罪惡活動裡，你出了什麼壞主意？哪些東西是你指揮他？哪些東西是他指揮你？為什麼你的文章都作了高崗反少奇同志的資本？”

此時，周恩來已作完報告回京，由羅瑞卿和楊尚昆繼續參加東北高幹座談會。現在這兩位留下來的中央領導，親自前來監督馬洪的揭發情況，可見上級對此重視的程度。於是，馬洪盡量克服住自己的緊張情緒，認認真真地進行交待：

“我替高崗寫的文章、報告，公開發表的共有 13 篇，主要的是：

“1, 49 年起草了關於東北對待資產階級的政策和供銷社的問題；

“2, 50 年起草的農村合作社和富農黨員問題；

“3, 52 年起草的《克服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是關於黨的政策和農村發展方向問題；

“當時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講話，說‘資本家還有些好處，應該利用他們的進步性和積極性’，強調了與資本家合作。在富農和黨員剝削的問題上，少奇同又說‘現在必須有剝削，要歡迎剝削；黨員不要怕雇工，不要怕有富農黨員’。

“高崗叫王鶴壽把少奇同志的天津講話搜集起來，轉給主席，

表示不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據高崗說，主席看了劉的講話很生氣，說這是原則問題……”

羅瑞卿馬上打岔：“馬洪，你態度端正點！這算什麼檢查，完全是替高崗辯護，繼續散毒，給少奇同志抹黑！”

聽話聽聲，鑼鼓聽音。可馬洪那時還沒有這方面的閱歷，只打算老老實實把自己知道的事實講出來。所以，馬洪繼續說：

“那篇反右傾的文章，主席認為很好，讓喬木轉發，不但在《東北日報》和《人民日報》登了，還讓新華書店印成活頁文選，向全國發行……”

羅瑞卿不耐煩地：“都什麼時候了，你還給高崗臉上貼金！我告訴你，反對少奇同志就是反黨，就是反對中央！”

自從中央傳達高崗犯錯誤以來，馬洪極力在思想上轉彎子，力圖跟上黨的步伐。而檢查寫了多次，多次被退回來；一開始被批為“空洞無物，避重就輕”，後來涉及具體事情，又被指控為“誣蔑中央”、替高崗“評功擺好”。幾個月來連續批鬥，無論馬洪怎樣劃清界限，總過不了關。現又被羅這一通訓斥，馬洪茫然若失，無所適從。

楊尚昆年不過五十，當初在莫斯科，他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成員之一，追隨過王明；1948年土改時，又因為“過左”，遭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去年，則因為擅發文件而被主席通報，算是黨內一位“老運動員”；加上楊尚昆深知老鄉羅長子的脾氣，所以，他以溫和的口氣開導馬洪：

“你看看，你一直是黨器重、培養的青年幹部。組織上重視

你出身貧苦，小小年紀又參加工運，因此少奇同志在延安給你寫介紹信，陳雲同志又送你入黨校學習。黨曾對你期望不小啊！”

聽到此話，馬洪因熬夜而乾澀的兩眼開始濕潤。

楊尚昆見自己的諄諄誘導生了效果，這才點擊要害：“可你投靠了高崗，辜負了黨！”駭得馬洪全身後仰。

羅瑞卿隨即接過話茬：“你給我交待高崗都跟誰串聯了，密謀了什麼？”

馬洪想起在東北時彭總（彭德懷）從朝鮮回國，總要先停沈陽，與高會晤。而去年夏天，高崗曾去南方看望過林總（林彪）。但考慮到高崗與他們分別在抗美援朝和解放戰爭中的工作關係，負責同志之間見見面、交換一下意見也屬正常。“至於他們之間有什麼密談，我本不知道，也不能胡編。”

羅瑞卿似乎看出馬洪的思想活動，拳頭往桌上一擊：“說，別再包庇壞人了！”

楊尚昆時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察言觀色之間，對毛主席的思路摸得比較透徹。楊知道毛這次並不想牽涉林彪和彭德懷，雖然這兩人與高過從甚密；而陳雲，高崗另一位合作的同僚，自己又主動作了交代。於是，楊轉移話題：

“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看看王鶴壽、陳正人，級別比你高，知道的事也更多，可是人家都搶在前面揭發了，劃清了界線。”

確實，馬洪注意到，在揭批會上，有些同志的名字起初提得挺多，漸漸稀少了，最後消失了。這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結

果。馬洪試圖使自己鎮定下來，能夠集中思維：“可我總不能為保住自己，就信口胡謔吧！”

見馬洪默默不語，羅瑞卿火冒起來了。這事是總理臨行前親自交待下來的，又有時間的限制，誰有功夫這樣婆婆媽媽地糾纏不休？何況，羅瑞卿記得清清楚楚，1942年在延安整風時，毛主席說過：“在中央黨校的2500個學員中，已經挖出了250個特務，估計還不止，恐怕應當是在250到350之間，數目才算夠。”現在東北這麼多的幹部，總該有一定數目，才能算是完成了任務。

於是，羅瑞卿厲聲喝道：“馬洪，你放老實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和高崗在一起，都幹了些什麼反黨勾當？還和什麼人串聯搞反黨陰謀？”

馬洪實在弄不懂領導到底想讓他交代什麼，甚至認死理，認為黨一貫強調實事求是，“高崗有錯誤，我也不能硬說成罪行呀。”因此，馬洪一橫心，索性說：“那就算我本人自覺反黨還不行？”

羅聽罷，大怒：“你小子還敢犯刁，還嘴硬！”說著抄起桌上的黃銅筆筒，照著馬洪頭上摔去，楊尚昆想攔都攔不住。馬洪眼前一黑，倒頭栽地。

1.2 昏迷中，他回閃早年的經歷

馬洪恍恍惚惚地，想掙扎著起身，而一動則頭部劇痛，又陷入昏迷之中……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土炕上，炕席既破且舊，然而非常乾淨。只見一個身影在他眼前隱隱現現，又聽到一聲聲心疼的呼喚：“仁權子，你醒啦？”馬洪再作掙扎，卻被一雙溫暖的手臂抱起來。原來，三歲的他，被娘緊緊摟在懷裡。娘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粒一粒掉到小仁權發燙的臉上，掉到他乾得起泡的唇邊。

母親智氏，高身材，扁平臉。自從她嫁到待陽村牛家以後，牛家老人去世，家境每況愈下。父親牛夢月為人忠厚，挑個小擔子走村串戶，賣個針頭線腦，總難維持生計。那年頭“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智氏特心強，不便抱怨男人沒本事，卻照著當時晉北農村窮人的習慣，一胎胎地懷孕，若是女嬰，便棄之荒野，攢下了奶水，去喂養富人的子女，好換些錢糧，一家人勉強糊口。

仁權這娃娃，儘管家道貧寒，但胎氣十足，呱呱墜地時又白又胖，長到兩三歲就有四五歲孩子的個頭，且眉眼十分周正。鄉人嘆息智氏裡裡外外操持辛苦，智氏則一門心思，把希望全部寄託在仁權子身上。

這年寒冬臘月，窮人們正打飢荒，村裡突然流行時疫。仁權子身子骨結實，壓根兒沒得過病。可智氏作奶媽的班家，全家上下都病倒了，於是小仁權最終也染上了疾病。也許因為這娃娃平時不得病，一旦病了就三天三夜高燒不退，神志不清，智氏心急如焚。無奈家窮請不起郎中，也抓不起藥。村裡有老人相勸：東方七岩山有座娘娘廟，進山求拜，興許能救娃子一命。

頂著刺骨的寒風，冒著紛揚的大雪，智氏背上奄奄一息的孩兒，進山燒香。七岩山遠在數十里之外，又趕上年關，道上行人稀少。偶有人趕個驢車經過，見那婦人背個小兒怪可憐的，也肯搭上一程。好歹上了山，進了娘娘廟，智氏將省下的幾個銅板，買了兩個白饅和一支香供上，抱著娃娃，跪在娘娘的泥像前，哀哀祈禱。此時廟內空無一人，廟外北風呼嘯。智氏悲切泣訴引來了主事，主事摸摸小兒的額頭：“沒事了，你可回去了。”智氏聞後大喜，起身背起仁權子回家。

一路上依舊風雪如晦。或許天佑神助，或許智氏的淚水融化了冰雪，總之，一進家門，孩兒出了一身汗，煞白的臉蛋又見血色。待智氏去熬粥糊糊，娃娃奶聲奶氣地開始叫娘……

仁權子六七歲時已懂得給家裡幫忙。族人見娃娃出息，便讓他在村子的學堂裡，掃地端水，幹些零活兒。學堂裡的學生多家道殷實，小小年紀被送來念書，往往坐不住板凳。在庭院中，小仁權常可聽到學生的嬉笑和先生的訓斥……久而久之，這小童工竟掌握了課堂中先生教授的內容。一天，先生提問，一反往常的嘖嘖喳喳，教室裡頓時鴉雀無聲。先生再問，仍無人回答，只聽一童聲在外面朗聲應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先生好生奇怪，推門卻見小仁權拄著根掃把立在庭中。

學堂先生見小仁權如此聰敏好學，遂與校長商議，讓他做工之餘當旁聽生。不久，仁權子便成為學生裡的佼佼者，族人牛誠修先生是村裡的開明士紳，遂願為他出學資。此後，仁權子便不在學堂裡打雜，而去誠修先生家裡幫助抄抄寫寫、整理縣

志……

且說馬洪作檢查，不過關，被羅瑞卿用黃銅筆筒當頭一擊，不省人事。雖然倒在軟臥的床鋪上，頭痛欲裂，馬洪卻以為自己躺在鄉下的冷炕上，躺在冀察熱遼的臨西。

1946年，屆時國共和談已破裂，內戰開始了。延安的幹部分成十個大隊，撤退到各地。第七大隊的隊長是馬洪，政委是劉雲漢，參謀長是段蘇權，被派往東北。那是冬天，在行軍的路上，馬洪染上瘧疾，夜晚高燒不退，早晨又凍得牙齒打戰。由於當時部隊轉移，條件艱苦，缺醫少藥，馬洪打了好幾十天的擺子，幾乎喪命，後來完全是靠自己的身體頂過來了。

提起這“幾乎喪命”，馬洪參加革命以來，已有兩次。

第一次是1938年，在延安中央黨校，馬洪只有18歲。黨校在楊家灣，距延安縣城有20多里。週末休課時，學員常常跨過延河，去逛縣城。說來這延河水也奇怪，平時很淺，脫鞋挽褲腿，蹣水就能過河。可夏季山洪暴發的時節，延安本地可以大晴天太陽當頭照，而上游的大水驟然衝下來，過河者就人仰馬翻。

這天，同別人一樣，馬洪去縣城裡轉了轉，所發的津貼只夠買碗羊肉泡饃，陝北人愛加點紅辣椒調味，吃得渾身冒汗；然後他遛遛商店，不過是飽飽眼福。因為黨校離縣城不近，所以還得趁早往回趕路。正巧是盛夏，陰晴不定，馬洪算是有心地帶了把雨傘。他走到延河邊上，剛打點著過河，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轟隆一聲巨響，延河水從天而降，不容他有任何反應的餘地，已被狂濤巨浪捲

走。這浩浩蕩蕩的河水，裹挾他十幾里，直至平緩的下游，仿佛發夠了脾氣，方減弱了勢頭，把他撿棄在亂石斑斑的河灘上——馬洪還緊緊地抓住手中的雨傘，保住了一條性命。

馬洪當時在馬列學院二班。儘管班上有徐海東這樣的老紅軍，也有新婚燕爾的江青，馬洪卻在未被提名的情況下、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當選為黨支部書記。同年春天，毛主席到馬列學院作《中國革命戰爭與戰略問題》的報告。他早到了一點，先去二班支部辦公室休息。主席剛坐下，就問馬洪學員們的情況，還關切地問到馬洪的年齡、經歷及興趣愛好等。馬洪回答後，請主席題詞。當聽說馬洪愛看報以後，主席笑微微地點頭，伏案揮毫，寫下“看報有益”，並簽下姓名。主席又同馬洪談學習，馬洪說他特別喜歡讀書，主席很高興，又揮毫寫下“讀書是好的，毛澤東”。接下來，主席問起他對工作的感想和在學院工作的情況，馬洪一一作答。毛主席第三次提起筆，寫下“工作著是美好的”。

當年在組織眼裡，馬洪是有前途的培養對象，而毛主席的嘉獎，更使他在學員中威信提高。所以，馬洪那天過延河被大水沖走“大難不死”的故事，馬上在延安傳開，成為一時的新聞。

這第二次“幾乎喪命”是1946年，在熱河。1月份，國民黨軍隊進攻熱河中部，搶佔了平泉縣城。馬洪被黨派到平泉縣任縣長兼縣委常委，負責同國民黨談判，要求其歸還違反停戰協定而侵佔的縣城，但談判無結果。5月以後，馬洪響應中共中央土改的號召，發動群眾、減租減息，同時作了大量的農村調查。6月，馬洪被調熱河省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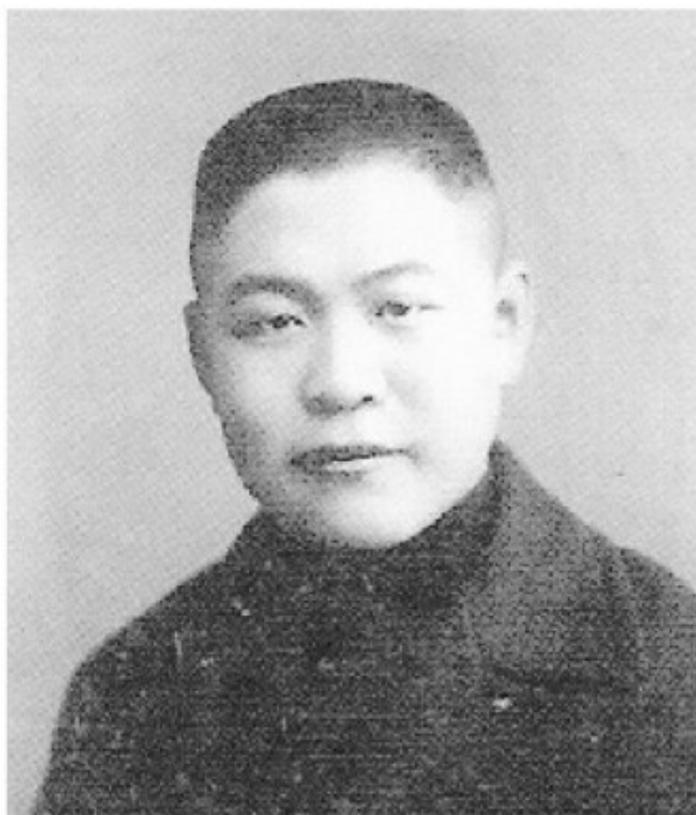
9月，國民黨軍進犯承德，馬洪參加了冀察熱遼司令程子華和省委書記黃火青組織的軍民反擊戰。在一次戰鬥中，敵方忽然增兵將我軍團團圍住。設法突圍的時候，馬洪隨行的機要員犧牲了，警衛員也被打散，一顆子彈射向馬洪，卻打在他所攜帶的手槍上，故幸免於難。

所以，那回得瘧疾，已不是馬洪第一次面對死亡、第一次過生死關。年僅 26 歲的他，仗著年輕力壯，仗著天生底氣足，在敵強我弱、無醫無藥、甚至缺吃少穿的艱苦條件下，硬是挺過來了。

自童年起，周圍的人便對他期許很高。參加革命以後，他又成為組織上重點的培養對象。這三次死裡逃生的經歷，使他珍惜有生之年。無論在延安還是熱河，馬洪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因為他始終有一種使命感，要為國家和人民做一番大事業。

1947 年秋冬，馬洪負責在熱河寧城縣推行土改。東北局的領導人高崗來視察工作，對當地的工作進展予以表揚。1948 年 5 月，馬洪被高崗調任東北局。

從那時起到 1954 年“高崗事件”，六七個的年頭過去了。現在馬洪倒在軟臥的床鋪上，但他的知覺漸漸地回復。他才意識到自己已被捲入一場危險又脫身不得的政治漩渦，而他本人則面臨一場生死存亡的搏鬥。但這一次威脅他的不是洪水，不是瘟疫，也不是敵人致命的槍彈，卻是自己的“反黨”罪行！……一想起 1952 年底，他才跟著高崗春風得意地從沈陽進京，時間還不到一年半，簡直就跟作夢一樣……



馬洪進入同蒲路工作，攝於山西定襄，1936年。



馬洪進入馬列學院學習，攝於延安延圓道，1939年。



在陝西米脂作農村調研，左四為馬洪，左五為張聞天，1942年9月



黃河渡口合影，右三為馬洪，右四為張聞天，1942年。



馬洪任熱河省平泉縣縣長，1946年。



馬洪任熱河省
寧城縣縣委書記，
1947年。



馬洪、陳伯林夫婦與馬雅，攝於瀋陽，1949年。



馬洪夫婦，攝於瀋陽清華街，1950年。



馬洪在國家計委工作時期，攝於雲南石林，1952年。



馬洪和馬雅在北京頤和園，左為秘書張磐，1953年春。

1.3 “五馬進京”，高崗得寵

1.3-1 陳雲替毛澤東遊說

一年前，1953年的北京。這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雖是三月，萬千楊柳已在春風中擺動枝條，而柳絮綿綿，紛紛揚揚，滿城飛花。

東交民巷8號。這從前是法國大使館，現成為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崗的宅第。那宅第門樓巍峨，一對青灰石獅雄踞兩側。平時，兩扇紅漆大門緊閉，只開旁邊的小門出入；庭院內地有百畝，綠樹成蔭，芳草鋪被；兩層的主樓坐北朝南，房屋共幾十間，樓下的大廳可容納數百人翩翩起舞。

自高崗從東北進京，主持國家計委以來，他的門前車水馬龍，號稱“經濟內閣”的國家計委委員和八個重工業部的部長們，常在此聚會，有時甚至有黨和政府的其他要員參加，顯示出高崗權勢日隆。可今天是例外。不知是巧合，還是刻意的安排，當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奉命執一密件到達時，門前竟異常的冷清。

按照常規，但凡重要的機密文件，均由中央機要局派人專門遞送。此件卻由毛主席的機要秘書親自送來，勢必非同小可。所以，高崗帶著恭敬而略微緊張的心情，翹首以待。

高崗這年四十八歲，身材高大而強悍，紅潤的臉上有幾粒麻

點，這是他小時候在陝北農村鬧天花時落下的。高崗進京還不到一年。在此之前，他是東北人民政府的主席和東北局第一書記。是毛澤東親自點名讓高進京來的。

高崗記得清清楚楚，一年前，陳雲特地由北京趕到沈陽，將主席的這個意思傳達給他。陳是他從前在東北有交情的老同事，目前在北京主持全國的財經事務。高崗聽了這個消息後很覺突然，雖說“受寵”，但更為“若驚”。說實話，高崗喜歡留在東北。自解放戰爭起，他在後方支援四野的林彪打仗，連戰連勝；全國剛解放，他又配合彭德懷抗美援朝，也是合作默契，捷報頻傳。在東北，高崗領導接收了日偽留下的大工業企業，重建了新中國的重工業基地，為解放軍大軍南下和全國勝利，都起了巨大的作用。這裡的幹部群眾，他知根知底，幹起工作來心裡踏實。“每到逢年過節，大紅燈籠高高掛，無論機關還是街道，我的像和毛主席的像一起並掛；東北的工作虎虎有生氣，有目共睹。別說主席，就連斯大林見面也不住地誇獎，另眼相看啊！”想到此，高崗心裡很自在。而北京，在中央工作，高崗不熟悉，擔心做不好。但陳雲勸慰他：“這是毛主席本人的意見，他很看重你。不要推辭了。”

提起毛主席，一股暖流馬上湧遍高崗的全身。自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起，高崗同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人在陝北領導紅軍打游擊，建立了革命根據地。但當時以朱理治、郭洪濤為代表的“王明左傾路線”，對劉志丹等橫加打擊迫害，誣蔑他們是“土匪武裝”；1935年，又將劉、高等逮捕，嚴刑拷打後準備活埋。虧了中央紅軍及時趕到，搭救了他們。而陝北的根據地的存在，

實際上也為長征的黨中央和紅軍，提供了落腳之地；為此，毛澤東表彰了陝北紅軍和根據地對黨和軍隊的貢獻。高崗本人，則因大力開展邊區工作成績突出，受到主席的提攜。最令高崗感激涕零的卻是，1939年底，毛澤東在楊家嶺他的住所親自出面，用當時邊區少見的臘肉和雞蛋請客吃飯，為他作大媒。幾天後，高崗便與20歲的李力群成了親。

高崗出身貧農，文化程度為師範畢業。他從小就天不怕、地不怕，帶領村裡的窮孩子們去討飯，然後坐在炕上作“山大王”，讓娃娃們給他磕頭。而高的家鄉米脂，是明末“闖王”李自成的故鄉。高崗對毛澤東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在這老農式的知恩圖報的情緒中，還夾雜著江湖義氣的成分。後來他在東北雷厲風行、政績卓著，一再得到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贊揚，高崗卻單把這筆好帳，全記在毛澤東一人名下。因此，當陳雲強調：“這是毛主席親自點的名”，高崗一來義不容辭，二來感戴毛澤東的器重，便下了決心不辜負主席對他的厚望。

自打建國起，毛澤東就謀算把地方權力集中於北京。1952年，在他的精心策劃下，高崗由東北、鄧子恢由華南、饒漱石由華東、習仲勛由西北、鄧小平由西南，分別從地方調入中央，即所謂的“五馬進京”。當然“一馬當先”的是高崗，他榮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國家計委與當時的政務院（國務院）平級，主管重工業八個部門，因而削弱了以周恩來為總理的政務院的權威。而且，國家計委的副主席有鄧子恢、李富春、賈拓夫；委員包括陳雲、彭德懷、林彪、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習仲勛、黃克誠、劉瀾

濤、張璽、安志文、馬洪和薛暮橋。這其中許多人都是黨政軍的負責人，高崗卻是計委首長，可見他的權重一時。

1.3-2 高崗享有殊榮

進京後，特別讓高崗感到毛澤東對他器重的是，他位於中南海的辦公室就在第一層，和毛主席是對過；可劉少奇、周恩來則在同樓的第二層。這使得高崗有許多機會同主席單獨接觸，談工作或者聊天。因此，高崗聽了毛澤東的一些“私房話”：比如，他表露出對劉少奇不那麼滿意，覺得劉的思想有些“右”，也許“過不了社會主義的關”；比如，蘇聯專家對周恩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贊同，看來還得返工；比如，現在有些人大權在握，辦事也不跟他打招呼，像“新稅制”沒通過他就推行下去了；比如，有些制定的政策反倒照顧資本家，等等。

高崗從來沒在中央工作過，對於高層的這些意見分歧，儘管耳有所聞而未知其詳。加上他生性疏闊，對中央一些複雜的人事關係既不摸底細，也沒有太大的興趣。就高崗而言，毛主席總是正確的，自己要聽毛主席的話，努力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好工作。

儘管如此，到了這年的春夏之交，當毛澤東要求高崗去調查劉少奇 1929 年在奉天（沈陽）被捕後的敵偽檔案時，高崗還是大驚失色。

在先，高崗理解毛澤東對劉少奇在路線上有些“右”而不滿

意，萬沒料到，主席竟對劉少奇的革命品質產生懷疑！震驚之餘，高聯想起毛對劉少奇的種種指責和抱怨，心中豁然開朗：原來主席對他這個七大後安排的接班人不放心，怪不得憂心如此之深。轉過這條筋來，似乎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既然毛澤東對劉少奇有疑心，按照高崗的推理：“劉少奇顯然有問題，並且是極端嚴重的問題；而主席處於他的地位和身份，有些話不便說，有些事情不好做，所以我們要替主席分憂！今天，主席把這天大的機密交給我，說明他認為我高崗是可以信賴的！”

此刻，高崗渾身微微顫慄，不像是一個部下對上級，而像是一個感激涕零的臣子對君主，甚至更像一個願盡孝心的兒子對父親。事後，高崗並沒有認真地推敲其中的利害，只認定這是一樁極端異乎尋常的重托，只認定自己已成為毛主席的親信。

話又說回這年春天，高崗接到毛澤東繞過通常渠道，而由他本人的機要秘書親自送來的密件。機要秘書鄭重告知高崗，他就在高的辦公室外聽候，待高將文件閱畢，由他立即收回帶走。

高崗坐到辦公桌前，打亮台燈，小心翼翼地打開來，原來這是一份名單，一份有關“八大”政治局委員的草擬名單。他仔細地讀了一遍，然後又讀了一遍。“怎麼這裡面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高崗陷入了思索：“誰擬的名單？這名單對誰有利？主席為什麼拿給我看？…安子文是組織部副部長，實際上掌管組織大權，這名單有可能是他擬定的。名單上包括許多‘白區’的人和‘北方局’的人，如彭真、薄一波等，都對劉少奇有利……可安子文哪有這麼大的膽子，敢擬這個名單？肯定他背後有人。那麼，這人顯然就是

劉少奇嘍！……原來，這是主席讓我知道他們的動靜，好有所警覺，有所防範呵！”

毛的秘書臨走前，對高崗千叮萬囑，此名單要保密，切勿外傳！可他前腳走了，高崗後腳就去找陳雲。這麼大的事，高崗心裡可實在裝不住。何況，陳雲是最可靠而又能給予指點的人。

1.4 毛澤東不滿劉少奇和周恩來

1.4-1 毛不甘受蘇俄制約

毛澤東已經兩天兩夜沒睡覺了。幾十年的戎馬倥傯使他起居不定，飲食無常。每當他心裡有事，就牙疼上火，更容易失眠。只有事態明朗了，只有他對事物有了初步的了斷，他才好入睡。

1893年，毛澤東出生於一個富農家庭。當時清朝政府腐敗無能，世界列強爭相瓜分中國國土，那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代。像同代的許多青年人一樣，毛澤東立志救國。他高身材，體魄強健，雖生就一雙東方美目，一張頗具女性特徵的臉，卻天性好鬥。他從小喜歡游泳，意欲向風浪挑戰：“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他的座右銘。毛澤東的一生也確實是從大風大浪中過來的。

毛澤東個性極強，對聯共插手中共事務一直不滿。早在大革命時期，先是共產國際代表要求讓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工作——中共那時隸屬於共產國際，是它的一個支部；後來由共產國際作出決議，指令如此“國共合作”，中共則必須服從。於是，當時的中共黨員變成國民黨員。那次國共合作，雖使革命形勢大發展，打倒軍閥和北伐勝利在望，中共的影響卻引起國民黨右翼的防範與敵視。鑒於國共關係錯綜複雜，中共黨員紛紛要求改變這種“黨內合作”的方式，卻被蘇聯顧問鮑羅廷壓下。鮑認為，中共要以大局為重，忍耐求和，等北伐取得徹底勝利，再來檢討、解決矛盾。結果在 1927 年，北伐軍的總司令蔣介石與共產黨決裂，國共兩黨之間的同盟破裂，大批共產黨員被捕和被殺。

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領導瞿秋白、李立三不斷搞城市暴動，頻頻失敗。毛澤東則發動“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創建紅色根據地和壯大紅軍。後來，共產國際不但不總結蹲在城裡鬧革命的經驗教訓，反從一再指定其政策的代理人，遙控中國革命。特別是王明，在 1931 年主持中央工作以後，拿共產國際的指令當聖旨，一概不顧中國的具體國情。在王明去莫斯科以前，指定博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否定毛澤東等“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和“游擊戰爭”等方針，並剝奪了毛澤東等人的軍權。其結果是白區損失 100%，紅區損失 90%，1934 年紅軍被迫長征。直到 1935 年的遵義會議，局勢才扭轉過來，毛澤東才逐漸重新掌握軍政大權。

抗戰期間，毛澤東在陝北紅色根據地的延安，通過“整風”整

肅了王明的勢力。由於抗日，國共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和國民黨軍一起抵抗日本侵略。1945年，在中共的七大上，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正式認可毛是中共的最高權威。日本投降後，旋即在1946年，國共之間的和談破裂，中共發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炮聲……

“可是俄國人繼續反對我，”毛澤東憤憤地追憶，“那共產國際，不過把我黨當作他們的一個支部，高高在上地作‘太上皇’，動輒就指定誰誰作他們的‘兒皇帝’。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們讓我們與國民黨國共合作，落得個蔣介石叛變革命。

“抗戰勝利，他們又鼓動我們同蔣介石和談。當我們佔了東北，駐地的美國代表不走，呆著觀望，也許等待跟我們建立關係。但經周恩來請示蘇聯，斯大林示意我們把美國人轟走，迫使我們向蘇聯‘一邊倒’，杜絕了中國走‘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當然接著就‘別了，司徒雷登’！等我們打到長江之北，斯大林竟讓我們隔江而治，不准將革命進行到底。儘管當時美英大使還留在南京，蘇聯大使羅申卻跟著國民黨的臨時政府跑到廣州去了。”

毛澤東越往下想，他的心緒越不能平靜：

“……終於盼到全國解放，我去蘇聯見了斯大林。我對他說：‘我是個受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呵，’他掐斷我的話頭：‘勝利分清了是非，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容我繼續申訴。我在莫斯科乾住了兩個月，斯大林一直避談要害。其實他是想維持‘雅爾塔會議’的結果，同美國一起瓜分世界；他是想維持與蔣介石簽訂的《中蘇條約》。這樣，我們就不能再提‘外蒙’的問題了；這樣，

他們就連中長鐵路和旅順、大連軍港都不用歸還了。直到我宣布要回國，西方媒介也有了我被蘇俄軟禁的謠言，斯大林這才讓了步，這才同意改簽了條約。

“後來金日成貿然南進，蘇聯生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敢出兵，卻支使我國出兵。我們內戰剛結束，亟需休養生息，並且與美國較量，我們武器的差距也太大，但我們咬咬牙還是參戰了。他們出的是錢和槍，我們墊上去的可是子弟兵！由於我們抗美援朝，美國派第七艦隊封鎖了台灣海峽，放棄了‘袖手旁觀’的政策，轉而公開支持蔣介石；於是無限期地推遲了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到頭來還是我們付出了代價。”

與蘇俄的關係一直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結，他對此總難以釋懷：

“……俄國人不拿我當自己人看待，就因為我不是他們的心腹嫡系，而是他們眼裡的‘鐵托’。我毛澤東搞革命是為了救中國，不是為給克林姆林宮效力。我們中國解放，也不是為給俄國當個附庸。可天底下有幾個人知道，多少年我毛澤東來反封建、反資本主義，打日本、打美帝，還得時時提防臥在身後的俄國同志，來保護我們中國的利益。”

1.4-2 他比較劉、周、高的優劣

在回顧了與蘇俄的關係之後，毛必然轉到中國黨內，這才是

他近來經常思慮的焦點：“現在黨內的許多同志看不清這個問題。全國解放，他們就以為革命成功了，或貪圖大城市的安逸，或忙碌於文件往來，成了庸庸碌碌的事務主義；有的甚至忘記自己是共產黨人，同資本家拉拉扯扯。而我最看不起的是那些假洋鬼子，把中華民族的利益放到一邊，聽候洋人的指令，好像外國的月亮都比中國的圓……”

對當前時局的審度，更加紛紛雜雜，攪得毛澤東的腦海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前政務院提出的‘五年計劃’，連蘇聯專家都通不過，認為太冒進。看來周恩來，甚至陳雲也不見得有領導全國經濟的能力。我調高崗來組織計委，有了‘經濟內閣’，才算有了糾偏的可能。不料，前不久周恩來在薄一波的慫恿下，搞了個什麼‘新稅制’，給資本家很多好處，也不通知我就把文件發下去當法律來執行。這樣下去怎麼了得？要開一個財經會議，好好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把我們的財政方針擺正。這事可交給高崗去做。”

毛澤東的臥室在豐澤園內，豐澤園處於中南海的南海北岸。由於他“日出而入，日落而出”，雖此時是常人的大白天，卻是他的黑夜。然而，毛澤東心事重重，儘管四扇大窗用黑布和紫紅絲絨捂蓋得嚴嚴實實，一絲兒光不透，他依然輾轉反側。

他記得兩個月前，譚震林來見，提起“紅區黨”和“白區黨”的問題，說“白區黨”的人佔去了很多重要的位置，如安子文的中組部、彭真的政法委員會、薄一波的財經委，他們原來都是北方局劉少奇手下的幹部，這樣的話，“紅區黨”的幹部就都被排擠掉了。

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搭碴兒，可譚的話他是往心裡去了。

“……還要開一個組織會議。那派誰去辦？還是高崗罷。”

毛自言自語，嘆了一口氣。

毛澤東對高崗的印象頗佳。高崗從農村來，是個老粗，農民那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根子很深。毛同樣來自農村，兩人造反的初衷不謀而合。

1937年底，王明、康生、陳雲同機回國，王明被譽為“崑崙山下來的神仙”。高崗對這個教條主義者卻不買賬，提醒說：“原來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什麼好東西，沒想到是禍從天降！”毛澤東本人也很不耐煩王明那種喝洋墨水、西服革履式的人物，張口希臘、閉口羅馬，可連家鄉的五穀雜糧都分不清；更不說多年來他受王明“左傾路線”的迫害和打擊。

自然而然的，毛澤東掂量起黨內目前幾位領導人的情況，劉少奇是他首先想到的一個。劉的年齡與出身與毛相似，不同之處是劉後來去過蘇聯受訓。劉以在“白區”領導工運著稱，並且因為擁護毛澤東排擠王明有功，在中共的七大上，成為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灰白頭髮，瘦長臉，一貫表情嚴肅。

“劉少奇麼，對工農大眾漸漸不感興趣。近年來一會兒鼓吹‘富農入黨’，一會兒宣傳資本家‘剝削有功’，同時娶了個大資本家的女兒。興許他想當個‘紅色資本家’？”

接下來，毛想到的是周恩來。周出身大家族，祖上作過大官。他早年去法國時加入了共產黨。周恩來儀表堂堂，風度翩翩，具有公認的社交和外交上的才能。無論在國民黨還是在西方人士

中，周都享有盛名。

毛澤東記憶清晰，當初周恩來年僅 20 出頭，便在黨內握了重權：

“1925 年他剛從海外歸來，懷揣著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介紹信，馬上在當時的國共合作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1927 年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他又受命擔任南昌起義的總指揮。但是，南昌起義兩萬餘人的隊伍，後來只剩下千把，還是被朱德和陳毅拉上井岡山，跟我會合的。周自己卻轉身去了上海，在黨中央工作……”想到此，毛澤東面露輕蔑。

毛澤東不由自主地拿高崗同劉、周作比較：“高崗同他們不一樣。雖說黨內也有別的粗人，比如彭德懷，而高崗比我小十好幾歲，我還救過他的命。36 年高崗差點被‘左傾’分子活埋，幸虧我們中央紅軍趕到。39 年我又給他做大媒。鄉下人嘛，對恩恩怨怨總記得特別清楚，所以高崗對我忠心耿耿。

“他不但人能幹、有魄力，對我交待的事一點不含糊，並且性子爽、大大咧咧，像條綠林好漢。有一次開會，某某人在上面作大報告，連篇累牘，我都聽得坐不住了，看見鄰座不遠的高崗，點起打火機，燒他小腿上的汗毛。在場的幹部有的大驚失色，有的嗤之以鼻，我倒蠻理解他。長話短說，廢話少說。有些人就喜歡裝腔作勢地作報告、批文件，煞有介事，而對革命的精神實質卻含混不清。這高崗身上有一股‘猴氣’，和那些循規蹈矩的人不同……有的事我不放心交給別人去做，即使交辦了，他們也會打折扣，他們也沒有高崗的膽量。所以，財經會議、組織會議都得由高崗去張

羅。”

心中有譜之後，毛澤東的心境平靜下來，遂進入夢鄉。

1.5 陳雲與高崗的私交

1.5-1 同志加兄弟

陳雲與高崗年齡相仿，資歷卻比高老得多。他是江南人，出身貧苦，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店員時參加了工運。王明時期，陳雲已成為白區的重要領導；1935年奉共產國際的命令去了蘇聯，1937年和王明、康生等同機回到延安，主管組織部門。1942年延安整風，批判王明路線，陳雲受牽連，下放到西北財經辦事處當副主任，原中央組織部長的職務由彭真來接任。彭真的接權與他在北方局的上級劉少奇有關。劉與彭都在整治王明時立了大功。陳雲性情溫和，說話慢條斯理，做起事來也沉著穩重。王明挨整以後，陳雲為人處事更加謹慎。

早在陝甘寧邊區時，高崗就對陳雲的印象不錯，可他和陳雲是在東北時期才有了頻繁的交往。當時高崗已是東北局的書記之一，陳雲不過是東北局的委員，彭真則是東北局的第一書記。

那是解放戰爭初期，彭真等領導人，對國民黨的和談抱有幻

想，並固守城市忽視農村，這引起了東北局領導層內的爭議。陳雲在政策討論會上，對彭真的種種做法提出批評，而陳的意見得到林彪、羅榮桓、高崗等其他領導人的支持。毛澤東和黨中央因此調動了彭真的職務，由林彪取代。

而1946-47年間東北局的這些是非，影響到有關幹部的團結，一些人甚至結怨甚深，延續多年。後來林彪南下，高崗接替其職務。接著，林、高、羅聯名上書黨中央表揚陳雲，陳成了東北局的副書記。因為陳雲在反對彭真的失誤時，立場和態度都很鮮明，使高崗對他的評價更高，認為陳不但老成持重，還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一位黨性和原則性都很強的好同志。於是他們之間的私交也多起來了。

對於陳雲來講，高崗工作潑辣、效率高，且快人快語、有俠義之氣，這似乎與他本人的性格有天壤之別，但他兩人工作上默契，私下也談得攏。對於高崗來說，跟陳雲接觸久了，知道陳的閱歷很深，看問題很有見地，卻從不自我標榜。陳雲的長處正是自己的短處，應當向他好好學習。

自從有私交以來，雖然高崗略微年長，地位較高，個頭也明顯高大，但他與陳雲之間已形成了這樣的位置：陳雲是大哥，他是小弟。他訴說，陳雲傾聽；他說完，陳雲給分析，出主意。這種良師益友的關係使高崗受益匪淺。當高崗向陳吐露林彪稱病不肯領兵出朝，陳預言彭德懷會取而代之；當高崗吐露主席對“新稅制”不滿，遷怒於薄一波，陳判斷這說明主席認為周的政務院至少是工作上不得力。陳對問題看法之深刻、中肯，令高崗佩服得五體投

地。加上陳本人生活儉樸、作風檢點，在高眼裡，陳雲黨性既強又有水平，簡直就是一位無可挑剔的聖人。高崗凡事都願與陳雲交換意見，得到指點。

調北京工作，高崗本心並不那麼樂意：東北呆慣了，自己說話算數，是個“大本營”。而上北京，他自知不瞭解中央的情況，總不如留在東北實在。經過陳雲的勸說，反復說明這是主席親自點的將，高崗方才披掛上陣。顯然，陳能替高提供信息，幫他分析問題，然後兩人一齊來商議解決的辦法。所以，進京以後，高崗幾乎天天跟陳雲接觸，不見面至少也打個電話。一開始，多是高崗向陳雲請教，漸漸地，陳雲也不斷向高崗打聽從主席處得來的動向。

陳雲住在北長街的一個四合院，既離中南海較近，又不事張揚，因為其他幾個平級的負責同志也基本如此，算不得搞特殊化。但高崗住的那東交民巷8號，則是豪門大戶。雖說因為高進京遲，也許合適的房院分光了，可在陳雲眼裡，還是過於招搖。

1.5-2 高、陳的一次密談

時間不早了，陳雲本打算休息，不想高崗突然來訪。陳雲長年身體欠佳，所以對飲食、作息十分在意，既有節制，又有規律。這習慣高崗知道，平時也很尊重。此次破常規夜間來訪，必有要事相商。陳雲近來從高崗處聽說，主席對劉少奇不那麼滿意，覺得劉比較“右”，興許“過不了社會主義的關”。陳看得出毛對高

確實信任，不時向他吐一些“私房話”。陳雲估計高的膽子再大，也不敢胡編亂造主席的意思；即使高有誇張的成分，或者摻了他本人的情緒，可陳雲從自己對主席的觀察中，判斷出高崗傳遞來的消息基本上是可靠的。

高崗到達陳雲處，陳雲把他讓進書房裡，掩上房門，慢聲細氣地問：“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啊？”

這一問，倒像主席的千叮萬囑忽然在耳邊響起，高崗竟一時說不出話來。

陳雲示意讓高崗坐下，他自己徑自坐上了沙發。高崗本來是一個生性好動的人，情緒激動時更愛來回走動，但這次陳雲發現高崗只是沈默地在書房裡度步。於是，陳自己點上一支煙，又把煙盒遞給高崗：“不著急，慢慢講。”

高崗猛吸幾口煙之後，方才立定，把名單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訴陳雲。陳雲卻陷在沙發裡悶不做聲，靜靜地吸煙。高崗知道陳雲有時會裝聾作啞，這是由於他為人小心，尤其在王明路線之後，更不輕易發表觀點。於是，高崗把名單又重複了一遍，見陳雲還是沒有動靜，為了省事，索性替陳雲把想法用自己的話說出來：“你看看，薄一波搞了‘新稅制’都在名單上，可林彪打了那麼多勝仗，名單上卻沒有！”

陳雲聽著點點頭。

高崗明白陳雲儘管在白區多年，卻與同在白區的“北方局”過往不密，而且在東北與彭真爭議也得罪了一些人，所以又接著說：“這名單顯然對北方局來的人有利。我看是安子文搞的。不過

安本人沒有這麼大的膽兒，肯定他背後有人！”

陳雲聽罷又點了點頭。

高崗覺察出陳雲同意自己的意見，便來了情緒。他談到三月初斯大林逝世後不久，毛澤東向他流露出在“接班人”這個問題上的憂慮。主席雖然身體健康，可畢竟年近六十。似乎他對劉少奇不那麼放心，想讓劉“挪挪位子”；說劉“這個人喜歡送往迎來，不如去當個議長”。而八大在即，主席當然有考慮。另外，高崗認為設總書記，容易把主席架空。

聽到此，陳雲才插話：“設總書記的確不好，要設就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都可以參加，林彪也可以參加。”

高崗一拍大腿：“對，這個辦法好。這樣他們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

那麼，由誰牽頭呢？朱總司令年紀大了，林彪又身體不好。於是高崗說：“我看只有你了，陳雲同志！”

陳雲忙擺手：“我不行，身體跟不上。你比我的本錢大，主席信任你，你在軍隊和地方又都有人緣。你出來挑頭最合適！”

高崗沈吟一陣之後，提出這想法是否應當先向主席匯報？不知何故，陳雲卻說：“不忙，你先幹起來，等搞確實了，再說也不遲。到時候，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兩人當下談得十分投機。

坐在回程的轎車上，高崗回味著晤談，激動得難以自己：“讓劉少奇‘挪挪位子’，解決了接班人的問題，去了主席的一塊心病，也算我高崗報答他老人家的知遇之恩。”高崗感到此舉既義不容

辭，又師出有名。

而且，“你一個，我一個”，想見自己的權位日隆，座次甚至推前，他難免沾沾自喜。特別是陳雲的應許——“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更使高崗感覺上了政治保險，心裡頭相當瓷實。

只見車窗外一輪明月，懸掛中天，圓滿之至，徐徐的夜風送來陣陣暖意。值此良宵，高崗又怎能不陶醉？

恰與高崗相反，高崗走後，一貫從容不迫的陳雲被攪得七上八下。雖是融融春夜，他卻手腳冰涼，越往深裡想，越覺得不妥當，脊梁上竟冒出一股寒氣。

憑著多年靈敏的政治直覺，他感到時局的動蕩。與高崗的這番交談，既給他帶來機會，也會給他帶來危害。“今晚也許話說多了，”陳雲暗暗失悔。張國燾的落荒而逃，王明的徹底清算，1942年的整風……陳雲知道，在和藹可親的面容底下，毛澤東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1.6 “兩會”——毛澤東試探劉、周實力

1953年的夏天也來得分外早。才6月初，已華陰如蓋，儼然像是盛夏天氣了。

高崗最近特別忙，百事纏身。他身為國家計委主席，領導全

國的工業，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本來就忙得不可開交。好在搞生產建設，在陝甘寧邊區，尤其在東北，他積累下豐富的經驗，可以說輕車熟路。當然，搞全國的這還算頭一遭，但他行政能力強、政治熱情高，被主席賞識，被同志們擁護，更加上天生自信，所以他走馬上任三把火，已初見成效。

休頭的倒是，毛澤東還有其他的委託，這是他從東北進京以前始料所不及，僅目前布置下來的就有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兩大樁。而主席對這兩個項目，似乎比對計委的工作更為重視。捫心自問，高崗對這兩項心中並沒有多少底數。儘管在中南海上班，且辦公室就在主席的對過，可除了毛主席重用自己，有事常和陳雲通通氣之外，他在北京並沒有什麼人脈。

如果說高崗有什麼根柢，還是從前在陝北，後來在東北的幹部。而且，多年來同部隊上的領導關係也很不錯。尤其對林總和彭總，高崗有一股勝於對一般同志的兄弟之情。他想起，解放戰爭時，林總把東北局交給了自己，揮軍南下，從松花江一直打到海南島，所向披靡。蔣介石視其為魔鬼，國民黨軍聞風喪膽。

他又想起：“抗美援朝時，美國佬號稱‘世界第一’，連蘇聯老大哥都不敢出兵，連林總也託病，可彭老總雄赳赳，氣昂昂，跨過了鴨綠江。當時美帝不可一世，飛機、大炮三天三夜，幾乎把上甘嶺炸平；到最後，還不是我們的志願軍在彭總的指揮下，硬把他們給打趴下了！聽說，就連我們的手下敗將，那些逃到台灣的蔣匪幫，都覺得這為我們中國人爭了口氣。我真為彭老總感到驕傲，打出了國威，打出了軍威！甚至作為後方支前的我，也跟著臉上有光。

“但搞什麼財經和組織兩會，不能說是我的強項，因是主席的重託，只好趕著鴨子上架嘍。”高崗天生好強，一來不願打退堂鼓，二來也不能給毛澤東丟人。

中南海內，毛澤東躺在菊香書屋的一張大木床上，身披一襲睡袍，或讀書，或思考。近來他去辦公室漸漸稀少。他不耐煩穿戴整齊去辦公，流於形式，浪費時間，防礙他斟酌真正的天下大事：

“建國以來，形勢變化，中國面臨新的課題：打仗變成了建設，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可命還是要革的。中國窮，要前進，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氣力。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照抄人家的東西。再說，我們的江山也不是靠別人給打來的。”

想到此，毛澤東放下手中的《資治通鑑》——那部近千年前北宋司馬光撰述、歷代統治者都引以為鑒的史書，起身踱步，並點起了一根煙：

“先派周恩來和陳雲制定‘一五’計劃，其冒進脫離實際，令蘇聯專家瞠目結舌，顯然行不通。我雖然不是搞經濟出身，周恩來又懂得多少經濟？由於東北經濟搞得不錯，也許有些經驗全國可以借鑒，所以才把高崗調來試一試。搞建設，對於全黨說來都是新鮮課題嘛。再說，高崗的計委，掌管了重工業八個部門，形成了‘經濟內閣’，對政務院至少也算個鉗制。”

但這計委的成立，還沒去掉毛澤東一半的心病。他又燃起一支煙，繼續沈思：“今年開初，政務院在財政部長薄一波的主持下，制定了一個‘新稅制’，對全國的資本家和中小業主作了很大的讓

步，對我們政權以工農為基礎的基本利益，起碼是考慮不足。而周恩來就把它當作法令發布下去了，這麼大的事，事先竟然也不跟我商議一下。這樣下去怎麼行？我已讓高崗組織一個會議，批判這種右的傾向。而且薄一波，是北方局劉少奇下面的人，好像歷史上還有什麼自首問題。敲打薄一波，就是敲打劉少奇，同時也捎帶了政務院。好在高崗這人聽我的話，辦事雖然毛糙些，可以調教。”

毛澤東的牙周隱隱作痛，近來這影響到他的睡眠，而睡眠不好，反過來又使牙疼加重。他試圖用游泳和體力上其它一些消耗使自己疲勞，誘導入睡，可以往的經驗證明，這多半要等到問題有些眉目。此時此刻，毛的思維卻異常活躍：“經濟問題重要，組織問題更為重要。從蘇區來的譚震林，那天提出了‘蘇區黨’和‘白區黨’的觀點，切中要害。組織部門已經有了許多北方局的人，安子文在八大名單上還要作進一步的安插。他們人多，累年經營，勢力不小。高崗也布置人去開組織會議了，但不見得管用……我一再用高崗，是不得已。”

話說懷仁堂這邊，財經會議正緊鑼密鼓地進行。周恩來、薄一波早覺察毛的動向。特別是周恩來，以往中央文件送領導人批閱時，順序是“毛、劉、周、朱（德）、高”，近來周把順序改為“毛、高”，甚至是“毛、高主席”等。

在財經會議上，周和薄爭先檢討，竟至痛哭流涕。許多與會者本是“新稅制”的擁護者，見周、薄的表態，當然給予同情；又見

高崗剛進京不久，依仗主席的信任，便以勢壓人，心中自有不平。因此，財經會議的結果，毛澤東並非大獲全勝，頂多是勝敗參半。

可高崗自恃有主席作後盾，自認有陳雲鼎力相助，在上下一片讚揚和吹捧聲中，飄飄然忘乎所以。他沒有意識到，經過連年的戰爭，許多幹部久亂思定；他更沒有料到，在他的身邊，其實是危機四伏，有人已經開始整他的黑材料了。

財經會議尚未結束，高崗以為八九不離十，便南下休養去了。他確實想解除一下連月來的疲勞，於是把組織會議推給了張秀山和饒漱石。高崗進京後，張秀山接替他擔任了東北的第一把手，而且受毛澤東的委託，查找敵偽檔案，調查劉少奇在歷史上是否有變節行為。

饒漱石原為華東局第二書記，為“五馬進京”之另一馬，進京後任中央組織部長。這“五馬進京”，本是毛澤東為了架空地方領導，並且在中央分權的戰略部署。而饒漱石被安插在中組部，則是毛要削減劉少奇、安子文在人事部門大權的一個步驟。其實，饒漱石以前並不認識高崗，從工作關係上講，饒倒跟劉少奇算比較熟。只是作為華東局的書記，饒有一次參觀東北的工作，大表欽佩，曾在毛澤東面前誇獎過高崗。

主持組織部之後，饒漱石對安子文層層安插手下的人馬，頗為不滿，正打算利用“組織會議”整頓一下。這可談何容易。饒漱石與張秀山企圖開整風會，遭到了強大阻力。

尤其是在會上，張秀山和從東北新調任來的中組部副部長郭峰的發言，都涉及到組織不純的問題。張秀山甚至說，中組部“對

中央一級機關和各地的某些高級機關”，在任用叛變自首分子的問題上，“處理得不嚴肅”；還對富農黨員的問題提出批評。這些提法顯然是有針對性的，因而觸怒了一些人，激起了軒然大波。

自“七大”以來，劉少奇在組織上下了很大功夫，怪不得毛澤東想搬搬石頭。於是在“組織會議”上，雙方爭論不休，幾乎吵崩了。

1.7 高崗泄密犯大忌

1.7-1 忘乎所以，禍從口出

高崗素來不以為人精細著稱，近兩年因得毛主席的格外器重，他的線條變得更加粗略。高把主席的意向，通過自己的領會與消化，做出判斷，形成概念，不知不覺地，這些判斷和概念就成為“事實”。毛澤東向高露了對劉少奇、周恩來不利的風聲，有心人會慎重地留意動向，適時向主席匯報，見機行事。可毛澤東對高破格的提拔，使得他暈頭轉向，自我膨脹。他遂以主席的名義到處擅發言論，企圖給高層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主席對劉少奇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甚至有意以高崗取而代之。

說風就是雨。雖說這“風”確實來頭挺大，這“雨”也並非完全是憑空捏造，但高崗只知“風大”，卻不知這“雨”中夾雜了不少

自己主觀的臆想和願望。他的弦一鬆，許多界限就更模糊了。

一天，高遇見朱德和鄧子恢，黨內的另兩位元老，開口就問他們是否知道八大政治局名單。朱與鄧很詫異，都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本來是一個絕好的提示，告誡他毛澤東對自己是有特殊的信任的，因此應當十分自重；同時也提醒他毛澤東曾千叮萬囑，此名單不可泄露，其用心良苦。但高崗此時已忘乎所以。夏季，高去南方休假，竟又主動地把名單之事告知葉劍英與譚政。高崗不僅忘記了毛澤東不許泄露名單的叮嚀，反而自認為散布名單和對劉少奇不利的流言，能幫助主席實現讓劉“挪挪位子”的意願，當然這也能抬高他本人在黨內的威望。

葉劍英年輕時是一位挺拔英俊的人物。這幾年來小發福、微謝頂。長征後期，以張國燾為首的紅四方面軍，人馬是毛澤東一方面軍的四倍。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裡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是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

多虧了葉劍英，毛澤東轉危為安。從此他不忘葉的功勞。葉劍英是一位風流倜儻、不拘小節的人，被毛稱為“大事不糊塗”。因此，不同於其他領導，如周恩來有王明等前科，如劉少奇在“七大”上來靠的是毛澤東的提攜，葉被主席接見時，瀟灑灑灑，坦蕩自如，絕無唯唯諾諾的拘泥之態。

半杯茶飲下，葉劍英直截了當：“主席，那八大的名單到底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心裡一驚，卻不溢於言表，倒詫異地反問：“什麼名單，我怎麼不知道？”

弄得葉劍英與譚政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葉等退去後，毛澤東大為光火。他心裡清楚，這名單他只給過高崗，且是命他本人的機要秘書專遞，立等閱畢收回，絕對保密。

“可現在怎麼連廣州的人都知道了，豈不已經鬧得滿城風雨？肯定是高崗泄的密！他怎能這樣掉以輕心！要找他來問個究竟。”毛澤東對高崗的行為十分不滿。

1.7-2 高撒謊犯了毛的大忌

當高崗被毛澤東召見時，雖然未知何故，心頭已忐忑不安。因為從前主席跟自己講“私房話”時，常常自然而然，全在聊天中進行，份量很重的話，說起來似乎輕輕鬆鬆。今天突然召見，直覺告訴他這次與以往不同。

毛澤東這幾天本來心煩的事就多。一個財經會議效果參半。周恩來與薄一波並非等閒之輩，以退為進，不但檢討過關，還贏得了人心。另一個組織會議開得更糟，人家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步步為營。可饒漱石赤膊上陣，被打得人仰馬翻。會沒開好，反而顯得黨內出現了分裂，這可是一大忌諱。抗戰、內戰，又抗美援朝，人心思定嘛。毛澤東心頭不安：“我開會，只是要給劉、周一個警告……看來有些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高崗大步步入客廳，臉上帶著誠惶誠恐的表情。

“知錯就好，”毛澤東心說，於是和顏悅色地問：“你知道誰把名單泄露出去了？”

高崗心裡一驚，本想從實招來，可一時竟張口結舌。除了意識到自己違背主席的旨意將機密的名單泄露、犯了大錯以外，高崗更本能地心生恐懼。因為3月間，劉少奇、楊尚昆未經主席批准，擅發中央文件，“破壞紀律”。高崗在場目睹了毛澤東大發雷霆，目睹了楊尚昆嚇得面如土灰，口唇抖顫；到了5月，毛澤東仍然對此事三申五令，耿耿於懷，其怒態令高崗事後回想，都一身冷汗。高崗還記起一些老同志曾說到主席的脾氣特大，並且翻臉不認人。

所以在慌亂之中，高支支吾吾地：“我不知道。”

毛澤東心如明鏡，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強壓心頭怒火，綿裡藏針地依然笑問：“那可能是饒漱石吧？”

高崗喃喃地：“那怎麼可能呢？……”

對高層的鬥爭，高崗沒有經驗。截目前為止，他唯一的一次政治風險是1936年在陝北，幸虧那次黨中央搭救了他，才免於被左傾分子活埋。後來他憑著跟得緊、魄力大，被毛澤東看好，一路升遷。至於聯合誰，打擊誰，本不是他的看家本領。何況這兩年有主席大力撐腰，誰還需要搞那一套？現在他冒冒失失地泄露絕密，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在此節骨眼上，如果他老實認錯，坦白交代，尚許可以彌補過失。

“可他居然敢欺騙我，陽奉陰違，跟我毛澤東耍滑頭！”毛不

由得把拳頭挪到胸口。

高崗退下時，儘管六神無主，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高崗散布名單，卻謊報“不知”是誰泄露。對毛澤東說來，散布名單尚屬言行不慎，尚可酌情處理，可說謊……這就犯了真正的大忌。為此，高崗失去了挽回毛主席對他信任的機會，錯上加罪，釀成大禍。從毛澤東那張依舊掛笑的臉上，他覺察出主席的目光從來沒有過這樣冰冷。

1.8 鄧小平率先舉報

1.8-1 “高崗在底下隨便亂說”

秘書來報告毛澤東：鄧小平求見。

“他找我有什麼事？”毛澤東有些納悶。

其實毛澤東對鄧小平印象不錯。鄧雖然去過法國、蘇聯，吃過洋麵包、喝過洋墨水，但他並沒有像王明那樣鸚鵡學舌，照葫蘆畫瓢，忘了自己是中國人。當年他與周恩來、蔡和森等人留法勤工儉學，因為年齡最小，個頭又小，有時被人小視。比如，他第一任妻子阿金後來就跟了儀表出眾的黨內另一位領導李維漢。從莫斯科回來後，鄧在廣西和農民在一起，跟國民黨打了好幾年的游擊；

後來在中央蘇區追隨毛澤東，遭到排斥；解放戰爭時期，鄧與劉伯承南征北戰，臨渡江佔領南京之前，鄧小平說：“我們打了勝仗，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而劉伯承不敢苟同：“那我們吃了敗仗，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失敗了？”兩人一語不合，便連飯都吃不到一起去了。毛澤東對這點過節，心中還是有數的。

鄧小平那年四十七八歲，年富力強。儘管他身長不足五尺，但兩眼有神，脖頸粗壯，看上去機警強悍，有股實幹家的勁頭。

“西南王來了，”毛澤東坐在沙發上迎接，半開玩笑。

毛喜歡這樣半真半假的說笑。一來，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可能使談話的對方緊張，所以，說個笑話，對方往往就鬆弛下來。二來，雖然是個笑話，其中往往含有真意，有時又會擊中要害，使對方措手不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鄧小平雖不愛咬文嚼字，倒也應對得十分得體。

毛澤東首肯，擺擺手讓鄧坐下，鄧也沒有推辭。

落座後，鄧卻斂起說笑，板起面孔，傾身對毛澤東說：“主席，有關高崗同志的一些情況，我想應向你匯報一下。”

毛澤東靜坐在那裡，吸煙。

鄧小平說：“高崗近來在下面散布了不少對少奇同志不利的言論，比如少奇太右啦，過不了社會主義的關啦，比如主席想讓少奇‘挪挪位子’等等，還把這些話都說成是主席的意思。”

“這些話倒是我說的，”毛澤東心裡默認，眯縫起眼睛。

看到毛澤東沒有表示異議，鄧小平繼續往下說：“少奇同志在

黨內的位置是歷史造成的。我個人也不認為少奇在工作上沒有過失。但是有問題應當向主席說，或者拿到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桌面上來說，而不應在底下隨便亂說，否則就違背了組織原則。”

毛澤東仍然沒有動靜。估計到目前為止，毛澤東似乎贊同自己的意見，鄧小平忽然話鋒一轉：“高崗表示要聯合我，和軍隊的其他同志一起，搞掉少奇同志，這是分裂活動。”

毛澤東聽到此，方才心頭一緊，臉上卻毫無表露。

“高崗說：‘我一個東北，你一個西南，再加上華東和西北……’，”鄧小平點到為止，又見毛面有倦色，便適時起身告辭。

鄧小平退下後，毛澤東的牙周又隱隱作痛。

“我給高崗露些風聲，是讓他心裡有數，而不是像程咬金似的猛打猛衝。現在他打著我的旗號，到處給我捅婁子，還敢隱瞞實情、對我說謊！……可他為什麼要說謊？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是心裡有鬼？”

“那次開軍委擴大會，彭德懷說：‘抗美援朝勝利，60%靠後方支援，40%靠前方打仗，還得感謝高麻子和洪麻子（洪學智）呀！’這把黨中央擺到哪裡去了？高崗最近曾率領大批高級將領，上西山拜會林彪，他們又都搞了些什麼名堂？”

接二連三地，種種不愉快的記憶和念頭紛紛湧上心頭：

“高崗還常在東交民巷8號他家裡開會，有一次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出席了。在東北，開會時竟有人大呼‘高主席萬歲’，看來他九千九百歲還不夠哇。”

“……高崗跟部隊、地方的關係都不錯，東北搞了一攤子，可

以呼風喚雨。現在他東北、西北、華東，還要拉上西南，看來胃口真不小！聽說金日成單獨接見他；而他跟那個柯瓦廖夫總顧問又密談些什麼？會不會要把我們的東北拱手獻給蘇聯，充當他們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

每當毛澤東有心事，就到戶外活動，是他清理頭腦的方式之一。於是，他邁出了豐澤園，繞著南海漫步。雖說是12月初，又幾近半夜，衛士還是一溜兒小跑，才能跟上他那高大的身影。毛澤東迎著飄飛的細雪，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毛澤東決定好整以暇。在先，他雖然有意制約劉少奇，但需要摸清底細，故拿出高崗作為試探氣球。現在，通過兩會，“討薄射劉”、“討安伐劉”，他見識了劉的人多勢眾、實力雄厚，確實不好動，只好往回收了。而這高崗又狂妄自大、輕率魯莽，看來也是扶不起來的。權衡利弊，毛澤東的重心逐漸偏離高崗，先把他“掛”起來，“晾”到一邊。況且，目前局勢尚未明朗：中原逐鹿，鹿死誰手？毛澤東慣於從旁觀察各方的動靜。“不過，鄧小平倒像一個有腦筋、有決斷的人，”毛澤東帶著幾分欣賞地審視。

1.8-2 高、陳出現裂隙

幾天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他要去南方休假，建議當他不在北京期間，由劉少奇或其他幾人來輪流主持中央的工作。

周恩來接口：“既然從前都是少奇主持工作，這次還是照老習

慣來。”

劉少奇推讓道：“還是輪流的好。”

高崗馬上說：“我贊成輪流。”

朱德和彭德懷也贊成輪流。可陳雲和鄧小平贊同讓劉少奇主持。會議沒達成一致意見，毛澤東說以後再議，宣布休會。

高崗窩了一肚子的火。休會後，他乘陳雲的車去了陳家。一進辦公室，連門還沒關好，高崗就開始嚷嚷：“不是事先說好的嗎？你怎麼臨時變卦？”

陳雲長長嘆了一口氣：“也不知道老毛到底怎麼想的，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

高崗氣得鼻孔直煽乎：“怪不得主席叫你老牌機會主義，就會見風使舵！”

這下可觸到了陳雲的痛處。他本想解釋一下自己為什麼這樣做，跟高崗分析分析形勢，勸勸高崗應當小心謹慎。斷不料這高麻子一點也不冷靜，還動不動就出口傷人！於是，素來為人克制的陳雲，也不客氣地頂撞起來：

“我這麼說，也是為了你好！你莽莽撞撞，到處亂說。這樣胡鬧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高崗一直認為這些話都是毛澤東跟他說的，他高某人不過是為主席辦事，幫助去除他老人家的一塊心病。而陳雲，這位推心置腹的“良師益友”，這位黨性強、原則性強的“大聖人”，怎麼一見勢頭不對就打退堂鼓！？

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1.9 陳雲反戈一擊

1.9-1 周恩來向毛稟報陳雲的檢舉

高崗走後，陳雲深陷沙發許久，由惱怒轉為極度的不安：

“高崗這人太危險了！我跟他攬得過深！我和他在一起議論過劉少奇，高說主席對劉不滿意，想讓他‘挪挪位子’。我本人對劉少奇是有一些看法，有的話也許說得過了頭。但好在這都是一些言論，沒有行動，而且與高崗議論時也沒有第三者在場。這樣的事只要向組織上說清楚就行了，該承認的錯誤就承認，不作隱瞞，會得到組織的諒解……”

“可向誰去講清楚？毛澤東不那麼信任我。那年同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同機抵達延安，毛澤東去機場迎接。從他的臉上一眼就看得出，他認為我們都是第三國際派來的。後來彭真接替我當組織部長，我去下面搞財經，一直小心翼翼。到了東北，敢給彭真提意見，也因為他是劉少奇的人。毛澤東知道我和高崗走得很近，否則他不會派我去沈陽，勸高崗放下東北進北京。可天曉得老毛現在到底怎麼想的？沒准兒會反咬我一口‘惡人先告狀’、‘賣友求榮’，罵得個狗血噴頭！……此路不通。”

於是，陳雲想起了周恩來：“我和康生曾在周下面的中央特科

工作過，多年來又一起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周對我是相當瞭解的。再說，周為人點水不露、深沈內斂，只要自己一五一十把情況講明，再由周向毛澤東稟報，估計會免去他不必要的反感，事情應當不至於搞得過糟。”想到此，儘管時間已晚，陳雲還是當機立斷，給周掛了電話。

待周恩來求見毛澤東時，“無事不登三寶殿”，主席已猜出一二：“我毛澤東近來蠻吃得開呀。”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這“風不止”，對毛來說，是正常現象，同時也是他的興奮劑。毛澤東預知風雲突變，他有備而無患。

周恩來五十有餘，濃眉黑眼，深酒窩，是當初與汪精衛、張學良、梅蘭芳齊名的“中國四大美男子”。那天他晉見時，頭髮有條不紊地理向後面，在延安因失馬摔折的右臂饒有風度地勾在腰前，身著淺灰色的中山裝。毛澤東記得：“周恩來在延安也穿土布的八路軍軍服，可一到重慶，馬上換上藏青的西裝。進城以後，因為我不穿藏青和黑色，他這才追隨我，穿上銀灰色的服裝。”

毛澤東在座位上吸煙，揮手讓周入座，而周恩來依然站立著，表情嚴肅而恭敬，他向毛原原本本稟告了陳雲對他的匯報。

毛澤東對周恩來好感不大，陳年的一些往事又浮現在腦際：

“他從法國和蘇聯回來，懷揣著季米特洛夫的介紹信，25歲上就作了大官；‘立三路線’、‘王明路線’他都在台上，導致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紅軍被迫長征；在“遵義會議”上，他見左傾路線大勢已去，便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擁護我作軍委主席掌實權，把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架空，由此而保住了他

自己的軍委副主席的位子……”

周恩來是一個注重細節、辦事認真的人。毛澤東正相反，討厭循規蹈矩，反對繁文縟節。如果夜間睡不著覺，毛就白天睡覺；如果穿戴整齊，使他不自在，毛就披件睡袍。總之，毛澤東認為規矩是為凡夫俗子們設立的，他不能為之約束。面對眼前這位衣冠楚楚的周恩來，他想象周從前就這般畢恭畢敬地伺候王明的。

“這人官癮大，”毛澤東忖道。

當聽周說到高私下裡跟俄國人來往，有“裡通外國”之嫌時，毛澤東眄視周片刻，暗笑：“要說把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利益放到我黨我國之上的，恐怕也不止一人吧。”

報告完畢後，周恩來覺察毛澤東有些心不在焉，以為不便久留，正打算告辭，不料毛澤東用手拂開眼前的煙霧，挺關切地囑託：

“不妨讓少奇召集高崗、陳雲在一起開個‘生活會’，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有些誤會也許當面可以說清。還是以團結為重。”

周恩來退出後，長噓了一口氣，慶幸自己沒有多說廢話。當初，周恩來判斷毛澤東借高反劉，後來又判斷他也許會臨陣斬將、聯劉倒高。所以，周才將陳雲的檢舉，及時向他稟報。殊不知，毛澤東又亮出“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法寶，這不得不讓周對主席甘拜下風。

儘管毛澤東的心思不易解讀，可周不由得揣度他是不是在給高崗留條後路？周恩來記得，在陝甘寧時，邊區老鄉親熱地管高崗叫“我們的高麻子”，胡喬木就此寫到了《解放日報》上，毛澤東看

了，替胡改為“我們的老高”。周還聽說，在東北，高崗打下一隻老虎，用虎骨泡酒專程送給主席滋補，毛對此曾說了一句：“這個高麻子！”由此可見兩人的關係不一般。於是，周決定快刀斬亂麻，以免節外生枝。當然，首先還得鬧明白，在這高崗的人馬裡頭，誰是鐵桿心腹，誰是鼠輩小卒……

卻說周恩來退出後，毛澤東默坐片刻，遂以掌擊沙發扶手，仰天大笑。笑罷，又嘆：“實在高，他倒借陳雲把高崗給端出來了！”

1.9-2 “生活會”告吹

經周恩來下達主席的指示，劉少奇把陳雲和高崗請到自己家裡，開了個自延安整風以來屢試不爽的“生活會”，即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解決黨內的一些矛盾。據說這有別於斯大林的“肅反”，動不動就把黨員幹部拉出去槍斃，而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劉少奇當年五十出頭，瘦高個子，背微駝，已頭髮灰白，是一位性情比較拘謹的人。1945年“七大”召開，他提出“毛澤東思想”，立下大功，加上多年在白區的工作成績，被推上毛澤東副手的位置。然而，自解放戰爭中東北的土改起，特別是解放以後，毛澤東愈來愈感到，他和劉少奇在許多政策上有分歧，總之劉比較“右”，有時毛認為甚至可以上到路線分歧的高度，這就是他向高崗說的“私房話”。至於高崗在下面大肆活動，散布毛澤東對自己

不利的言論，劉少奇不是不瞭解，也明白主席對自己有看法。現在由周傳達，“講求團結”，劉少奇認為至少應當利用這個大好機會，消除誤會，以避免矛盾激化，於黨、於己都有利。

卻說陳雲自上次跟高崗吵崩之後，意識到高崗的言行實在危險，最糟糕的是，高崗沒有自知之明。因此，他不得已才向周恩來匯報了高的情況，而由周再向主席稟報。“這樣至少我陳雲已向組織上說明白，”一塊石頭算落了地。眼下，又得知毛澤東建議開個“生活會”，更使陳雲大大鬆了一口氣，實在佩服主席的英明。如此這般，一來陳雲可乘機公開向劉提意見，消除了在底下搞小動作的嫌疑；二來也可以鼓勵高崗同樣去做，這樣起碼會大事化小。“高崗總不至於蠢到連這點都不明白的地步？！”陳雲作此估計。

可高崗恰恰就是連這點都不明白。他仍自以為受主席的重托，急主席之所急、難主席之所難，揭穿劉的真面目，好讓劉“挪挪位子”。如今，眼看著不苟言笑的劉少奇皺著一張苦臉，一本正經地檢討，高崗不屑地：

“這傢伙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臉，可討過多少個老婆？最後一個還是天津大資本家的女兒！真是要多假有多假！”

再看看眼前這個急於當場表態、隨聲附和的陳雲，高崗失望地想：

“怪不得主席說他‘鷹勾鼻子，最會看形勢，關鍵時刻就拉稀’！以前我還不相信，今天總算見識了。看來也只有我高崗，對毛主席忠心不二、肝腦塗地！再說，你劉少奇有什麼了不起？你有

北方局，我的陝北還救了中央呢！陳雲你也不過是仗著資格老，解放戰爭就算咱倆打平手，抗美援朝你就沒得說了！”

冷眼觀察劉、陳二人一唱一和，拉拉雜雜各講了一個多小時，高崗只用半小時便敷衍了事。

毛澤東聽完劉、高、陳“生活會”的匯報後，勃然大怒。他本希望通過批評和檢討，著意地營造出一種團結氣氛，把這亂子平息下去。因為毛承認他目前動不了劉，還得積蓄力量，從長計議。毛沈得住氣。毛澤東心裡明細，高崗在東北立下大功，已掃了彭真等人的面子；在國家計委坐大，等於排擠了周恩來的政務院；現在又要拱倒劉少奇，則驚擾了京城的百官。此處姑且不論高崗所作所為的緣由，單說這百官經過劉、周多年的經營調教，各就各位，官官相護。此時，忽地從關外殺來一隻“東北虎”，渾身上下土得掉渣不說，又有恃無恐，張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豈不將鬧得個國無寧日？！

最近一次政治局會議，高崗因去外地未出席，毛澤東到會時，其他各位均已落座。眾人追問高崗貴幹，毛澤東受到圍攻，感覺很有壓力，意識到高崗已經成為包袱。於是毛澤東大動肝火，假戲真做：“我不加罪於他，他倒不思反悔、不加收斂，反一意孤行，把矛盾進一步激化！”至此，毛澤東對高崗由“恨鐵不成鋼”，逐步發展成高崗似乎“不可救藥”。

其實，毛澤東比誰都清楚，幾年來是他一直在背後支持高崗，制衡劉、周，所以他還得進一步說服自己：“高崗錯就錯在他驕橫

跋扈、目中無人，又邀功心切，四面樹敵，所以得罪了諸位。我要是護著他，便犯了眾怒……”

其實，真正觸動毛澤東的，是鄧小平與他的那番晤談。還是當年的一句老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解放戰爭，靠的是林彪和粟裕這兩員驍將打天下；朝鮮戰爭，又靠彭德懷、高崗一前一後，迫美和談，才定的江山。若是這些人抱作一團……要不然高崗為什麼散布名單卻謊說不知？而那個斯大林，不是還管高崗叫“張作霖”？……

毛澤東思前想後，左手叉腰，右手擎煙，吞雲吐霧地在書房裡來回踱步。一旦主意打定，遂掐滅了煙頭。

1.10 毛澤東猝然翻臉

1.10-1 高崗被毛澤東拋棄

1953年12月24日晚，毛澤東在住所中的頤年堂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他端坐在主席台中央，紅光滿面，神態自若。啞了兩口杯中的茶水，清了清嗓子，毛澤東開門見山：

“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

因為事先知情，劉少奇和周恩來不動聲色，鄧小平正襟危坐，陳雲則早已奉命南下，調查高崗並“消毒”去了。而對大多數的與會者，這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主席怎麼突然間端出高崗，而且調門這麼高？雖然毛未點出這“別人”是誰，但他特地用“東交民巷8號車水馬龍，頤年堂門可羅雀”，來畫龍點睛。

放完這把火之後，毛澤東當夜乘車去了杭州。

在座的與會者中，最為震驚的乃是高崗，猶如晴天霹靂。他萬沒想到主席竟將他拋出來。他癡心地以為，自己不過是黨內問題，即使挨批，也不至於往死裡整。何況，這來龍去脈主席比誰都清楚！高崗在這九級地震的衝擊下，由委屈不平，漸漸變為惶惑，甚至是恐懼，不寒而慄！近幾年來，尤其進京以來，毛澤東對自己一直褒獎有加，更經常吐露一些“私房話”，頗使高崗得意忘形。現在毛澤東忽然一翻臉，矛頭指向自己，高崗完全亂了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忙給毛主席打電話，懇求能去杭州面談。

高崗認為他“伐安”“討薄”，都是按照主席的指示辦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至少主席會體諒他的一片忠心。有些工作沒做到家，作作檢討，主席也會放他一馬；哪怕有些誤會，面談一下也會冰釋。一介草莽的他，哪曾料想，毛澤東重用他，原是為了在黨政上平衡劉、周，“打鬼借助鍾馗”，不想“鬼”們組織嚴、城府深、步步為營，這江湖水平的“鍾馗”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況且，高崗本人也桀驁不馴、野心勃勃，越來越不聽打招呼和勸告，又讓毛澤東起了防範之心。所以，毛澤東已適時地調整策略布署，以立於不敗之地。

於是，毛澤東在電話中對高崗說：

“你不必來杭州了……有什麼話，對少奇講也是一樣的。”

高崗碰了壁，卻沒有泄氣，連忙托楊尚昆給主席帶去一信，還是苦苦哀求面談。楊轉手將此信遞給了劉少奇。劉即約周恩來、陳雲、鄧小平一起來研究，並提出意見。等毛澤東收到高的求見信以及劉等對此的意見後，在給劉的回覆中，告知“高崗同志不宜來此”。

儘管高崗求見主席不成，他仍未死心，又讓安志文轉告王鶴壽，設法去南方給林彪帶口信，托林在主席的面前替他說情。王鶴壽從前經常給高崗通風報信，但此時已如驚弓之鳥，躲避猶恐不及，哪裡會再替高崗效力？王鶴壽將此事報告陳雲，陳告誡王不要自投羅網。

如此這般，形勢急轉直下。1954年2月6-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沒有與會，這是他空前絕後的一次，在身體健康時沒有出席中央全會。會前，周恩來作了極機密的安全布署，以防不測：如在林彪的搭檔、原四野政委羅榮桓等一些部隊領導人的住處周圍增派了警衛部隊，又派自己的親信宋任窮和陳賡等人帶手槍參加會議。

會上，劉少奇受毛澤東委託，作了報告，報告中對合作社問題和“和平民主新階段”等問題，作了自我檢討。此前，劉少奇曾認為：在農村，合作化運動搞得過早；在城裡，仍應像解放戰爭時期一樣，繼續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業主，而不把他們當作革命對象來對待。對這些重大的政策和原則，毛澤東持有完全不同的

見解。現在，既然劉放棄了他的意見，毛姑且對他網開一面。在會上，高、饒也作了檢討，其他許多人做了自我批評。

會議開得和風細雨，沒有對任何人點名。會議最後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一些不知內情的與會者，甚至不知道此決議是針對高、饒的。如此這般，在毛澤東的精心安排下，全會開得順利、成功，穩住了局面，沒有激化矛盾。像高崗牽涉林彪、彭德懷或者陳雲其他幹部這樣難堪的局面、像高崗和軍人們一起發難……諸如此類危險的“非常事件”，僥倖地都沒有在會上發生。

然而，四中全會後，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兩個高幹座談會，繼續揭發批判高、饒的錯誤。因劉少奇不宜出面，便由鄧小平主持揭批饒漱石的會，而由周恩來主持揭批高崗的會。周恩來不禁想起：在與蘇聯簽訂“中蘇同盟條約”時，斯大林本意由他自己與毛澤東共同簽約。但毛因顧慮條約中承認“外蒙”獨立，有喪權辱國之嫌，他不願像清末的李鴻章一樣成為“歷史的罪人”，執意不簽，而讓周與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代簽……

可周的長處斷不止於承擔責任，更在於他擅長處理棘手的難題。1936年，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西安逮捕了蔣介石，迫使他進行“國共合作”以共同抗日，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蔣介石成為人質後，一度態度強硬，於是中共派遣周恩來前往進行斡旋。早在1925-1926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蔣任黃埔軍校校長，周任其政治部主任，而黃埔軍校是當時北伐軍的大本營。再者，在那次國共合作時期，蔣介石的長子蔣經

國被送去蘇聯學習，此後滯留於蘇。今歷經十年內戰，蔣、周再度相會。周細敘黃埔舊情，順便又問及蔣長公子經國在蘇聯的近況，恰點到穴位。這對於事件和平解決，不無裨益。在親辦高崗之後的一二十年內，周恩來還陸續處理掉劉少奇與林彪——這是後話了。

中央高幹座談會從1954年2月15日開始，共計10天，有32個早已做好準備的人發了言。會議一反四中全會表面的溫和作風，對高崗搞突然襲擊，氣氛緊張恐怖。

陳雲首先發言，揭發高崗曾經對他說過：“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林彪也可以當。”把他兩人對中央人事安排交換意見，說成是高崗有陰謀篡黨奪權的企圖。

高崗當即反駁說：“這話是你對我說的。”會議的主持人周恩來，卻嚴厲地制止高崗繼續說下去。

第二個發言的是劉亞樓。他揭發高崗在東北戰爭時期，與蘇聯人密談三天三夜，提供情報，裡通外國。高崗生氣地說：“你真會造謠，我連俄文都不懂，談個屁！”眾人哄笑。其實，劉亞樓本人留居蘇聯多年，精通俄文；且歸國後娶流亡東北的白俄女子為妻。

發言人中陳正人揭發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大量言行，說高有野心，想把劉推倒，自己當主席的助手。高崗憤怒地說：“你在東北時就對劉少奇意見一大把，並對劉不讓你當組織部長耿耿於懷……”

高崗認為許多事情都是對他的誣陷，要求對質、拿出證據，更不承認對劉少奇提意見就是反黨奪權。但從揭發情況看來，高崗大有在別人指示下，從事“反黨”和“分裂黨”的嫌疑。所以，會議只許批判揭發高崗，不許高崗解釋申辯。

1.10-2 “我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

揭批高崗的座談會，每天午後在周恩來辦公室東邊隔壁的小會議室進行。連日來，重磅炸彈的攻擊，使高崗極為震驚，寢食不寧。會畢，他一人獨坐，凝神嘆息。

“剛剛開過強調團結的四中全會，怎麼緊接著開這個座談會，一個勁叫我‘老實交待反黨罪行’？並且不容我作任何的辯解，打得我抬不起頭，喘不過氣？真是牆倒眾人推啊！”

在四面楚歌中，高崗想起了陳雲。儘管他對陳雲近來的表現有看法，但過去他不但敬重陳雲，尊重陳雲的意見和建議，而且兩人一直是無話不談的朋友呵。

高崗尤其難忘記的是 1945 年底，他和陳雲一起在北滿的那段時光：

日本人曾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戰敗後在那裡留下了相當強大的工業基地。因此，東北成為國共必爭的戰略要地。解放戰爭開始，中共中央向東北派了 20 多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足見對其重視的程度，而派到東北的政治局委員有彭真、陳雲、高崗和

張聞天。當時解放軍據守的山海關、錦州已相繼失守，國民黨大軍正步步逼近，中共黨政機關已撤離了沈陽、長春、哈爾濱這三大城市。“解放軍十萬大軍向何處去？共產黨如何在東北站穩腳跟？”這成了黨中央和剛組建不久的東北局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當時的東北局領導層中，不少人對第一書記彭真等人固守城市的戰略方針有不同的意見，雙方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

在此歷史的轉折關頭，陳雲、高崗和張聞天在北滿會合，聚在一幢僻靜的小樓裡面，反覆討論，認真思索，整整一天一夜。當他們統一認識以後，先由張聞天執筆寫出初稿，再由三人反復修改，終於在11月29日，以陳、高、洛（洛甫，即張聞天）的名義，給東北局並黨中央發出了《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電報。他們分析了蘇聯對滿洲的政策，認為中共和解放軍對此新形勢應有清醒的認識。《意見》主張“我們應當放棄固守大城市，應當先退守到農村”；主張“我們應當避免對蘇聯的依賴，準備進行艱苦的鬥爭”。中共中央接到電報後，完全同意了他們的意見。

高崗又想起，還是在北滿，他有時從街上買回豬頭肉、醋蒜頭，吃飯時就往大家的火鍋裡放，把菜搞得很不是味兒。陳雲說：“麻子，你這樣亂放，還讓我們吃嗎？”有一次，高崗實在想吃鴨子，秘書說我們沒錢了，高崗笑著嘟囔：“中央委員連個鴨子都吃不上。”警衛員把這事跟陳雲講了，陳雲便把身上僅有的錢給了警衛員，買了隻鴨子給他解饞。

回想這些情同手足、並肩戰鬥的風雲歲月，淚水湧上高崗的眼眶，使他心頭一熱。於是，他托安志文轉達了想見見陳雲的願望。

後經中央批准，陳前往去作高的思想工作。

高向陳申辯：“我沒反黨反毛主席，這你最清楚。大家都說了對少奇不滿的話，怎麼現在全推倒我一個人頭上來了？”

陳兩手一攤，苦笑道：“毛主席發了脾氣，正在氣頭上，一時也說不清。你不妨先承認下來，等他消了氣，看看形勢再說。”

高一聽怒極，臉龐扭曲，多日積鬱下來而在會上強壓抑的怒火，登時全部噴發：“叫我承認什麼？我沒反對主席！我只反對劉少奇，不想讓他當接班人，這你比誰都知情。況且，反劉也不是我一個，你也是主要的一個，這你心裡明白！你們都說了反劉的話，你叫王鶴壽給我送材料，他還從北京派人給我送來劉在天津的講話……為什麼現在全讓我一人兜著？”

值此，陳雲已經相當不痛快，心說：“你把好心當作驢肝肺，還東拉西扯的，真叫人沒辦法！”可多少礙於舊日的情面，權當盡點最後的義務，同時也想作些自我辯解，陳雲便息事寧人地：“我跟你不同！少奇有錯誤，已作了自我批評，就不要揪住不放嘛。”

聽了這話，高崗幾乎跳起腳來：“可是，‘到時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這話不是你說的？現在要我承認有野心、要奪權，你自己怎麼就推得一乾二淨？！”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這乃是陳雲最最忌諱的話題。他惱羞成怒，馬上繃起臉，態度強硬起來，兩人僵持不下。最後，高痛罵陳“奸商”、“小人”，“最會投機倒把”，還說：“你這人不認帳，沒臉皮！怪不得毛主席老說你陰！”陳雲至此也撕破臉，斬釘截鐵地說：“像你這樣頑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條！”說罷把高崗託他交給

毛澤東的一封信往桌子上一甩，拂袖而去，去時滿面冰霜。

1954年2月16日會上，陳雲發言，最後跟高崗劃清了界限：

“我把高崗和我講的話向黨說出來，高崗可能覺得我不夠朋友，但我講出來，是黨的原則，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

聽著陳的發言，高怔住了眼，似乎後腦勺上挨了一拳重擊。他臉色鐵黑，青筋暴起，呼吸急促。然而，有一條弦他始終緊繃著：

“千萬不能把主席同我講的話、讓我辦的事都抖出來。但如果不說，我就得自己全兜著了！”

高未與陳爭辯，反而覺得此時爭辯已經十分無聊。虎落平陽被狗欺。“什麼陰謀、野心、反劉反黨，愛說什麼就說什麼罷。不就是個死罪嗎？！他媽的就全爛在我肚裡吧！”高崗方才覺出心灰意冷，卻依然不肯低頭。

1.10-3 高崗自殺身亡

高崗素來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也算不得一個明智的人。遭受揭批期間，偶爾心靜，他也悟出自己被人拿來當槍使，為他人做嫁衣裳。但這還不是他最難以下嚥的一丸苦藥。令他悲憤欲絕的倒是，他曾經敬畏主席，他曾經敬佩陳雲，以他行伍出身、農民造反的江湖之見，自以為他與這兩人有著類似父子和兄弟般的深情厚誼。萬沒料到，一轉眼，被陳雲賣了、被毛澤東拋棄！是非顛倒，人妖混淆呀，這是個什麼世道！還有個什麼活頭？“我高崗

即使不能堂堂正正地作人，至少也不會趴在地上當狗！”遂起了輕生的念頭。

說到輕生，這念頭高崗從前也有。那是1934年，他在蒙古地區工作，思想一度悲觀消極，認為反正不是被敵人殺死，就是被“左傾”路線的人整死，過一天算一天，養成生活上放蕩不羈的惡習。後來，在延安他耳聞目睹一些高級幹部生活上的不檢點，使他對自己的作風問題心安理得；解放和進京以後，高本人位高權重，這惡習更有所發展。然而，高崗出事以後，對於政治上的罪名，他拒不承認，亦無反悔，卻是這些私生活方面的問題，使他感覺內疚，感覺對不住妻子李力群和子女。

高崗不怕死。當初，他就是把腦袋繫在褲腰帶上參加的革命，多年也這麼槍林彈雨地過來了，可如今，唯一令他掛牽的卻是妻子兒女。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對毛澤東的“私房話”一直沒鬆口，一直沒有推卸責任連累他人。也許他企望用這點最後的忠誠，能讓主席動些惻隱之心，至少對他的妻兒手下留情。但高崗又深知，毛澤東不是一個過問細節的人；即使主席對他的妻兒高抬貴手，具體的落實還有賴於“管家”來執行。所以，高在臨走前，又情義切切地給周恩來寫了一封託孤信，估量只要主席首肯，周應會一絲不苟地照辦。

果不其然，在高崗1954年8月17日服下大量安眠藥去世的當天，毛澤東便打電話到高家，並要求中央對高崗“善殮厚葬，用上等棺木”，並指示中組部“對高崗的子女，由組織上撫養”。周恩來在高崗出事的現場——東交民巷8號接聽了電話，當眾宣布。

當時在京的中央領導除劉少奇和彭真外，基本都在場。

所以，這才有高崗沒被火化，而是土葬北京萬安公墓，並且立碑的後事，雖然只寫“高崗之墓”，而不稱同志、不刻碑文（墓碑在“文革”中被砸毀）；所以，這才有高崗的子女每人每月發給40元生活費的待遇；所以，這才有1971年經毛澤東授意、由周恩來親自張羅，李力群及其子女得以從外地和幹校返回北京的特殊安排……

但是，此前半年，1954年2月17日，也就是在中央高幹座談會上陳雲發言的第二天，高崗開槍自殺未遂，這使得他又罪加一等。周恩來在綜合發言中，這樣總結道：“高的極端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個人野心”，他認為高的自殺行為自絕於黨和人民，應對其實行“長期管教”。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高崗這次未遂的自殺前，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絕密信，除了承認自己反對劉少奇，除了承認自己散布主席給自己過目的八大政治局名單、不敢供認泄密卻撒謊說不知以外，還提到曾與誰誰誰議論過“一線二線”以及“輪流坐莊”的事情。此信由高的秘書趙家梁整理後，高還徵求過安志文的意見。因為涉及了許多人，安勸高要慎重。而高崗決心發信，給劉少奇轉毛澤東。但在舉槍自殺前的一刻，高又改變初衷，把信追回燒毀。

高這次自殺未遂後，趙家梁與安志文向周恩來匯報了此事。周讓趙復述信的內容，經安閱後，由兩人共同署名作證。事後，周曾追問趙，有無旁人知此信。趙回答，除安、趙以外，別無他人。

又一次，周對趙說，在中央只有極少數人傳閱過此信。據此，周恩來才在高幹座談會上說：“高崗臨死還要拉上別人墊背，噴人血口”。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批評毛的經濟政策過激，不計百姓疾苦，而毛澤東反過來多次指責彭德懷是“高饒漏網”分子，恐怕也與此信所披露的情況有關。

1.11 高崗成了“集團”

1.11-1 “高崗集團”定案的原因

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東北局高幹會議於瀋陽舉行。3月27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報告，次日旋即回京。中央派遣的聯絡員羅瑞卿則留下來，繼續參加會議，會議由東北局第一副書記林楓主持。

在人人自危、人人過關的情況下，會議通過了“關於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及“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向中央的建議”。這些文件把東北局的主要負責人除林楓外，幾乎都打成“高崗反黨集團”的成員，還捏造出“五虎上將”的罪名。這“五虎上將”，原是東北軍區副政委周桓發言時信口胡說的，但也許是對1946～1947年間，林彪、高崗、陳雲批評

彭真、林楓和原東北軍將領呂正操搞小圈子、搞“桃園三結義”的回敬。總之，“五虎上將”的提法，在會上大受羅瑞卿和林楓的讚賞；後上報毛澤東，他認為很生動，於是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上述的決議和建議。“文革”後的1977年，這個決議及建議又上了新出的“毛選”五卷。毛澤東的言論，在當時的中國相當於聖旨。有關高崗的決議和有“五虎上將”文字的建議出現在“毛選”上，就向世人昭示：高崗不能翻案，而“五虎上將”也沒有正名。

當時給高崗定罪，費了將近一年，可給“五虎上將”定罪，僅僅花了五天。回顧起來，很清楚：1952～1953年間，毛澤東曾利用高崗向劉少奇與周恩來挑戰，但沒有成功。毛明白他暫時動不了劉、周。於是，1954年，高崗便成為他的替罪羔羊。雖然林彪、彭德懷和陳雲等人與高崗關係密切，但毛澤東還不願同時犧牲掉他們，因為這些人的存在，可以在中央抵消、甚至抗衡劉、周的勢力。所以，才必須有“五虎上將”作為替罪羊——他們必須跟著高崗一起倒台。

在這“五虎上將”中：

第一號張秀山，當時任東北局第二書記，他曾與高崗一起創建陝北根據地；解放戰爭初期，東北局領導人對政策有爭議，張秀山支持過林彪、陳雲、高崗和張聞天，反對過彭真和林楓的意見。真正要害的卻是，張秀山奉毛澤東的命令，調查了劉少奇的敵偽檔案。

第二號張明遠，自1952年起任東北局第三書記；他過去長期在白區和晉察冀工作，歷史上與高崗毫無關係。

第三號郭峰，原為遼西省委書記；1952年調東北局後，先後任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總共僅一年多；1953年調任中組部任副部長，尚未到任，已被定為“五虎上將”。

第四號馬洪，時任國家計委專職委員、秘書長；馬洪1948年由冀察熱遼分局承德市委書記任上調往東北局，調京之前任東北局副秘書長。

第五號趙德尊，原為黑龍江省委書記；高進京後，1953年3月，趙才調任東北局農村工作部長兼秘書長，尚不足一年。

這“五虎上將”各自經歷不同、由不同的時間和地區調到東北局。到了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抹去了“集團”，“聯盟”的字樣，只保留了高、饒兩個光杆司令。對於當年被打入“高崗集團”的五個人，中央都給予“實際解決”，但未予公開平反。鄧小平還說：“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

如前所述，1954年，就在中央高幹座談會的第三天（陳雲發言的第二天），高崗自殺未遂，周恩來即宣布對其實行“管教”。從此，高崗不但沒了自由，連消息也不通了。4月份當他寫完反省，曾多次請求與中央談話，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高崗實在絕望，終於於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身亡。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常常自言自語：“我上當了，我上當了……”但此時的高崗有何言論，已無關緊要。

1.11-2 毛說：“遺憾，終於留不住他”

羅瑞卿回憶，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第二天，毛澤東說：“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條狗！”又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誰也擋不住。”這反映出他內心的矛盾。

然而，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回憶，當高崗自殺的消息傳來，毛澤東仔細地詢問：“人死了嗎？”當確知高崗已死，主席又問：“怎麼死的？”

葉答：“吃安眠藥死的。”

主席聽後，沈默良久，說：“遺憾，終於留不住他。他這個人鬥爭性太強，性格過於剛烈。”

葉子龍說：“高是自絕於黨。”

主席說：“話是這樣說，但黨內鬥爭死了人，總是不好的。”

他還對葉說：“本想讓高崗還當個省委書記，去陝北，保留黨籍、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工作，他也會願意的。可是，遲了一步，沒來得及講。如此結局，我覺得很遺憾。這事怪我啊。”

毛澤東想起自己在中央蘇區曾被撤職，曾幾乎被開除黨籍，甚至鄧小平也跟著挨了整。“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可高崗……”，毛澤東內心責備高崗，卻帶有惋惜。據葉子龍說，有一個多月功夫，毛的思緒反反覆覆，情緒很惡劣。

又據高崗的遺孀李力群說，事後在北戴河，毛澤東跟周恩來發脾氣：

“你把高崗整死了，把問題複雜化了，擴大化了！”

到了1964年6月，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到“接班人”的條件時，又提及高崗：“原想把他留在黨內，保留中央委員，去陝北當地委書記。但他死了，很遺憾……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

第二章

忍辱負重



2.1 下放反而有了反思的機會

1956年8月，中共八大召開。中央新領導的排名順序為：毛、劉、周、朱、陳、林、鄧。黨代會通過的新黨綱，強調經濟建設。

天剛蒙蒙亮，工地的喇叭已經響起來了，先放革命歌曲，然後是重要新聞。七屆四中全會以後，馬洪由原來的行政7級降到13級，下放基層，在北京第三建築公司當副經理，主管財政和材料管理。他慶幸自己還保留著黨籍。馬洪注意到，八大沒有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他還注意到，陳雲被選為黨的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

雖說八點才是幹部正式上班的時間，可喇叭一響，就像工地上上早班的工人一樣，馬洪拎著飯盒去食堂打飯，然後上工地，控方、丈量、統計，開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在一間空空蕩蕩的大房間裡，馬洪拉上一個布簾，把房間一分為二，前面放隻辦公桌，後面放張床，工作和休息都挺方便。他已經好幾個月沒回家了，一邊上班，一邊繼續“閉門思過”。現在遠離了高層，遠離了中央，不再有沒日沒夜地加班加點，馬洪反倒難得地忙裡偷閒，靜下心

來好好理理頭緒，看看自己究竟如何，走到了今天的這一田地。

2.1-1 “革命不分年齡大小”

童年在山西定襄待陽村，馬洪——那時他叫“牛仁權”，人們都叫他“仁權子”，是個人人誇獎的、懂事爭氣的好娃娃。由於好學上進，族人出資供他上完高小，高小畢業即被聘為本校教師。之後又經鄉人舉薦，去了同蒲路，經過訓練成為站務員。

日寇壓境，國難當頭。在鐵路上做工的仁權子與其他愛國青年一起參加了“犧盟會”（犧牲救國同盟會）——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在山西建立的一個統戰組織。由於出身貧苦，仁權子向往共產黨消滅階級、社會平等的主張，加上是有文化的工人，很快被共產黨組織看中，予以培養。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牛仁權改名牛黃，積極參加工會活動。

當年的同蒲路上，人人知道有一個牛黃，年紀輕輕，一呼百應，組織、宣傳能力都很強。1937年11月，經楊珏、賈永福介紹，17歲的牛黃加入了中共。他組織工人武裝，成為同蒲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

因為抗戰的需要，中共與地方軍閥閻錫山搞統一戰線。屆時，中共鐵工委派牛黃代表同蒲路總工會，同閻錫山當局交涉，要求給工人發槍發配給，來加強抗日武裝。談判的地點是閻錫山在臨汾的臨時辦公室。經牛黃的據理力爭，又有在閻錫山身邊的“犧盟

會”成員的協助，談判成功。

50多歲的閻錫山，在山西割據稱王，蔣介石對他又打又拉。閻本人既懷拒蔣之意，兼懷日軍侵華之憂，遂不時有半心半意的聯共之舉，是一位老辣多謀的政客軍閥。在談判中，閻見牛黃器宇軒昂，思路敏捷，與堂堂督軍對陣，毫不怯場，顯出“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加上是本鄉本土之士，便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詢問牛黃為何年紀甚小，就參加了革命。牛黃答：“革命不分年齡大小。”讓閻頗感詫異。

太原失守後，日軍南下，閻對中共的態度惡化。1938年2月下旬，同蒲路工人撤退。中共鐵工委派牛黃領導工人，一邊破壞鐵路來阻止日軍的行進，一邊組織工人們武裝抗日。3月，日軍抵達黃河東岸的風陵渡口。牛黃和撤退的工人一起前往西安，到中共所辦的安吳青訓班學習。然而，國民黨也企圖拉攏這批職工去“戰幹團”受訓，加入國民黨軍隊。在這場國共之爭中，流亡的同蒲路當局同西安的國民黨當局勾結，到工會活動頻繁之地，搜捕牛黃及其他工會領導。得此情報後，中共黨組織安排牛黃轉移，在當地一個紳士身份的地下黨員家的頂棚裡躲了三四天。後來接到鐵工委負責人李一民的通知，牛黃先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隨即奔赴延安匯報工作。

2.1-2 延安“整風運動”沒掃到他

在延安，牛黃向中央工委領導張浩和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匯報了同蒲路工人鬥爭和撤退到西安的情況。張浩面孔白皙，眉眼烏黑，一看即知是一個有決斷的領導，後來得知他是林彪的堂兄。劉少奇身材瘦長，不過中年，兩鬢已霜，顯得嚴謹深沈。他細心地聽取了匯報，認為具有典型意義，遂推薦牛黃向張聞天作進一步的報告。聞天同志高高的個子，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雖然時任黨的總書記，可一點架子都沒有，倒像一位有學問的教書先生。

不久，幾位同蒲路工會的同志被國民黨逮捕。劉少奇派牛黃以同蒲路總工會代表的身份，打算利用統戰關係，再度同閻錫山交涉。為使牛黃途中便利，劉少奇以“胡服”的名字寫了一封便函：

“牛黃係我好友，去找閻主任，如有困難，請給予幫助。”

工作布置完畢，劉少奇目光嚴肅，緊握牛黃的雙手，祝他一路平安，勝利完成任務。牛黃深感黨對自己的信任，滿懷決不辜負組織重托的信念，攜信上了路。不料，中途獲悉，閻已與中共撕臉，正在大力搜捕其他工會領導。故此時去找閻交涉，無異於送進虎口。於是上級指示牛黃返回延安。

有了聞天、少奇、張浩的推薦，時任中央組織部長陳雲翻閱牛黃的檔案時，非常留意。他不過 30 出頭，細眉細眼，身體瘦弱，說話輕聲慢氣，看去文質彬彬。然而陳雲已在中央工作了多年，主持白區的工人運動。當牛黃前往向他匯報時，陳雲對匯報聽得特別認真仔細。當年的延安，大多數工農幹部沒有文化，而從白區來的青年學生許多又背景複雜。牛黃來自農村，家境困苦，領導過工運，還有一定文化，像有這種條件的青年不多。所以，望著眼前

這個身材高大，面色紅潤，年方十七的北方大小夥子，陳雲估量著牛黃值得培養造就。他自己就是因為共產國際一向注重提拔工人出身的黨員幹部，而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破格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當然，組織上還需要對年輕幹部作進一步的考察……陳雲充分肯定了同蒲路的工運，指示牛黃先在延安學習、鍛煉一陣，待時機成熟後再派往白區工作。而為了今後工作的方便，陳雲特地為牛黃改名為馬洪。至此，馬洪深深體會到，組織對自己是非同一般地關懷與重視。

自從到了延安，馬洪先後進入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為了抗日救亡，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從白區的大中小城市，來到陝甘寧邊區，大多數人上了抗大、女大、魯藝、陝北公學，只有少數人進入中央培養理論幹部的最高學府：馬列學院。在那裡，馬洪天天親耳聆聽革命家和理論家的講課，給他打下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即使在1942年那疾風暴雨的整風運動中，由於馬洪出身好、歷史清白，審查輕易過關，隨即同張聞天去鄉下作社會調查。張的言傳身教，使馬洪有意識地將馬列主義理論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為他日後從調查研究中作總結報告，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延安期間，馬洪曾任《共產黨人》雜誌的編輯，並先後擔任馬列學院政策研究室的學術秘書和中央黨校三部的秘書科長。

然而，許多同志不像馬洪那樣順利，包括一些老同志、老革命，或在白區跟錯了路線，或在蘇區站錯了“山頭”，被禁閉、被逼供信，甚至遭到嚴刑拷打。至於那些從大中城市來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尤其是出身背景不太“單純”的，在“搶救運動”中，更

不容易過關。對此，馬洪耳聞目睹，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他告誡自己，階級立場要堅定、要相信黨，在革命的風浪中，不容許有半點的軟弱與動搖。

話雖如此，馬洪深心有一處隱痛，那便是游軍。一提起游軍，他眼前就一團水霧。她是那樣一個溫靜柔順的女孩子，不多話，善解人意，馬洪跟她在一起，總能心平氣靜。記得是1936年冬天，在同蒲路做工的牛黃，參加了“犧盟會”在太原組織的抗日大遊行。只見一位個子高高的女學生，圓臉短髮，藍旗袍，灰圍巾。她埋頭發傳單、寫標語，給演講人端茶送水，雖然積極活躍，卻一點不出風頭。由於牛黃是工人代表，自然而然地與這位學生代表游軍接觸漸漸多起來。游軍和她的姐姐游雲，都是“犧盟會”成員，她們也參與了牛黃的同蒲路總工會的籌備工作。

游氏姊妹出身商人家庭，在國家內憂外患的局勢下，她們接近共產黨，追求進步，投入了救亡運動。與活潑外向的姐姐游雲不同，游軍文雅內向、多愁善感，又很愛讀書。因家境優裕，其父又受過新學，家中收藏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書籍，其中既有高爾基、魯迅等人的激進著作，也有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這樣經典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參與救亡，游軍寧願整天躲在閣樓上讀書。可還是這個游軍，常在集會前、散會後，靜靜地在場地等候牛黃。她每每留意地在裝着左翼報刊的書包里，加放幾隻熱烘烘的白饅。工會事情多，牛黃常常要工作到深夜，而游軍就留在他身邊謄稿子、剪彩旗，一聲不吭，就好像一池靜靜的水，就好像一朵潔白的雲。他倆成了革命運動中的戀人。經約定，他們先後奔赴延安。

在延安，牛黃因“根正苗紅”，成為黨的重點培養對象，被馬列學院評為延安的模範青年，接受過毛主席親自頒發的獎章。而游軍上了女大，即使同在延安，女大和馬列學院隔山隔水，兩人的來往漸不如前。

整風運動時，基於游軍的出身和社會關係，審查不易過關；她又愛讀古典名著，“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情調”，當然受到了批判。而因為延安的物質條件差，加上情緒低落，游軍染上了肺病。這使屆時已改名馬洪的牛黃甚為掛牽。他深知游軍固然向往革命，但她之所以投奔延安，還因為她對愛人牛黃的傾心。在太原的游家獲知愛女患病，便設法將她接回家養病。黨組織則安排她借此機會，利用家裡的社會關係，進行統戰工作。也許游軍意識到，在延安的新形勢下，她與牛黃不再般配，也許她只是一個柔順如水的弱女子，總之，回到太原以後，她便嫁給了閻錫山手下一名高級軍官，不久鬱鬱辭世。

對於游軍，馬洪終生都懷有內疚之情，他不能原諒自己辜負了初戀的游軍。後來，只要條件允許，他的窗前總有一盆細細綠綠的雲竹，他常常親自輕輕地為它淋水。他的小女兒也由此取名為“筠”。

2.1-3 成也高崗，敗也高崗

在延安，馬洪雖心有隱痛，卻試圖克服自己“不健康的情緒”，

努力振作起來，投身到火熱的工作與學習中去。有領導的栽培，有同志的友愛，對馬洪來說，延安畢竟是一個理想的革命大家庭。他在延安一帆風順的境遇，使他比較順利地越過了與游軍分手而帶來的創痛，也忽略了其他不那麼幸運的同志們在延安整風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當馬洪離開延安去東北時，儘管在馬列學院提高了理論水平，儘管在陝北農村的社會調查，使他初步培養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工作作風，但他對黨內路線鬥爭的複雜性，卻毫無思想準備。後來在東北的土改運動中，雖然他獨當一面，先後擔任平泉縣和寧城縣的縣長和縣委書記，工作勤奮、卓有成效，可他的政治頭腦還是相當簡單的。

1947年冬，高崗代表東北局到冀察熱遼視察，看中了馬洪，1948年5月將他由承德市委書記任上調往東北局。這是馬洪政治生涯中的轉折點。

高崗那時不過四十開外，身材魁梧，具有超人的旺盛精力，每天只需睡四五個小時；雖當上中央局的領導，仍不失陝北農民的本色。在某種程度上，馬洪與高崗有著天然的親和力：兩人都出身貧苦，都來自北方偏遠的農村；高崗是師範畢業，馬洪原本只上完高小。與黨內不少來自上海、北平或其他城市，上過洋學堂，甚至出過洋“見過大世面”的同志們比較，他們顯然是“土包子”，然而，卻是對其自身能力有著強烈自信的“土包子”。高崗的工作作風大刀闊斧，敢於破格用人，馬洪算是人盡其才，得其所用。

從1949-1952年，在高崗主導東北時期，經過三年多的恢復，工業生產總值已超過歷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農業生

產也與歷史最高水平相近，有 60% -70%的農民上升成中農，而其中 20%還變為富裕中農。著名科學家嚴濟慈回憶道：“金雞報捷，始自東北，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新中國的工業與科研，也可以說是在東北首唱建設之歌。”

與此同時，馬洪由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升至東北局直屬黨委委員、東北局委員，兼瀋陽市委委員。當時東北局重要的政策文件，特別是財經方面的文件，大多經馬洪主持起草或修訂。在兼顧其他的同時，馬洪把工作的重心集中在城市工作，尤其是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上。通過下廠蹲點、深入基層，他針對當時工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以下頗有見地的觀點：

- 1) 東北是全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基地，但不應放鬆農業，尤其是農村合作社的領導，以促進工農業共同發展。
- 2) 要注意均衡生產計劃，合理調整工業結構。
- 3) 要做到“好快省”，不能“單打一”。
- 4) 發展地方經營的中小企業，作為對國有大企業的促進和補充。

這些觀點，對推動東北的工業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在解放後短期間內，東北的工農業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受到了中央的肯定。

1952年11月，國家計委成立，馬洪赴京任計委委員兼秘書長，同時兼任計委機關黨委書記。他在主持計委日常工作的同時，積極參與制定新中國的“一五”計劃。東北局時期的工作，使馬洪積累了管理局部地區經濟的經驗，而國家計委的工作，則具有宏觀性，使他有了站在全局高度思考和研究我國國民經濟的條件。

正當馬洪躊躇滿志，準備大展宏圖之時，高崗挨批，自己受到牽連，禍從天降。一開始，他不理解，甚至委屈；後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又十分驚恐；再後來，則變得萬分沈痛。那個階段，他整整一個月簡直沒有睡覺。好在他當時年輕力壯，經過一年左右的來回批鬥，他心理上和體力上都慢慢地承受下來。

馬洪承認自己加入革命隊伍以來，少年得志：

記得 1950 年毛主席從蘇聯回來，路過瀋陽，他隨高崗一起去火車站迎接。高崗向主席介紹了馬洪，主席說：“久聞大名，工運出身、年輕有為，對東北的經濟建設有貢獻！”聽到主席的鼓勵，馬洪激動地回答：“這是為革命工作！”

又據高崗說，當初胡喬木曾向主席建議，要調馬去書記處當秘書，高崗對主席說他離不開（馬）。胡喬木還建議過調馬去中宣部做秘書長或副部長。

馬洪還想起來，高崗進京以後，辦公室就在主席的對過。一天晚上，馬洪作為秘書值班，正好趕上主席讓他起草一個文件。馬洪連夜就寫好了。第二天，當他將文件呈交主席時，主席非常滿意，對文件一字未改。當時馬洪心裡挺得意，認為自己能幹。高崗出事以後，馬洪的妻子陳伯林責怪他：“就愛逞能，好像自己能把主席的心思都摸透。要是出上一兩個錯兒，也好讓主席指點指點啊……”馬洪一邊回憶一邊嘆氣，但是以後他照樣忠心耿耿、一絲不苟地完成上面交給的任務。

馬洪在檢討中承認，在革命隊伍中，自己由於成長順利而驕傲

自滿；在埋頭抓工作的同時，忽視了改造思想。可他相信，自己是忠於黨和毛主席的；他相信自己參加革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名譽和地位。想通以後，他主動坦然地接受“改造”，與基層的群眾打成一片。馬洪這種“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的積極態度，被他身邊的幹部、工人看在眼裡，當然也不會被高層領導所疏漏。



籌建山西同蒲路總工會，中為馬洪，1937年。



馬洪代表同蒲路
總工會與閻錫山談判
期間，攝於山西侯馬，
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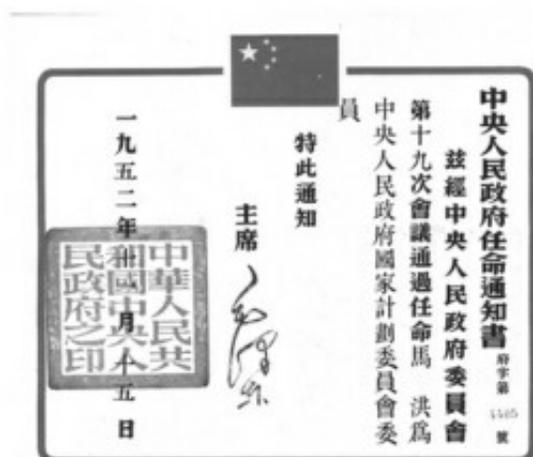
馬洪在中央黨校政策研
究室，攝於延安，1941年。



馬洪在熱河省寧城縣，1947年。



馬洪擔任中共冀察熱遼分局承德市委書記，1948年。



毛澤東授予馬洪的委任狀(一)，1952年。



毛澤東授予馬洪的委任狀(二)，1953年。



杭州，高崗事件前夕，1953年。



馬洪與陳伯林，攝於上海黃浦江畔，高崗事件前夕，1953年。



馬洪與高崗的夫人李力群，2006年。



李力群與馬雅，2011年。

2.2 在國家經委“將功折罪”

2.2-1 被薄一波所用

“八大”以後，中共中央設立了國家經委、國家建委，由薄一波、陳雲分別擔任主任。毛澤東一來認為李富春主持的國家計委不得力，二來也是為了打破原國家計委的老班子，給工交系統輸入新鮮血液。

馬洪旋即被薄一波調到國家經委。這個調動出乎馬洪的意料。因為在基層下放期間，馬洪與李富春有聯繫，不時將下面的企業調查報告上去，其中有關如何節約投資的主要內容，曾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看來，薄一波是搶先一步上調了馬洪。馬洪本人卻因為在中央機關犯過錯誤，做好思想準備在下面長期鍛煉，又因為從前追隨高崗反對過薄一波，所以，他對於在經委能否幹好，也缺乏足夠的信心。

薄一波屬於高層領導中的“少壯派”。他早年即投身革命，1931年被捕入獄後，關在北平的草嵐子胡同的“反省院”，一關就是八年。後來因為國共合作組成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授意薄等61人，寫下“自首書”出獄。薄出獄後，返回山西，組建統戰抗日的

“犧盟會”和“新軍”，漸漸成為北方局的領導人之一。解放以後，他出任第一任財政部長。高崗得勢之時，在財經會議上發難，“射薄批劉”，薄一波不免把當時的馬洪視為高崗的得力幹將。

當年薄年近 50，充滿活力，漆眉隆準，相貌堂堂，是一位魄力和謀略兼備的領導幹部。他也來自山西定襄，年長馬洪整整一輪。薄一波曾就任用馬洪的問題請示過毛主席，主席說行。為了確鑿起見，薄又特地點明馬洪與高崗“同案”。主席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人還很年輕嘛。”薄將主席的這層意思傳達給馬洪，打消了他的顧慮。由此，薄一波不僅盡了同鄉之誼，更表現出自己不計前嫌的肚量。

半個多世紀後，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成為中國政壇上的風雲人物。小薄人有魅力，且因鼓吹恢復毛澤東的革命傳統在民間有感召力。卻在 2013 年在高層內鬥中終於被清洗掉。薄的政敵們認為他桀驁不馴，野心勃勃，不遵守集體領導的遊戲規則，因而協力將他拉下馬。薄熙來終以腐敗、受賄和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終身監禁。此為後話。

1956 年的馬洪，不比從前，他對自己的現狀有相當清醒的認識。當年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在同蒲路上雄辯閻錫山；當年少奇寫信，陳雲改名，在延安和東北都是“種子選手”和“梯隊隊員”；進京後更是國家計委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宏觀策劃“一五”，可以號令“三軍”。後來被黨的決議定為“反黨分子”，雖然未被劃為報廢，算是“次品”，顯然不再是從前那精貴的“優質產品”了。現在黨給予改過的機會，當然應該將功折罪。馬洪被安排作國家經委政策

研究室主任，但正式的任命始終沒有下來，他以“負責人”的身份掛職近十年，最終還是被迫調離經委。

薄一波很有眼光，也很會用人。自參加革命起，馬洪就以組織能力強，腦子快、筆頭也快著稱。薄一波至少給馬洪派上了幾分用場。他非常欣賞馬洪能將堆積如山的公文化為一兩頁簡報的才力。

2.2-2 和鄧力群等一起當黨內“秀才”

這期間，馬洪在上邊為薄一波、李富春起草有關財經問題的文章、文件，還參與起草周總理人大報告的財經部分；同時，他還擔任中央財經小組出版的《經濟消息》的編委，與《紅旗》雜誌的鄧力群一起，寫過不少文章。

鄧力群，年長馬洪五歲。在延安馬列學院時期，大家都是小青年，年長三五歲就似乎大好多，鄧力群一直被馬洪稱為“老鄧”。鄧力群既有能力，又有才華，為人剛直，性情豪爽。解放初期，鄧隨王震西上新疆，因鎮壓地方分裂主義“過頭”，受到停職反省的處分。馬洪當時在瀋陽，適逢鄧失意，曾邀請鄧赴東北一同共事。鄧因看不上高崗，婉拒。當馬洪到經委工作時，鄧擔任《紅旗》副主編。主編是陳伯達，但陳同時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所以，鄧其實主管《紅旗》的事務。

那時的中宣部下面有三個寫作小組：姚臻、王力管意識形態；吳冷西、喬冠華管國際共運和外交；鄧力群、馬洪和梅行管經濟。

這些智囊人物和筆杆子當時在黨內被稱為“秀才”，經常參與起草有關黨政的重要文件和社論。經濟組曾用筆名“許辛學”（虛心學），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多篇文章，僅1959年就有六篇，其標題如下：《一切經過試驗》、《必須優質高產》、《指標要切合實際》、《學會更好地計算經濟效果》、《工業生產中的節約》、《保持工業生產高速度發展中的均衡上升》。可見，在大躍進的熱潮中，“許辛學”並沒有被完全衝昏頭腦。

大躍進之後，是“困難時期”。且不說地方上飢鴻遍野，即便在北京，大中小學裡也實行“勞逸結合”，休課停課，鼓勵大家躺在床上，節約能量；市民和幹部憑票證，定量供給糧油肉蛋糖；國家機關提倡培養“小球藻”，家家戶戶在窗台上靠陽光和水分植養藻類，以補充食品中缺乏的蛋白質和維生素之類的營養。

其時，馬洪與其他“秀才”寫社論文章，每次可得15-20元稿酬，不致於像平頭百姓那樣為解決基本的肚皮問題犯愁，可以下下飯館，以解口腹之欲。在前門外的豐澤園、地安門內的馬凱、東單的東來順、西四的同和居……他們輪流坐莊，席間談笑甚歡，偶爾竟有鄧小平、楊尚昆吃請。經濟組的人，如鄧力群從書記處，梅行從計委的富春處，馬洪從經委的一波處，均帶來各種消息。食物與信息一同被各位細細品味，再被慢慢地分解消化。

飯後茶餘，秀才們常常去逛琉璃廠的榮寶齋和廠甸的舊書市。大秀才如康生偏古董，陳伯達偏字畫。以下如田家英、鄧力群、梅行偏金石。那時，就算齊白石的畫，一般價格在三五十元之間，上品僅只一二百元。如有真正上好的文物，請專家鑒定以後，諸位也

買不起，不過看看罷了；但凡國寶級的文物，或被國家沒收，或以低價收購，藏入故宮博物院，秀才們卻得以參觀，先睹為快。這些士大夫式的風雅，馬洪只是“湊湊分子”而已。他能帶回家的只有像鄭振鐸的《世界文庫》，和民國初年周作人、梁實秋和徐志摩諸人的小品文集。

2.3 七千人大會

2.3-1 參與大會文件起草

為使國民經濟走出困境，中共中央於 1962 年 1 月至 2 月，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分局，各省、地、縣的領導幹部，以及一些重要廠礦、高校和軍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到會參加討論，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會”。

1961 年 12 月下旬，馬洪到釣魚台參與了“七千人大會”的文件起草，參與者還有田家英、胡繩、吳冷西和鄧力群、梅行等。此文件起草原先由陳伯達主持。他主持此項工作期間，文件都是由陳口授，參加工作的人員做記錄，再由陳伯達本人修改成稿的。

由陳伯達主筆的文件脫稿以後，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干預。在 1962 年 1 月上中旬的十多天時間裡，劉少奇上午到會，鄧小平下

午到會，輪番作戰，對陳伯達的稿子提出各種批評，最後把陳的原稿推翻了，而由田家英、胡繩和吳冷西負責重寫。胡繩管政治部分，吳冷西管經濟部分，田家英管黨的部分。馬洪先與梅行一起協助吳冷西搞經濟部分，後來調去陳伯達處，幫助陳紀錄整理關於經驗總結的部分。而這一部分是經毛澤東授意之後，才補寫進去的。

劉少奇、鄧小平兩人的工作方法不同。劉少奇有什麼指示，都直接找胡、吳、田三人，分別面談，然後，再由這三人分別傳達給有關的參加文件起草工作的人員。馬洪所聽到的劉少奇關於文件起草的講話，大都是經吳冷西傳達的，也有一些是由吳冷西先傳達給梅行，再由梅行轉告給馬洪的。

劉少奇對文件起草的基本意見：

1, 總路線是站在群眾之上，命令群眾，形式主義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不是由人民群眾實事求是地去鼓足幹勁，切切實實地力爭上游，而是由少數幹部站在群眾之上，命令群眾形式主義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是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浪費了群眾的幹勁，這幾年浪費了群眾的許多幹勁，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群眾的熱情和幹勁受了嚴重的挫折。

2, 三年大躍進，出現了“馬鞍型”。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這幾年提出過高的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與基本建設指標，進行了許多不適應的“大辦”，要在全國建立許多完整的經濟體系等等，都是缺少根據和沒有根據的，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作風。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

線太長，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的不協調現象，比例失調。大躍進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不注意品種質量。這些事情英國人懂得，日本人懂得，就是我們不懂得。

3, 人民公社搞早了。當時不辦，也許好一些。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好處現在還不大明顯，還看不大清楚。

4, 這三年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一樣。這幾年發生的許多錯誤，使全黨的幹部、黨員，以及大多數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經驗，都有了切膚之痛。餓了兩年飯。

5, 這幾年的問題，決不是一個指頭、兩個指頭的問題，至少是三個指頭或者是四個指頭的問題。有些省市是倒四六，倒三七，甚至九個指頭都爛了。像河南、甘肅、安徽、青海等省算不算犯了路線錯誤，大家可以議論，我看就是犯了路線錯誤。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地委、縣委討論，作出一個初步的判斷，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以至第九年還可以再討論，再判斷。

6, 這三年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7, 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應反左，結果反右，犯了錯誤，鬥爭錯了人，應當平反。彭德懷那封信，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這幾年重複了黨的歷史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反對毛主席，只是反對個人；公開反對三面紅旗，不為反黨；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人，只要不是裡通外國的，就可以翻案。

8, 現在是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措施。現在要實行高度的集中

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

9, 恢復法制。過去幾年犯錯誤，下面幹部無法無天，就是因為沒有法制。

鄧小平不像劉少奇只找小組負責人分別面授機宜，而是把稿子集中起來，讓人一部分、一部分地讀給他聽，讀到哪一部分，就吸收有關的起草人員參加。鄧隨聽隨發表意見，在某一部分讀完以後，再綜合發表意見。鄧要求工作人員當場按他的意思將稿件改寫出來。馬洪親耳聽到的鄧小平的講話，中心思想是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

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觀點都寫入了後來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和口頭講話。劉少奇的意見，是由吳冷西、胡繩、田家英等從劉少奇處親領指示之後，由他們動手寫進文件裡的。吳冷西曾說過，聽了劉少奇的那些講話以後，腦筋很開竅，可以放手寫稿子了。

經過劉、鄧十多天馬不停蹄的督戰，稿件完成，送交毛澤東審閱。據田家英說，主席閱劉、鄧的稿件後，非常不滿；並指示要很好地總結過去工作的經驗，要增寫民主集中制，作為文件的一部分。毛澤東還指示，要組織一個起草委員會，重新起草文件。於是，由彭真、譚震林、薄一波、陸定一、李井泉、陶鑄、劉瀾濤等及胡繩、吳冷西、田家英等組成了起草委員會。這個起草委員會不在釣魚台工作。

會議期間，每晚有京戲、評劇和秦腔、山西梆子等戲曲表演。會議代表“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其中有一齣戲是《竇娥冤》，劇

情是講古代一位青年女子，被冤判殺人罪，處以死刑。神明認為此案如此不公，遂六月下起紛揚大雪。此戲有借古喻今、替彭德懷等鳴冤叫屈之嫌。而這一齣滿腔悲憤的《竇娥冤》，激起了全場一陣陣熱烈掌聲，就反映出當時的政治氣氛。不過寫作班子的人員由於稿子幾次返工，晝夜加班，忙得不可開交，連睡覺的時間都很少，更不用說看戲了。

在草稿完成的間隙中，幾位起草人員還是找機會碰一碰，交換一些意見。他們曾在吳冷西的房間裡，討論過如何集中統一的問題。鄧力群和梅行認為，這幾年經濟工作沒有搞好，主要應由計委的李富春同志負責，同時讚揚陳雲。吳冷西也贊成這種看法，並且認為，儘管前幾年，陳雲的“反冒進”意見受到主席的批評，現在看來陳“緊縮”的主張還是正確的。田家英認為，農業上譚震林也難辭其咎。馬洪則說，應從組織領導的形式上來考慮，過去中財委統一管理財經工作，現在的幾位負責同志多人分工，各搞一攤，主管計委的李富春儘管是管綜合的，但因為工農財貿文教各有負責人分工，讓李富春和計委統一管起來，也有難處。是否應在中央有一個統一領導財經工作的機構，像過去的中財委那樣？有的人贊成這種意見，有的人不贊成。於是一些人認為問題還是由誰來掛帥，這實際上是主張由陳雲來掛帥。

後來這個意見，反映到總理那裡，周恩來說，現在情況變了，再搞中財委不適當。

“七千人大會”實際上基本否定了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陳雲雖然沒有接受主席讓他在“七千人大會”發言的建議，卻在不久

後的“西樓會議”上，提出應對國民經濟進行“傷筋動骨”的大調整。同年6月，陳還進一步提出“分田到戶”的主張，來解決農業的困難。“七千人大會”之後，馬洪等又去釣魚台為總理起草人大報告。這時鄧力群向一同參與寫稿的馬洪與梅行傳話：劉少奇親口說他支持陳雲的意見，說誰正確他就支持誰。並要鄧力群選編陳的講話，準備在黨內印發。

2.3-2 去了東北去西北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為了進一步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搞好調整，中央指派一些幹部去基層作調研。

在經委的馬洪和在計委的廖季立受陳伯達指派，於1962年4-5月間去東北地區，瞭解工業的恢復和調整究竟需要多少時間，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馬洪等人在東北調查了鶴崗煤礦、撫順煤礦、長春汽車廠、鞍山鋼鐵公司等單位。根據當時各單位向他們說明的情況和提供的材料，經過研究分析，馬洪他們認為這些單位生產恢復和調整的時間，各自不同。有的要兩年（長春汽車廠、鞍鋼），有的要三年（撫順煤礦），有的要四年（鶴崗煤礦），其中撫順的西露天礦，如果全部停產，集中精力做剝離工作，需要一年半時間，如果邊生產、邊剝離，按當時的條件，則需要八年。

接著，1962年5月間，廖季立、經委的張磐和馬洪，又受陳伯達指派到西北，做工業恢復和調整的調查，還順便瞭解一下青海湟中、甘肅張掖和陝西三原三個縣的農業生產情況。臨行前，薄一波說：凡是在下面看到的、聽到的東西，都要如實向中央反映。

農村政策的調整是1960年冬開始的，經過一年多時間，有了一些初步效果。但是局面尚未根本好轉，不少地區情況依然嚴重，有些甚至在繼續惡化。馬洪他們在西北三省調查，就發現那裡糧食生產還在下降，農民口糧依舊匱乏，不少人還在餓肚子，許多農民和基層幹部呼籲實行單幹，以渡糧荒。馬洪把瞭解的情況整理成材料，送交中央的兩位負責同志和經委黨組，並寫了一封信：

“從這三個地方農業生產的情況看來，目前糧食的產量還在下降，牲畜還在死亡，生產下降的趨勢，還沒有完全扭轉過來。

“這三個地區，過去都是產糧區，而現在都嚴重減產，同過去最高年產量相比，有的減產一半（三原），有的減產將近四分之三（湟中、張掖）。

“由於農業減產，而糧食的徵購又過多，農民吃不飽，意見很多。要求單幹的呼聲，相當普遍。許多農民認為單幹可以使糧食增產，可以不餓肚子。

“根據陝西省的一些負責同志反映：目前有的社隊，約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要求單幹。有些縣和省的負責幹部也提出：允許農民單幹，可能是較快地恢復農業生產的一種辦法。

“在這方面，有以下一些議論：

“一種議論是：由於各個地區經濟條件不同，農村的經濟組

織可以有集體、半集體、單幹三種形式。在集體經濟內部，也可以有較高級的和較低級的不同形式。

“持這種意見的人，主張如下：

“1，凡是有一些現代化的農具，擁有一些真正受益的水利工程和排灌設備，群眾確實感到從集體經濟得到了比單幹較多的好處，因而贊成繼續辦下去的生產隊，一定要堅決地幫助他們鞏固起來，更好地發展生產。

“2，多數社員要求單幹，但是，由於耕畜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嚴重不足，這些東西，仍然需要保持公有公用，因而耕地種地，也需要集體進行。但是，在地種完了以後田間的經營管理工作，可以單幹，也可以自願結合，實行互助合作。這種形式，就是所謂“半集體”的形式。

“3，對一些堅決要求單幹的農民，也可以採取如下的辦法：土地集體所有；牲畜分戶喂養，以私養為主公養為輔；有些大農具（如犁杖等）也歸私有。土地的耕作，可能有某些換工互助，但基本上是個體經濟。屬於私有的耕畜、農具，誰使用誰付給所有者一定的代價。

“另一種議論是：把現有的生產隊再劃小一些（現在陝西省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平均有 25 戶到 30 戶，可以考慮再劃小到十戶左右）；或者在現有的生產隊下面，分作業組，包產到組，或者以作業組為單位進行經濟核算。”

據當時一同參加調研的張磐回憶，在青海湟中縣，有一條稀罕的“倒淌河”。以中國西高東低的地形地貌特徵，河流大都是由西

向東流淌，最後歸入海洋，這條河卻是一個例外。當地人士特地向馬洪等介紹了這一奇景。馬洪登臨日月山，遠眺河流蜿蜒西去，終匯入青海湖，甚不尋常，心有所感，曾提筆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大意为：青海湟中一奇河，九天落地向西折。世人皆知東流水，無緣見識倒淌河。

2.3-3 馬洪的報告受到陳伯達批評

當時田家英是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的。馬洪把西北農村“單幹”的信件發出不久，1962年初夏，田家英約請馬洪參加一個座談會，包括計委的梅行在內，約有十來個人參加。田在會上以他在湖南的調查為依據，作了系統的發言，說明當時農村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主張分田到組到戶。田家英說，他的這種意見已經得到中央幾位負責同志的支持。會上還有人舉出安徽曾希聖“包產到戶”的例子，來支持田的意見。馬洪也在會上介紹了在西北三省的所見所聞，提出了他的意見：即生產隊能辦好的要繼續辦下去，核算單位過大的要適當劃小，實在辦不下去的，也可以考慮包產到組到戶。

然而，馬洪的報告卻受到陳伯達的批評。

陳伯達當年在黨內是與康生齊名的“左派”，但陳的“左”則更偏於意識形態領域。由於他作風老派，在新派的“秀才”們眼裡未免迂腐，遂被戲稱為“老夫子”。雖然陳伯達似乎不如其他才子

那般才思橫溢，但治學認真嚴謹，加上其左，故亦得毛澤東的賞識，故能在“文革”中與康生一同進入中央文革小組。而今回顧歷史，誇張一點可以簡單地說，在當年的《紅旗》雜誌編輯部，陳伯達代表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鄧力群代表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所以，在“文革”開始以前，陳伯達就把鄧力群排擠掉，發配到偏遠的廣西桂林去當地委書記。“文革”一起，鄧力群馬上被抄家。其原因之一，還因為鄧有一套珍藏的西洋畫冊。據說，陳伯達以前曾企圖借閱，但被鄧力群拒絕。於是，在“破四舊”時，那套畫冊就很方便地被“破”掉了。

有趣的是，一貫“左傾”的陳伯達，到“文革”中期認為革命已經鬧完了，該抓生產了，於是被張春橋打成鼓吹“唯生產力論”的“右派”，作為他是“林彪同黨”的罪名之一，被打下去監禁多年，病重將死才允許保外就醫。而曾幾何時，當年“犯右傾錯誤”而京官外放的鄧力群，在改革開放以後，卻由於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被視為“極左”的“保守派”。他不但與改革主將胡耀邦、趙紫陽有衝突，甚至與鄧小平也有政見分歧，於是在公眾眼裡，鄧力群搖身一變成了阻礙改革的新“左爺”。平心而論，“文革”以後，中國社會基本上放棄了對意識形態極端的追求——雖然這似乎在美國正方興未艾，比如“茶黨”——而當年的“右”現今被視為“左”，倒也說明了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乃至中共內部變遷之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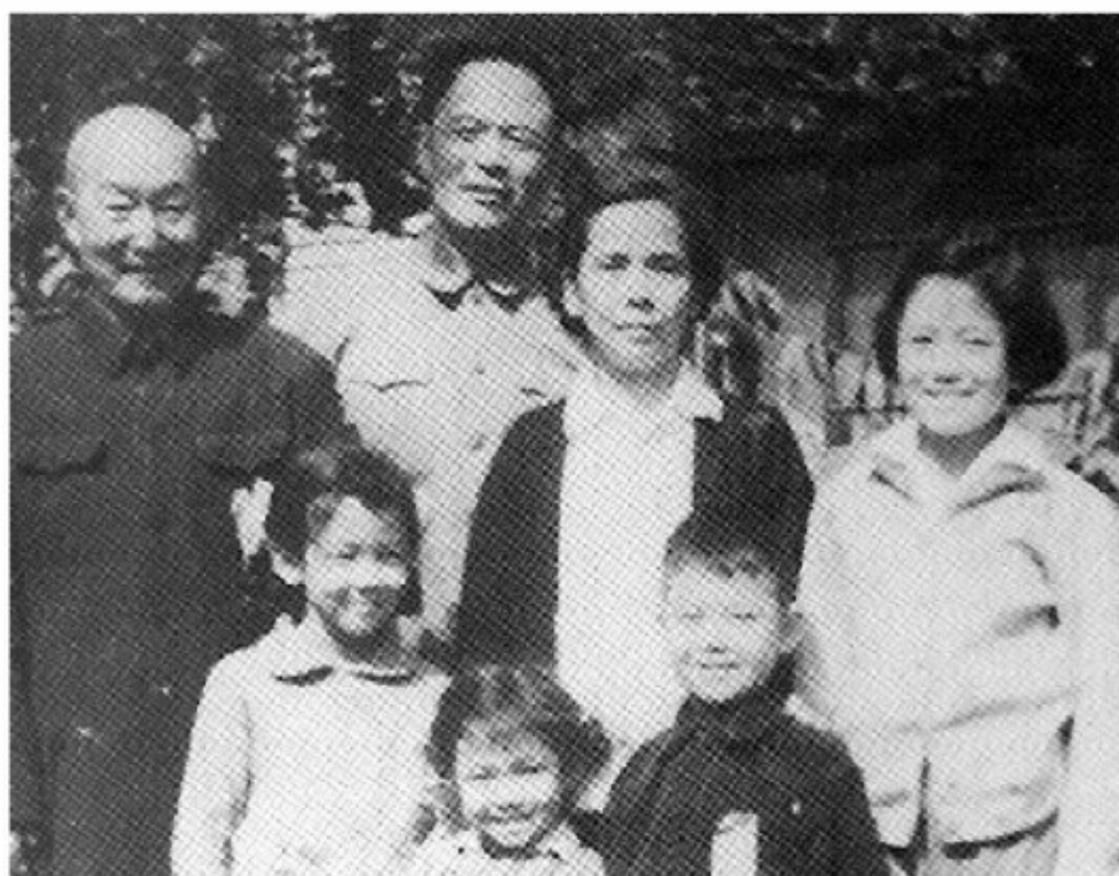
國家經委工作證照, 1956 年。



大躍進期間, 馬洪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 1958 年。



與陳伯林在北京
三里河國家計委宿舍，
1959年。



全家在三里河國家計委宿舍合影，左一為馬洪父親，1959年。



馬洪與陳伯林，北京，1964年。



陳伯林和馬雅，北京，1956年。

2.4 《工業七十條》這樣出爐

2.4-1 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

不可忽略的是，馬洪雖然殫精竭慮地為中央領導寫文件，他深知這只是將中央或者某高層領導人一時一地的意見，充分準確地表達出來，說白了，只是“為人代筆”。當初，他就是為高崗代筆，自以為是為黨、甚至是為中央代筆，到頭來犯下大罪。屆時馬洪參加革命已 20 餘年，在浮沈中已有所歷練，對某些事物正逐步形成自己獨立的見解。由於經委工作的需要和便利，馬洪支持和參加了十多個省、20 多個城市廠礦企業的調查，積累了大量的材料；尤其 1961 年他參與的對北京第一機床廠的調查，成為了制定《工業七十條》的基礎資料。

馬洪認為，“一五”時期，我國的工業企業，基本上沿用蘇聯的老套套。在這些老套套中，有些符合經濟規律，對中國的建設起了積極作用，有些卻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這缺陷主要是把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國家計劃，片面地進行行政管理，而忽視了經濟手段的調節。這樣，政府雖然掌握了現代工業，但未能根據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形成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符合經濟規律的經濟管理辦法。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恢復之後，這必然阻礙了我國經濟在基本恢復後的更大發展。特別是“大躍進”，又對國民經濟造成了極大損害。因此，我國亟需找出一條既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有本質區別、又與蘇聯的做法有異、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道路，來改善工業企業的管理，來加速工業的發展。

眾所周知，在“大躍進”期間，我國的工業企業經歷過一個大破規章制度的風潮，許多必要的章法被廢除，一度出現各自為政的混亂脫序局面，在全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生產指標難以完成，產品的產量、質量大幅度下降，設備損壞，事故頻繁，人心渙散，工人流失，嚴峻的形勢迫切需要中央採取重大步驟，迅速把這種困局扭轉過來。所以，整頓企業、加強企業管理成為“大躍進”之後調整經濟的重要內容，而制定一套工業企業管理的規章制度勢必成為當務之急。

於是，中央書記處考慮總結“一五”時期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制定一個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條例。為此，1960年底開始，分管計劃和工交口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親自組織和領導了對北京十個工廠和單位的系統調查，並選定北京第一機床廠作為重點，由他直接主持。馬洪被指定參加這個調查組。

北京第一機床廠是當時全國最大的銑床製造廠，有較好的基礎，但在“大躍進”運動中卻暴露出不少問題，這在大型工業企業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所以，李富春確定具體解剖這隻“麻雀”，以便找到整頓企業工作的妥善辦法。元旦過後不久，國家經委、國家

計委、第一機械工業部、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中共北京市委組成調查組，由馬洪帶隊，對該廠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調查。

調查組入廠後，直接深入到生產第一線，和班組工人們打成一片，一同勞動，一同吃飯。一個週末，馬洪把還在上小學的女兒馬雅也帶去了一機床廠。他告訴馬雅，那個工廠很大，設備比較先進，工人階級的隊伍也比較強。他帶馬雅先參觀了銑床車間，然後同工人們一起吃了頓“菜餛飩”的午飯。這是用玉米麵和小白菜拌起來做成的窩頭，粗得難以下咽。但馬洪說，現在普通群眾能吃上這個已經很不錯了。他還對馬雅說，將來如果不上大學，也可以進工廠當工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以馬洪家的政治條件，馬雅不夠進工廠和部隊的資格，只有下鄉插隊。這是插曲。

調查組與工人相互談心，直接傾聽廣大工人和基層幹部的迫切呼聲，為展開調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馬洪等首先選擇有代表性的兩個生產組和一個工段、一個重點車間進行調查，而後擴展到全廠範圍。調查既是由點到面、逐級進行的，又有分門別類的專題研究，力求做到縱橫結合，比較全面、比較系統。他們不但調查這個工廠的歷史，而且著重調查它的現狀。凡是企業工作中需要弄清的情況和解決的問題，如建設規模、人員狀況、管理機構、生產技術、財務計劃、產品的品種和質量、工具的製造和管理、物資的供應和銷售、財務和成本、工資和獎勵、企業管理體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責任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兩參一改三結合”、勞動競賽、技術人員狀況和技術政策、職工的技

術文化教育、職工生活和職工家屬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都進行了比較細緻的瞭解。

調查組詳細地詢問了職工的工齡工資、家庭婚姻、甚至每月糧食定量是多少、夠不夠吃等等具體情況。這樣的“摸底”，使他們瞭解到，有的老工人由於文化低，提級很困難；有的行政幹部由於怕荒廢業務，不願意脫產；有的青年女工由於結婚生孩子，而廠裡卻沒有宿舍和幼兒園，政治上和業務上的進步都受到了影響……他們肯同群眾促膝談心，能體會群眾的疾苦，群眾樂意同他們交心，在座談會上也願意說出心裡話。

在調查過程中，馬洪他們多次召開座談會，分別徵詢老工人、青年工人、女工、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室幹部、車間和廠級領導幹部的意見，最終還是落實到工廠的生產建設上。在會上，大家都是用同志式的平等的語氣討論，鼓勵每個人把話講完。遇到意見分歧的時候，比如：在建設布局的問題上，新建的重型鑄工車間究竟是上馬，還是暫停？比如：在產品方向問題上，到底是以老產品銑床為主，還是以新產品重型機床為主？……調查組從來不輕易表態，堅持一切正確結論產生於調查末尾的原則，堅持多謀才能善斷的方法，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同廠裡的同志們再三商議，再提出意見。

在深入考察和分析的基礎上，調查組對現存的問題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改進建議。調查組提出，工廠的生產要合理地確定產品的方向。向高大精尖進軍，是長遠的方向；但從當前的實際出發，則首先要調整好現有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填平補齊。重型鑄

工車間和重型加工車間的建設，因目前力所不及，應當推遲，儘早下馬可以主動，勉強上馬反而被動。調查組還建議，應當把節省下來的一部分財力、物力，用來解決職工生活方面的急需，解決像食堂、宿舍這些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調查組進一步建議：要使廠長有職有權有責，不能什麼事都由書記說了算，只講黨委領導，不講廠長負責；企業裡一切活動都要服從生產，不能一年四季搞運動；生產中一定要做好經常的生產技術準備工作，寧可降低生產指標，也不能每個月都打被動仗，更不能一年四季搞突擊；在工資獎勵方面要克服平均主義。這些建議被該廠採納後，產生了顯著的效果。

1961年6月，調查組結束了在北京第一機床廠半年的調查。中央書記處決定以此為基礎，起草《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1961年6月17日，總書記鄧小平在他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把這項任務正式布置下來。於是，以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組的部分人為基礎，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組建了一個班子，帶著經委的馬洪和董峰、計委的梅行和廖季立、人民日報社張沛等同志，連同一大批一機床廠的調查材料及5月國務院召開的工交工作座談會材料，到東北的一些國營工廠再做調查。在瀋陽，他們通過東北局的協助，在瀋陽第一機床廠、重型機械廠等單位，一邊作調查，一邊討論有關問題，同時起草條例。歷時半月，完成了條例的草稿。其後，工作組又輾轉到哈爾濱、長春等地，多次召開座談會，聽取企業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意見。

在東北，基層的同志們反映：許多企業裡的問題，都不是企業自身造成的，而是上級領導決定造成的，例如計劃是上面下達的，

生產指標是上面規定的，原材料供應也是上面決定的。生產建設上的瞎指揮，許多都來自上面。外部問題不解決，企業內部的生產秩序即使整頓好，企業工作還是搞不好。

根據在現場聽到的這些意見，工作組不但重視了企業內部的問題，而且考慮到企業外部的問題。他們經過反覆修改，寫成了初稿，題為《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共 15 章，80 條，送交中央書記處。

2.4-2 《工業七十條》出台

1961 年 8 月 11 日到 14 日，鄧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條例”草案。會議最後把草案歸納為 70 條，分 10 章。10 章分別是企業管理的十個方面：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工資、獎金、生活福利，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協作，責任制度，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黨的工作。“條例”前面又加寫了一個序言，由鄧力群、田家英、胡繩、吳冷西等人起草。文件總字數 25000 字。

書記處會議通過的“條例”只算是初稿，隨即提交給 8 月 23 日在廬山開幕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在會上，多數人認為這是一個好文件，對於興利除弊、整頓工業企業、搞好企業管理十分必要。有了這個條例後，工業企業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條例”寫廠長負責制方面很突

出，而黨的領導方面則不突出；寫按勞分配、給錢方面很突出，而對政治思想方面則不突出；寫責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眾運動方面則不突出；寫廠長負責制方面是連貫的，一氣呵成的，寫政治掛帥方面則是點滴的，不連貫的；寫強調科學方面很突出，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則不突出。而且對“大躍進”的正面經驗總結得不夠，肯定得太少等等。還有人擔心，實行這個“條例”，又將回到“大躍進”以前的老路上去了。

中央書記處認真研究了會上的不同觀點，凡能吸收的意見都儘量加以吸收，並對“條例”初稿再次作了修改。儘管如此，仍然有人不肯表態。最後，田家英出了個主意：在頒發“條例”的同時，另寫一封指示信，全面論述“大躍進”的成就，既體現了當時思想上的共識，又對制定這一“條例”的目的、意義和重要內容進一步加以說明。中央書記處採納了這一建議，並指定由田家英組織人員起草指示信。因此，“條例”本身中的政治語言就被刪除掉了。

9月17日，毛澤東主席批示：“指示及總則已閱，很好。”並圈掉了“管理”二字，最終定稿題為《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此草案經討論通過後，由毛澤東簽發。這就是著名的《工業七十條》。據鄧小平後來多次對負責條例起草的薄一波說，毛主席臨終時，還把《七十條》擺在枕邊。

《七十條》是我國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第一個總章程。它的出台，對於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糾正“左”的傾向，提高全國工業企業管理的水平，把企業引向正確的軌道，起了重要的指導和規範的作用，並見到一定成效。在《七十條》的基礎上，

馬洪打算更上一層樓，批判地吸收蘇聯以及西方國家企業管理的經驗，對中國企業管理的歷史經驗再作總結與提高。於是，他與中科院經濟所的人員協作，開始撰寫《中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一書，作為我國工業企業的指南。

殊不知，天有不測之風雲。

2.5 被彭真揪住不放

2.5-1 “怎麼這個人也能參加會議！”

1962年夏秋，馬洪到北戴河參與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某日開會，彭真出席，見馬洪也在會場，沈下臉，喝斥道：“怎麼這個人也能參加會議！”說罷起身，摔門而去，將門窗的玻璃都震落下來，以至於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以為然地：“你（彭真）不要影響我的情緒！”

當初薄一波調馬洪去經委，就在書記處受到彭真的阻撓。所以，馬洪的正式任命始終沒有下來。其後，彭真又不斷地向薄一波施加壓力，欲將馬洪排出經委，發放外地。而薄一波一拖再拖，未作處理。薄一波當然知道馬洪是大材小用，況且並沒有授予他什麼“軍機大權”；可作為一個“秀才”嘛，馬洪又十分得力，確實無可挑

剔。

薄一波與馬洪是山西定襄同鄉。薄一波是蔣村人，馬洪是待陽村人，兩村相隔不過 15 里。同樣也是山西老鄉的閻錫山，是五台河邊人，相距也不過 20 餘里。

當年閻錫山為了表示自己抗日搞統戰，曾以同鄉的名義拉攏薄一波，外界曾有“閻是薄的舅舅”一說。雖說是謠言，卻無人闢謠，反正對統戰有利。薄遂利用閻的影響力，組織了“新軍”和“犧盟會”，加強了共產黨和抗日武裝的力量。閻錫山也曾自以為“新軍”和“犧盟會”，壯大了他自己的地方勢力，多了向蔣介石討價還價的籌碼。而馬洪（牛黃）當年作為同蒲路總工會的代表，曾跟閻錫山進行談判，因同樣來自本鄉本土，引起閻的刮目相看。為此，薄一波不禁感慨：“連閻錫山都知道招賢納士。何況馬洪原來反對過我，而不是你彭真。”薄幾次見到馬洪時，都欲言又止，似有難言之隱。

彭真，山西侯馬人，身材偉岸，鼓額，黑面。彭早年參加革命。1929 年在國民黨的監獄中，由於酷刑及其他非人待遇，他染上肺結核和痢疾。獄中同志恐其生命不保，問他有何遺言。為改善犯人們的待遇，彭真卻用僅存的氣力，領導了長達 20 天的絕食鬥爭（其間敵人曾幾次強行灌米湯和鹽水），而終於取得勝利。彭後來在北方局劉少奇的領導下做白區工作，成績卓著。彭 1941 年去延安，繼陳雲任中組部部長；解放戰爭初，作東北局第一書記；解放後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並在中央主持政法工作。

“七千人大會”之後，國民經濟好轉。不知是有遠見，還是看得開，鄧小平雖為總書記，卻自甘大權旁落，開會總坐得離毛澤東

遠遠的，整天打橋牌。彭真實際上掌管了書記處。

時光倒流，回到 1945 冬 -1946 年春，回到解放戰爭時的東北。對諸種重大政策問題，彭真等跟林彪、高崗、陳雲有分歧：對國民黨是“和”還是“打”？對投誠的偽軍殘餘，作何種階級分析？黨的工作重心，應放到中心城市還是廣大農村？後來，中央支持了林彪等人的意見，彭真在東北局的第一把交椅，被林、高先後所取代。而這些糾紛，即使在高崗、林彪隕落多年之後，仍然塵埃未定。時至 40 年後的 1987 年，以陳雲、彭真分別為不同的營壘，對遼沈戰役、對當時的土改，又重開論戰，各自組織人員寫書。直到這場官司打到鄧小平那裡，鄧指示此事不要再爭，文章概不發表，一併存檔。此乃後話。儘管彭與林、高、陳的爭議，是在馬洪 1948 年 5 月被高崗調用之前，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1962 年夏，彭真仍揪住馬洪以泄憤，足見彭與高等人當年在東北的結怨至深。

2.5-2 個人受些委屈有什麼了不起？

馬洪被彭真逐出會場後，漫無目的，不知不覺地返回機關的招待所。一進樓，看見小賣部的櫃台裡琳琅滿目，擺滿“金絲猴”、“熊貓”、“紅牡丹”，以及“茅台”、“竹葉青”、“加飯”等等各色名貴煙酒。當時全國經濟尚未全面恢復，這類煙酒雖在釣魚台、人大會堂、北京飯店諸地充分供應，可在市面上早已絕跡數年。

馬洪煙酒不沾，小時候是因為家裡窮。後來去了同蒲路，領下

幾元工資，除去飯錢以外，全部送回老家接濟父母。他發現自己有酒量，還是1937年那年過年，游雲、游軍姊妹一起請客吃飯。大年夜，北風吹，雪花飄，太原城裡盡放花炮，他們幾個年輕人又唱又笑。游雲想把牛黃灌醉，可他把“竹葉青”喝下一瓶，依然臉不變色心不跳，最後還是讓游軍給勸住了。“當時我們好年輕呵！”……牛黃不但酒量大，撲克也打得特別好，工會裡誰也贏不過他。但由於入了黨，生怕這類“毛病”會影響革命工作，統通給戒掉了。

馬洪不是一個容易傷感、經常憶舊的人，可那天他卻管不住自己的思緒。他用兩塊錢買下一瓶老家的“竹葉青”，匆匆回到房間。說實話，甚至在“高饒事件”時期，馬洪也從來沒有頹唐過，他只是認真檢查錯誤，端正態度，從裡到外都非常積極。今天，馬洪卻感到口唇焦燥，咕咚咕咚就幹掉半瓶子酒。捫心自問，自“高饒聯盟事件”以後，他從未計較名譽地位，無論上山寫稿、還是下廠蹲點，組織上讓幹啥就幹啥；甚至謹小慎微，在會上很少發言，只作記錄，到會下也不過是幫助上級整理文件資料而已。現在馬洪覺得胸口發悶，需要透口氣，於是疾步出門，邁向海灘。

解放前，北戴河是外國資本家和國民黨官僚的療養地。解放後，成為黨政領導人夏季開會兼休憩之所。金灘碧浪，紅頂黃檐的西式別墅錯落在林蔭之間；距北京僅一二百里，既幽美又方便。沙灘則按黨、政、軍分割，一般群眾不得入內。

由於中央工作會議仍在緊張地進行，海灘上遊人稀少。馬洪大口大口地吸入海風，好像要蕩滌胸中的污濁，可沒起多少作用。瞭望遠天，碩大的烏雲，仿佛沈甸甸墨畫的牡丹；而在烏雲的縫隙

之間，星星點點，又透過來明晃晃的太陽。馬洪似乎聽到遠方的召喚，遂縱身躍入海中。有人會以為他喝醉了，甚或是自尋短見？其實，他不過想消耗一下能量，讓自己平靜下來。沒想到，那似乎平靜的海水，瞬間變得混沌，旋即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壓來，把馬洪摺個底朝天。待他剛掙扎著露出水面，馬上又被苦澀的海水噎噲得透不過氣來。

這浪頭來得出乎意料，把馬洪打得措手不及。但此時的馬洪，已不再是當年在延安被山洪衝下、不識水性的青年。在那次遇險後，他向鄧力群、宋平這些北平來的大學生求教，在延河裡學會了游泳。儘管當時延安的青年，也有打籃球、打乒乓球這些業餘活動，馬洪喜歡的還是游泳。

後來，他出差到哈爾濱游松花江，到武漢游長江；平時在北京三里河的經委上班，午休時，便從釣魚台外面的玉淵潭水閘出發，順流而下，游到木樨地，再走上來，往返兩三次。可以說，馬洪的水性還是蠻好的。到此刻，馬洪的意識已經完全清醒了：他絕不能讓這海浪捲走，落得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下場！他奮力搏擊，終於返回海岸。畢竟年富力強，馬洪在跟風浪搏擊後，不但沒有筋疲力盡，反倒徹底冷靜下來。他爬上一塊巨礁，觀望海浪的起落，逐漸回復了他久已形成的邏輯推理：

遠的不提，幾年前在廬山，彭老總為民請命，上“萬言書”，雖有保衛延安、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赫赫戰功，仍不免獲罪；聞天同志長征時即任總書記，建國後僅任駐蘇大使，廬山會議上對“三面紅旗”提了些意見，即被定為彭的“同黨”。

馬洪對張聞天特別同情。早在 1942 年，他曾跟隨張去陝北農村進行社會調查。他們調查的重點是一個名叫馬維新的大地主。馬家保存了上百年的賬本、地契等記錄，是一座社會調查的寶庫。而馬維新本人很開明，允許張聞天的調查組自由參考他家的地產、租賃、貸款、雇傭等各種財產和經營的資料。

馬洪記得張聞天當年有一次曾開玩笑：“當年，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卡爾·馬克思研究資本家的賬目而寫出了《資本論》。如今，我們要理解中國的經濟，則不可不研究馬老太爺的賬目！”

馬洪還記得，馬維新每天從窗口打量他們：張聞天使用計算尺，馬洪打算盤，張的妻子劉英作記錄。老地主見他們起早貪黑，一絲不苟地調查他的家產。到頭來，調查組對他的家底跟他自己一樣清楚！“治一個國就像理一個家。他們無論貧富，不計土洋，從五湖四海來到一起抗日，”馬維新又驚又羨：“共產黨裡能人多呀，看來國民黨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張聞天樹立了榜樣，不僅激勵和引導了青年的革命者馬洪，而且感動了老地主馬維新。而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為創建新中國浴血奮戰，他們的領導人如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其中作出卓越的貢獻。但在革命成功之後，他們竟因為民請命而遭到如此的懲罰！

馬洪不由得想起李銳，毛澤東的另一個秘書。李在廬山會議上贊同彭、張的意見，立馬被打成“右傾”，發配北大荒。甚至像馬洪的朋友宋平這樣一貫言行謹慎的人，在小組會上說了幾句應當實事求是、關心人民疾苦的話，也由國家計委京官外放……田家英、梅行他們有時幾杯清酒下肚，便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馬洪不像他們

那樣士大夫氣，卻明白自己以高崗親信的情節，放在歷朝歷代，如果不是臉上刻字，也會像林則徐一樣被發配新疆，或像蘇東坡一樣被謫貶海南……

馬洪又從不同角度，再度捫心自問：當初參加革命是為什麼？入了黨，由牛仁權變牛黃，改了名；上延安，又由牛黃變馬洪，換了姓。這就是說，把自己全部交給了黨——抗日，土改，解放，建設……個人受些委屈有什麼了不起？參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國家和人民做些事。想到此，馬洪比較踏實了。他知道前途會非常曲折，可思想準備總算是有了。

2.5-3 彭德懷和習仲勛也跟高崗一夥

然而，馬洪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三。

1959年廬山會議後，安志文，就是那位中組部長安子文之弟，忽然到高崗遺孀李力群工作的勞動部，將她接回家裡，宣布“不許再上班了”。此時，進駐的公安幹警已把新裝的電話線，接到李力群原有的電話機上。安志文正告李力群：“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反毛主席、反黨。你根據我給你的提綱，在家好好想想彭德懷與高崗的關係、彭德懷與其他人的關係”。

幾天後，安志文又把李立群接到彭真家，在場的還有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

彭真說：“今天找你來，問問高崗與彭德懷的關係。你知道彭

德懷與林彪、陳雲的關係嗎？”——當時彭真僅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而陳雲和林彪是黨的副主席。

李力群嚇得直哭，說：“彭老總找高崗，都是談抗美援朝的事。彭總與其他人的關係我不清楚。”

彭真說：“我只是隨便問問。”

安子文和徐子榮接著說：“不知道就算了。不要對外講。”

這樣，李立群在家被關了三個月，直到公安幹警撤離。

到了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劉志丹》這本小說，被康生遞條子，說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除了照念條子之外，進而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製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於是由康生出面，將被指為“為高崗翻案”的小說作者、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逮捕下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和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旋即被撤職查辦，下放基層。高崗和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當初陝北根據地接應了長征後的中央紅軍。而習仲勛和賈拓夫也是來自陝北蘇區的領導幹部。於是乎，從陝北老區來的僅剩下的幾位老同志，也紛紛成為“彭、高、習反黨集團”的成員，那本小說成為了他們的“反黨綱領”。由此在全國造成了株連近萬人的又一大案。

這一次，安志文再次來到李力群家，要她檢舉習仲勛、賈拓夫，並規定她不准上班，在家寫材料。於是，李力群再次被軟禁三個月，直到被迫調動工作和搬家。

由此看來，彭真一再對馬洪揪住不放，不但是算高崗的老賬，

而且是新舊情節的交織。

據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回憶，“文革”初，在彭真即將落難之際，李曾目睹彭態度激昂地發火，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億萬中國人必須高呼“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如同宗教的禱告呼號。當時，全國上下，人人穿毛服、佩戴毛像章，飯前和睡前背誦毛語錄，三更半夜湧入街頭唱歌跳舞，以示他們對毛無限的忠心……這瘋狂的偶像崇拜既無人制止，也無法制止。而第一個喊叫“萬歲”的，其實就是四十年代的彭真本人。當然，許多人會步其後塵。在1966年那亂雲飛渡中，陷入危局的彭真仍想證明是他對毛主席最忠誠？

“文革”後，彭真主掌人大，每次開會時必照本宣科念憲法，作為開場白。晚年，他也多次搬出憲法說事，明確聲稱：“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



3.1 災難將臨，跟時間賽跑發奮著書

生有重泰山，死有輕鴻毛。
太史文章在，功過千年外。

如果說 1954 年的“高饒聯盟事件”對馬洪是一個沈痛的政治教訓，那麼 1962 年北戴河事件則給予他啟示，迫使他用不同的目光重新觀察周圍的人與事，迫使他去追求生命真正的內涵。當時他 42 歲，按孔子的說法，已逾不惑之年。現確知高層有人不容於己，馬洪面臨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擇：究竟是逆來順受地聽天由命，還是經歷磨難卻自強不息？從兒時起，馬洪就胸懷大志，想幹出一番事業。而今人過中年，他不容許自己因為某某人或某某事、某個打擊或某種不幸就隨波逐流地虛度此生。

由於高崗，加上彭真，馬洪明白自己的政治前景非常有限。但人生的意義並不完全在於做官的大小，甚至不在於做不做官。如果沒有高崗，沒有彭真，馬洪也許會成為一名開通而有作為的官員。然而高崗，尤其彭真，使得馬洪成為一位眼界更開闊、思想更深沈的

經濟學家。

在接連不斷的打擊之下，脆弱一些的人早就會精神崩潰，而馬洪則重新聚焦，力爭使今後的工作具有更明確和更深刻的意義。馬洪期望他的努力最終會有積極和長遠的效果，最終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福祉。

於是，他集中精力，主持編寫《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一書。

自建國以來，馬洪通過上上下下的工作實踐，切身感到，在中國廠礦企業的廣大工人中，蘊藏著巨大的能量；而新中國經過十幾年的建設，也初步具備了一個大國發展工業的基礎，問題是如何走出一條既不同於蘇聯，又不同於西方的中國自己的道路。他開始認真探索這個問題，一些粗大的脈絡已在他的腦中逐步形成。因此，這本書凝聚了馬洪的心血，貫穿了馬洪歷年來在調查研究中形成的管理思想。從寫書指導思想和基本觀點的提出，到篇、章、節的設定；從論證方法、行文格調的要求，到逐字逐句的修改定稿，這部書巨細均出自馬洪之手，這是馬洪的一部力作。

自北戴河事件以來，陰影一直籠罩著馬洪，他知道一場災難又會降臨，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他日夜兼程，好像在同時間賽跑。儘管寫作組的同志一般都熟悉馬洪超強的工作效率，卻不能完全理解他這種“只爭朝夕”的心情。

果不其然，1964年中，經委黨組書記谷牧找馬洪談話，傳達了上級指示，將馬洪調離經委。谷牧代表機關黨委給馬洪作了很

好的鑒定，表示對他在經委的工作十分滿意；同時說明這是中央一個負責人的意見，此負責人說，早就要求經委把馬洪調走，經委遲遲不調；如果再拖延下去，就要對經委“採取組織手段”了。谷牧表示，他和黨組都不願意把馬洪調走，但因為中央書記處的這個負責人向經委下了命令，“我們不能不這樣辦”。據谷牧說，有人原打算把馬洪下放到甘肅酒泉。酒泉乃西漢大將軍霍去病率五千精騎，晝夜奔馳，征戰匈奴之地。漢軍勝，武帝犒賞美酒勞軍，霍去病以酒傾倒在當地河中，與將士同飲，故得其名。酒泉後世為流放之地。而經過經委的疏通，上級同意馬洪留京，調去建工部設計院。後來，經委又同曾與馬洪在東北一起工作過的化工部部長高揚疏通，將他調往化工部下屬的設計院。在處理馬洪的工作調動上，經委方面確實花了不少氣力。馬洪調離時，薄一波沒有出面談話。屆時毛澤東已使用余秋里等人，組織“小計委”，故有傳言，薄本人的日子也不好過了。

馬洪兩年來時刻準備著，心理上尚能承受。然而，儘管他爭分奪秒，《企業管理》那本書還沒有完成。經委和化工部的領導都表示諒解和支持，寬限馬洪一段時間，使他能夠與助手們一起，齊心協力，盡早完書。不幸的是，在沈重的工作壓力和精神壓力下，馬洪突然發作嚴重的腰肌勞損，竟臥床難起。寫作組的同志（多來自工交口和中科院經濟所）和馬洪一樣焦急，他們深知馬洪是這本書的主導。在馬洪調動工作以後，無論是時間上還是地點上，都將對此書的完成大大不利。當時國民經濟有所恢復，他們這些工交戰線上的理論工作者，十分明瞭此書對今後工業企業管

理的重要性。於是，寫作組的同志，包括經濟所的陸斐文、吳家駿等研究人員，每天輪流來到馬洪家裡，圍坐在他的床前，由他口授，他們作記錄，然後再作整理、修改、定稿。如此這般，馬洪以驚人的毅力，在寫作組同志們通力合作下，竟用兩個月時間，將此書突擊完成。這本書終於在 1964 年底出版問世。

3.2 “文革”原來是要打倒劉少奇

1954 年“高饒聯盟事件”以後，毛澤東雖然沒有機會將劉少奇打倒，卻並沒有忘記了黨內的路線鬥爭。1955 年“合作化運動”時，毛澤東稱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在緊要關頭時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後面擊一猛掌”，實際上批的是劉少奇。“大躍進”前，他又指桑罵槐地指責周恩來和陳雲“反冒進”，其實也是衝著劉少奇去的。1959 年 3 月，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毛澤東第一天就鄭重宣布：我是黨的統帥，鄧小平是副統帥，把劉少奇摺到一邊。不久，劉少奇作了國家主席，儘管劉主席的像與毛主席的像並列，那不過是應驗了毛澤東從前讓劉“當議長”的盤算。不料，廬山會議上，突然殺出個彭德懷，彭馬上成了“歷來有野心”的“漏網的高饒分子”，而劉少奇因為跟著毛在會上鬥爭彭德懷，那回算是無事。而到了三年困難時期，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

被迫作檢討，接著又有“西樓會議”等，在毛澤東看來，這些都是對他的“反攻倒算”。其後，毛退居二線，韜光養晦。

但毛澤東不必久等。在1962年北戴河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在1964年的“九評”中，他更警告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同年討論“四清”的方案時，毛澤東又正式指出：“存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議討論期間，劉少奇插話：“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起來。事後，毛澤東說劉剝奪了黨章給他的權利，不讓他講話，執意要劉認錯，但被劉拒絕，弄得毛下不來台。後經周恩來、賀龍、安子文諸位黨內元老的調解，劉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查。可毛澤東自認有理，當面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與否的問題，而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問題，是原則問題。

時至1965年，中國的政局已不再能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形容，一場“澄清玉宇”的颶風海嘯，正步步逼近。其實，幾年來神州大地，不斷出現種種異兆：雷鋒學毛著，全軍學雷鋒，全國學習解放軍。而參謀總長羅瑞卿卻在軍中開展“大比武”，結果被批成“不突出政治”、搞“形式主義”。羅於1966年3月跳樓自殺未遂，毛澤東聽到消息，說了一句：“怎麼跳樓了？真沒出息！”；1965年江青到上海，組織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彭真；1966年1月毛澤東公開宣稱，陸定一主持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求“解放小鬼”；1961年毛退居二線時，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曾聽命於在一線的劉少奇，

安排給毛澤東講話錄音，被說成是“給主席安裝竊聽器”，導致了1965年底楊下放廣東……由於以上諸人分別把持政黨、意識形態、軍隊、情報安全等要害部門，所以，在“文革”的序幕中，首先端掉“彭陸羅楊反黨集團”，砍掉劉少奇的左膀右臂。

1966年6月1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發表，吹響了“文革”的進軍號。此前，北大出現了反對校領導的大字報，被毛澤東歡呼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毛本人接著寫下他的《炮打司令部》，炮口對準劉少奇。由此，打倒劉少奇的政治運動正式揭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不久，由於黨政機構全部癱瘓，社會上奇談怪論泛濫，此時劉少奇已岌岌可危，他的妻子王光美被公開羞辱，他的一個女兒被造反的紅衛兵扣押。1967年1月13日晚，毛澤東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一面招待，一面詢問他作為人質的女兒的近況。劉提出要辭職回家種田，毛澤東沈吟不語，始終未置可否，只建議劉認真讀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不久，劉少奇被拘禁。在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被宣布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永遠開除出黨”。次年，重病的劉少奇長頭髮、長指甲，全身赤裸，以化名死於河南開封的一個地下室。

3.3 被批鬥了七八十次

至於馬洪這個高崗的“死黨”，是群眾還不瞭解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真正意圖時，最早被揪出來的“黑幫”之一，主要罪行還是“追隨高崗分裂黨、反對劉少奇和黨中央”。他先在設計院裡挨鬥，然後拉到化工部，再後拉回經委，這回的罪名卻有了新的內容：“炮製《工業七十條》，反對《鞍鋼憲法》；主張廠長責任制，反對政治掛帥……”總之，經過上綱上線以後，就是對抗毛澤東思想。當時，經委的頭號靶子是“從敵人狗洞裡爬出來的大叛徒”薄一波，馬洪只是作為薄重要的“打手”和“爪牙”，一起拉來陪綁。

總共算起來，馬洪經歷的批鬥會，大小有七八十次之多，其中最熱鬧的一次，要數在工人體育場的“工交口萬人大會”。以薄一波為首，經委各副主任、工交口各部部長，以及馬洪，一個個脖子上掛個大牌子，上面名字倒寫又劃叉，站在講台上；如此這般，他們再彎腰躬背，兩臂倒舉，坐上“噴氣式”。面對場內的人頭攢動、標語旗幟翻滾、歌聲口號震天，被鬥者汗如雨下，六神無主。馬洪一開始被放到站台中央，作為批鬥的重點。後來按“黑幫”的官階排座次，又被擠到台的側邊。

同被揪來挨鬥的還有地質部部長何長工，他隨身沒帶《毛主席語錄》，因此極其緊張。這在當年可非同小可，被革命小將發現，很可能引爆一起新的“反革命事件”。在類似的情況下，“×××

狗膽包天，公然藐視毛澤東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油煎×××，×××千刀萬剮，砸爛×××的狗頭！”諸如此類的口號和標語立馬會響徹全城，×××將被推上卡車，拉到天安門廣場遊街示眾，鬧不好甚至可能被打死。因此，馬洪見狀急中生智，將自己的“紅寶書”的封皮撕下來，塞給了何長工，自己留下個瓢子，兩人好歹蒙混過關。

馬洪由於從前挨鬥見過世面，而且這回幹部幾乎人人有份兒，所以倒也不特別在意。尤其是過了“紅八月”，像“王光美是中央情報局派來的美國特務”，像“周恩來化名伍豪登報脫黨”，像“朱德在井岡山迫害毛主席”……火爆新聞目不暇接，群眾漸漸失去了對馬洪這類“死老虎”的興趣。於是，或在機關掃院子、刷廁所，或關進四壁透風的“牛棚”裡反省揭發，馬洪反倒落得個清靜。

為了進一步檢討作為高崗的“五虎上將”的罪行，馬洪必須有官方的文件作為依據，以免失誤，所以他讓兒子馬佳到計委大樓後面，替他抄錄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馬佳那年還不夠上中學的年齡，正在提心弔膽地抄抄寫寫，想不到一個戴眼鏡的老頭兒，見左右無人，上前詢問：“你是誰？”嚇得馬佳說不出話來。老頭子見狀，態度和緩地說：“你姓什麼？”馬佳答：“我姓馬。”老頭兒聽罷點點頭，說：“我姓張，叫張聞天，回去告訴你爸爸。”馬佳回家後，向馬洪訴說此事，並問：“誰是張聞天？”馬洪沈默了一陣，嘆道：“張聞天又叫洛甫，長征時期是黨的總書記。”年幼的馬佳驚訝而困惑。

張聞天和馬洪由此算是間接地“聯繫”上了。這位當年在陝北帶著馬洪下鄉搞社會調查的老前輩，始終對馬洪的治學有著深刻的

影響。而在“文革”那風雨飄搖的日子裡，張聞天和夫人劉英，除了挨鬥挨打之外，每月只發給僅夠糊口的生活費。於是，馬洪讓馬佳隔三岔五地，偷偷地給他們捎去兩筒肉罐頭，稍加改善。老兩口怕浪費，不用刀切，而用細線一點點地割，然後夾在饅頭裡面慢慢地嚼，也許這是蘇區傳下來的老傳統？馬佳還看到，劉英拿著毛巾蘸著溫水，替張聞天輕輕地從背上撕開血肉粘連的襯衣，替他清洗乾淨，保持住尊嚴，準備著下一輪的批鬥會。

至於馬洪，1969年，在中共“九大”之後，他和他的工作單位一起被疏散到程家——那是河北與山西交界的山溝裡的小村鎮。當時，各個機關紛紛撤離北京，幹部上“幹校”，學生下鄉，以“反帝反修、備戰備荒”。馬洪的女兒馬雅也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她順路去探望了馬洪。

馬雅由於不能上學，又沒有正式的工作，對自己的前途很悲觀。但馬洪對她說：“不管誰當政，任何國家都要發展經濟。情況不會永遠像現在這樣。”

在馬洪的窗前，有一棵他親手栽種的小樹，沐浴著雨露和陽光，天天向上。馬洪指著那棵小樹對女兒說：“如果我將在這裡終老此生，我要看著它長大成材。”

被父親的言行鼓舞，馬雅振作起來。她回鄉後，利用“文革”間自學的知識，成為了村裡的“赤腳醫生”。“赤腳醫生”是在當年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能給農民提供最基本健康服務的基層醫務人員。1972年，中美和解，毛澤東放寬了某些政策，其中包括讓學校重新招生。馬雅則被村民推薦回了北京進入醫學院作學生。



馬洪與全家在北京合影，此時陳伯林已下幹校。前左為馬洪岳母，1969年。



馬洪“文革”下放期間，在山西程家(娘子關)，1970年。



梅行與馬雅，攝於北京萬壽路，1996年。

3.4 俠義的梅行

一天，馬洪和另一位“黑幫”梅行在經委的院子裡掃地。他倆常趁此機會，溜一眼大字報，以知曉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忽然間，大樓的拐角處閃出幾名彪形大漢，雖然沒有戴領章帽徽，一望即知是軍人。他們不由分說，上來便將梅行擒下帶走。那年頭社會上很亂，馬洪上前想問個究竟，被來者蠻橫地推到一邊。梅行倒像有所準備，並沒與他們抗辯，可大漢們仍對瘦弱的他推推搡搡。從此，梅行杳無音訊。

梅行也是從延安出來的，當年梅行在魯藝，馬洪在馬列學院。他們是在東北一起工作時才熟悉起來的。梅行來自蘇北江陰，也許鄉風使然，他一身俠氣，一身豪爽。

遠的不提，1966年通過“五一六”通知，“文革”緊鑼密鼓地開場，雖然未被正式罷官，中辦副主任田家英已失去了聽取中央文件的資格。梅行卻連夜與田約會，通情況，並一同借酒澆愁。隨後，汪東興、戚本禹去田處，宣布其停職反省，並查封其所有的文件。田本一介書生，當晚自盡。

田家英自1948年起任毛澤東的秘書。儘管論資歷、地位，應在其他大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之下，然而田也正因為年紀輕，在毛澤東身邊的時間更多，私人關係也更密切。田曾做過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的中文教師，除給主席寫文件、編毛著之外，還整理他的詩

詞。毛澤東對田一度很欣賞，田幾次要求調工作而不可得。

由於 1959 年廬山會議時，田贊同彭德懷的意見，從此失去了主席對他的信任。而 1962 年劉少奇召集“七千人大會”時，田是報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七千人大會”以後，田繼續到外地作調研，以進一步否定“三面紅旗”。這愈發導致毛澤東對田的疏遠。最後一根稻草則是 1965 年，田在杭州整理主席的講話記錄時，刪去講話中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那關鍵的一句話，被關鋒告發，被江青大作文章。這種“公然篡改毛澤東指示”的背叛行為，當然不為他所寬容。

田家英在黨內高層知識分子中，是一位士大夫氣息很重的人。儘管康生、陳伯達這類黨內大秀才，同田家英一樣，重字畫、重金石、好古董，並有一定造詣。但與他們不同的是，田家英的處世為人，顯現出他士大夫的品格。田對清史，尤其是晚清史有研究，很仰慕“戊戌變法”的譚嗣同。譚嗣同的書房名為“莽蒼蒼齋”，田家英 1964 年將自己的書房起名為“小莽蒼蒼齋”，頗有慷慨悲歌之慨。他曾寫下“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一飯膏粱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的詩句以明志。田還把朋友間的義氣看得很重。李銳在廬山會議後落難，在李下放勞改之前，田約李到僻靜的小飯館話別。當李再度外放時，田又邀李飲酒餞別。

梅行與田家英意氣相投，不僅因為他們同愛字畫，同好飲酒，也因為他們同有肝膽相照的脾性。梅行不但寫得一手好字，更工金石，當初堪稱“京城一把刀”。梅行曾為視為知己同懷的田家英篆刻“京兆書生”的印章。

說到馬洪，梅行始終認為是一個冤案，那在當時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由於工作關係，梅行知道彭真從一開始就對薄一波調用馬洪極有意見。後來馬洪 1961 年參與中央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關於調整工業的文件起草，參與《工業七十條》的基礎調研和最終定稿，參與 1962 年“七千人大會”的報告起草，和有關 1962 年度中央關於商業決定的起草，使得彭真更加不滿，耿耿於懷，對薄一波不斷施壓。梅行為此一直替馬洪憤憤不平；而且出於同情，違反“組織原則”，每每向馬洪通風報信，讓他多小心，讓他迴避一些活動。因此，當彭真仗勢欺人，終於強行將馬洪調離經委，接替馬洪工作的梅行，公然在香山飯店宴請馬洪一家並留宿，不只表現他的仗義執言，更流露出他對權貴的藐視。

對於馬洪在“高饒聯盟事件”之後，忍辱負重，兢兢業業，梅行特刻製“牛舍藏書”印章一枚以相贈；章上尚有文字如下：“馬洪本姓牛，現名為陳雲同志所起。夫牛者，其軀也巨，任勞任怨，終年辛苦，以是魯迅有孺子牛之說。今以牛名舍，不亦可乎？”

“文革”一起，梅行作為曾在中辦、計委、經委等黨政要害部門工作的“黑筆桿”，自然劫數難逃。在工交口被批鬥和勞改時，梅行和馬洪難友重逢。與梅行比較，馬洪更像一個書卷氣的儒生，缺少梅行那種文人的落拓與豁達。來回的批鬥，除了“莫須有”的罪名之外，加上拳打腳踢、遭受唾罵等人身和人格上的凌辱，有時會使馬洪悶悶不樂。梅行卻想得開，他在批鬥會後，常常拉上馬洪，下三里河附近的回民小飯館，大吃二喝。拿他的話說：“得先填飽肚子，才有勁，才好對付下一輪的批鬥！”果然，馬洪發現梅行的對策

挺有效。可惜，他倆相依為命的好景不長，梅行被抓走了。

其實，馬洪心裡明白，以梅行對自己的見義勇為，他一定會因田家英受累。田家英算是犯了滔天大罪，可他“士可殺而不可辱”，懸梁自盡，使要整他的人惱羞成怒。於是，他的家人和友人便成為出氣筒和替罪羊。田的內人董邊迫於壓力，檢舉了梅行和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田與李也曾交換過一些對毛澤東的看法。李志綏因是汪東興舉薦上來的，汪唯恐牽連自己，遂將董邊對李的檢舉材料，經與周恩來交涉後，藏入周的保險櫃，保李過了關。可梅行哪有汪、周這等靠山？再則梅行這人有如“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他坦承自己是田的私交，在一起琴棋書畫、吹貓談狗，卻拒不交待田說過什麼政治要害。於是，梅行因包庇“死有餘辜的現行反革命”而代人受過，又因態度“頑劣”，罪上加罪。於是，身患肺結核病的梅行，被關進政治要犯監獄秦城，一押十年。

3.5 林彪不費一槍一炮把全黨全軍震懾住

論及風雲開闢的文革，便不可不涉及林彪。“靜如林，猛如虎”，作為一位軍人，林彪實在神奇。他紅軍時期是“娃娃營長”，抗日戰爭報捷平型關，後來他的四野又領軍解放中國，所以林長期受到毛澤東的特別鍾愛。但解放後林彪一直隱退，一來健康欠佳，二來也

是為了回避“功高震主”的嫌疑。

直到廬山會議批彭德懷，林才又顯山露水，“文革”前已有“語錄”“紅寶書”的政績。毛澤東為發動“文革”，需借重以林彪等為首的軍方實力。總參謀長羅瑞卿有能力，身體好，又比林彪年輕，是林在軍中的勁敵。於是，毛澤東拔除了這幾年與第一線的劉少奇走得過近的羅瑞卿，穩定住軍心。

而林彪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心領神會，遙相呼應：1966年1月，他鼓吹“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在《解放軍報》上打響了“頂峰論”這一炮；5月，他又到政治局擴大會上，大談古今中外的“政變經”。這樣，作為大軍事策略家，林彪不費一槍一炮，便在政治心理上，把全黨全軍震懾住；至於“彭陸羅楊”和往後的“劉鄧”，便兵敗如山倒。

但毛澤東對林並不完全放心，不僅在同年7月讓周恩來把他給江青的信轉給林看，還在9月叫林讀《三國誌》中的郭嘉傳和《宋書》中的范曄傳，目的是提醒林要擺正關係，學習郭嘉，一心事主；又用曄曄最後參與謀反，落得滿門抄斬的教訓，來警誡林彪。

到了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已被完全打倒，經中央文件定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被“永遠開除出黨”。當1969年4月九大召開時，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定為毛主席的法定繼承人，還寫進了黨章。原來八大的中央領導，約有90%被“吐故納新”。

當時國內卻很少有人意識到，“文革”激烈的黨內鬥爭，同中國在國際上反帝反修這種大環境是分不開的。西方和蘇聯，均感受

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的壓力，有恐“革命輸出”。於是中國邊界上也風雲密布，重兵壓境。1966年1月，蘇聯與蒙古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意義的“友好互助條約”。由於中蒙接壤4500餘公里，這事實上對中國的華北、東北、西北的三個方向構成了軍事威脅。從中蒙邊界的二連浩特經張家口到北京不過560餘公里，而蘇軍戰略軍團的當前任務，縱深可達700餘公里；完成當前任務的時間，則為10-14晝夜。加上中蒙邊界地區地勢基本平緩，尤其便於蘇軍機械化部隊的長驅直入。蘇聯部署在其國土縱深的洲際導彈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導彈，可以攻擊中國全境；而部屬於遠東戰區的遠程航空兵，如從中國“三北”方向入境，作戰半徑可達長江一線。

1966年3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日共領導人時，提到準備美國人從東海岸打進來，但著重談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問題。毛說：“準備修正主義來打，打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打進北京”；“準備蘇美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聯佔領北邊，美國佔領南邊”。

1969年3月2日，“文革”仍在進行之中，中蘇邊界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同年8月13日，又有新疆的鐵列克提事件，中蘇邊界形勢全面惡化。遠東地區的蘇聯空軍多次發布停機待命的通知，製造發動突然襲擊的恐怖氣氛。多方信息表明，蘇確有對華發動突然襲擊的具體計劃，中國駐東歐某國使館，甚至密報了他們偵查到蘇聯發動襲擊的具體時間。同年9月16日，倫敦的《星期六晚郵報》替莫斯科作傳聲筒，報道了克里姆林宮的兩個動向：1，轟炸中國羅布泊核試驗場的可能性；2，建立一個能夠呼應莫斯科“拯

救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共替代領導機構的計劃。其文章還進一步指出，由於不久前蘇聯對捷克的入侵，使得這種威脅變得非常現實。

在此背景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周恩來的具體布置，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機關和幹部家屬，從北京被“備戰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了《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的口述命令，全軍進入緊急備戰狀態；次日，口述命令由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的名義正式下達。至此，全軍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處於臨戰狀態。

3.6 毛澤東下了一盤國際大棋

面對的蘇俄劍拔弩張，毛澤東再作戰略上的調整，這回下的可是國際上的一盤大棋。眾所周知，毛澤東對中國的獨立自主，對中國的國力強大，一直念念不忘；而出乎所有中外人士意料的卻是，這次毛斷然決定遠交近攻，聯美反蘇。

其實，素來在毛澤東眼裡，這“兩夷”之中，蘇俄更對中國包藏禍心。還在1969年2月，毛澤東便交給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元帥一項研究國際形勢的任務。這四位老帥在周恩來的安

排下，從6月至10月進行了將近20次的戰略務虛討論，向中央提交了書面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與鬥爭，陳毅還提出利用蘇美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

到了1971年，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自恃羽翼豐滿，一反赫魯曉夫時期試圖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和平外交路線，而對美展開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使得美備受威脅。所以，美國也在尋求外力抗蘇，同時設法從越南戰爭的泥潭裡脫身。於是，這便有了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便有了1971年7月和10月間基辛格作為特使，兩次秘密訪華。

如此，在毛澤東直接授意下，周恩來與美方展開了中美之間的“戰略對話”。這對話當時震撼世界，幾十年後對全球格局的影響無可估量。1972年2月，尼克松的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著中美之間實現了和解。數年後，越戰終於結束，中美軍方也開始進行合作，構築起一種“准同盟”性質的戰略安全關係，結成了抗禦蘇聯的戰略合作夥伴。

堅冰已經融化，航線已經開通。中美之間的和解，在國際上，為中國贏得了幾十年的和平環境；這為日後的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利的先決條件。在國內，中美和解進一步打破中國對蘇俄政治經濟模式的頂禮膜拜，初步解放了黨員和民眾的思想；這為日後的改革開放，醞釀和儲備了巨大的能量。

3.7 神秘的“913 事件”

然而，雲水怒，風雷激，此時中國的內政又起變局。“林副主席第一號令”的出現，被毛澤東視為林彪要凌駕於他之上，以此來試測其底線的信號。主席一怒之下，曾想點火燒毀此文件。接著，在 1970 年 8 月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因鼓吹設立國家主席讓林彪擔任，遭到罷黜。這表面上是陳伯達與張春橋的較量，實為軍方與“文革派”的格鬥：林彪和陳伯達想恢復經濟建設，張春橋等卻要堅持“繼續革命”。在這場決鬥中，毛澤東支持張春橋，這為林敲起了喪鐘。林彪於 1971 年 9 月 13 日“倉惶出逃，折戟沈沙”，這便是舉世震驚的“913 事件”。此事件既駭人聽聞又撲朔迷離，自始至終是一團不解之謎。

對“9.13 事件”，中國各位領袖的反應不一。

當毛澤東獲知林彪外逃時，還不全信，他叫周恩來再進一步瞭解情況。等周作第三次報告時，毛澤東仍將信將疑，說：“他會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澤東仰望著天花板長嘆一口氣：“高，高超！我被他騙了，騙了 22 年。你們都被騙了。不要作事後諸葛亮！”

據汪東興記載，毛澤東還問：“飛機上有沒有活著的人？”

又據汪東興回憶，1971 年 9 月 16 日，當確知林彪等機毀人亡之後，汪回中南海，同毛澤東和其他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主席的

心情很好，並要汪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

根據原駐蒙使館二秘孫一先的回憶，周恩來對墜機現場的匯報不是很感興趣，聽著聽著還閉上眼打了個盹，（周因處理“913”，已連續工作 50 多個小時）。但他對屍體殘骸的照片卻顯得頗有興趣。他一邊看，一邊在照片的背面寫什麼東西，特別是 5 號（林彪）和 8 號（林的妻子葉群），他帶著花鏡反覆地看……最後一張是使館人員追悼儀式的照片，周掃了一眼，馬上扔到了一邊。然而，“當我講到死難者屍體時，已經接近凌晨 2 點鐘，總理的神情異常關注，已看不到一點疲倦的影子”；“最後，匯報死難者的遺物情況，總理全神貫注地聽著”。就在那次匯報當中，周恩來已經作出了飛機“自行墜毀”的判斷，使親臨墜機現場調查的孫一先，對此感到相當意外。

可是，當眾人都離開會場，會議廳裡只剩下副總理紀登奎時，周恩來突然捶胸頓足，撕肝裂肺地嚎啕大哭，足足 20 分鐘之後，才逐漸恢復自制。紀登奎被此情此景震呆，變得結結巴巴：“總、總理，這是不幸、幸中的萬幸……”周卻說：“你不懂，你不懂！”

元帥葉劍英的評論是：“以林彪在軍事上的成功，如果不是在家庭這個看似盤根末節的政治上犯錯誤，就會順利越過 70 年障礙，那麼被清算打倒的就是總理、我、向前等將帥，然後在主席逝世後……主席可以說是以錯破黨，沒有領袖魄力難做到。”

《彭德懷年譜》上記載：當專案組向彭傳達有關“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文件時，彭要求：“打電話給周總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這樣把林彪殺了我有意見，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來總理親自參

加這個審查。請打電話給周恩來總理、董副主席，叫他們來審我，我不活了。”

當時被疏散到江西的鄧小平聽完傳達後，說：“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同樣也在江西的陳雲，對此事的反應是：“林彪比我小兩歲，毛主席馬上就要叫我回京了”。

而在台灣海峽那邊，9月18日蔣介石得知林彪及妻子機毀人亡的消息後，令侍從打電話給次子蔣緯國，讓他回來吃飯，有事談。晚餐時，蔣介石說：“毛澤東去一臂矣！林彪死了。”蔣緯國臉色很難看，一言不發吃完飯，告辭回家。次日，蔣經國在國安局的報告上寫道：“共產巨人已經斷了一條手臂了，讓我們等著看他如何失去他的另一條手臂。”

然而，“913事件”給毛澤東極大的刺激。他頓時衰老，一度精神恍惚，摔東西、罵人，驅趕身邊的工作人員。唯有周恩來請來他的女兒李敏和李訥，由他的貼身特護張玉鳳陪著，才能使他稍許平靜一些。毛隨後兩次重病發作，逐漸由夜不能寐的肺炎，發展成缺氧昏迷甚至休克的肺心病。

在傳達“913事件”時，各處不斷報來種種不同的反應。如國家計委軍代表蘇靜向局級以上的幹部傳達時，出乎意料地，沒有遇到以往那種高呼口號熱烈響應的場面，而是面對死一般的沈寂；良久，幹部中甚至響起了哭泣聲。再如，某野戰軍連隊傳達文件時，有戰士當場憤怒地拉起槍栓，要打死台上那個“誣蔑林副主席”的

“壞蛋”。“哀莫大於心死”。毛澤東必須向全黨全國有個說法和交待。

於是，毛澤東以批判林彪為形式，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自己的一些錯誤。先聲奪人地，他公布了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的“571 工程紀要”，此處姑且不論其文件的真偽，單就其中的“秦始皇”一說，便令人無語。同時，毛以公開披露“文革”初期給江青的信來作為自我批評，說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接著，他參加陳毅的追悼會，為“二月逆流”平反（1967 年 2 月葉劍英等老師大鬧懷仁堂，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毛曾一度讓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後來又批准鄧小平復出。

那階段，毛澤東曾多次把周恩來找來，重復地問：“我周圍還有沒有‘親密戰友’式的人物？”周照例地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捍衛主席思想，緊跟主席幹革命”。毛還是重復地反問：“是真心嗎？我看不是。對‘親密戰友’，我、你都沒有發覺嘛！我整了不少人，他們會保衛我，你信嗎？”言畢，他仰天大笑，發著呆。

1972 年國慶前，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近 30 名老師、老將。他的開場白是：“我們之間是戰友加同志，有誤會、有爭議，也有傷害過，那請多多包涵！我的‘親密戰友’不告而別，今天還百思不解……”

席間，老師、老將稱讚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革初期給江青的信，已對林有防備，看出了林有野心、是陰謀家等。毛澤東聽後，搖搖手，插話：“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

最親密的戰友了！我勸你們不要信這封信。”

對於給江青信的內容，毛澤東曾多次問周恩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關於黨內外對此信的反應和議論。他們都千篇一律地回答：“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顧全大局，讓林彪有一個暴露的過程。”毛澤東聽完，總哈哈笑，還問周恩來：“你也信嗎？”周不知如何作答，毛澤東便說：“你不瞭解，但你明白。”

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做壽時，進一步對此信作如下評論：“康老（康生）、還有春橋，在信中作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師，會被‘謎’迷倒”。毛又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據張玉鳳說，經主席和汪告知，她才明白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經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這封信是個謎，而可能永遠是個謎，也許這正符合毛澤東的心意。比如，與張玉鳳的說法不同，據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他在文革初期便有機會讀到毛給江青的信。由於那封信使得李對毛的洞察力和歷史感印象之深刻，以至於他當場就把此信件抄錄下來。

3.8 毛澤東設“挺鄧抑周”格局

1974年，北京中南海游泳池。自三年前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傷了元氣，精神體力大不如前。雖如此，七十年代初，毛澤東仍出奇兵、使絕招，聯美反蘇，顯出他雄風猶在，證明他史無前例的雄才大略。殊不料，他身後的周恩來，在此歷史關頭，只因一表人才，風度翩翩，略施雕蟲小技，便幾乎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在海內外大大得分。毛澤東除了對此不服之外，內心還有更深層次的不安。

林彪事出，人心震撼。黨政軍內眾多的幹部，本來就對文革“不理解”，林彪這一倒，眾人理所當然地對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洞察一切”掛上了問號。毛澤東深知這人心向背的重要。而今，這人心竟漸漸凝聚到周恩來的身邊；就像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人心漸漸凝聚到劉少奇身邊一樣。這正說明，黨內有人不贊同“文革”，而且人數相當不少。其實，這批人當初就是追隨劉少奇反對“三面紅旗”的。

毛澤東心裡清楚：“我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一是解放，二是‘文革’。否定‘文化革命’，就是要否定我毛澤東。‘周公’，這頂當初民主人士給周恩來戴的高帽子，戴得何其好呵！他像林彪一樣‘克己復禮’，‘克己’是為了‘復禮’，‘復禮’是為了回復到‘文革’前去，不去搞‘繼續革命’，而去搞什麼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的‘四個現代化’。周鼓吹那老一套的‘唯生產力論’，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要叫那些被打倒的當權派繼續當權。我當初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現在又決心將‘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就是要跟這幫壓制群眾、企圖保留現存體制、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黨內官僚對著幹，就是要跟這幫搞宮廷政變、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反動派幹到

底！這種人，口頭上唱的是馬列主義，骨子裡行的是孔孟之道；而且一貫地崇洋媚外，從前拿共產國際的雞毛當令箭，現在又輪到給美國人當‘投降派’了……”

所以，當 1972 年鄧小平給毛澤東遞信，表示自己“身體還好，還能幹幾年”，並保證“永不翻案”時，1973 年毛澤東就把鄧小平給解放了，設下“挺鄧排周”的格局。一來，鄧有治國之才，可頂替已經查出有癌症的周恩來去料理國事；二來，鄧乃強人，敢做敢為，不似周恩來恪守中庸之道。這樣既可贏獲一些老幹部的人心，削減對“周公”的擁護和依賴，又可以對周進行節制。毛當初放鄧一馬，就看中他是一塊料，人才不可多得。所以，毛澤東盡可放手讓江青、姚文元去圍攻周恩來，中國這位當代的“大儒”。

周恩來於 1972 年 5 月，被確診為膀胱癌，尚在早期，如及時治療，治愈率可達 80-90%；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傳達中央指示，“不要開刀”。直到兩年之後，周才做了第一次大手術。歷年來，周恩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處心積慮，單解放以後，他就親手辦理了高崗、劉少奇、林彪幾樁大案。現在周自己卻面臨著“批林批孔批周公”，還被說成是在中美和解中“給美國人下跪”。以至於在第四次手術臨進手術室之前，周大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為了日後不被人臉上劃叉，周恩來留下揚棄骨灰的遺言。臨終前，儘管血尿血便，他仍把一本毛主席詩詞壓在枕下，以保晚節。

3.9 “接班人”何在

1976年1月間，周恩來去世；4月“清明”期間，群眾借紀念周之際，在天安門廣場誦詩、唱歌、舉標語，表示對時局不滿；當局鎮壓聚會的群眾，遂發生了“四五事件”。鄧小平因1975年企圖“整頓”黨政，已被“文革派”指控為搞“復辟回潮”，現則適時地被誣為操縱事件的“反動黑手”，再次被打倒。

據姚文元的回憶，清明天安門事件時，毛澤東在聽完簡報，派秘書到廣場瞭解情況之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的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隨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討論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葉劍英不表態，朱德退場。接著又討論開除鄧的黨籍，葉起身，說：“開除？乾脆把我也開除吧！”說罷退場。會上，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陳錫聯（北京軍區第一把手）、吳德（北京市委第一把手）、紀登奎（副總理）提出：“要請示主席。”華國鋒原為地方上省級的領導，後被毛澤東親自上調成為副總理，成為老幹部和“文革派”之間的緩衝。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紀要上，圈了葉，批上：“是在指責我。”圈了李，批上：“還是給我面子。”圈了華、陳、吳、紀，批上：“意見相同，我還活著，留在黨內”。

同年7月間發生唐山大地震。毛澤東被移出中南海游泳池邊的住所，安置到與游泳池住所連接的備有抗震設施的大廈，代號202。其時毛的健康每況愈下，終日昏睡。常守護在他身邊的有汪東興、張玉鳳，時隱時現的有他的侄子毛遠新、他的遠房外甥女王海容，有時照面的是江青。

1917年當毛澤東還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時，曾經寫下“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詩句。到了1965年他重上井岡山時，仍然懷抱著“九天攬月，五洋捉鱉”的志向，隨即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無奈“人生易老”……

清醒時，毛澤東心事沈重：“……我死後誰也壓不住鄧小平……鄧的問題是對‘走資派’恨不起來……把這江山交給誰？”

近來，他不時想起清人嚴遂成的兩句詩：“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老淚固然多，可“奇兒”在哪裡？毛澤東用昏花的老眼向四週張望，毛遠新太嫩，王洪文不奇，於是他想起了華國鋒……

第四章

改革(上)



4.1 馬洪復出

斗轉星移物境遷，大川日夜子唏噓。
不作書生空議論，聞雞起舞是祖逖。

4.1-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978年11月，東京。新大谷飯店裡回響著莫扎特的第40交響樂。那18世紀末歐州人意氣飛揚、活潑躍動的旋律，在這豪華的東洋大廳裡回蕩，好似急促地傾訴20世紀70年代日本人驕傲而奮進的心聲。連從來沒有多少機會欣賞西洋樂曲的馬洪，都受到感染，心情為之一振。馬洪由此得到啓示：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都可能有機會，都可能趕上好時代——關鍵是要抓住時機！

馬洪隨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率領的考察團，到日本訪問。經過了近30年的鎖國，特別是十年動亂，全體團員包括鄧力群，人人耳目一新，不但開了眼，而且觸發了嚴肅的思考。

這思考，不僅止於目睹一衣帶水的日本經濟繁榮、人民富足、社會穩定，更在於“文革”前，尤其是“大躍進”之前的中國，與日本

的國民生產總值不相上下，20 年過後，卻只有日本的 1/4。1978 年，日本的人均收入為 7,020 美元，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 190 美元，相差將近 37 倍。

馬洪所在的代表團去商店、工廠各地參觀，所到之處，員工講求效率而彬彬有禮。他們訪問的汽車廠，幾乎是前門進零件，後門出成品。顯然，管理部門專業內行，廣大職工訓練有素。

馬洪是帶著問題來的，他自然把企業管理當作考察的重點。日本的企業有 51 萬家以上，其中大的企業一千多個，餘下的都是中小企業。馬洪注意到：首先，這些企業，主要是按專業化和協作的原則組織起來的，企業間的協作關係又用合同固定下來。其次，日本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管理，一切都以質量為中心，企業的各项規章制度均為此服務；各級經理和每個工人，對此也有明確的認識。再次，為了走向世界前列，日本的企業，特別重視人才培養，視其為戰略任務，稱之為“能力開發”。因此，各大公司都有設備先進、師資齊全、教材成套的培訓中心。最後，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資本家將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聯繫起來，以發揮職工生產創新的積極性。他們採取的辦法包括：“終身聘用制”、“年功序列工資制”、獎金制、和職工的集體福利等等。

那是馬洪第一次赴日考察、第一次出國訪問，時年 58 歲。經過十年浩劫，代表團一行抱著重建中國的目的，去日本學習和借鑒，每個團員都是帶著問題去的。而馬洪所攜帶的問題很具體，所具有的目光也格外犀利：日本人可以做到的，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做不到？他們為資本主義發展生產，難道我們不能為社會主義發展經濟？

4.1-2 胡耀邦“解放”了馬洪

馬洪早年在同蒲路工作過，鐵路系統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中國，算得上先進的大工業企業。後來，他在東北主管工業，而東北無論在經濟恢復的解放初期還是在抗美援朝時期，都是共產黨的重工業基地。到北京以後，馬洪曾主持國家計委的日常工作，參與制定“一五”計劃。高崗出事後，他被下放基層，作建築公司的副經理兩年，又增添了領導基層企業的經驗。隨之馬洪調到經委，接近國家經濟決策核心，參加了宏觀性政策的討論與制定。尤其是起草《工業七十條》和撰寫《中國社會主義的工業企業管理》一書，使得他在“文革”之前，就逐漸形成對我國工業企業管理的思路和理論。

但是，1966 年“文革”一起，馬洪的種種探索被迫中斷。1969 年中共的九大之後，為了防止美帝、蘇修的“突然襲擊”，全國的機關、廠礦轉移“三線”，學生下鄉，幹部去“幹校”，馬洪隨化工部設計院轉移到河北與山西交界的山溝娘子關一帶的小村鎮程家。

1970 年夏，馬洪被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李富春調到北京石化總廠。屆時上級決定，將該廠建成我國第一個大型化工項目 -30 萬噸乙烯工程，馬洪被任命為該項工程的副總指揮，來負責現場設計的組織領導工作。這是我國第一個技術含量較高的大型化工項目。馬洪在現場度過了無數的不眠之夜。經過建設者的努力和創新，該工程提前勝利竣工。幾年親身參與這項大規模

的工程建設，再次給予了馬洪領導現代企業和管理工業企業的寶貴經驗。

1975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他企圖對黨政進行整頓，被文革派視為“復辟回潮”。至1976年清明節，群眾聚會天安門廣場，以紀念周恩來的名義反對“文革”，鄧小平則被按上“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暴亂”的罪名，第二次被打倒。“文革”前曾經由鄧主持制定的《工業七十條》，又被張春橋、姚文元等翻騰出來，添油加醋，打算作“回鍋肉”再炒。而作為《七十條》的主筆馬洪，似乎又是劫數難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0月間，這場鬧劇戛然而止，馬洪方才又躲過一場劫難。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過世。10月6日，黨政第一把手華國鋒、元帥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逮捕了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華國鋒繼續推行“兩個凡是”，企圖維持毛澤東的正統。可老幹部勢力日大，華和葉遂不得不敬請鄧小平、陳雲出山。鄧、陳在黨內是最有能力和威望的領導，他們逐漸取代華、葉。鄧身體好，魄力大，站在台前。陳雖體力不及鄧，但謀略與鄧比肩，於是留在幕後，與鄧共同決策。

“文革”間，百業凋零；“文革”畢，百廢待興。鄧小平等重振旗鼓，正是國家用人之際。然多年積重難返，首先必須撥亂反正，所以，亟需任用大刀闊斧、披荊斬棘的開路先鋒。胡耀邦，紅軍出身，是紅軍中的“紅小鬼”；解放後曾主持共青團的工作。他思想活躍、為人坦誠，經“文革”後對歷年的政策有所反省，觀念比較開明。正因此，鄧小平派遣胡為改革打頭陣，推翻冤假錯案，替老幹部昭

雪平反。一轉眼，鋪天蓋地地，從“劉鄧”、“彭陸羅楊”、“彭黃張周”、“61人叛徒集團”，到“胡風”、“反右”……幾乎解放後所有的案子都翻過來了。老幹部和知識分子人心大快。

1977年，胡耀邦先後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和中組部部長，他找上馬洪一同乘機去湖南作考察。胡耀邦是個心態開放、有文采的人，一路上跟馬洪談得蠻投合。回來後，胡在黨校作報告，說：“壞事有時變好事，像馬洪，‘五虎上將’，後來寫出了《工業七十條》……”下面的聽眾裡有人就不幹了，如薛明（賀龍的夫人）劈頭問道：“高崗那到底是怎麼回事？‘五虎上將’又到底算什麼問題？”胡耀邦人樸實，坦承自己當時在西北工作，並不很瞭解“高饒事件”的實情和細節。報告後，作為中組部長，胡耀邦找馬洪談了話，表示組織上正在進一步做工作，他的問題也有解決的希望，並且給馬洪恢復了級別。

所以，儘管馬洪“高崗集團成員”的結論暫時沒有推倒，到了1978年，他人已經被解放，開始復出了。同年，當馬洪加入于光遠等人赴大慶作有關調研時，他算是“復出”而有待“正名”。在大慶，馬洪進一步充實了他對國家工業企業的經驗與認識。雖然他的問題尚未解決，他已受命組建社科院的工經所，並出任所長。

那時，薄一波剛從“文革”關押中被釋放出來，馬洪的老友梅行拉著他，率先前往招待所探望，“文革”中，薄的妻子自殺，子女或入獄，或流散，所以他還沒有一個固定的住所。薄曾坐過國民黨的八年牢，現又坐了共產黨的八年牢。他感嘆道：“共產黨的牢，可比國

民黨的牢苦呵。”

回溯“文革”迫在眉睫之際，經濟界學術權威孫冶方，因為鼓吹“唯生產力論”，首先被上面拋出來進行批判。屆時當局已經內定，下一個被登報點名批判的將是馬洪。馬洪為了避免被人剃成“陰陽頭”，自己預先剃光了頭，企圖保住最起碼的尊嚴。在當年的各種政治運動中，為了進行人身侮辱，剃“陰陽頭”是慣用的手段：“壞人”們常常被剃去半邊的頭髮呈現“陰陽頭”，以示他們的“不人不鬼”。不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一發表，矛頭對準劉少奇與彭真，作為原北方局的大員、與劉少奇關係密切的薄一波，本身自顧不暇，才來不及用馬洪當作工交口的“死老虎”來作犧牲。

所以，這次出獄以後，薄一波就此向馬洪致歉。不久，薄一波出任國家機械委主任，讓馬洪擔任副主任，同時不失時機地搬請馬洪回經委，在機關的紅塔禮堂，為全體幹部作形勢報告。由於馬洪既往的資歷，並具有盡人皆知的能力，一時間呼聲身高，成為一顆迅速上升的政治明星。

1978年底，老經濟學家薛暮橋與馬洪一同率團走訪了美國的哈佛、麻省理工、賓大、斯坦福和印第安納五所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對美國如何培養管理人才又作考察。馬洪回國後在各機關、院校作了相關的報告，並主編了《美國是怎樣培養管理人才的》一書。此書一售而空。馬洪接著參加歐洲論壇，並先後訪問了瑞士、西德、奧地利、法國等西歐各國。

通過在日本、美國和西歐的親身考察，尤其基於他本人在中國

高層、基層多年的閱歷與思考，馬洪對於中國如何改革，如何擺脫舊框框、如何走出新道路，具有比較完備的設想，有些策略幾乎呼之欲出。借用當年的一句老話，馬洪“煥發了革命的青春”。他摩拳擦掌，一鼓作氣：報效國家的時刻又到來了！而這次他是有備而來的。

1979年底，馬洪身兼數職，包括在計委、建委任副職，也包括在社科院胡喬木下面任副院長。這胡喬木，與陳伯達齊名，當初在黨內是數一數二的大才子。毛澤東的“宏文四卷”，尤其是第四卷，多經胡手，這是因為胡能將毛的本意，用準確的語言充分地表達出來。這點也表現在一個值得探討的歷史疑點上。

舉世皆知，毛澤東不但是政治家，而且是詩人。他在著名的《沁園春·雪》中，這樣地表白心志：“……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有一種傳言稱，這詞原為胡喬木獻給劉少奇的晉身之詞。劉不敢受用，但將胡連詞帶人，一並轉呈毛澤東。1945年，國共重慶和談時，《沁園春·雪》一詞公開發表，被柳亞子等社會名流驚呼為“帝王之詩”。又據稱，胡臨終之前，有人詢問過此事，胡亦未置可否——此為插曲。

1982年，胡喬木邀請馬洪出任社科院院長。馬洪曾滿懷希望地說：“我從前在國家計委工作過，有在那裡的工作經驗，現在也有許多新的想法。在哪裡跌倒了，就在哪裡爬起來，我能否重新回到計委工作？”胡喬木笑笑：“黨現在需要理論上工作的人。你一貫受黨的培養，做理論工作，所以，還是到社科院來吧。”馬洪作為黨員

和幹部，當然從命。

4.1-3 不允許高崗翻案

然而，胡耀邦正力排眾議，張羅著也給高崗翻案，不料卻被鄧小平當頭一棒：“你這個人好糊塗呵！”

鄧小平雖然承認：“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毛)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

“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也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如土改時‘搬石頭’，‘反五大領袖’；天津講話，還是有缺點錯誤。”

但是，鄧小平又說，“高崗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叫不叫路線，也難說。”

並且，對整理黨內歷史，鄧下了“宜粗不宜細”的著名指示。鄧還說，“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

1981年，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討論

會上，陳雲也說：“有的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就不要再講了，再講沒有好處，”“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不要再提了。”

眾所周知，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毛澤東的話在中國的分量。毛澤東的文章，其發表不發表、何時並以何種方式發表，都與特定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都與所涉及的政治人物的命運密切相關。比如，1965年9月，毛澤東在勸說彭德懷到西南三線時，最重要的安撫話就是：“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的名字”。可以想見，1981年，在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高崗的舊案未翻；馬洪作為高的“五虎上將”之一，再次被歸入另冊地上了新出的“毛選”五卷，這在中國的政壇上和社會裡意味著什麼。

4.1-4 第一次出國的印象影響深遠

筆者不禁想起，鄧小平第一次出國時，只有16歲。當時清王朝剛覆滅，“五四運動”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列強正忙於重新瓜分中國。鄧小平走出積貧積弱的祖國，抱著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理想，踏上資本主義發達的法國國土，其反差之大、衝擊之強，可以想見。到了1991年，鄧小平還說：“閉關自守不行。文化革命時有個‘風慶輪事件’，我跟‘四人幫’吵過架。才一萬噸的船，吹什麼牛！1920年我到法國留學時，坐的就是五萬噸的外國郵輪。”時隔70餘年，鄧仍記得郵輪的排水量，可見當年西方物質文明對他的刺

激有多麼深。

從少年到青年，鄧小平在法國一共生活了5年。這期間，他成為共產黨人。1926年，鄧又從法國去蘇聯，趕上了當時還在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列寧在20年代採取了一些比較靈活的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例如把土地租給農民、吸收外國資金和技術、開展對外貿易等等。這些政策後來統統被斯大林廢除了。如此，鄧小平除了在法國第一次開眼之外，當初對蘇聯“新經濟政策”的印象，也可能對他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因為具備這些“天外有天”的見識，鄧小平對蘇聯的計劃經濟那一套，並不是特別地心悅誠服。他曾說：“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僵化了”，還說：“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沒有完全搞清楚”。

再看看陳雲。1935年他第一次出國時30歲，去的是他一心向往的革命聖地蘇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十里洋場裡，陳雲目睹帝國主義的殘暴、中國政府的腐敗，所以毅然參加了革命。赴蘇時他不但已經入了黨，而且經共產國際的推薦，成為中共的負責人之一——政治局委員。當時長征中的紅軍正被蔣介石圍追阻截，中國革命仍在尋找出路，而社會主義的蘇聯，就像在茫茫夜海航行中的燈塔。對那整整一兩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講，“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陳雲是抱著崇敬和虔誠的心理去向“老大哥”學習的，他從蘇聯學到了不少建黨和治國的經驗。

時至1981年，在中共中央制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陳雲對起草文件的負責人明確指出：“我們黨是在共

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的，建黨初期共產國際也起了好作用……”後來，在他的《年譜》中，也有如此記載：“‘一五’的156項援助，表現了蘇聯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情誼”；‘一五’計劃是蘇聯幫我們搞的，這個計劃基本上是合理的。”

筆者不由得還注意到，1974年當鄧小平去聯合國開會途徑巴黎時，專門請人買了一箱羊角麵包和一箱奶酪，特地派人送給聶榮臻元帥等當年的旅法同學。無獨有偶地，儘管陳雲身體虛弱，平素深居簡出，卻在1983年和1991年，兩次破例地會見了前蘇聯專家組總負責人阿爾希波夫。有這樣的記載：“陳雲眼前浮現他幾次去蘇聯學習、工作的情景，回想蘇聯對自己的重要影響，對比現實考慮到中國將來的發展，不禁淚花閃閃，半晌說不出話來。”

對比之下，毛澤東第一次出國時已經57歲，去的也是蘇聯。早年毛澤東曾有機會赴歐留學，探求真理，但他選擇了留在中國幹革命。當毛澤東終於走出去，看看中國以外的世界時，冷戰已經開始。作為中國黨政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去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國家，任務是簽訂“同盟條約”。所以，不比當年的鄧小平，甚至陳雲，毛澤東的責任遠為艱鉅複雜：不但要結盟，而且要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個人的尊嚴。

由於歷史條件、所處地位和個人稟性的迥異，像毛澤東就拒絕使用蘇聯國賓館的抽水馬桶。初次走出國門這件事，對各位領袖的影響大相徑庭，而他們日後在中國的革命和改革中留下來不盡相同的印跡，也不會與此無關。



馬洪與胡耀邦在中南海, 1978年。



馬洪與胡耀邦在中南海, 1978年。



隨薄一波在內蒙視察, 1979年。



馬洪（後排中）在遼寧礦山考察時合影，1979年。



馬洪（對面左一）第一次去日本考察，1978年11月。



馬洪率團考察美國
工商管理學院，攝於哈佛
大學，1979年。



馬洪在法國工廠考察，1980年



留學的馬雅赴巴黎開
會，與父親馬洪在凱旋門前
合影，1980年。

4.2 大風起兮

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守四方。
不守四方披星月，戰馬嘶嘯弓滿張。

4.2-1 馬洪有備而來

馬洪素知自己與眾不同。兒時在待陽村，是“敏睿過人，無師自通”。在同蒲路“一呼百應、富於鼓動，是宣傳組織能力都很強的工運領袖”。到了延安，成為“不多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組織上的重點培養對象”。去東北和上計委，又成為“年輕有為，前程無量”。曾幾何時，從天上掉到地下，打成“反黨分子”。即使後來調到經委，遭受壓制，只被控制使用，最終仍不免被排斥。

“文革”後復出，又被委以重任，馬洪也曾有過短暫欣喜若狂的時刻。他也是人嘛，也願從多年的緊張和壓抑中解放出來，一求暢快。1982年，當他率隊去山西考察煤礦，也許是家鄉，令他回憶起早年，回憶起1937年他同游雲、游軍姊妹倆一起過年喝酒……40多年過後，這次他又開懷痛飲白酒兩斤，而依然不醉。趁著酒

興，他與老伴陳柏林在省招待會上共舞了通宵。說來也奇怪，馬洪會跳華爾茲，是因為在延安時代，凡事都以蘇聯為榜樣，於是跳舞一時成風，成了從領袖到普通人的文藝活動。這是馬洪在“高崗事件”之後第一次步入舞池，也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

馬洪不能忘乎所以。從政治上來講，他是過來人了；從生活經驗來講，他時時小心著命運的干預。正如他此刻再度成為政治明星，加官進爵、門庭若市，裡裡外外不乏“追星族”，可明天極可能再度被摔得粉碎。有道是“時勢造英雄”。馬洪深知，自己今天的本事絕不比昨天下基層、蹲山溝時強多少，只不過一時又變成命運的寵兒。他太明白這命運到底有多可靠！環視周圍，其能力、資格與自己不相上下，甚至高出於己的同志，或已赴黃泉，或“廉頗老矣”，不幸錯過了良機。正因為有這種自知之明，並警惕命運的撥弄，馬洪格外地珍惜機會，工作上也格外勤奮。

1977年，馬洪受命組建工經所。雖然當時還沒有被正式解放，他馬上從各地調來有作為的幹部當領導，不管他們曾經是“右派”、“右傾”，還是“三反分子”，比如蔣一葦、朱鎔基等等。在此“天公重抖擻”的歷史關頭，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時刻。從大學畢業生中，馬洪又挑選思維活躍、銳意進取的青年，作為業務骨幹，就這樣生氣勃勃、別開生面地開闢出一塊革新的陣地。那時馬洪有一種責任在身、聽候召喚的精神風貌。清晨，他常常與所裡的研究生朱嘉明相約，一起在計委大院跑步鍛煉，一起討論時局和工作，同時逐漸整理好思路。上班後，馬洪便胸有成竹，馬上全力以赴地推行工作計劃。這樣，他和同志們從這工業企業管理

的基礎上，拓展改革的宏圖。

4.2-2 結構改革

馬洪在籌建工經所的過程中，以“雙周座談會”的形式，分別邀請中央各部委業務主管部門負責人來座談。他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把“文化大革命”期間搞亂了的整個工業經濟部門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並及時將問題和對策建議報告中央。這為中央進行經濟調整和改革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1979年，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馬洪又受命領導經濟結構調查組，集中了100多人進行經濟結構的綜合調查。

1, 當時中國的經濟概況

建國以前，中國的工業只佔工農業生產總值的10%，到了文革結束兩年以後的1978年，工業的比例佔了72.2%，而且鋼產量已達到3100萬噸。然而，我國的人均收入，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還排名在100位之後。

在1950-1978年期間，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9.5%，其中工業增長13.5%，農業增長4.3%。在同一時期，其他國家的工業，增長速度最快的日本，也不過是12.04%；蘇聯居次，為9.5%；美國僅4.5%。在1951-1978年期間，農業的增長速度，蘇聯只有3.6%，美國只有1.8%。這表明，與其他大國同期比較，我國的發

展速度是相當快的。在同一時期，我國的固定資產增加了4000多億元，流動資金增加量也很大。但是，許多別的國家都富起來了，而我國還是一個窮國；我國人民生活的改善很慢，吃、穿、用、住都十分緊張。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從1949-1957年8年間，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4.6%，國民收入年均增長12.7%；“一五”時期，實際工資年均增長5.5%。而在1958-1978年的21年間，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比1957年以前的8年大幅度下降：工農業生產總值，從年均增長14.6%降到7.6%；國民收入，從年均增長12.7%降到5.4%；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實際工資，從年均增長5.5%下降為負6%，實際工資降低了。

很明顯，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存在著這樣幾對突出的矛盾：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發展了，可國家沒有富起來；國家的生產發展得相當快，可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大；特別是1957年以後，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大大不如1957年以前。這究竟為什麼？於是，馬洪和他的助手孫尚清所負責的經濟結構組，帶著這幾個對國計民生影響重大的問題，從整頓經濟結構的角度，對中國和世界的狀況進行了系統的和比較，試圖從中找到答案。

他們發現，自1958年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以後，我國不切實際地追求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量的高指標，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形成了“重、輕、農”這樣一個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儘管在60年代初的調整時期，局面有所改善；但“文革”期間，我國的重工業越來越重，輕工業越來越輕，農業越來越不能適應整個

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加上閉關鎖國，使局面每況愈下。其結果，我國的國民經濟的比例嚴重失調，所出的產品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不能直接使用的中間產品多，可供人民生活消費用的終極產品卻很少。其結果，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但長期得不到實惠，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挫傷。

經濟機構組的研究人員推論，既然 20 年來我國一直“以鋼為綱”，而且我國鋼的年產量在 1978 年達到了 3100 萬噸，所以，可以用“年產 3000 萬噸鋼”作為一個重要的參數，用來比較各國年產 3000 萬噸鋼時的經濟概況。美國達到這個指標時是 1912 年，蘇聯是 1951 年，西德是 1959 年，日本是 1963 年。他們認為，拿世界上這幾個鋼鐵生產大國年產 3000 萬噸鋼時的經濟概況，與我國產鋼 3000 萬噸時的經濟概況作比較，將有助於研究和探討我國經濟結構究竟存在什麼問題。

2, 與其他幾個大國年產 3000 萬噸鋼時經濟概況的比較

他們的調查證明，就農業來說：在年產 3000 萬噸鋼時，每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美國比中國高 8 倍，西德和蘇聯比中國分別高 3.5 倍和 1 倍，日本雖然耕地面積比中國少，仍然比中國高 60%。當時，我國城市居民的口糧約 30% 依靠進口，農村裡相當一部分人的口糧還不夠吃；我國每年要花大量的外匯進口食用油、糖和棉花，以供國內的消費。即使花費了我國有限外匯的 1/5 以上，來進口這些農業基本產品，可我國人民的糧、油、糖的定量還很低。這說明，我國經濟結構中的農業，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就輕工業來說：在年產 3000 萬噸鋼時，按人均計算，蘇聯生產的棉布、棉紗、紙比中國高 0.5-1 倍；西德生產的自行車、棉布、縫紉機比中國高 1-2 倍，手錶和紙比中國高 10 倍，電視機、塑料、化纖比中國高幾十倍；日本輕紡工業的產品則比中國高得更多。“文革”以後，中國政府給農產品提了價，給職工漲了工資，可工農群眾有錢買不到東西，社會購買力和市場供應能力差額幾十億，甚至上百億。這說明中國經濟結構中，輕工業很落後，與中國整個經濟不相適應。

就技術設備製造來說：以上涉及的國家，當年產 3000 萬噸鋼時，其技術設備的製造，除了滿足本國的需要以外，都可以有大量成套設備的出口。比如蘇聯在我國“一五”時期所提供的 156 項成套設備。可當時，無論北京燕山化工總廠，還是武鋼、寶鋼，許多大的、複雜的設備，我國都不能自己生產，而是依靠進口。

就鋼材的自給程度來說：在鋼產量達到 3000 萬噸時，以上提到的國家都是鋼材的淨出口國了。淨出口鋼材佔產量的百分比，日本為 20.5%，西德為 15.6%，蘇聯為 2.4%。中國 1978 年出口鋼材 45 萬噸，而進口鋼材卻相當於產量的 37.1%。

就能源消耗來說：在年產 3000 萬噸鋼時，我國的發電量是 2566 億度，比當年的美國高 9 倍，比當年的蘇聯、西德、日本都高 1 倍，但我國仍然缺電，幾乎 1/3 的工廠因為缺電不能正常開工。而將我國消耗的能源煤、油、天然氣、電折合成標準煤計算，合 7000 大卡，比當時的日本高 2.9 倍，比西德高 2.1 倍。而 1978 年，日本的能源消耗總量僅為我國的 77%，但它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比我

國高3.9倍。

以上數據和事實表明，儘管我國花費了那麼多的能源，使用了那麼多的鋼鐵，卻事倍功半，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原因何在？雖然各國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是經過比較，結構組得到了某些啟發：我國目前存在的困境是與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有關，其中農業和輕工業大大落後於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重工業內部的結構也自相矛盾。正是由於這種經濟結構的不合理，阻礙了我國生產力的更大發展，致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改善。

3, 當時我國經濟結構具體存在的問題

在達到初步共識以後，馬洪、孫尚清和結構組的同志們，對解放以來我國經濟的歷史、現狀作了更深入、細緻的調查。他們收集了大量的數據和具體的事實，就我國的經濟結構進行了進一步的研討和論證，以下舉例說明。

產業結構：

我國農業強調“以糧為綱”，長期忽視了經濟作物的重要作用，忽視了不同地區農、林、牧、副、漁各具特色的多種經營。由於一味追求糧食的生產，把森林和草原變成農田，破壞了生態，像黑龍江省就出現了從前沒有過的乾旱；許多地方又為了糧食高產，單施化肥，不配合施用有機肥料，引起了土地板結、土壤質量下降，最終連糧食增產的目的也實現不了。這種不顧區域的自然條件、單一種植的結果，使得我國人民的飲食結構以糧為主，缺乏應有的

肉、魚等動物蛋白質的供應。同時，由於豬肉是我國最大的肉食，但是豬也食糧，以至於豬與人爭糧。其實，我國的草原面積有 40 多億畝，遠高於耕地面積，如果充分利用草原的優勢，不但可以保護生態，還可以增加其它肉類的產量，有助於改善飲食結構，提高人民的營養。此外，我國的淡水養殖面積不到 1 億畝，利用率僅為 30%；儘管每畝水面生產的蛋白質，遠遠高於每畝糧食所產，但因為生態不佳，又缺乏科學的養殖方法，我國目前魚塘的養殖率很低。

我國的重工業強調“以鋼為綱”，致使冶金工業只搞黑色金屬，不搞有色金屬。其實，鋼鐵的冶煉須有一系列的合金材料，否則煉不出好鋼。另外，還存在採礦和冶煉、冶煉和軋製之間的合理安排。在正常情況下，軋鋼能力應大於煉鋼能力，但當時我國的軋鋼能力小於煉鋼能力。在日本，初軋至少需要三十幾道，而鞍鋼只軋 9 道，所以按國際標準衡量，鞍鋼軋出來的鋼材不合格。即使這樣，有些錠子還是軋不出來，以至於鞍鋼的錠子要千里迢迢地送到攀鋼去開坯，然後再運回鞍鋼軋鋼，如此往返周折，造成極大的浪費。而我國的機械工業，總是把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分得一清二楚，井水不犯河水。像我國的軍工和民用工業就是兩張皮，這在和平時期是極大的浪費。日本的日立公司，既可以生產微機、電視機一類小型產品，又可以生產核電站和航天的大設備，沒有軍工、民用，或重工、輕工的明確劃分。日本的大通特種鋼廠，規模與首鋼相似，但它每年除生產數百萬噸鋼鐵外，還生產菜刀和剪刀，銷售海內外。再比如，雖然我國許多工

廠由於動力不足，無法正常開工，可當時積壓在礦山裡的煤礦就有 1000 多萬噸，由於火車不夠而拉不出來。這又說明交通運輸影響了能源的供應。

技術結構：

這些年來，全國有不少小化肥、小鋼鐵、小煤炭、小水泥等“五小工業”，他們所生產的產品，不能抵償其消耗。全國 35 萬多個企業，虧本的有 1/4，損失約 40 個億，其中“五小工業”虧損約 22 個億。本來生產技術的發展，普遍是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因此“五小工業”那種由大到小，由洋到土的做法是否得當，頗值得研究，否則能源的消耗就降不下來。

產品結構和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我國目前的產品很多，但終極產品有限，而計算產值時，甚至把次品和廢品也包括在內。據 1978 年統計，我國的出口產品中，農業佔 28%，輕工業佔 47%，重工業佔 25%。重工業產品中主要又是原材料出口。我國的機器出口只佔 2.7%，在世界貿易中只佔 0.07%，這與我國的大國地位極不相稱，日本人認為最賺錢的是成套設備的出口。我國目前出口的是原油，如果把原油加工成汽油、煤油、柴油，即可提高 3 倍的價錢；如果再綜合利用，製成石油化工產品，即可提高 8 倍的價錢。再如出口的鎢砂，一噸 7000 美金，如果煉成鎢金，一噸值 2 萬多美元，如果製成合乎國際標準的鎢絲，則價值 77 萬美元。可我國現在不能出口鎢絲，因為還沒有掌

握這方面的技術。再比如山羊絨，是我國熱門的特產。如果能把這種原料製成羊毛衫，就會價錢倍增。但我國的山羊絨 90% 以原料出口，而我國出口的羊毛衫則由於質量不高，在國外被放到低檔貨櫃；而日本和英國用我國山羊絨製成的羊毛衫，價錢分別比我國的高 2 或 3 倍。這些都是由於出口產品的結構不合理、其中工、農業品的比例失調、原料與加工品的比例失調，而造成了損失原材料和產品賤賣之類的問題。

投資結構：

我國當時的投資重點放到了建設新的企業上，對於原有的 30 萬個企業的改造沒有考慮。這些原有企業的基金，來源於大修理的折舊費，可是折舊率很低，對折舊基金的使用又卡得很死。所以，老企業的改造存在資金上的困難。

價格結構：

價格的合理與否，對人民的生活、消費影響尤大。以匈牙利為例，其生產資料 10% 採用固定價格，30% 採取浮動價格，60% 採取自由價格；生活資料則 30% 採取固定價格，大大超過生產資料，浮動價格佔 40%，自由價格只佔 30%，所以基本上穩定了人民的生活。而我國的情況相反，生產資料的價格總是穩定，生活資料名義上基本穩定，實際上有上漲的趨勢。雖然對消費價格作適當調整是必要的，但有的價格提得過高，不少單位把提價作為扭虧為盈的手段，把負擔轉嫁給消費者。

積累與消費的結構：

如果只搞重工業，不搞或少搞農業、輕工業，或者重工業不為農、不為輕，也不儘可能地生產耐用消費品，那麼怎能提高消費呢？而消費提不高，最終又會影響積累。因為積累率的提高，不是從壓縮消費、降低人民生活中找出路，而應從發展生產、增加國民收入中找出路，這就是“骨頭”和“肉”的比例關係。

“一五”時期，我國的全部基建投資中，生產性的基建投資佔 71.7%。非生產性的投資佔 28.3%。由於這個比例基本上符合當時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生產建設的速度比較快，人民的生活也得到顯著改善。但“二五”時期，生產性建設投資上升到 86.8%。非生產性投資下降到 13.2%，往後也一直沒有提高。

“一五”時期對住房的投資佔總投資的 9.1%，而在“二五”時期的 1976 年，住房投資下降到 6%。因此，1977 年我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 3.6 平米，比 1952 年的 4.4 平米還少了 0.8 平米。城市缺房戶達 626 萬戶，約佔城市總戶數的 37%。因此，“幾代同堂”的現象嚴重。總之，國民經濟的發展的目的，其一是增加消費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二是增加生產資料，擴大基本建設。可後者還是為了前者，因為生產資料的生產，最終還是為了消費資料的生產，還是為了人民的福利。

4, 中國必須作經濟結構的調整

通過實事求是地調研，結構組的結論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是處理好農、輕、重的比例關係。我國當時有 9 億多人口，80%

以上在農村，農民是個大頭。要是農民有吃有穿，年年生活改進，中國的大局就穩定了。重工業要為農業和輕工業服務，重工業內部也要以此來安排自身的發展。所以，我國必須改變過去那種“以鋼為綱”、“重、輕、農”的不合理結構，逐步形成合理的經濟結構，使農業能基本滿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使輕工業能適應廣大群眾生活日益改善的需要；使重工業能改變成為農業和輕工業服務，為技術改造服務，自身也能協調發展；並使交通運輸能真正成為先行，來保證能源的供應。

為了把我國的經濟局面扭轉過來，馬洪和結構組的同志們認為，應當克服長期存在的“速成論”，認真清理過去那種急於求成的錯誤思想，從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來確定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走出一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路。通過調整，在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經濟結構合理化，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穩健、效益良好，人民年年得到實惠。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一次重大的戰略轉變。

4.2-3 企業的自主權

1, 積重難返

改革開放後，雖然“工業七十條”原有的一系列重要原則，如企業是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廠長負責制、規章制度、按勞分配、經濟效益、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等等，都得到了重申。但是，新形勢

的迅猛發展，亟需對我國的工業管理的思想和措施，作更進一步的充實與提高。

按理說生產本是企業的中心任務，但長期以來，政治運動卻成為我國企業活動的中心。在“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什麼事情都要第一書記掛帥。工人們有句順口溜：“一元化，書記大，事事都要他發話”，就反映出這種實情。而企業裡事無巨細，樣樣都要經過黨委討論，書記拍板，必然導致了企業效能的低下。這種實際上的書記一長制，又造成了權力與責任的分離，有權的無責，有責的無權，缺乏健全的法制和責任制。而且，在企業裡外行領導內行，大權集中在不懂技術、不懂經濟、不懂管理的一些幹部身上，懂業務的廠長和專家，則常常受到冷遇和排擠。他們在文藝節目裡，不是姓“白”就是姓“錢”，用以標明他們所代表的“路線”。在書記決策、外行指揮的前提下，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也是“丫環拿鑰匙，當家不作主”，沒有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所以，企業裡常有“黨委發號召，廠長作報告，代表舉舉手，工會跑龍套”這種怪現象，很不利於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再加上從規劃上講，全國上下奉行“大而全”、“小而全”，沒有專業化協作，因此本來是社會化的生產，也漸漸淪為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則更不利於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當時我國的人均 GDP 只有 200 多美元，在世界 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只佔第 120 多位。1979 年，我國少數農村，人均收入還不足 50 元。這種貧窮和落後的面貌，實在不能順應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

面對這種嚴峻的國情，究竟怎麼辦？難道仍然抱殘守缺、夜郎

自大、固步自封？雖然企業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成“管卡壓”，而中外的實踐都證明了，對企業進行合理的管理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2, 借鑒日本的經驗

由於每個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科技水平、歷史傳統和倫理道德有所不同，馬洪認為，學習外國企業管理經驗時，一方面要防止盲目排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和克服不顧國情的“拿來主義”。而日本在學習西方經驗時不斷地演進，逐漸自成一家的某些做法，值得我國參照。

二戰後的日本，管理十分落後，面對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一派認為但凡美歐的就先進，主張全盤接受；另一派則認為西方的理念方法與日本的傳統習慣格格不入，難以吸收，故一概排斥。然而，日本人最終達到的共識是：對引進的經驗要認真地消化，對自己的經驗要認真地總結，取長補短，因此形成了具有日本特點的現代化企業管理。他們利用日本民族的傳統和習慣，突出“家族主義”的“長尊幼卑”，使得上級擁有權威，形成等級之間的有效控制。後來西方的人類學家證實，在這種“家族主義”的影響下，日本的企業形成了有效的競爭群體，這顯然比起競爭的個人，更富於競爭優勢。從“家族主義”出發，日本人建立了企業的三大支柱：一是“終身制”，職工與企業共存亡；二是“年功序列工資制”，這其中工資一部分按工齡定，另一部分按學歷和貢獻而定，因此年資和能力兼顧；三是按企業而不是按產業來組織工會，這樣勞資之間

的衝突和交涉就限制在企業內部，“家裡事家庭內部解決”，用家族主義來分化階級，緩和階級矛盾。

對於如何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他們也費煞苦心，既有廠史的教育、會社的準則、生日的祝賀，又有消除矛盾達成諒解的“忘年會”，不一而足。同時，他們應用常規獎（相當於2～6月的工資）和根據貢獻大小的年終特殊獎，對員工進行物資刺激。得獎多少則由主管決定，員工之間既不通氣，也不作評議。總之，日本這種以“家族主義”為特點的企業管理，把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捆綁在一起，產生了明顯的經濟效益。

當然，日本企業的終極目的還是追求最高利潤，家族主義又帶有封建的色彩，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發生，“終身制”也難以為繼。但是，日本畢竟是把外國經驗與本國的國情結合起來，而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故在日本本國行之有效。

3, 對策: 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回顧建國以來，我國也曾幾次進行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但往往是“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就這樣團團轉，經濟效果很不理想。深究其原因，過去這些改革主要是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集權和分權的問題，而不是解決企業自主權的問題。無論是集權把企業收上來，歸中央各部“條條”管，還是分權把企業放下去，歸地方“塊塊”管，企業的權限始終很小，甚至有越來越小的趨勢。這樣做，都是按行政系統、行政層次來管理企業。其結果，不是由於“條條”管而割斷了行業之間的聯

繫，就是由於“塊塊”管而割斷了地區之間的聯繫，致使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

另外，正確地認清國情，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國當時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不清醒地正視這種現狀，就會在建設中反覆摔跤子。馬洪認為，在改革之初，應當從我國仍然處在“一窮二白”這樣的一個實際情況出發，來制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和方向。

對於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模式，馬洪的設想是：在經濟上，政企分開，權力下放，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實行獨立的經營和核算，自負盈虧；在政治上，使職工有發言權，實行民主管理，形成職工和企業血肉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在管理上，實行廠長負責制。而企業經營的好壞，最終不但應從經濟成果中反映出來，而且應從職工得到的福利上表現出來，因為改善人民生活，應是國家和政府的崇高使命。

從 60 年代初制定“七十條”、撰寫《企業管理》，到 70 年代末呼籲“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中國的工業企業管理起步維艱。當年起草《企業管理》一書時，連“責任制”、“分配制度”、“企業的任務”等等看來是毫無疑義的概念，那時提出來都會有爭議，都要冒風險。比如，60 年代一味強調階級鬥爭，提倡什麼“企業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於是，《企業管理》寫作組的人員曾被迫進行討論：既然如此，企業和學校沒有區別，那我們還辦什麼工廠？那我們還辦什麼學校？就這樣迂迴曲折地來說明，企業的任務是搞生產，是創造社會財富，所以有別於辦學校。這種荒謬絕倫的現

象，可能會令後人啼笑皆非！

畢竟，沈舟側畔千帆過，當年被禁忌的、試圖進行突破的觀點，如今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常識，這本身就是社會的進步。

4.2-4 馬洪遇見了趙紫陽

回想 1947 年，在熱河的寧城縣，當時馬洪擔任土改工作團團長和縣委書記，那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時期。他每天都把土改的經驗和體會，寫成文章或新聞，僅在分局的機關報《群眾日報》上發表的，就有 30 多篇。1977 年，時隔 30 年後，馬洪感覺自己又像當年一樣充滿朝氣，滿腔熱忱，有著使不完的勁頭。

所不同的是，到了 57 歲，就像一罈醞釀多年的陳酒，酒香醇厚，到了開封的時候；而這些年來積累下的思想、經驗和資料，在加以整理總結之後，就好像能用一根金線，可以把散亂的珍珠給串連起來了。

這時候，馬洪遇見了趙紫陽。

趙紫陽乃河南安陽滑縣人氏，1938 年參加革命，解放時隨大軍南下，後來在中南局廣東省陶鑄下面工作，政績突出。而趙紫陽在全國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是在 1975 年“文革”後期，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期間，派趙紫陽主政四川；不過，緊接著下來的“批鄧”，使鄧的“重振朝綱”的計劃夭折。直到“文革”後，鄧小平重用胡耀邦管黨務，整頓組織和宣傳，作為“左膀”。而鄧仍需要“右臂”，來抓國民經濟，管理國務院的日常事務。浩劫之後，國事艱

難，百端待舉。當此非常之時，須用非常之人。由於文革的摧殘，京城裡縱有百官，然多多心有餘悸，或思有所羈，或力不從心。於是，鄧啓用了趙紫陽，這位實幹而有魄力，在四川贏得“要吃糧，找（趙）紫陽”口碑的地方官員。

趙紫陽與馬洪一樣，是“三八式”（抗日初期參加革命的幹部），也有北方男子漢的開放豪爽的性情。當時，他們兩人都在權力核心中位置微妙，趙長年作地方長官，在首都缺乏人脈，而馬洪則有高崗的前科。從某種意義上講，兩人都不真正處於“局內”。但是，兩人同樣有能力，有雄心，對新事物敏感好奇，對中國的改革躍躍欲試。英雄所見略用，兩人一拍即合。就在改革初期那風雲際會的特定條件下，天時地利人和，趙紫陽與馬洪，聽從時代的召喚，順應歷史的潮流，互相呼應，彼此激勵，呼風喚雨，形成了一種極有效能的互動關係。以下諸章節分別給與詳細的描述。

由於他們兩人的個頭、身材相仿，經常穿錯了對方的軍大衣。後來即使在領口寫上名字，還有穿錯的時候。有一次，趙紫陽甚至打電話追到馬洪家裡抱怨：“你看看，寫了名字還穿錯了！”

他倆喜歡一起微服出訪。

一次在河南，他倆正坐在炕上和老鄉一家聊天，成批的當地幹部聞訊趕到，忙不迭地向趙紫陽拜稱“總理”，嚇得主人幾乎跌下炕來。

又一次在上海，他兩人甩開警衛，溜進一家咖啡館，企圖享受一下普通人的樂趣。不想有人認出了趙紫陽，引起群眾的圍觀。

還有一次在普陀山，一尼姑望見微服的趙紫陽磕頭便拜，連

稱：“我近來夢見菩薩兩次了，看來這回升科長可有希望了。”趙說：“我是總理，管不了佛界之事。”事後，趙紫陽笑問馬洪：“尼姑裡頭也有幹部級別？”

80年代中，中央曾有意調馬洪去上海主持工作，趙紫陽在列車上與馬洪交談：“你別去，要不然我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了。”

而1987年，當總書記胡耀邦去職，由趙紫陽接替時，馬洪也勸說趙紫陽不要去，說還是當總理合適。

4.2-5 奉派主持寶鋼論證

1980年7月，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事件——寶鋼工地的地下鋼樁發生位移。這把舉國上下都嚇呆了，人們擔心投資巨大的寶鋼會滑到長江裡去。9月，國務院要求冶金部出面接受各地人大代表團對寶鋼的質詢。11月，根據國民經濟調整步驟，國務院下令寶鋼二期工程停建，對一期工程進行論證。一時間，對寶鋼建設的質疑四起，傳言工程面臨下馬。

1980年12月23日，國務院決定寶鋼工程“一期停緩，二期不談”。1981年，趙紫陽派馬洪到上海主持寶鋼的論證。經過現場的實地調查，經過認真傾聽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傾聽了技術人員的匯報之後，馬洪認為寶鋼當初的上馬是太倉促，考慮不周全；然而事到如今，已經同外國簽了這麼大的合同，又已經投入了這麼多的經費，如果不咬牙幹下去，國家的損失將會更大。1981年8月5日，

中央決定寶鋼建設重新上馬。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寶鋼和類似的爭議到此為止。

1, 著名冶金專家周傳典堅持我國鋼鐵工業應走技術改造的道路

周傳典在《挖潛是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方向》這篇文章中說：我國現有的鋼鐵工業有基礎，潛力大，大型企業布局也比較合理。東北有鞍山、本溪，華北有京津唐、太原、包頭，華東有上海、馬鞍山，中南有武漢，西南有攀枝花，都已形成一定規模的鋼鐵基地，這些都是我們今後前進的基礎和依托。

同時中小鋼鐵已遍布除西藏以外所有的省、自治區，形成了年產 1100 萬噸鐵、600 萬噸鋼、800 萬噸鋼材的生產能力。我們特殊鋼的生產也有了一定規模。

所有這些企業，過去潛力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而且有不足之處，比如有的有鋼無鐵，有的有鐵無鋼，有的配套能力差，有的工藝裝備落後等等，這是我們弱點……但潛力還是有的，主要是有些企業經過配套，可以形成綜合生產能力；有的企業經過革、改逐步採用國內外成熟的新技術，可以提高設備效能。僅靠這兩項，鋼鐵工業的質量、品種、成材率和產量都可以有一個較大的提高；消耗，特別是能耗也可以有一個較大的下降。據初步測算，當時我國 3700 萬噸鋼的生產水平，通過挖、革、改，地方中小企業可以挖出 300 萬噸的生產能力，重點企業也可以增加 1000 到 1200 萬噸。加上寶鋼 600 萬噸，我國的鋼鐵工業達到 5500 萬噸到 5800 萬噸

生產能力，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另外，發展鋼鐵工業不能依靠進口礦石，目前鐵礦山在建能力只比消失能力多 1000 多萬，所以加快礦山建設是十分必要的。

周傳典還說：“重點企業每挖一噸鋼鐵生產潛力需要 800 到 1000 元。”依此推算，增加寶鋼那樣 650 萬噸的生產能力只需 60 億元。毫無疑問，如果不上寶鋼，把上寶鋼的錢用在其他方面，自己設計生產設備、建造鋼鐵廠，能夠得到的生產能力肯定要高得多。而且自己製造設備，意味著現有的工廠充分開工，這樣同時就會有大量的資金生產出來，由此可用來建設的資金將大大增長。

2, 我國企業的現狀——全國技術改造的緊迫性

從全國來看，在改革初期的 1978 年，我國有大中型企業 8000 餘個，其中五六十年代建立的老企業佔 70% 左右。當時我國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和國防建設，主要是依靠這一批起骨幹作用的大中型企業。但是，長期以來在重基建、輕技改的指導思想下，這批老企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已經老態龍鍾。如果再不給予及時“輸血”，促其恢復活力，它們將失去在我國經濟建設中應有的作用，這將給我國的經濟建設帶來重大損失。

當時我國的工業技術裝備，約 20% 具備 60-70 年代的水平，是屬於先進和比較先進的；約 20-25% 技術上雖然已經落後，但陳舊程度不算嚴重，設備基本完好，大體上還能適應我國生產的技術要求；以上兩部分合計 40-45% 左右。在剩下的 55-60% 之中，約有 35% 的技術裝備十分陳舊，產品難以達到必要的精度，且能耗、物

耗過高，所以這類設備迫切需要改造或者報廢；另有約 20-25% 的設備也相當過時，只能勉強應付眼前的生產，而不能適應產品升級換代和採用新工藝的需要，因此也有必要進行更新改造。

3, 馬洪強調技術改造應從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

馬洪與周傳典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在 1982 年發表的《對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一文中，從中國工業全局的角度，論述了技術改造必須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適合於我國國情的路子。馬洪指出：中國的人力資源極其豐富，自然資源也不差。但是，我國的這些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且從總體來講，我國的經濟還相當落後。根據這種現實，我國應當採取適合自己資源條件、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並能帶來良好效益的先進技術，而不能統統要求最新技術，片面求洋、求新。

他認為，對於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我國應當從技術改造的實際需要出發，注意引進合乎我國國情的先進技術和自己不能製造的關鍵設備，包括少量局部生產過程的系列設備。當不得不引進必要的設備時，應當重在對它的掌握、消化和發展，而儘量少引進甚至不引進成套設備。凡是我國能製造的設備，就不要引進，更不要重複引進。1950-1979 年 30 年間，在我國引進技術使用的外匯總額中，用於成套進口的佔 90%，用於引進先進技術的只佔 1.4%。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要把引進技術同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結合起來。

他堅決主張，我國應當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充分利用現有的

基礎，在老企業的挖掘、革新、改造方面下功夫。今後我國的基建投資的大部分，比如 60% 或 70%，應當用到老企業的技術改造上；少部分，譬如 30%，或 40%，用在新建企業上。過去把投資的重點顛倒了。今後，我國首先應當把現有的幾十萬個企業現代化起來。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國的現代化究竟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還是花錢買來個洋式的現代化？是把我國現有的基礎現代化起來，還是把它丟到一邊，另起爐灶？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馬洪認為，必須採取前一種做法；因為後一種搞法，我國搞不起，也搞不成。相反的，採取前一種做法，花錢少、見效快、得益多。

究竟在我國怎樣進行技術改造？1983 年 11 月，馬洪受國務院委託，在研究了國內外技術改造的資料和我國技術改造有關問題的基礎上，代國務院起草了《關於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進行技術改造的決定》。經過討論修改，該決定作為國務院正式文件發出，文件尤其強調以下幾點：

有計劃地加速設備更新：我國當時的機械工業，吃不飽，又吃不了。原因何在？這是因為我們的折舊率太低，平均是 4% 左右，即 25 年才能折舊完畢，可企業實際上只能拿到一半，每年拿到 2%，其他的都被主管部門等單位拿走。結果，我國的企業 50 年才能折舊一次。對比經濟發達的國家，一般的七八年就折舊完了。他們不是舊的工廠不要了，而是把折舊費收回來，然後不斷地更新和改造原有的機器。在我國的油田和煤礦，如果把目前使用的舊式水泵換成新的效能高的水泵，一台水泵每年節約的電費，就

可以買兩台新的水泵；假如煤礦把舊的風機換成新的，便可以提高效率 10%，更新費用一年便可全部收回；假如小化肥廠改用新的風機，即可提高效率 20%，按節約電費計算，兩三個月即可收回投資。

提高折舊率，使企業改造有穩定的資金來源：當修鍋爐比買新的還貴時，就乾脆毀掉換新的；同時把那些“煤老虎”、“電老虎”也換下來。我國的煤、電都很缺，換下來就節約了能源，還可以利用這些大量廢鐵煉鋼。世界上經濟發達國家的鋼鐵生產在 3000 萬噸以上的，都是鋼產量大於鐵，鐵產量只相當於鋼的 70%、80%，甚至更低。我國去年（1981 年）產鋼 3400 萬噸，產鐵 3700 萬噸，鐵多於鋼，其原因就是廢鋼鐵太少了。眾所周知，把鐵煉成鋼消耗的能源很多，而我國貧礦多，往往需要三四噸礦石才能煉成一噸鐵。正因為能源的不足，又限制了我國的鋼鐵工業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環節都是銜接的。但如果拆下舊機器，廢鋼鐵多了，生鐵即可以少生產，鋼產量反而可以提高；以同樣的能源，不但可以生產更多的鋼鐵，而且質量也提高了。當有了更多的鋼鐵，吃不飽的機械工業也可以吃飽了。

所以，當設備的大修理費用高於新購費用，或者消耗能源的價值高於新購設備的價值時，要堅決進行更新。現行的過低的折舊率要適當提高，使技術改造有穩定的資金來源。這樣進行設備更新，還有利於改善企業的技术狀況，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說有利於增加產品，提高質量；同時可以減少能源的消耗和原材料浪費。

此外，鋼鐵工業的內部結構應進行調整：我國當時鐵鋼之比是 1.09: 1，而世界平均水平是 0.7: 1。如果我國降到 0.9: 1，每年就可節約 900 多萬噸標準煤。當企業加強了對廢鋼鐵的回收和利用之後，就可以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況下，增加鋼產量。況且，鋼只是初級產品，只有軋成鋼材，才能進入消費領域，所以，不應片面追求鋼產量，而要大力提高鋼的成材率。我國鋼的成材率若能達到歷史上 85% 的水平，那麼以同樣的能源，產同樣多的鋼，則可獲得比目前多出許多的鋼材，從而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益。

在投資上，首先應保證現有設備技術改造的需要：改變過去那種以新建為主，改變成今後以改造更新為主，這應是分配投資的一條重要原則。目前國家的基建投資有限，還得保證如寶鋼這樣的在建的成套引進項目，所以難以一下子將這個比重提到合理的高度。因此，要充分利用企業和地方的自有資金，包括折舊費、大修理費利潤留成中的發展基金，以及銀行的貸款，作為技術改造的基金。但今後用於技術改造的資金，從中央到地方，應由 1978 年的 30%，逐步增高到 70%。

另外，中心城市是歷史上形成的經濟中心，大多數工業企業都集中於此，特別是沿海地區大城市有一大批亟待改造的老企業。所以，抓好中心城市和骨幹企業的技術改造，是容易見效的合理措施。

有關寶鋼的後話

1983 年，寶鋼將二期項目規劃上報冶金部。按規定，寶鋼的

第二期建設，需在第一期完工後，經層層審批，再加上五六年建設週期，很可能要到世紀末才建成。1984年，時年85歲的鄧小平在寶山賓館，聽取完寶鋼的二期設想後，一錘定音：“寶鋼二期還可以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誤時間。”寶鋼二期由此提前兩年上馬。第二年上半年，寶鋼開始研究三期工程規劃。1986年年底，就在一期工程投產後不久，三期工程建設方案遞交給國務院，建議儘早籌備。但是，第三期工程，卻經歷了8年準備，反對浪潮的核心仍然是“錢”字。當時冶金系統大多企業明確表示不贊成，認為建設寶鋼10多年來，把國家安排給各大鋼廠的建設資金幾乎全佔了。冶金部意見不統一，規劃書就不能向有關部門轉報。另外，上海市有關部門認為，寶鋼三期應該側重於與上海鋼鐵廠協作，但這與寶鋼自身的發展規劃有悖。再者，職工也擔心，建設三期的600多億投資得不到回報。

經估算，三期工程需623.4億元資金。寶鋼決定全部自籌，提取固定資產折舊費，作為三期建設資金，每年約50億，再申請由日本海外協力基金貸款21億美元外匯。寶鋼在自籌資金建設三期工程期間，按國家稅法，照章繳稅，並將寶鋼建設一、二期工程的733億元國家貸款如期償還本息。

結語

究竟是花錢買一個洋式的現代化，還是對我國現有的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這是30多年前的爭議。現在，改革已大見成效，中國成為了世界上第二經濟強國。我國的鋼產量，從1978年的3178

萬噸，到 1996 年超過一億噸，躍居世界第一位，2006 年則開始由從前的鋼材淨進口國變為淨出口國了，其中寶鋼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撫今追昔，如果把當年投資寶鋼的數百乃至上千億元，用來改造振興鞍鋼、攀鋼、包鋼等我國原有的骨幹企業；或者把全新的項目放到煤鐵資源豐富的河北、內蒙、山西一帶，帶動當地相對落後經濟的發展；而讓上海充分利用其中心城市三次產業的優勢、作為未來國際大都市卻避免工業污染；如果當年能夠腰杆子硬一點，更加看重我國自己的家底，周密地權衡我國的實情，因地制宜地發揮各地區的特長，那麼我國應是一派更加宏大的氣象了！

現縱觀我國的鋼鐵、機械、能源、汽車、航天等各部門，但凡自力更生、以我國自己工業基礎為依托的工業，不但進展長足，而且更有潛力。這說明胸懷遠大的中國人民，不但能趕上西方和日本，而且能超過他們。故今日舊事重提，仍有它的現實意義。

4.2-6 理論突破的前夕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在歷史的重負下求發展，在列強的圍堵中求生存，並非在白紙上畫宏圖。改革開放理論上的突破，是一個艱難的過程。1979 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相當活躍，一些學者認為，“計劃”違反了價值規律就受到懲罰，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商品經濟。這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並為加快市場化製造了聲勢。但 1982 年十二大的政治報告，

重申“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的原則，說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還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進行了批評。上面既然定了調子，“警惕市場化副作用”的意見又成為主流，否定商品經濟又成為了天經地義。

1984年5月，趙紫陽與馬洪談起中國改革的目標問題時說：“看起來中國還是需要搞商品經濟，你不是也有這種觀點嘛，不妨寫篇文章送給老同志們看看。”於是，馬洪組織社科院工經所的周叔蓮和財貿所的張卓元，起草了《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一文。同年7月份，去東北三省兩市的發展戰略討論會期間，馬洪隨身帶著此文的草稿，邀請剛從美國訪問歸來不久的吳敬璉一起修改文章。兩人大約用了一個星期，基本上完成了改稿的任務。

馬洪隨即中斷了東北之行，返回北京，將稿件送給幾位老同志，並附了“我和幾位同志寫了這篇文章，送請你們一閱”的短柬。當吳敬璉開完會回京時，馬洪告訴他：

“我們的文章有結果了。只有鄧力群提出，最好不要從全民所有制的內部去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不同所有制的關係，即兩種公有制的存在，來解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好。”雖然一貫尊重鄧力群，馬洪這次卻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因為馬洪曾對此問題進行過認真的思考。早在1981年的《經濟研究》第七期上，他就發表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文章，指出“當勞動還沒有過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時，取消商品經濟，取消貨幣，是不那麼現實的”。

出乎馬洪意料，黨內元老王震將軍看了文章之後，親自提筆寫信，誇獎文章寫得好，說我們不能只說老祖宗說過的話，應該有所創新。楊尚昆、薄一波等人也表示贊同。得知此文探明了道路，趙紫陽便在9月9日給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寫信：“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各方面有關人士均緊張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而局勢很快明朗。鄧小平、陳雲分別在9月11日和9月12日，批示同意。可是，黨內的認識仍很不一致。要想在正式文件中採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提法，取代“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老框框，還需要做出很多的說服工作。

4.2-7 寫信力主“商品經濟”

9月中旬，馬洪參加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的調研組，赴滬進行發展戰略的工作，吳敬璉同行。不久前，馬洪替趙紫陽草擬了一封信，強調商品經濟的重要性的和它與計劃經濟的關係。此信送交鄧小平和陳雲，得到認可。外人也許不知，這可是石破天驚的一件大事，是中國經濟終於可以向市場經濟轉化的起點。

由於才氣縱橫，當年的馬洪曾叱吒風雲，可“高饒事件”後，他不得不刻意收斂。今夜，儘管伏案工作，馬洪卻心緒難平。他先起身踱步，然後推窗，風一陣陣湧入，吹拂他的面頰，掠動他的頭

髮。他不自主地張開兩臂，讓更多的風傾注他的胸懷，任自己置身於流動的大風中。

“起風了！”他對自己說。兒時在待陽村口的大槐樹下，他有過這種感覺；青年時在陝北的黃土高原上，他有過這種感覺；盛年在東北的千里沃野，他也有過這種感覺；而今雖已年過花甲，他又有了這種感覺——這種迎接挑戰的感覺。“時辰到了，該做些事情了。”他再次對自己說。

是夜明月當空，桂子飄香，正是花好月圓的江南之夜。在此良辰美景之下，馬洪疾筆行書。吳敬璉經馬洪的提拔，這次作為助手與他同行，就住在馬的隔壁。吳敬璉後來成為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夜深了，吳見馬的屋裡仍燈光閃亮，於是過來問他還在做什麼，馬洪說：現在看到的稿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徵求意見稿）上，仍然沒有採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他已經給胡耀邦和趙紫陽寫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馬洪還說：“紫陽按我們的文章寫了9月9日的信，我現在再按他9月9日的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

馬洪給趙紫陽的親筆信中寫道：“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

他尖銳地指出：“我們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商品經濟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國經濟的發展就順利、就迅速、經濟效益就好，否則就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看作是互不相容的、相互排斥的、截

然對立的東西，從理論上說，這往往是經濟戰線上產生‘左’的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多方努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終於寫進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對這個《決定》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的初稿”；“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好，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當他聽說胡喬木沒有參與決議的起草時，又說：“‘死了張屠戶，也不吃混毛豬’”。鄧後來還說過，“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列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弄清楚。”

今天，改革開放在人們眼中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或是輕而易舉之事。其實在改革前，飽受戰爭與侵略威脅的中國，是以計劃經濟或軍事共產主義獲得新生的國家。為了防止帝國主義的顛覆，不單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被視為對革命精神的侵蝕，就連商品經濟，也被看作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威脅。文革的“上綱上線”，更把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畫上等號。但是，在中國已經掌握了核武器、帝國主義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脅的改革初期，中國能否轉變發展戰略，向西方開放和競爭，就不僅是政治智慧的問題，也是理論創新的問題。30年前，包括西方觀察家都普遍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相容的對立體制。沒人料得到改革的中國，經能將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成為日後西方主流經濟界公認的混合經濟。因此，當年向建國以來佔統治地位的過時的教條挑

戰，提倡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幾乎是離經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風險，何況是處於馬洪的位置。

首先，由於高崗的牽連，馬洪政治上有負擔；雖然“文革”後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饒留為黨內少有的懸案，馬洪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當年計劃經濟的主帥是陳雲，陳在黨內為資深元老，與鄧小平平起平坐。他在“大躍進”之前，就對毛澤東的冒進有非議而遭貶斥，因而“文革”後在黨內備受推崇。況且，早在延安時代，陳雲便最早賞識了馬洪，為他改名，送他進馬列學院。同樣不可忽視的是，馬洪的許多老友、老同志，如鄧力群、宋平、梅行等，都贊同和擁護陳雲的“鳥籠經濟”（計劃經濟的形象比喻），視其為共產黨人之大本。而馬洪力主“商品經濟”，可以說，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礎的政治營壘裡，眾叛親離。多年後，馬洪曾偶議此事：“現在改革成為很時髦的事情了。當初還不知道是否要為此掉腦袋呢。”當時，也有別的幹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經濟”，但馬洪如此做，頂著的政治壓力遠比其他人大得多。再加上馬洪當時在經濟界和決策上都舉足輕重，也要求他在言談和文字上慎重而縝密。

自早年投身革命起，馬洪便組織鐵路工運，後來幾十年都與中國的大工業、大企業的管理和改造有著不解之緣。可以說，在改革初期參與決策的層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國現代化企業的幹部，能理解“計劃經濟”在建國之初的優越，以及在改革開放中的局限。所以，儘管備受爭議，馬洪基於自己幾上幾下，在高層、

基層積累的閱歷和經驗，堅定地維護了“商品經濟”的論點。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表現出他政治上的勇氣與智慧。

事後有人認為，馬洪提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過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技巧，因為提法在體制內，所以比較容易通過。可縱觀古今中外，革命固然重要，循序漸進的改良往往更有效。縱觀馬洪的經濟思想，它固然一貫重視國家的宏觀調控，不全盤否定計劃經濟，但在萬馬齊喑多年之後，黨需要打破禁錮思想的條條框框，人民需要釋放積蓄已久的創造力和積極性，中國的經濟亟需盡快騰飛。而只有改革開放，中國才能實現這一宏偉目標。1988年3月21日，馬洪在《加強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研究》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要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傳統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我們要通過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叫作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中國的改革開放，解決了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使佔世界3/4的貧困人口走出了貧困線。目前，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接近7千美元，接近“小康”。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風暴中，我國的混合經濟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我國的綜合國力，2010年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現居世界第二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在8-10%之間，預期在一二十年內綜合國力將與美國並駕齊驅。這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使西方學者都不得不予以承認，稱之為“自英國工業革命以後，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又一重大歷史事件”。

4.2-8 《2000 年中國》

1, 時代背景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著名的西方智庫羅馬俱樂部出了《增長的極限》這本書,討論世界能源的供應、人口的增長以及生態的破壞等情況,認為世界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極限,至本世紀末或下一個世紀初,總的發展就會停下來,經濟就會萎縮。後來它對其報告有所修正,但總體講,對前景的估計還是相當悲觀的。在此之後,美國的卡特政府,也寫了一個有關世界發展的預測報告,儘管比羅馬俱樂部的結論要“光明”一點,但也算不得樂觀。接著,日本的大來政府,編製了《2000 年的日本》,預見將來日本社會的特點是國際化、成熟化和老齡化。針對這些問題,許多國家都提出一些相應的方針和發展戰略。有趣的是,這些當年聽起來有些聳人聽聞的預言,如今卻幾乎一一兌現了。

八十年代初,我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如何在這錯綜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下,對發達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成功和失敗之處,都進行研究,儘量少走彎路,激流勇進,奮起直追,設計出一個既借鑒各國發展的經驗,又適合我國國情的宏圖遠景,這是擺在我國決策諮詢人員面前的一個嚴肅艱鉅的課題。這課題涉及了非常廣泛的內容,試舉例如下:

西方的“汽車社會”,差不多每個成人都有一部轎車,由此不得不營造大批的高速公路、停車場,過度地消耗了能源並污染了空氣,中國應當避免這種發展方向。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二三十

年後，中國社會在這方面無視當初決策諮詢人員的警告，照樣走美國式的老路。

參照日本：從 1955-1972 年間，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 GDP 年均增長率為 9.3%；日本同期引進了大約 2 萬個項目的技術。日本的 GDP 在 1967 年超過英國和法國，在 1968 年超過西德，從此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日本人承認其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引進技術，引進人家現成的技術，一用就可以現得利。然而，如果日本要想持續發展經濟，就不能全靠引進，就得靠自己去開發新技術。所以，從 80 年代起，日本開始強調“技術立國”。這個經驗中國應當記取。但根據我國當年的水平，在一二十年內如果技術引進得當，積極作用仍然很大。

要估計到隨著經濟的發展，某些產業的地位會發生巨大變化：比如美國的鋼鐵工業，在 20 世紀 40-60 年代是它的“黃金時代”。第二次大戰以後，世界重建，市場對鋼鐵的需求激增。美國鋼鐵年產量從 1940 年的 10,338 萬噸，快速增長到 1969 年的 21,695 萬噸，增長了一倍，佔世界市場的份額上升到 50%，並保持穩定。美國鋼鐵工業不但在全世界稱雄，而且與汽車等相關的重工業一道，在美國本國的經濟領域裡稱霸。可是，在 70 年代以後，隨著日、德的經濟復甦，遂以它們高技術、低成本的優勢，大大擠壓了美國的市場；使得美國的鋼鐵由 60 年代佔世界市場的 50%，降到 70 年代的 20%，此後更一路下滑，成為了“夕陽工業”。美國鋼鐵工業的衰落，固然與自身技術創新不夠而競爭力減退有關，但更是電子等高科技和服務業等“朝陽工業”的興起的必然結果。所以，要能

預見到不同產業戰略地位的轉移。

經過回顧和考察了國際形勢之後，以馬洪為首的決策諮詢人員還得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來。首先，他們必須研究中國的國家、部門、中心城市、區域等不同的經濟結構，並研究他們之間的內外部關係。然後，他們還要探討在 20 世紀末，中國的科學技術將具有什麼樣的特徵，從而來預計其水平、能力，以及將來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簡言之，在預言 2000 年中國的時候，對研究人員來說，頭等重要的是，總結中國的歷史和充分了解中國的現狀，同時參照外國的經驗和教訓。只有如此，預言中國的未來才能有根有底、紮實可靠，才能具有遠見卓識。

1980 年，鄧小平對外賓說：“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一千美元，算個小康”。1982 年，黨的十二大又決定屆時工農業的年總產量要翻兩番。然而，“翻兩番”是什麼？“小康”水平是什麼？人民目前的生活如何？人民需要什麼？怎樣才能達到小康？這些問題都要給以實際的科學的研究、論證與描述。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都對此作了指示，全國人大則將“2000 年的中國”，列為“六五”中的一項重點研究課題。

馬洪受命主持了這項工作，並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的王慧炯和李伯溪具體負責。為此，馬洪動員了中科院和社科院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並調動了國務院各部委和下屬研究所以及各省市的有關工作人員，共同協作研究。此項目先後直接投入者達 2-3 千人，包括 400 多名專家，還有科協 18 個分會的一萬

餘名會員的參與。課題自1982年開始，至1985年完畢，馬洪遂將這200萬字的報告送交國務院。

2, 1980年代初我國的具體國情

在作這份前瞻性報告之前，馬洪先號召主要的研究人員到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研，他親自帶隊去了西南偏遠地區。這種深入基層的考察，對研究人員的震動很大，加深了他們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並看到了地區之間的差距，這對他們確定總體方案和對策思路都有重要的影響。

他們認識到，預測“2000年的中國”，首先要從研究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據統計，1985年我國7種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在世界的名次是：糧食居第二位、棉花居第一位、肉類居第二位、鋼居第四位、煤居第二位、原油居第六位、發電量居第五位；我國工業的增加值（淨產加折舊）居美、蘇、日、德之後，佔世界第五位；農業淨產值居世界第一。這些都是我國的優勢，是我國前進的基礎。

雖如此，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從技術上講，落後20年；按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來看，我們低於世界的平均值；如按勞動生產率來算，我們落後得更多。當時的中國，可觀的經濟總量與極少的人均量並存，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

馬洪率領研究人員，對中國優勢劣勢並存的情況，再作細緻的分析：中國幅員廣大，僅次於蘇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而經

濟發展極不平衡、東富西窮，上海人均已達千元，西北貧困地區只有幾十美元。人口居世界之首，佔全球總人口的 1/5 強，比日、德、英、法人口總和還超出 70%；而其中農業人口近 80%，大大高於世界平均 44.5% 的水平。且文化技術素質低，文盲和半文盲約佔 21%。從資源講，總量豐富但人均資源匱乏，如可耕地佔世界第四位，而人均僅 1.39 畝(世界人均為 4.7 畝)；草原居世界第三位，可利用面積人均 5.5 畝(世界人均 11.4 畝)；地面水資源人均 2,700 立方米(世界人均 11,000 立方米)；森林面積居世界第六位，人均 1.7 畝(世界人均 15 畝)。這種人均地面資源少，對我國的經濟，特別是農業發展，非常不利。儘管我國的水力資源極為豐富，我國地下礦產包括煤、鐵、石油資源很多，問題是如何愛護和有效利用這些資源。而且，各種資源在地區上的分布極不均勻。

至於基礎設施的薄弱環節，過去認為是能源，經過研究後發現其實是交通：而運輸幾乎全靠鐵路，其中大部分是單線，複線里程只有 19.2%；鐵路的密度僅及印度的一半。我國的能源主要有煤、油、氣和水力，可如果沒有交通的配合，能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便不能實現。至於通訊，我國是世界最落後的國家之一：1984 年電話 0.34 部 /100 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26；我國電話的總門數還不及香港。

通過實事求是地對優劣勢作調研後，馬洪等得出結論：可以在紮紮實實的基礎上，制定出一個盡量接近實際的長遠規劃。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固有的優勢；而且經過改革開放，全國上下民心振奮、思想解放。如果能將宏觀遠景展示給人民，描繪出

生動可喜、卻又可信可行的輪廓圖像，那必將極大地鼓舞全國人民向新世紀邁進，走向世界前列的鬥志和信心。

3, 為“本世紀末實現‘小康’”的三個發展方案及其選擇

在馬洪領導的發展研究中心裡，對於一些重大的決策和預測，諮詢決策人員一般提出上、中、下三個方案，給高層提供選擇空間，這逐漸形成了他們的風格。這次，經過專家們反復的計算，他們仍提出三個可選擇的方案：

(1) 重型結構方案，即基本上延續 11 屆 3 中全會以前的那種偏重重工業的發展方案，積累率為 32%。

(2) 以實現人民“小康”為目標來確定生產結構、使生產結構與消費結構相適應，即協調發展的方案，積累率為 29%。

(3) 在“七五”和“八五”期間，把積累率提得更高一些（35%）、把發展速度提得更快一些，到“九五”以後（1995 年後）再來考慮改善人民的生活，即超高速發展的方案。

馬洪等通過一再充分的論證，集思廣益，採納了第二方案。因為第一方案偏重重工業，其投入多、產出少，宏觀經濟效益差。第三方案，是以抑制人民近期消費為代價的，將在一定程度上挫傷群眾的積極性。而第二方案，不僅使翻兩番有保證，更重要的是能使翻兩番的經濟效果更好，讓百姓年年都能得到改革的益處。馬洪再三反問自己：無論當初革命，還是現在改革，最終的目的不都是為了中國普通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嗎？

由於第二種選擇，是以實現人民“小康”為導向的，所以需要

確定產業結構，使之適應於百姓的消費結構。實施此方案的積累率約為 29%，是一個協調發展的方案：其中包括：I) 首先抓消費生產，然後安排好生產資料的生產。II) 增加對農業的投資。III) 加快能源交通及第三產業的發展。IV) 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電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V) 智力開發。VI) 立足東部、開放沿海，發展外向型經濟；避免齊頭並進。VII) 以大中城市為中心，建立層次和規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經濟網絡，發揮其產品經濟的多功能。VIII) 引進外資，等等。

根據第二方案的實施，馬洪領導的研究人員對 2000 年中國做出以下的預測：

(1) 繼續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人口將控制在 12.5 億。如果人口膨脹，耕地又逐年減少，人民的生活難以改善。而在 2000 年以後，如果人口結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過渡，再隨機另商國策。

(2) 人民生活水平接近小康：由 1980 年 227 美元的消費水平，2000 年可提高達到 617 美元；農村居民可達目前城市居民的中等水平。其中：

A. 當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在食品的消費結構中，糧食比例減少，副食比例增加，由“溫飽型”向“營養型”轉化。

B. 衣著消費由單一低檔，向多樣、中高檔發展。

C. 耐用消費品由機械型，向電子型發展：“老四件”（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逐漸變成三機一箱（電視機、洗衣機、照相機、電冰箱）。而且，開始房屋的商品化和汽車的家庭化。

(3)綜合國力可望超過英、法、意，僅居美、蘇、日、德之後(這實際上是在 2007 年實現的)；三次產業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由 1980 年的 36: 44: 15，變為 2000 年的 22: 52: 26；其中信息等新興服務業迅速發展；將利用開發的東部沿海地區為基地，把投資和建設的重心，逐漸移向中西部。

(4)工業生產總量，大約相當於美國 80 年代初期的水平。

“2000 年的中國”，為中國老百姓描繪了一幅經過全國上下齊心合力有可能實現的美好遠景：向 21 世紀邁進，不但國家強大了，人民也富足了，這使得廣大群眾覺得既有方向、又有奔頭。自鴉片戰爭以來，一個多世紀的內憂外患，使中國人民受盡了苦難。終於，共產黨領導人民趕走了帝國主義，改革開放又讓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在國際上，中國趕上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在國內，也算有了歷代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相對好的環境。所以，從 80 年代展望到世紀末，再從新世紀更向前滾動 20 年、30 年、50 年，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前景無可限量。

4, 2000 年, 對照現實與預測

到了現實中的 2000 年，我國的人口接近 12.7 億，農業、工業、服務業就業人口的比例，為 50: 23: 27；人均消費 1 千美元左右，接近“小康”；三次產業結構為 18.4: 48.7: 32.9；全部消滅了文盲，中高等教育普及率為 76%；電話(加手機)約 10 部/ 100 人；交通運輸，公路世界第四、鐵路世界第四(幾乎與印度平齊)、航空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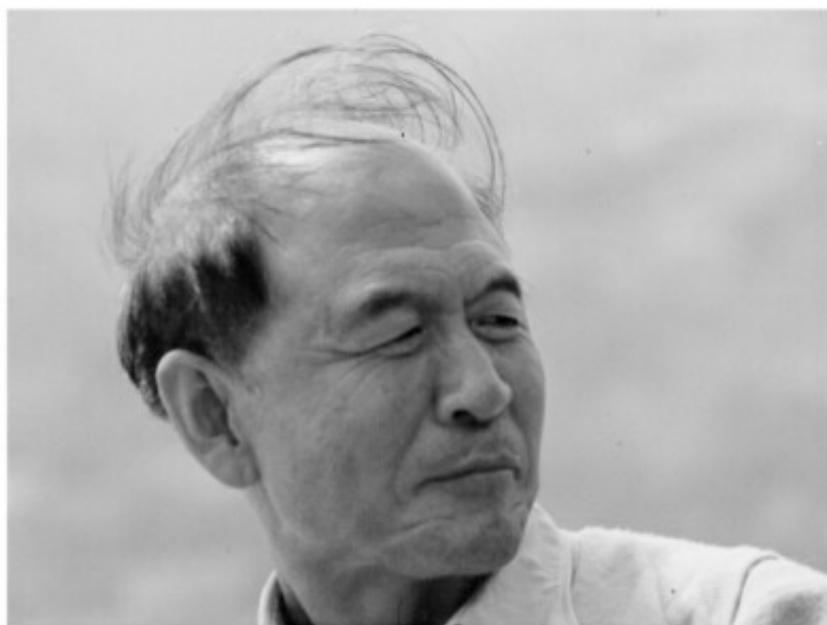
第六、海運世界第五……中國基本上實現和超出了馬洪等當年的預測，中國的經濟在新世紀裡穩健地騰飛。

5, 馬洪選擇第二方案的過程

而今作歷史性的回顧，筆者卻發現，馬洪內心裡其實是主張第三個方案，即超高速發展的方案的，也就是所謂暫時“國富民窮”的方案。由於他認為只有國家的實力更雄厚了，積累的財富更多了，才有真正的底氣向更高處發展。而過早地提倡消費，容易使人民一時嘗到甜頭，可難能持久，而且會造成較大的貧富懸殊。

當馬洪向國家正式獻策時，卻贊同了第二方案，即協調發展的方案。其原因是鄧小平迫切地希望中國盡快達到“小康”。鄧在1979年訪美時，曾與卡特總統達成了諒解：只有中國逐漸接近“小康”之後，西方向中國出口尖端技術（包括軍事上的尖端技術）才易於被美國國會所接受。否則，中國的技術進步和軍備發展，將被西方視為不顧百姓福利，像當年的德、日，或者蘇聯那樣企圖向西方的霸權挑戰，因而招致西方國會的抵制。另外，由於一個多世紀積貧積弱，全國上下都有這種巴不得明天就富起來的急迫願望。鄧小平意識到，單靠革命精神，難以安撫“文革”後的民心。

於是，馬洪暫時擱置了自己的主張，服從了多數人合情的願望。



大風起兮，1982年。



參加趙紫陽會見，1981年。



同趙紫陽一起考察山東的廠礦，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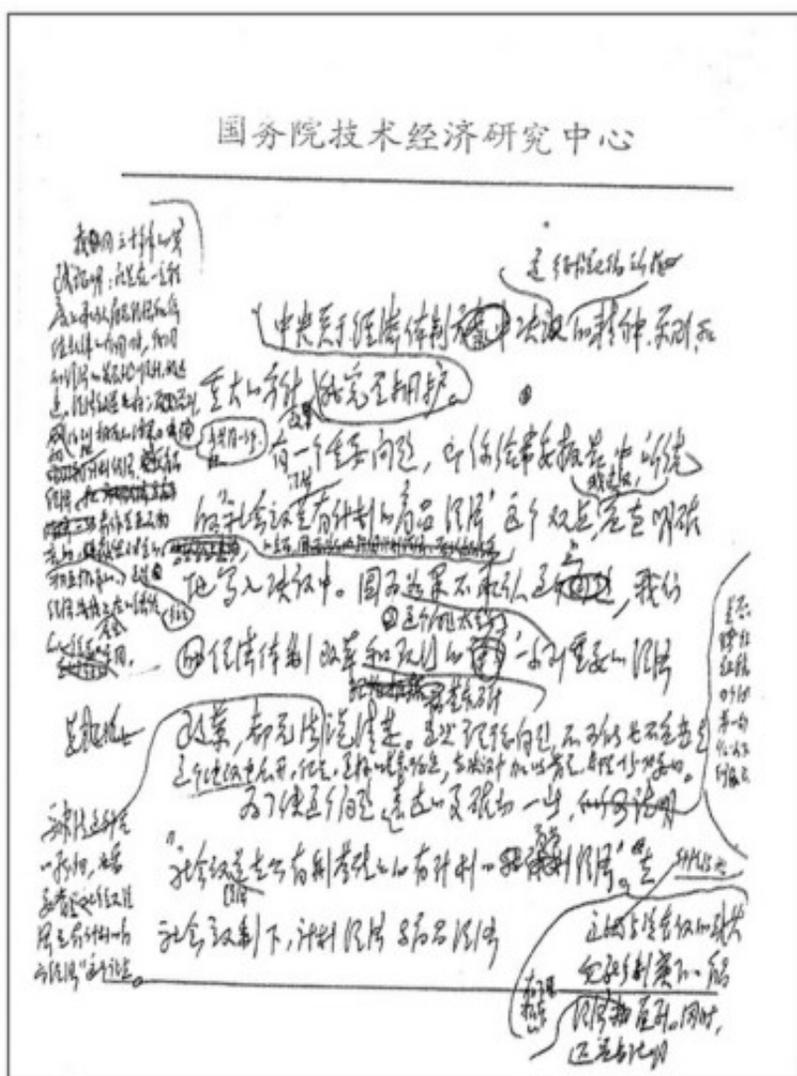
隨趙紫陽一起在紫光閣會見美國外賓，1982年。



馬洪在中南海西花廳的辦公室，1982年。



馬洪夫婦, 1983年。



馬洪給趙紫陽關於“商品經濟”的信手跡, 1984年。

第五章

改革(中)



5.1 政見不同，水火不容

冬去春來夏復秋，
欄杆拍遍小徑幽。
不問安石變法，不問資治司馬，
倒問是非總無休。

鬥智勇，角柔剛，
顛來倒去是陰陽。
陰何時陰？陽何時陽？
何時又是陰與陽？
千古一題，萬古蒼茫。

5.1-1 老謀深算的陳雲

“四人幫”倒台，陳雲復出。因“文革”後千瘡百孔、積重難返，陳雲說動了葉劍英、華國鋒，搬請鄧小平出山收拾亂局。當鄧

小平出任軍委主席、掌握軍權之後，他面臨黨政要職人選的調配。論資歷、論經驗，陳雲應是黨的總書記的首選；李先念時為常務副總理，又長年管理經濟，也應是國務院總理的首選。但是，鄧小平卻選擇了思想開明的胡耀邦和在中央沒有根基的趙紫陽，分擔二職。一來鄧認為陳、李思想不夠解放，二來因陳、李也是黨內元老，不如胡、趙那樣便於指揮。於是，一開始從任命上，“新派”與“老派”便有了“結”。

陳雲是高層中搞經濟最有經驗的人，而且他多謀善斷、見解獨到。

早在 1944 年當西北財經副主任時，為了打破對邊區的經濟封鎖，陳雲用電報遙控白區的地下黨，先派人把國民黨鹽庫的人收買了；當對方沒了存貨，我方便抬高鹽價，賣出賺錢；而當市場上鹽多了，我方又降價，結果老百姓不買國民黨的鹽，使國民黨大為虧本。後來抬高棉價，基本上也是採用的這個策略。

並且，陳雲利用抗日戰爭時期的特殊條件，運用通膨手段，巧奪天機，“吞吐”黃金和法幣。1944 年夏，邊區政府一次短時間就收進黃金萬兩，賺取大量金價波動的差價，充實了銀行的準備金，同時還進口了大量必需的物資。

1949 年上海剛解放，金融市場不在共產黨手裡。陳雲動用國家機器，下令查封上海市證券交易所，派兵實行軍事管制，不費一槍一彈，便打贏了這場“銀元之戰”。然而，投機商仍然操縱著上海的商品市場，物價猛漲。陳雲則在全國調動糧食和棉紗，集結到位，接著指令全國國營商業提高商品牌價，與黑市持平；當投

機商不知死活地吞進商品時，政府即下令全國統一大量拋售，同時降價；投機商也爭相拋售，於是行情大跌，穩定住市場和物價。拿陳雲自己的話說：在西北“擺小攤子”，在東北“開商店”，到上海是要辦“大公司”，以至於資本家們全都傻了眼：“原來共產黨裡頭也有人懂得經濟！”

1957年陳雲卻因為“反冒進”，得罪了毛澤東，遂明智地稱病隱退。

說到解放後稱病者，黨內確有幾大著名的病號。

首先當推林彪。林是公認的軍事天才，這裡只說他的病。平型關大捷之後，林喜極生悲：穿上日本軍官的黃呢子大衣，騎上一匹白色的大洋馬兜風，被閻錫山部隊冷槍誤傷。拿林自己的湖北土話說，是“陰溝裡翻了船”。林從此因傷需用鴉片鎮痛，還落下怕風、怕光、怕水的毛病，終年居住室內，掛上黑窗簾。韓戰時，他曾託病而拒絕掛帥出征；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德懷後，病情似有好轉；“文革”時，則可與毛澤東同登天安門、同乘吉普車，檢閱紅衛兵。

其次要數康生。康一貫執行左傾路線，以整人著稱。從30年代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到1942年的延安整風，到“文化革命”，愈演愈烈，遭其迫害的老幹部恨之入骨。拋開康的政見不說，此處專點康生之奇：他家乃明、清兩朝大地主，家中可設學堂，供子弟進學。延安整風後康生因民憤極大，七大時由原來的政治局委員降為山東地委書記；解放戰爭期間他回老家土改，親手槍斃了

生父，“大義滅親”，遂稱病多年。而其病，多少還與在延安時騎快馬跌傷、腦部受損害有關。據說，後來康用蠅頭小楷，手抄《西廂記》14遍，終於治愈腦病。

康生平詭譎，但才藝雙全。真草隸篆，樣樣精通，還能兩手左右開弓。他且工篆刻、擅繪畫，常以“魯赤水”為名作畫——與齊白石欲爭高下。“文革”前，在北京北海的畫舫齋，可欣賞到他與當代其他名家的書畫。因康好古玩成癖，謠傳文革“破四舊”時，他趁火打劫，巧取豪奪，但是客觀上保護了不少珍奇文物。

再後才輪到陳雲。陳在“大躍進”之前，被毛澤東斥為“和右派不過是50步與100步的差別”，遂寓居杭州養病，聽評彈、深居簡出。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國貧思良相，家貧思賢妻”，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曾邀請陳出面講話，而陳未在會上發言；會後則因受到“七千人大會”暢所欲言氣氛的鼓舞，在1962年2月的“西樓會議”上，將其對重工業、基本建設應作“傷筋動骨”的大調整的想法和盤托出，還獻出在農村開放自由市場、發放部分高價商品以回籠貨幣等錦囊妙計。1962年夏，面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形勢，陳又提出比“包產到戶”更為到位的“分田到戶”的應急措施。

可是不久，毛澤東便在有關文件上批示：“此人（指陳雲）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雖然這文件被田家英扣住，未交書記處，但陳知情後，立刻稱病南下，連隨即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也未參加，從此脫離中央決策層多年，故“文革”中未

遭大罪。總之，陳雲治理經濟的特點是穩重而實際。

5.1-2 陳雲對改革有保留

到了1980年，鄧小平的胡、趙兩員大將幹得風風火火。尤其是胡耀邦，通過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辯論，開始解放思想。在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上，胡又“開言禁”，大膽闖入意識形態的一些“禁區”：如自由、民主、人性和反對“個人崇拜”等等，甚至允許對“文革”及毛澤東本人有所褒貶。這勢必引起黨內一些資深人士的不安。像原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即大聲疾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還發出“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警告。這些爭議，又必然導致黨內元老們的關注，而陳雲正是這批元老中的中流砥柱。

杭州，按說這江南水鄉，吳儂軟語，避開了喧囂的京城，本符合陳雲的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的心性。然而，儘管西子湖上的荷香沁人肺腑，儘管幽細如絲的評彈婉轉輕舒，此刻地雖偏，陳雲的心境卻不能遠。恰與晉陶淵明的“心遠地自偏”相反。

“改革開放了，有些人出國轉了幾天，回來便鼓吹中國不如外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在1983年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發言結尾，我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就是提醒全黨：‘資本主義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現在不少人趕風頭，成了見風使舵的‘風派’，我最看不起這種人。”

陳雲不但看問題深刻，並且作風謹慎。他說什麼話、做什麼事，要等待合適的時機，要斟酌長遠的後果。比如上面提到的“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以及之後的隱退。到了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已經過世，陳雲講了彭德懷的問題，闖過當時華國鋒“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不能超出文革”的界限。後來審“四人幫”，政治局開會，許多人主張判江青死刑，陳卻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黨內鬥爭，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而1987年對《遼沈決戰》一書提意見時，陳雲又曾有“林彪作為四野的司令員，在當時正確的地方，我們也不必否定”的指示。遙想當年，陳雲和林彪、高崗在東北工作時配合默契，林彪指揮的遼瀋戰役是中共在內戰中決勝的轉折點。但是，林彪在1971年乘機外逃、折戟沈沙之後，成為了“叛徒”，因此，提及林彪在歷史上的功績，是一般人的大忌。

80年代初，有的領導幹部出國招商引資，違反外事紀律，變相索賄受賄。陳雲對此頗有警覺：“開放是對的，但越是開放的地方，幹部越是要‘金剛鑽’”。當有些領導幹部的子女“自費”出國，實際上是外商出資；陳雲親自出面，給有關幹部寫信，說這樣不好，“我們‘自費’不起”，規勸其子女回國。

同期，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走私泛濫，涉及黨政幹部，民憤很大。陳雲知情後嚴肅地說：“要重辦，要殺掉幾個，可以挽救一大批。”對於有些人擔心大張旗鼓地打擊經濟犯罪會妨礙改革開放，陳雲正色：“怕這怕那，就不怕亡黨亡國。”陳時任中顧委主任，知道執法行事，會得罪一些人。他說：“抓這事是我的責任，

我不管誰管？我準備讓人打黑槍、損子折孫。”並讓秘書轉告子女，出門時要注意安全。

但是這千頭萬緒中，在陳雲看來，最要害的是改革“姓資”還是“姓社”，共產黨員要講共產主義。也就是說，政治上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經濟上要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來確保社會主義公有制。陳雲認為，目前黨內有相當一些幹部忽視了這些原則，模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這引起陳雲的警覺，他認為必須與小平商議，以引起全黨的注意。

與此同時，陳雲又洞察到金融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早在 70 年代“文革”中，他便教導兒子陳元：在美國真正掌大權的不是總統，而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日後陳元擔任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

5.1-3 陳雲提拔重用宋平

縱觀中國的改革過程，鄧小平勇於創新，陳雲善於守成。這一對雄才大略與老謀深算的領導人相互制動，影響到日後中國改革的不斷演進。陳雲固然把鄧小平推到前台，但出於深謀遠慮和積年的歷練，認為鄧的一些舉措未免過激。特別是鄧手下的胡、趙這兩員闖將，辦事草率不當：像對意識形態領域“自由化”的縱容、像對“計劃經濟”動斧等等。

尤其令陳雲憂心忡忡的是，經過“文革”，幹部隊伍備受摧殘，

現在得力和可靠的人手不多。比如，“文革”前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萬里能幹，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1975年抓鐵路有成效，可他是陳雲在延安和東北的對頭彭真的老部下，現在又跟鄧小平太緊，甚至跟趙紫陽一起向鄧小平爭寵。而“文革”前的商業部長姚依林，與陳有交情，在“文革”中還冒著風險經常通氣；姚倒是蠻牢靠的，可以看住計委，把好“計劃經濟”這道關；只可惜欠缺管黨務的經驗，同時近年來健康也成問題。

那天，當陳雲向姚依林吐露這些想法時，姚向陳推薦了他的清華同學宋平。

作為長期管組織工作的陳雲，自然瞭解宋平。

宋平是原北平農業大學學生，後轉入清華，“一二九”運動出身。到延安以後，宋先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工作，後派往重慶南方局，任周恩來的秘書，曾參與1945年的國共和談；解放戰爭時期宋去東北，後來同馬洪一樣，作為東北局的幹部隨高崗一同進京，進了國家計委。工作關係嘛，陳雲自己不也曾跟高崗一起共過事？高崗出事，有人要扯上宋平，幸虧有總理講了一句情：“宋平是老實人”，這才安然過關。

以後宋平在勞動部、國家計委，始終兢兢業業。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宋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被視為有“右傾”之嫌，有人借機將宋平排出國家計委，京官外放到西北局計委。好在宋為人低調，不露鋒芒，所以在“文革”中“民憤不大”，只落得個“靠邊站”。一旦“文革”高潮過去，除了“抓革命”以外，還得“促生產”，宋平馬上成為第一批被解放的幹部。他先在甘肅省國防工

辦掛個閒職，然後去甘肅省委，成為主管生產的省委書記，基本上沒有脫離過第一線。這經歷與其他資格能力相似的老幹部，在“文革”中不是關監獄、便是住牛棚，一晃十年八年，出來後兩眼一抹黑，情況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陳雲以他富有經驗的一雙老眼，事先已經認可了宋平，加上可信賴的姚依林的舉薦，認同宋作風四平八穩，不會去追求時尚，去充當“風派”。況且，宋平作省委書記多年，這比起姚依林僅擅長經濟，似乎還略高一籌。陳雲感覺欣慰：有了姚、宋二位的輔佐，“穩健派”營壘的實力定較前大增。

馬洪與宋平，有在延安和國家計委的共同經歷。所不同的是，馬洪來自農村，當過工人；在陝甘寧邊區曾跟隨張聞天下鄉，搞過一年多的農村社會調查；高崗事件後，又幾度下放；在國家經委的十年，儘管工作接近高層，然而其間經常下基層蹲點。可以說，馬洪既對國家計委的宏觀經濟瞭解，也對計劃經濟的局限和下面的民情知底。對比而言，“文革”前宋平雖不算“大紅大紫”，馬洪則歷經波折。這境遇的差異，對基層實際情況理解程度的差異，或許造成了他們對文革前17年“鳥籠經濟”認同的差別。可以說，改革開放，使馬洪看到一個難得的契機，這使馬洪從改革一開始，就積極支持鄧小平的許多大膽措施，成為了旗幟鮮明的“改革派”。

其實，由於高崗事件，馬洪的政治壓力一直很大。只要高崗不翻案，馬洪就不得“正名”，他的任命就會有爭議。如果馬洪違背自己的信念與原則，姑且附和陳雲的“鳥籠經濟”，對他個人

來講，政治上應當是比較安全的。

鄧小平正打算勢如破竹地推行改革，在經濟方面，國家計委明顯就是一大障礙。單提“烏籠經濟”一門，就像金箍咒一樣，把國民經濟箍得緊緊的。於是鄧小平先派胡耀邦上馬，企圖解散計委，打破這個老框子，這當然招來陳雲的反對。老計委樹大根深，胡哪裡扳得動？可因為這是鄧的旨意，當時姚依林和宋平還是相當緊張的。姚與宋堅信“烏籠經濟”，認定籠破了，鳥飛了，國民經濟就垮掉了，至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報銷了，因此他們決意進行抵制。

姚與宋都是清華“一二九”運動出身，“文革”的風風雨雨，並沒有使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理想產生動搖；相反，他們認為，目前黨內自上而下，有些人立場不穩、黨性不純，被國內外資產階級的歪風邪氣吹昏了頭腦，喪失了共產黨人的遠大理想。而今天的江山，是先烈們用鮮血和頭顱換來的，絕對不能大權旁落！於是，他倆在一起宣誓：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然後寫好辭職書，放進上衣的口袋裡，隨時準備共進退。後來由於胡耀邦方法簡單，且人手不夠，奪權只好草草收場，不了了之。

儘管胡耀邦此番不成，鄧小平並未善罷甘休。鄧又委派趙紫陽，再度向計委“興師問罪”。也大約在此期間，陳雲找馬洪談話，試探派他去計委接替宋平工作的可能性。萬沒想到馬洪不識相，居然說光搞計劃經濟不行，救不了中國！由此可見，馬洪已經背叛“計劃經濟”，同那幫搞市場經濟的人坐到一條板凳上去了。這件事，我們後面再詳說。

5.1-4 馬洪與宋平結成兒女親家

幾十年來，馬洪一直同宋平的私交不錯。宋平身材適中，眉清目秀，溫文爾雅；而馬洪高身材，紅臉膛，熱情開朗。在延安馬列學院，一個是幹部科長，一個是組織科長。當宋平的妻子陳舜瑤被派去重慶南方局工作後，宋平有一陣子很苦悶，馬洪比宋平小三歲，當時也因與女朋友游軍分手而情緒低落，於是兩個青年互吐心聲，彼此安慰和鼓勵，結下了友情。國共和談破裂後，宋平也被派往東北，曾與馬洪在冀察熱遼重逢。馬洪跟宋平聊起他在寧城縣突圍，死裡逃生，二人敘舊甚歡。高崗落馬，宋平有驚無險，未受牽連。廬山會議後，宋因言遭貶，京官外放，心有餘悸，變得言行相當謹慎。此時馬洪仍在國家經委工作，宋平每次進京參加計劃會議時，兩人仍然見見面，敘敘舊，當然宋平也趁此機會，瞭解一下高層的動向。

馬洪因受高崗牽連而落難以後，宋平是極少數繼續與馬洪保持來往的老友。歷經世態炎涼，馬洪時常感嘆宋平為人忠厚。隨著歲月的推移，即使溫情的人也會逐漸變得冷酷。但早年的際遇，往往給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記。愛屋及烏，這多少是兩人後來聯姻的緣故。

馬洪的女兒馬雅，與宋平的兒子宋宜昌從小是同學，兩小無猜，青梅竹馬。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文革”中，雖然馬洪尚未解

放，馬、宋兩人出於彼此間的信任和瞭解，欣然結為親家，兩家同舟共濟。“文革”結束，眾多幹部包括馬洪復出，老幹部彈冠相慶。馬、宋關係好似當初，宋宜昌和馬雅被眾人稱為“天生的一對”，遠近傳為美談。宋平甚至有將其他未婚子女與馬家再結姻緣的調侃。

馬雅進了宋家，第一次拜會陳舜瑤時，“文革”尚未結束。入席進飯，馬雅提及父母間共同的老朋友，無意間提到左權將軍的夫人劉志蘭。不料陳當場色變，弄得馬雅莫名其妙。當初高崗落馬，宋平繼續與馬洪來往，陳已不悅，曾多次勸阻。“文革”結束，馬、宋已是親家了，一次，陳舜瑤在馬洪處撞見了高崗的遺孀李力群，頗覺晦氣。

5.1-5 政見不同，家庭破裂

倘若“四人幫”不倒，馬、宋兩家尚可一致對外；即使求同存異，也是同大於異。但“文革”畢，舊敵去，新敵又形成了。老幹部裡涇渭分明，又分成兩個營壘。馬雅在改革開放之初，考上研究生去了西歐；待幾年後歸國，形勢已變——此一時，彼一時也。

80年代初某春宵。皓月千里，碧空如洗。馬、宋兩家晚飯後，不約而同地到院中散步。家人知趣地退到一邊，由馬、宋二人交談，就像當年在清涼山下，就像在延河晶亮的水邊。馬洪說：“不改革，國民經濟得不到發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宋

平說：“即使生產發展了，也要把握住社會主義的方向；如果把不住社會主義的方向，共產黨人大權旁落，工農群眾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東風過，一陣杏花雨。兩人漸行漸遠。

改革初期，日新月異，社會上魚龍混雜。在改革派看來，改革只剛剛起步；在保守派看來，改革已經改過了頭：動“官本位制”就是要動共產黨的江山，用“金本位制”的資本主義所取代；金錢腐蝕了黨心、民心，到處物欲橫流，世風日下。

陳舜瑤堅決反對改革，是有名的“馬列主義老太太”。馬雅剛回國時，對此知之甚少，以為還是和諧的一家人。因此，有一次在飯桌上，她不知深淺地步入雷區：“老說‘改革’‘改革’的，我怎麼就沒看見改革派？”陳舜瑤放下雙筷，把一縷頭髮從眼鏡前捋到耳後，嘿然一笑：“改革派不就在你們家裡？”眾人鴉雀無聲，馬雅不知所措。

由於有在西歐生活和學習的閱歷，目睹了當時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馬雅有時對僵化的制度提出疑問，並對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個人品質也有質疑。諸如此類的想法在陳舜瑤看來是“異端”，甚至是對她個人的冒犯，遂認為馬雅被西方“洗了腦”。而當她獲知馬洪抹了陳雲的面子，婉拒去國家計委接替宋平來維持計劃經濟時，則斷定宋、馬已然勢不兩立，兩家的分歧已然不可調和。所以，她經常尋釁，挑動衝突。每每看電視、讀報紙，一有機會，陳舜瑤便指桑罵槐：“從前的黑人，是被賣到美國當了黑奴，如今卻有這麼多的黃人，自願到美國去當黃奴。現在看他們笑，有他們哭的時候呢！”

以前宋平在甘肅時，雖為“大吏”，畢竟屬於“封疆”。為宋能順利回京，馬洪助過一臂之力。宋平1981年入京以後，在姚依林的推薦和陳雲的大力提拔之下，步步高升。83年出任國家計委主任兼國務委員，87年主持中組部兼任政治局委員，掌管黨務人事，89年6月在動亂的危局中更出任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最高層決策核心。

自宋家進京後不久，便不許馬雅夫婦在宋家居住。也許怕馬雅在家在場，聽到什麼機密，會走露風聲？後來宋宜昌因病住院，他家沒人去看他。因為他是宋平的愛子，馬雅給他家去電話，想通報一下他的情況。電話接通，馬雅說“請找爸”，接電話的某人：“誰是你的爸！”“卡”地掛了電話。馬雅又不得不跟機關聯繫，請秘書用“紅機子”接通，馬雅才跟宋平說上了話。後來，馬雅在美國從電視上看到“六四”的鎮壓，雖然很震動，但對當權集團中一些人，會對群眾採取極端手段，也並不完全感到意外。宋宜昌病愈出院，回宋家暫住，馬雅前往探望，陳舜瑤堅決不准留宿，小兩口子不得不大半夜裡收拾鋪蓋捲走人；而馬雅的但凡有宋平在內的家庭合影也紛紛地不翼而飛……總之，欲將馬雅掃地出門的意圖十分明顯。按說馬雅的父親是馬洪，公公是宋平，天底下有幾個人這般“幸運”？可就像馬洪、宋平夾在鄧小平和陳雲之間，馬雅也處在某種夾縫之中，日子很不好過。她曾對宋宜昌說，要是能現在被冰凍起來，過20年後再醒過來就好了。可她用不了等多久。

時至八八、八九年之交，物價飛漲，民心浮動；而大學校園裡

和地方上不斷有學生和工人“鬧事”，因此北京政局激變，氣氛很緊張。擔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仍忙於送往迎來，與外賓們觥籌交錯，而宋平與楊尚昆、李鵬這黨、政、軍的頭面人物，則每天留在遠郊的玉泉山上，密切觀察時局的變動。事態瞬息萬變，一觸即發。此刻宋宜昌提出離婚，宋平開了綠燈。



馬雅和宋宜昌，攝於蘭州，1972年1月。



馬雅和宋宜昌，攝於北戴河，1985年7月。



馬雅赴美
前與父親在北太
平莊家中合影，
1986年1月。



馬洪參加鄧小平接見印度外賓，1983年。

5.2 “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

昔日有寶劍，入鞘乃錚錚。

而今劍在手，卻問得用否？

5.2-1 陳雲打算啟用馬洪

馬洪復出以後，本打算重振旗鼓，返回計委。從1952年起，他主持國家計委的常務工作，參與制定“一五計劃”。以在東北掌管和改造重工業的經驗，馬洪正雄心勃勃，準備在國家的宏觀經濟上大顯身手。不料命運多舛，期望落空。1956-1965年十年在國家經委，他參與了“文革”前許多國家重大的經濟政策的起草與制定，如“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如《工業七十條》，並主編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工業企業管理》一書；因此，他對國民經濟的命脈，相當熟悉。另外，他曾多次下放和到廠礦作調研，有在第一線領導和生活的經驗，理解基層群眾的疾苦和心聲。總之，自上到下、從裡到外，馬洪對經濟改革已有一整套的想法和做法，“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所以，當馬洪獲知他有可能再度被重用時，曾滿懷希望地請戰：重歸國家計委。殊不料，這請戰遭胡喬木婉拒，卻委以另一重

任：來社科院當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即“文革”前的“學部”，其盤根錯節、其不易理順，乃全國有數；在“文革”期間，其派系之紛雜，又可謂“文革”之縮影。其實，當初社科院院長的候選人頗多：有老中宣部的、有老學部的，如于光遠等等，“捨我其誰哉”者大有人在。為何高層偏偏選中側重經濟策略的馬洪，來接替黨的理論權威胡喬木？內情不明。估計其中正如馬洪不能如願以償返回計委，東山再起，情況相仿。1982年，胡喬木和鄧力群，將社科院這意識形態的複雜攤子，交給了馬洪。儘管馬洪沒有“正名”，在不少人心目中，仍是個掛著問號的前“分子”，依然披甲上陣了。

為何馬洪不能回計委？事有蹊蹺。而蹊蹺何在？

在馬洪走馬上任社科院不久，陳雲開始編寫《遼沈決戰》，召集有關的同志去他處討論、整理、幫助回憶，準備出書。馬洪也在被召集的人選之列。

陳雲是在延安認識馬洪的。當時他任中央組織部長，經少奇、洛甫（張聞天）的推薦，審查一個從農村長大，領導同蒲路工人運動的年輕幹部，名叫牛黃。牛黃高個子，紅臉膛，朝氣勃勃，挺拔興旺，看去有股北方人的鄉土氣息。坐下來一談話，陳雲發現這小夥子講話有條理，頭腦清楚，很能抓住要點。通過談話，陳雲又得知牛黃出身窮苦，所得的文化知識，多靠平時的刻苦自學，內心更加賞識。由於牛黃是北方局鐵工委從白區派來的，將來還要派回去，為了作地下工作的安全與方便，陳雲便替牛黃改名為馬洪。就在這次談話之中，陳雲判斷馬洪是塊可塑之才，應該

留在延安，作為培養對象，給他創造機會。因此，整個抗日時期，馬洪留在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直至 1946 年才隨大軍去東北。

等陳雲再度見到馬洪時，已是 1948 年。那時陳雲作為高崗的同僚，工作配合，得心應手。那是解放戰爭的後期，東北成為共產黨南下的大本營。東北工業的重建和建設，高崗重用馬洪，馬洪也人盡其才，一帆風順，直到後來高崗事發。

陳雲嘆息地回顧：“高崗這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把毛主席對他講的‘私房話’到處亂講，還不是自己找死？對我的苦口婆心，他不但不聽，反而蠻幹到底……馬洪雖有牽涉，畢竟年紀輕。只可惜他彎子轉得太慢，不如王鶴壽、陳正人、安志文他們靈活，及時地痛改前非……”

高崗出事時，陳雲反戈一擊，有驚無險地過了關。“八大”召開，當上黨的副主席。陳雲曾在上海灘作店員，見過世面，當時比許多從農村出來的幹部懂得經濟。所以，在“合作化”時，他與“裹著小腳”的鄧子恢站到一起；“大躍進”前，他又“反冒進”、潑冷水，故遭毛澤東的冷落。於是，陳稱病隱退，不再多言。“言必有失，禍從口出。難道這樣的教訓還少嗎？彭德懷便因此在廬山獲罪，”陳雲如此忖道。

直到困難時期，生靈塗炭，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以總結經驗，毛澤東識別陳雲的理財能力，特請他到會發言，陳卻未作發言。直到“七千人大會”之後的“西樓會議”，陳才拿出治理的方案，不但主張對國民經濟作“傷筋動骨”的大調整，甚至主張給農

民“分田到戶”。但不久，陳雲的諸種策略，又遭到毛澤東的嚴厲譴責。陳雲知情後，再作隱退，保持低調，不像劉少奇等得理不讓人。因此，陳雲未被列為“文革”的矛頭所向。

1976年，周、毛接踵而去，華國鋒、葉劍英拿下江青，隨之大批老幹部復出。陳雲復出之後，說服葉、華，班請鄧小平出山，主持國政。陳自知精力不濟，力挺鄧小平站到前台。當然，到了關鍵時刻，該說的話還得說，原則問題上不能讓步。

當初陳雲一進京，就住在北長街的一個四合院裡，30年如一日，直到唐山大地震，住宅成為危房。為了避免大興土木，陳雲始搬入中南海。即便進了中南海，他仍然不許宅邸翻修，所以，陳在中南海的住所也樸素如舊。

1983年，陳雲籌備寫書，恰趕上春天。正堂前面那株粉紅的西府海棠，華冠如蓋，富麗堂皇，這才教庭院顯出幾分平時被掩蓋住的王侯氣派。凝視著眼前的似錦繁花，陳雲陷入了沈思，卻聽廳外的台階上有腳步聲，只見馬洪邁進門來，身材依然高大，臉色依然紅潤，仿佛北方田野裡的高粱。一瞬間，陳雲仿佛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延安。陳雲因體弱，一貫自覺地節約心身的能量，經過幾十年風雨的修煉，他更加習慣成自然地不露聲色。可也許是感嘆時光的流逝，也許因為當年正是他自己，親手栽培了牛黃，陳雲細眯的兩眼竟有點潮潤。

在馬洪眼中的陳雲，幾十年來的變化不算太大，還是斯斯文文，身體瘦弱。自從1954年七屆四中全會以後，馬洪再沒有接觸過陳雲。儘管在經委的十年中，馬洪有機會參與高層的某些會

議，但陳雲像毛澤東一樣，多年來深居簡出，常在外地。況且，馬洪懂得陳雲不僅生性謹慎，而出於種種與高崗過往的特殊原因，陳雲不便像薄一波那樣揮灑自如、不避嫌疑。

“陳雲同志，你身體可好？”馬洪趨前向陳問候，還是那山西口音，鄉音未改。

躺在睡椅上的陳雲，欠身坐起來握手，又上下仔細打量了馬洪一番，才發現馬洪已經謝頂，他的額頭顯得更高更寬，上面甚至也起了皺紋……

“歲月不饒人，”陳雲又忖。

陳雲聽說，馬洪除了在社科院任職，還在趙紫陽那裡，不但作副秘書長，而且搞了個智囊中心，替趙出謀劃策。自改革開放起，鄧小平重用了胡耀邦和趙紫陽。陳雲看去斯斯文文，內心活動卻很多：“雖然撥亂反正，需要大刀闊斧，可鄧使用的這兩個人，仍有嫌疏闊。胡有‘自由化’的傾向，趙推崇西方市場，都不夠妥當。兩年前，同姚依林安排好，我把宋平從甘肅調進北京。宋一來有管組織的經驗，二來也一直搞計劃，有助於對胡、趙糾偏。這次找馬洪來，也不僅談談寫回憶錄，更想看看有無可能派他去計委，接替宋平。”

聽到馬洪問候，陳雲慢聲細氣地：“不行了，老嘍。就像部木炭汽車，總冒黑煙。”

馬洪接上說：“哪裡的話，陳雲同志的身體很好嘛。”

陳雲遂往後一仰，慢慢躺下，半晌才說：“今天找你來，是想問問你，想不想回計委工作？”

馬洪一聽，心頭一震，不知是喜還是驚。因為上次他曾向胡喬木請命回計委，結果碰了個軟釘子，被派往社科院；估計是上面有人不准，而這“不准”必然來自最高層次。

覺出馬洪的疑惑，陳雲解釋道：

“現在要調宋平去中組部，姚依林的身體又不好，所以想派你去計委，把好計劃經濟這一關。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不容易。”

馬洪沒有立即作出積極響應。這似乎出乎陳雲的意料，但他還是有所期待地鼓勵著：“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吧，”遂起身帶著馬洪步入書房。

陳雲端坐在寫字檯前，讓秘書備好了筆墨，展平了幾頁宣紙。沈吟不多久，出乎馬洪的意料地，陳雲又起身，立於桌前，懸腕揮毫，錄下唐朝崔護的一首詩：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贈給了馬洪。然後他面有倦色，說要休息，讓馬洪改日再來。

告別陳雲後，馬洪的心緒如潮似海：

“我一到延安，就被陳雲同志看中了。他看重我的出身背景，看重我在實踐中自學的經歷。當年的共產國際，就曾經根據這些標準，破格提拔了他本人。正因為有陳雲同志的推薦，我留在延安，得到機會去馬列學院深造……雖然在高崗事件中，他沒有出面保我，可那時連他自己的處境也很為難呵。”

“這次遼沈戰役編書，他又破格地徵求我的意見。說起

46 ~ 47 年間，我在熱河工作時，不過是縣長、縣委書記一級的幹部；直到 1948 年 5 月，高崗調我去東北局以前，我也不過是承德市委書記。要寫遼沈戰役的回憶錄，資格比我老、功勞比我大、比我瞭解情況更多的將軍和老幹部，不計其數，再說我也不是部隊上的人。可陳雲同志特地找我談遼沈，可見他老人家對我一直有栽培的心意……

“說起回計委，這正是自己多年的夙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主觀上也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多少年來摸索出的方法、策略，都要用在計委，才算到位，才能把勁頭真正使出來……可談到計劃經濟，我們已經搞了 30 多年，仍然沒有走出一條路來。從 1957 年到 1978 年這 20 年，我國基本上取消了私有企業和商品經濟，而國營企業在計劃經濟的統管之下，先天不足，連年虧損，職工工資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 5.7%；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從 1957 年 582 元下降到 1978 年的 549 元。

“而日本呢，從 1955 年到 1973 年不到 20 年間，三十人以上的企業，企業職工工資提高了將近三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九倍。我記得特別清楚的倒是，王震同志訪問英國回來，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

“這些年來，我在下面作調研，又在上面作規劃，歷史和實踐已經向我們證明，光搞計劃經濟時沒有前途的……”

想著想著，馬洪激動的心情反漸漸轉為沈重：“陳雲同志是黨

內第二號人物，一言九鼎。今天他給了我馬洪這麼大的面子，假如我不領情，肯定會得罪他老人家。那樣的話，不但我個人的前景會受限制，甚至連原來設想的一些宏觀策略，也有可能遭遇困難……”

此後，馬洪有好幾天惴惴不安。他知道他將作出一樁非常重大的決定，而這決定將會決定他今後的一生：

“改革中，小平同志主張市場經濟，陳雲同志主張計劃經濟。我如果為了個人升遷，盡可以去支持陳雲同志的計劃經濟，但這與我的改革理念不合。中國好不容易趕上了百年不遇、甚至千年不遇的大好時機。我應當聽從時代的召喚，順應歷史的潮流。”

“官不作也罷了，但是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這便是馬洪對他個人和國家的前途所作的估量。

同時，馬洪也難免不平地想起：“當初我不明不白地從計委出來，難道現在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回去？”

5.2-2 牛黃“吃一塹還不長一智”

幾天後，陳雲再次召見馬洪。馬洪明確地向他表示，光搞計劃經濟是行不通的。

陳雲對馬洪的態度不是完全沒有預料，但內心仍然失望：“改革後有些人出去轉了幾天，回來就說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中國不如外國。這種人是趕時髦的‘風派’，我看不起這種人。”

陳雲知道鄧小平重視馬洪。雖然馬洪連“副字號”都不是，但得到特許，能像中顧委的薄一波和書記處的胡啓立一樣，參加國務院的國務會議。陳雲也瞭解，馬洪與趙紫陽走得很近，兩人同出同入，配合默契。“顯然，馬洪的尾巴又翹起來了……”面對這高個紅臉的北方漢子，陳雲勾起了不愉快的回憶：“記得從前有一位，也是紅臉魁梧的北方漢子，同樣地不聽我的勸、同樣地使犍牛脾氣。而眼前的這一位，吃了一塹，還不長一智！”

於是陳雲伸出他尖尖的手指，指向馬洪：

“牛黃啊牛黃，你要是當初學我，還能落上這‘五虎將’？！”

遂把手邊的茶杯往旁邊重重一推，引得秘書和特護推門探望。

默默聽著陳雲的訓斥，馬洪心頭好像鑄了鉛。

陳雲畢竟涵養深，不多時已然斂住了氣，與馬洪冷淡而客氣地結束了談話。從此也算了結了他與馬洪之間相當特殊的關係。

馬洪走後，陳雲又陷入沈思：

“犯不著動氣。多少人比自己身體好，卻走得早，就是因為想不開，想不開呀。不通則痛，則病。前幾年我得了癌症，泰然處之，病反倒給控制了……”

“回想從延安到現在，我一直對馬洪另眼相看。我小時候也是家裡窮，很早就出來打工，邊工作邊學習，後來參加了革命。所以，我當年就對馬洪有好感，抱期望，打算作為苗子予以培養。但從今天的情況看起來，人家是另攀高枝了……”

“有些人就是沈不住氣，過了多半輩子，仍然不懂政治，而且

不識抬舉，所以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想到此，陳雲依照他的老習慣，又閉目養起神來。

5.2-3 鄧小平：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他

幾個月後，當鄧小平會見印度貴賓時，讓馬洪作陪。接見前，馬洪先到會客廳等候，不想鄧小平也先期到達。鄧小平個子雖小，而脖頸粗壯，給人一種頭大的印象，所以，鄧看上去個矮但人不小。他一進門便開玩笑：“‘五虎上將’來了！”話又點到，又使氣氛隨便。鄧小平對馬洪說：“你和我一樣，都是幾上幾下。你當初落馬，這次又不能上得更高，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他……”說著指了指後面。

馬洪立即心知肚明。無論如何，至少上面給自己挑明了。

哪裡的政治風向標和氣壓計也不如北京的靈敏。果然，在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當趙紫陽提議讓馬洪當副總理時，雖然得到薄一波和鄧力群的支持，卻遭到同為“改革派”的萬里的極力反對：“像馬洪有那樣‘問題’的人，能當上個正部級就很可以了。”當然，萬里如此做，與黨內的種種背景相關。絕的卻是，在那次開完書記處會議之後的當天，萬里拉上不知情而且不會打高爾夫球的馬洪去打高爾夫球……總之，往後諸如此類的提議，像安排為國務院秘書長、到上海當第一把手……也跟著作罷。不久，馬洪又因“對社科院內的‘自由化’處理不得力”，被免去社科院院長的

職務。倒是趙紫陽，把馬洪召回國務院，讓他把幾個中心合併，組建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作為國務院的經濟智囊。

盼春每探枝頭，
惜春又怕花開早。
背陰地，向陽坡，
風刀霜劍，雨細風和。
總非人奈何。
風雨過，花殘落。
有待來年春光燦。
栽樹護苗不辛苦。
縱使天公不作美，
且喜幹枝猶健碩。

5.2-4 馬洪到底是馬洪

一些知情人包括筆者在內，都認為馬洪太傻，至少是過於老實。“高崗事件”時，他沒有出賣上級，也沒有連累同志，只承認自己“自覺反黨”。據有機會查閱當年歷史檔案的人士曾作如此評論：“一邊看材料，一邊真替馬洪著急，別人都痛痛快快地交待了，只有他吞吞吐吐。”因此，馬洪落得個“五虎上將”之一，一輩子都背黑鍋。想一想連小平那樣硬氣的人物，都得忍氣吞聲地發

誓“永不翻案”，才得以出山……何況，馬洪從來沒有全盤否定過“計劃經濟”，後來還適時地支持過採用國家干預，來對付通貨膨脹。由此可見，馬洪是個線性思維、不善於轉彎子的人。筆者不由得聯想起“五虎上將”的另一員郭峰，對高崗、張秀山執行毛澤東命令，為劉少奇翻查敵偽檔案所發的議論：“到底是陝北山溝裡出來的土包子，人家讓你去查，你就去！？”

對於“高崗事件”，以及對於83年這次與陳雲的晤談，筆者沒有關於馬洪感想的第一手資料。所以，筆者在這裡只好作一些猜測，和粗陋的分析：

馬洪來自中國北方偏遠的農村，出生於一個貧苦的家庭。在參加革命以前，他只受過農村私塾的教育。當年的私塾，傳授的是儒家思想。從正面意義上講，其倫理道德的核心是愛國家、愛人民，做人要忠誠老實。從負面意義上講，是宣揚愚忠愚孝，維護地主官僚階級對廣大人民的統治。

馬洪青少年時，國家內憂外患，他投身革命，去了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軍。當時他不只歷史清白，並且思想單純，是一張沒有負擔、好畫最新最美圖畫的白紙。比起那些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裡長大的青年們而言，馬洪對階級社會的複雜性、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見識大大欠缺。且不說在這人群裡面，不少人早具有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的意識和相應的社會經驗（此處並無褒貶之意）。

雖然隨著閱歷的增長，尤其他本人坎坷的經歷，馬洪對黨內鬥爭或許多少補了課。但正如毛主席所說，“在階級社會裡，各

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由於馬洪的出身，所以他不忘老本，始終關心人民的疾苦。而兒時所接受的孔孟之道，青年時聆聽的共產黨的教導，使得他始終不渝地憂國憂民，說得上是“精忠報國”。

又如毛主席所言，“在革命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過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抗戰時期，是一個歷史的非常時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由於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當時不少愛國青年只因“歷史的誤會”而加入共產黨。解放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和後來的“八九”，使得其中一些人“與時共進”，最終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了。而馬洪不是其中的一個，他咬著牙沒有離隊。

綜合現有的材料，筆者發現馬洪堅決擁護經濟改革，大力鼓吹“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尊重價值規律；而在政治改革方面，他贊同“行政體制改革”；由於戈爾巴喬夫以及葉利欽的所作所為，使原蘇聯全盤瓦解、江河日下，不僅社會主義制度消亡，國家民族也分崩離析，又不得不讓馬洪倍加警醒，對如何政改慎之又慎。當然，這並不能說明馬洪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別的想法。是不是因為“高崗事件”的陰影一直罩在馬洪頭上，阻止他暢所欲言，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第六章

改革(下)



6.1 不求名但求成功業

兩耳盡聞天下事，實踐聯繫聖賢書。
無論主公張王李，平生本意在報國。

6.1-1 “馬不停蹄”

得知由於高崗的前科等緣故，黨內元老決意不再重用自己，馬洪明白他個人的前景有限，心中不免遺憾。主要的遺憾是，對國民經濟的許多宏大高遠的設想，都不那麼容易實現了。但是，馬洪並不因為境遇蹉跎而氣餒。比起當初的一落千丈、背上黑鍋，還有彭真等輩揪住不放，現在畢竟好多了。雖然天地不如預想的寬闊，但搞宏觀經濟決策，畢竟算個行家裡手。不求名但求成功業。無非是功勞記在別人頭上，沒有名分而已，幾十年來一直如

此，也算不得什麼新鮮事了。

自兒時起，儘管天資聰穎，可由於家境貧寒不能入學，馬洪從人生的起點便處於劣勢。沒有天賜的好運，又沒有隨遇而安的性情，他未曾循規蹈矩，四平八穩，走常人的老路。他自信，通過勤奮的努力，他能夠脫穎而出。處於下風，其實激發了他人生的志氣和骨氣；而從來就不屬於主流派，又使他習慣於異軍突起。

然而，高崗事件到底不同，宛如泰山壓頂。光是才能不夠了，更需要毅力、智慧和勇氣，得長年累月地走鋼絲，還得鋌而走險。高崗事件後，馬洪展開了他持續終生與厄運的鏖戰：永遠處於下風、處於劣勢，永遠是一場爬坡的戰鬥，但他不能停歇，也不願停歇。而與其他堅忍不拔、埋頭苦幹的戰士們不盡相同的卻是，人生的坎坷，使常馬洪抱有機遇難得的意識，所以，即使是縮水的機會，他也十分珍惜。人生苦短，機不可失，每一次出征都可能會是最後的一搏，每一次戰鬥他都準備好要從頭越。好在趙紫陽為人爽快，許多想法也投合。於是，馬洪一如既往，以他超人的效率為國家和人民繼續盡忠效力。

有時筆者不禁想，馬洪幾十年罪名如同重石，始終不得正名，卻幾十年如一日，不管有什麼挫折和打擊，每天早上爬起來，照樣精神飽滿、一腔熱情地投身工作，公而忘私——這需要多大的潛力，多強的意念，多陽光的心態，多坦蕩寬廣的襟懷！

本章以下將按時間順序，敘述馬洪如何這樣馬不停蹄，日夜兼程，不懈地推動中國改革的進程。

說到搞經濟宏觀規劃，馬洪有豐富的經驗。早在1949年在

東北局工作時期，張聞天指導馬洪，根據當時東北解放區的經濟大環境，曾將其經濟劃分為五種成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秋林經濟”。此報告上達中央後，得到毛澤東的賞識，除了把其中“秋林公司方式”改成全國通用的“公私合營的中小企業方式”以外，此經濟劃分方式一直沿用到“文革”前。後來在60年代初，馬洪曾參與《七十條》的定稿和主持《企業管理》的成書，也都屬於“文革”前社會主義建設的宏觀思維與規劃。

而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原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為了實現這個轉變，中國當時需要解決幾個重大的問題：經濟結構、理論、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中央決定由于光遠主持理論研究，張勁夫主持體制改革，汪道涵主持對外開放，馬洪則受命研究結構問題。

1979年，建國30週年時，馬洪在《紅旗》雜誌第10期上發表文章，呼籲擴大企業自主權。

1980年，馬洪和他的同志兼得力助手孫尚清，主編了《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該書是進入改革後，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一本影響很大的書，被海外人士稱之為“中國（大陸）第一本用數字說經濟的書”，在蘇、美分別用俄、英文出版。當時的蘇聯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後成為俄羅斯總理）的普列馬科夫來華訪問時，曾專就結構問題而拜訪了馬洪。

1981年，受趙紫陽委託，他主持在上海建立寶山鋼鐵公司的

論證。

1982年4月，馬洪在親自調研的基礎上，制定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五年發展規劃》，國家遂決定建設以山西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生物工程的實用化，新材料、新能源的進展，標誌著世界範圍新技術革命的到來，這在當時西方稱之為“第三次浪潮”。這種新型的產業革命，將會給全球帶來巨大的經濟社會後果。改革後振興的中國，對此應有相應的對策。1983年10月，趙紫陽召開了一個有關的會議，並指定馬洪組織專家來進行研討，使得我國不失時機，迎頭趕上。由此，馬洪先後主持召開了三次大會，與決策人員以及專家們共同研討後，提出了我國重點的發展方向：1，發展新興產業，以信息技術為主，推廣微電子技術和微機。2，應用新技術，加速舊產業的改造。3，“有限目標、突出重點”，不要追求過去那種“全面趕超”、“自成體系”，要有所不為而有為，集中精力發展重點等，以此來縮小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加強我國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力。

1983年12月，馬洪主持社科院工經所編寫了《中國工業經濟管理》，強調了經濟效益。此書成為改革前期我國各大學講授工業經濟管理的代表性教材。

1984年，與他的同志、工經所所長蔣一葦等人一起，馬洪組織舉辦了“刊授大學”，共四期，為工業企業中有工作經驗而缺乏理論知識的幹部，提供了學習和深造的機會，更為他們日後的發展創

造了條件。全國有近四萬人參加，獲得教委頒發的畢業證書。這批人在改革中發揮了承前啓後的作用。

1984年7月，宋平和馬洪主持制定了《上海經濟發展的宏觀戰略》。

1984年11月，馬洪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一文，其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已在有關理論突破和他給趙紫陽寫信的章節中詳述。

同年12月，馬洪著書《經濟結構與經濟管理》，在書中他強調要有兩個轉變：過去那種大鋪攤子、大上項目，以大量消耗資源和勞動力，片面追求數量和速度的粗放型方式要改變；他呼籲，要將其轉化為優化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轉化到追求效益和質量的集約型方式上來。特別是要由從前商品短缺的賣方市場，逐步轉化為供略大於求、或供求平衡的買方市場。只有這樣，經濟增長才有效益，增長才有可能持續。

1985年5月，馬洪主持完成了《2000年的中國》的國家項目。

1985年6月，馬洪創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是中國第一個智庫。

在八十年代中，他指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心城市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戰略作規劃。其中，他主持和參與關於改革的戰略性研討還包括：

“七省市座談會”，討論對少數民族和落後地區（雲南，貴州，廣西，重慶等）的開發。考慮到當時東南亞條約國家對我國的包圍，此策略的目標在於發展我國西南，打開東南亞的缺口。這個

策略後來漸次發展成為“全方位開放”，“沿邊界開放”：如滿洲里對蘇聯、延邊對朝鮮、西雙版納對緬甸、北海對越南等等。而由於當時蘇聯與我國原有的貿易關係，在實施中以對蘇俄的開放率先。

“環渤海經濟協作區”，像遼寧、河北、吉林、山東各省，既有東北的鋼鐵、化工等重工業為後盾，又可利用濱臨渤海、靠近日韓的外貿優勢，彼此進行協作，搞互補而不搞重復，不搞“小而全”。但在實施時，“環”的效益發揮得不夠理想，比如在用水問題上，北京-天津-唐山之間的關係，就是以大壓小。

“沿海長江‘T’字型開放”：沿海自然外向；而長江經濟帶，則要充分利用河運的低成本。上海和重慶，是這長江一條龍的龍頭和龍尾，應當發揮其中心城市的優勢，來建立周邊的經濟網絡。這種發展地區經濟的想法，是多次考察日本後得到的啟發。

“東北老區重工業的恢復和開發”：由於有遼南地區這樣一個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地帶，馬洪提議，應當從遼寧、東北、全國甚至世界的角度來看問題。遼南地區，是我國的國寶，是世界上著名的工業基地之一，也是為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提供重要物質基礎的生產基地。它有四大產業，第一是機械製造業，佔全國第一位；第二是鋼鐵工業，鋼產量約佔全國的 1/5；第三是石油化工；第四是建築材料。這樣的地區經濟在我國沒有別處可以匹敵。而且，這個工業老區曾為我國的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和“一五”計劃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不能讓這個地區停滯不前，無以為繼，而應當創造有利條件，使它得到振興。可惜長期以來重視不夠，所以老區

的恢復和開發起步比較遲，要等到胡錦濤主政之後。

80年代中期，為使石油資源能夠綜合利用，馬洪向趙紫陽建議把石油部和化工部一些企業分離出來成立石化總公司，把煉油和化工結合在一起，以利於節省資源和解決各自為政的矛盾。國務院採納了這一建議。

1987年4月，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馬洪提出對通貨膨脹的警告，遭到趙紫陽的駁斥。

1988年2月，國務院決定設立海南省，使之成為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1988年4月，馬洪組織有關人員研究了建省問題。

1988年5月，馬洪向國務院提出，“在深圳移植香港經濟法規和改革政府管理體制，通過消化、創新，逐步建立起維護商品經濟新秩序的法規體系，不僅對深圳很有必要，而且對全國也是很有益的”。“在深圳移植香港的經濟法規，需要從兩方面進行工作：一方面以深圳特區政府為主，吸收有關法律專家參加，組成研究小組，具體研究實施的步驟和辦法”，“另一方面，要根據世界各國特區普遍採用的體制，確立深圳特區直接對國務院負責的行政體制，相應地給予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在符合憲法的總原則下，允許突破一般法規，以有利於移植香港經濟法規和改革政府管理體制的工作。”

20多年來，把香港作為改革開放的參照系，深圳大膽借鑒香港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如引進建築工程招標、實行土地批租等具體做法，促進了深圳建築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形成；引進國際通行的會計制度和國民經濟核算制度，又加強了特區的立法、規範

了市場行為、改善了深圳政府對經濟的管理。

1988年，馬洪陪同鄧小平會見“9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與會者。當時鄧小平說：“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內地還要搞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天津是北方的經濟中心，也是國際性的港口城市。馬洪認為，從客觀的有利條件來講，南有上海，整個長江流域是它的腹地；北有天津，廣大的“三北”（華北、東北、西北）是它的腹地。但改革以來，南方發展得快，中部不如南部，而北部還不如中部，主要原因是開放程度的差異。馬洪強調，所謂開放，包括對外、對內兩個開放。京津塘三大城市“金三角”的優勢，應當充分發揮，它們之間的經濟應當有機地結合起來。

馬洪有關遠景規劃的建言獻策，隨著改革的深入，有的已經實現，有的還在逐步推行。多年後，當筆者通讀馬洪文集12卷，其思維的宏大，行文之急切，好似當年沙場上的金戈鐵馬的撞擊之聲，至今仍在耳邊震蕩。而每當國家有事、風雲突變之時，筆者更理解到馬洪為什麼總是只爭朝夕、日夜兼程，總是想把那些被荒廢的寶貴光陰儘量補救回來。

6.1-2 反對意見更發人深省

而今作歷史的回顧，筆者發現，馬洪不但支持和擁護一些事物，同時也反對和抵制一些事物。雖然後者往往被人忽略，但往

往更發人深省。

比如，八十年代初，趙紫陽曾指派馬洪主持對寶鋼是否上馬的論證。通過聽取各方領導的專家的意見，馬洪認為，鑒於我國當時改革才剛剛起步，資金匱乏，應當把有限的資金投放於對我國固有企業如鞍鋼、武鋼和攀鋼的技術改造，而不應著眼於大量購買外國外國的成套設備。同其他專家、學者和幹部一起，他還對寶鋼的選址，對其地基的鞏固、港口設備、材料的供應，以及作為重工業對上海作為日後一個國際大都市的環保等問題提出質疑。那是1980年代初，日本的鋼鐵工業面臨著國內外電子等“朝陽工業”的無情競爭，力圖將其鋼鐵工業的陳舊設備連同高耗能、高污染，作為包袱甩給中國，並從中賺取一筆大錢。而中國買下日本的過時設備，還是只能生產粗質鋼材，優質鋼仍需要用高價從外國進口。因此，論證會開得很激烈，寶鋼也曾經下馬。在論證中，馬洪認為這裡涉及一個原則問題：中國究竟應當花錢買一個洋的現代化，還是在國有企業固有的基礎上進行技術改造？他非常贊同著名的冶金專家周傳典在寶鋼問題上的見解。然而，由於國家當時已經對寶鋼投資甚巨，鄧小平拍板還是硬著頭皮搞下去。

再比如，八十年代中，馬洪大力向中央倡議，利用上海外向的傳統和第三產業的優勢，開發浦東特區。浦東的日新月異，如今令人稱道。可當初它的開發，卻頗有阻力。黨內的一些元老，對於開發深圳，本已極為不滿，認為是“辦血汗工廠，回到半殖民地”。而開發浦東，更是把這“資本主義”搞到家門口來了。浦東的真正

開發，要等到九十年代朱鎔基當了總理之後。

馬洪也曾反對過早地與跨國公司合資、發展轎車製造業，理由是當時我國的工業基礎還不夠。尖端技術、核心技術人家並不轉讓給我們，我們自己不能生產外國汽車的發動機，甚至不能生產輪胎，只能給人家的汽車敲殼子，結果為人家平台服務，淪為外商的原料加工廠。（痛心的對比是，五十年代，當日本人還在拆美國人的摩托車、琢磨其零部件時，我們已經生產出解放牌汽車了。）而且，我國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尚與美國式的汽車社會相去甚遠。如果國內生產大量的轎車，國家不但將浪費巨額外匯用以購油，百姓又將消耗大量能源用以消費，在當時中國經濟的起步時期，這樣做是否得當？且不說隨之帶來的空氣污染、生態危害和交通的擁塞。

在“中國轎車”論證期間，馬洪走訪了二汽附近的農村。他訪問的一戶農家，兄弟二人輪流出來接待，令馬洪感覺奇怪。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兄弟倆不得不共用一條褲子。解放已近40年了，農民還如此困苦，馬洪十分慚愧。他自己也來自農村，出身窮苦，所以對老鄉們的境況有體會。馬洪痛感改革必須推進，並且必須給老百姓帶來實惠。

1987年5月，馬洪組織在湖北二汽召開了“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戰略討論會”，會議的核心論題是：中國當時適合發展轎車嗎？到會的有一汽、二汽、一機部以及國家各部委的領導和專家200多人。在會上大家爭相發言，有時爭得不可開交，馬洪表達了以上的反對和保留的意見。然而，經過會議統一思想後，馬洪成為了

轎車工業的積極支持者。他將報告《關於發展我國汽車工業的建議》，以文件的形式遞交國務院。姚依林召開了專門會議，李鵬、胡啓立出席，會上再次討論熱烈。姚最後宣布，中央決定，中國要發展自己的轎車工業。

從這些例子可看出，馬洪的意見建議，有的被採納，而有的意見建議，儘管他和別的一些同志向中央匯報情況，力陳弊病，由於一部分領導人持有不同意見，未予採納。在 1987 年的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馬洪對當時的通貨膨脹提出警告，卻遭到駁斥便為一例。

6.1-3 外事活動軼聞多

馬洪在 80-90 年代，也做了不少外事方面的工作，他的足跡遍及五大洲，包括如今人們常常提起的“金磚國家”（巴西、印度、南非、俄國）；還包括通過民間接觸，促進了中韓建交。他在國外的幾件軼聞值得一提；

馬洪從唐寧街 10 號出來，忽覺腿一軟，被送行的撒切爾夫人扶了一把。從那以後，他才開始發現自己患有帕金森氏綜合症。

訪問印度時，馬洪拜會了英·甘地夫人。他剛回國不過一週，甘地夫人遇刺。他是最後一位見到這位印度總理的中國高級官員。

他參與創辦了“中日知識交流會”，任會長，谷牧任顧問。此

會雖然是一個民間組織，但他每每率領十幾個部長或省長，出訪一衣帶水的日本，被日相接見，歷時達 20 年之久。連朱鎔基當年都參加過兩次這種活動。由於被日方高度重視，馬洪特在日本皇宮侍衛長的陪同下，參觀了天皇的寢宮。

馬洪曾去俄國，與俄總理會晤。此人在中國改革初期，曾專就經濟結構問題而拜訪過馬洪。江澤民主政後，他率領俄國 50 多個大企業家的代表團訪華攬生意。

由於心態的開放和包容，由於見多識廣，各國文化的差異使馬洪看到，不同民族對人生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比如，在中國的“花開能有幾時紅”，在日本卻是“願像櫻花在晴空間凋落”，而在俄羅斯則“人生就是一把火……”



馬洪, 198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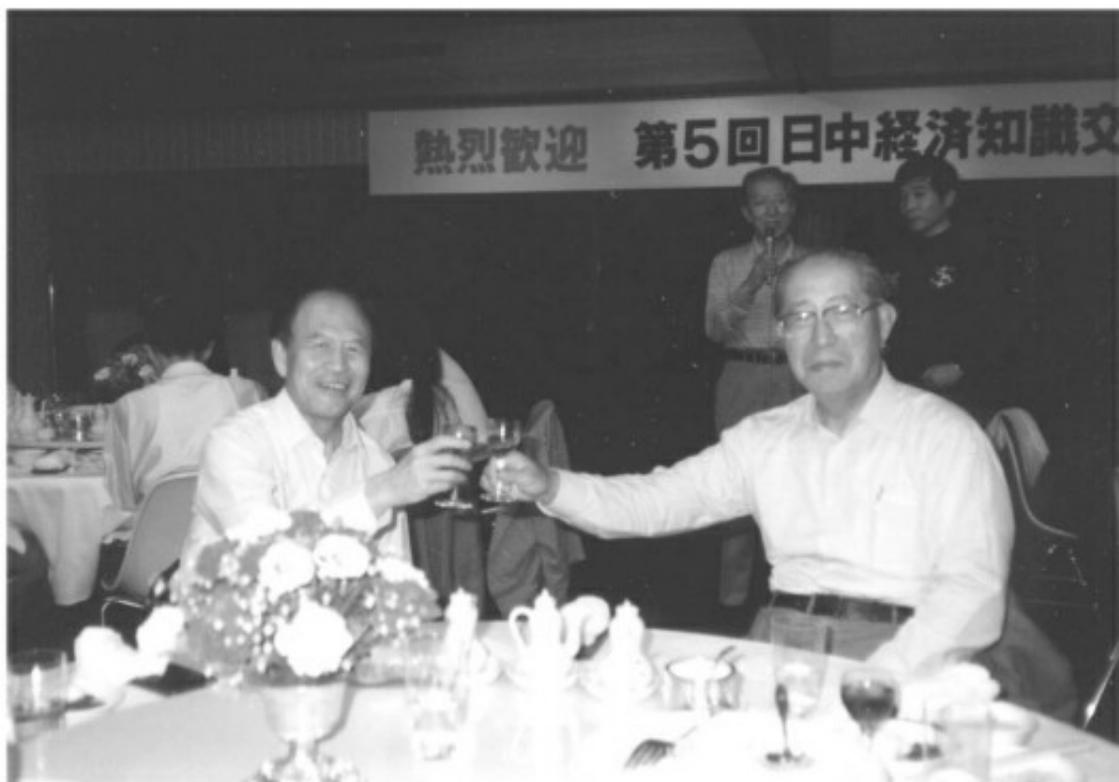
馬洪, 1985 年



馬洪，1986年



馬洪在北戴河游泳，1988年。



“中日知識交流會”與日本大來前外相合影，1985年。



與李鵬到瑞士參加達沃斯世界論壇時合影，1989年12月。

6.2 “通貨膨脹”大爭議

險遠至者少，夷近游者眾。

秋聲擊金鐵，秋心動海潮。

6.2-1 “通貨膨脹無害論”

到了1987年，改革開放已將近10年，國民經濟起色很大，有些部門甚至出現了經濟過熱的現象。對於下一步如何走，高層又有爭議。鄧小平認為步子太慢，陳雲則認為步子太快。當其時，國務院技術中心的青年幹部田源，寫了一篇有關“通貨膨脹無害論”的文章，很投合改革陣營裡激進派的口味。

“通貨膨脹無害論”，是以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為基礎的。佛氏的基本主張是：減少政府的干預，讓市場機制更自由地發揮作用。在20世紀中葉的西方經濟理論界，這是對主流派凱恩斯主義提出的挑戰。對於1960年代後失去活力的西方經濟，佛氏理論或許是一劑合理的良藥，可拿到發展中國家的改革上，則不僅水土不服，而且難免帶有政治動機。佛氏曾講過“蛇的故事”：下狠勁一刀砍蛇，蛇雖遭劇痛，但尚存活；若不得力地連砍數刀，蛇反會因傷致死。於是這著名的“長痛不如短痛”的

說法，一時間成為中國激進派的口頭禪。後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薩克斯，又根據這個故事，為蘇東各國國家體制改革設計了“休克療法”，即：迅速地同時推進市場自由化與資本私有化的進程，讓舊體制“休克”，而讓新體制得到生存發展的機會。

6.2-2 馬洪警惕經濟過熱

1983年，針對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西方經濟模式，馬洪在《宏觀經濟的研究要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一文中指出：“有些外國人做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否適合中國的實際，很值得懷疑。當然他們也付出不少的勞動，值得我們參考。我們應當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按照我國的實際情況，編製出我們自己的宏觀經濟模型來。”

對於改革開放經濟起飛之後，我國在基本建設上出現的“過熱”現象，馬洪在同年發表的《關於目前基本建設規模問題》一文中提醒：

投資規模過大，帶來許多問題：1，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和增加額，都大大超過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和增加額；2，基本建設投資增長速度和增加額，大大超過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和增加額；3，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速度……等等。我國基本建設的三條基本政策是：1，不能

靠財政赤字來搞基本建設；2，基本的原材料和設備不能有大的缺口；3，不能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去搞基本建設。

在“六五”計劃期間，我國曾連續幾年出現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尤其在1984-1986年增勢很猛。“六五”計劃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投資3600億元，實際完成5330億元，超過計劃48%。1984-1986年，全國投資平均每年增加27.5%。到了1985年底，在基本建設項目有7萬多個，在建規模達5300億元，已有1/3以上的缺口，而1986年1-6月新開工的基建項目又有11000個，缺口更大。消費基金在整個“六五”期間年增691億元，平均年增17.4%。1984-1986年超分配中靠發票子彌補的分別佔92%、61%和44%。貨幣發行量年增25.7%。貨幣發行量過多，又導致物價增長過猛，這些都大大超過工農業總產值年增13.7%，國民收入年增11%的增幅。

馬洪對這一情況深感憂慮，於1986年7月18日給趙紫陽寫了一份報告，分析了過熱的表現、原因和危害，並提出了七條建議：

1，鑒於“七五”計劃安排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已經很大，在計劃之外又安排上新項目，如非安排不可，必須相應地削減原計劃以內的項目；

2，目前國民收入的積累率高達33.7%，長此下去會產生許多弊端，應逐步調整到30%左右；

3，擠佔流動資金擴大基本建設的辦法，不僅使基本建設規模膨脹，而且阻礙商品流動，因此，要適當提高流動資金在積累總

額中的比重，其份額不能低於過去 30% 的比例。同時，要嚴禁擠佔流動資金去搞建設；

4, 適當安排國家儲備基金，用以進行改革和作為對付各種不測的後備；

5, 在固定資產投資中，要適當提高技術改造資金的比重，並且應嚴禁挪用技術改造資金去搞新的基本建設；

6, 加強技術改造資金的管理，企業的折舊基金和生產發展基金專戶存入建設銀行，加強監督，防止流失。同時，提高折舊基金和生產發展基金的存款利率，以便在新、老企業間調劑使用；

7, 一切體制改革方案都應當有利於遏制投資的膨脹，而不是相反。

然而，這一意見與當時有的領導的看法不一致，故未得到及時的、應有的重視。到了 1987 年，投資過大、需求失控等不利局面，愈演愈烈，馬洪對此很警覺。所以，當那位青年幹部寫了“通貨膨脹無害論”，馬洪批評了他，並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談到“一些年輕人鼓吹‘通膨無害’，我以為不妥”。趙批了信，並請常務副總理姚依林召集會，聽匯報，讓兩派到會，在會上作爭議。這便是 1987 年 4 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

6.2-3 發言不到一半被趙紫陽打斷

會議在頤年堂舉行。趙紫陽當總理時期，作風比較民主開

放。青年幹部夏天可在中南海裡游泳，冬季可到瀛台溜冰。有些重要的會議，中青年幹部可以參加，在會上暢所欲言。這次會議，一些持不同意見的青年幹部已準備了材料，打算到會上作爭議。臨開會時，會議卻限定只有部長以上的人員才能參加。姚依林又突然說他不作匯報了，讓馬洪代其發言。

姚的稿子本來就是馬洪起草的，於是馬洪在會上大致講了以下的觀點：

- 1, 在國民經濟的“助跑期”，應為日後高速度發展準備好基本條件，而不應把重心放到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
- 2, 在打基礎的階段，應適當節制消費增長；
- 3, 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全程中，要經常保持運行中的整體有效性，這才能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的發展；

馬洪還談到，自1984年起，某些人開始頭腦發熱，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一浪高過一浪；這樣積累與消費同時誇大，出現了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而“超分配”與“超高速”又互相促進，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的穩步進行，不僅使經濟結構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本身的順利進行……

不料，馬洪的發言還不到一半，就被趙紫陽打斷。趙起身，滔滔不絕地講了半個多小時，並且發了脾氣。

他指責馬洪的報告“把經濟形勢說得‘險象環生，一團漆黑’，問題還弄不清楚就產生悲觀情緒，表明一部分同志對改革動搖”。趙說：“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不過一二百個億，用不著驚慌

失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後不要再用。”他認為，“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基本是幻想。等待出現了寬鬆的環境才改革是不現實的，不改革怎麼能出現寬鬆的局面呢？”趙強調深化改革就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紫陽如此說，其他人的發言自然“一邊倒”了。

會議結束，馬洪進入他的助手孫尚清的辦公室。“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傷心的是，趙紫陽是他改革中並肩戰鬥的同志，怎麼到頭來連這點起碼的理解都沒有？作為國務院經濟智囊團的首腦，馬洪自1985年以來，再三地向趙紫陽提醒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危險。趙紫陽不是一個不懂經濟的人，當然明瞭事態的嚴重性，內心也未必不贊同馬洪的見解；可現在出於某種原因，當眾翻臉不認人。雖然馬洪曾見過被搞突然襲擊的世面，也知道把政策上的不同意見政治化是某些人慣用的手法，但趙紫陽竟然如此做，還是令馬洪失望。

會後，趙紫陽本人給馬洪的辦公室去了多次電話而無人接，最後在他的助手孫尚清的辦公室裡找到了他，安慰道：“你不要介意，我是有感而發。話說得有些衝，因為我和你是老熟人了。其實我的話是說給別人聽的。”馬洪說：“你的一些想法我不是不理解，但目前的政治環境不允許。”對於類似情況，杜潤生也曾經說過：這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

馬洪過後給趙紫陽寫了封短信，作為檢討，說自己的發言“不適當，誇大了通貨膨脹的危害”。

可趙紫陽並沒有消除心中的惱怒，他當晚把資深老經濟學家

薛暮橋召入家中，想讓他接替馬洪。薛沈吟許久之後，回答：“我其實同意馬洪的意見。”

趙紫陽顯然餘怒未息，籌備十三大時，不打招呼，便把馬洪的名字從名單上拿了下來。事後經人提醒，趙意識到有卸磨殺驢、雞腸小肚之嫌，方才從國務院給馬洪補了一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的頭銜。

但從此以後，以馬洪為主的發展研究中心，作為趙紫陽的智囊，作用較前消減。而一群鼓吹“通膨無害”以及其他類似激進主張的精英人士，雖對中國國情和國際大環境缺乏深入瞭解，又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卻在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等人支持下，對趙的影響日大。有的人甚至放言：“通膨有害無害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掌了權。”

趙紫陽本人，則對其它不同意見愈發聽不進去了。遲至 1988 年 5 月，在關於“價格闖關”的會上，他仍非常不滿地說：“經濟學家有個固定公式，速度一快，必定效益不好。為什麼不到大邱莊看看？速度很高，效益也很高……在中國只要速度一掉下來，什麼也幹不成了。”同時，他被那群推銷和崇尚西學的人士包圍著，在政治上越走越遠，認為自己有當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可能。

6.2-4 價格闖關沒闖過

中國那段日子真是多事之秋。1985 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已被高層視為“走過頭”；1986 年開始，地方上出現了學潮，

1987年胡耀邦則因為處理此事手軟而去職，由趙紫陽接替其中共總書記位置。儘管趙並沒有真正的決策權，在國務院實際上又大權旁落，在名義上卻成為了中國的“第一號人物”。

此刻趙紫陽的處境相當微妙。在國內，一方面他推行的改革受到保守派的一貫抵制；另一方面，他還得承受上面來自鄧小平的壓力，和從旁來自改革派內部諸如副總理萬里的競爭。在國際上，趙與鄧小平都生怕中國的改革落到蘇聯和東歐的後面。這些因素迫使趙在言論上更加激進。趙向馬洪提及，他是“有感而發，說給別人聽的”，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這“沛公”似乎還不止一個。但經過權衡利弊，趙決定仍然堅奉鄧小平的旨意，不計通貨膨脹的後果，加速改革的步伐。

1988年6月，鄧小平幾次接見外賓時反復宣布，中國政府已決定“價格闖關”。鄧顯然認為改革的成敗在此一舉；而以他的威望和權力，這關闖得過去，翻不了天。但事與願違，當政府宣布開放物價以後，社會對通膨的預期進一步加強，引起搶購風，造成全國性的恐慌和經濟政治上的混亂。

到了同年9月，趙紫陽會見外賓時不得不說：“改革出了難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並承認“通膨的原因是沒有解決企業和地方部門的自我約束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地方消耗基金增長過快，而導致了貨幣供應量過多”。同年12月，趙又向薛暮橋、劉國光、吳敬璉承認：“看來這一年來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遺憾的是，治理通膨的最佳時機已錯過。儘管“價格闖關”戛然而止，在社會上已激起強烈的不

滿。

中國乃一大國，經濟底子薄、歷史久、國情複雜。不幸而有幸地基於這種背景，中國的改革，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與前蘇聯相比，這不失為實踐中的明智。然而，這種漸進的戰略，與開放後從西方輸入的自由化思潮勢必衝突。解放以後，老百姓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習慣了穩定的物價，對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缺乏心理上的準備和承受能力，容易帶來社會動蕩。儘管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可要把農村“全面承包”的經驗照搬到城市和國企，也給當時的改革增加了額外的難度。總之，當時無論從保守陣營還是改革陣營裡的激進派的角度看，中國的形勢都有某種“一團漆黑，險象環生”的跡象，難怪引起決策人的分歧。而這種高層的政治震蕩，降臨到馬洪身上。

遙想馬洪當年，處於十分微妙的位置上。1987年4月那次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趙紫陽原說讓兩派來爭議，卻在會前臨時縮小了與會者的範圍，說明鄧小平已事先定調，決意加速“價格闖關”，故趙不得不強壓不同意見。

姚依林顯然事先得風，於是把馬洪推到台前。難道馬洪不知其中的利害？但是，馬洪顧全大局，替姚發了言，向趙進言。如此這般，姚的意見表達了，卻避開了刀槍。而馬洪這種為國家盡職的態度，在趙的眼裡，一時間成為“不識時務”，“站錯了隊”，充當了保守派的“炮筒子”。

鄧小平有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至理名言：“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以此推理，不管是陳雲的主張，還是鄧小平

的主張，只要於國於民有利，就是好的主張。1984年9月，馬洪與趙紫陽配合默契，聯手將“商品經濟”寫入黨的決議，是為了中國加大改革的步伐。到了1987年4月，馬、趙對如何改革有分歧，馬洪主張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主張要調放結合、分步實施，不搞一闕而起，是為了保證改革能夠穩步前進。建國以來，我國人民已為領導人氣吞山河似的急功近利，付出過沈重的代價。

這時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欲挽狂瀾於既倒，馬洪授意中心的研究人員，寫了針對“通膨”和“價格闖關”等時弊的分析文章。趙紫陽閱後，從字裡行間識別出馬洪的觀點。趙沈思良久，推窗而嘆：“好久沒讀過這麼好的文章了！”無奈大勢已去。

即便時令不濟，馬洪依舊對經濟改革的長遠規劃做不懈的努力。關於東北老區的規劃即出手於此時。趙紫陽對這個規劃很欣賞，打算讓馬洪署名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由他本人親自寫導言。而隨後發生的“六四”，把事情耽擱下來。

1988年9月，趙紫陽面晤佛利民，當時通貨膨脹已經失控。趙對佛氏說：“要像武侯一樣，‘審時度勢，嚴寬有度’。”假若趙紫陽1987年4月，能想到並頂住壓力，爭取做到這樣，歷史會不會改寫？



馬洪作“山西能源開發”考察期間在山西工礦，1982年。



馬洪作“上海宏觀規劃”期間與時任上海領導江澤民等合影，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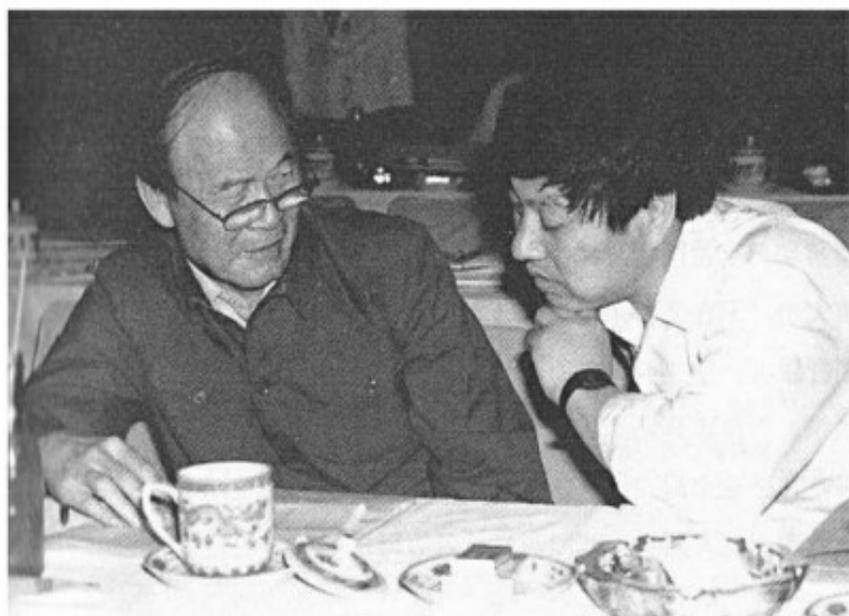
馬洪在三江平原考察, 1986 年。



體改委, 薛暮橋(右四), 季崇威(右一), 攝於中南海紫光閣, 1985 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中南海紫光閣，1985年



馬洪與發展研究中心的魯志強規劃“2000年的中國”，1985年。

6.3 中國第一個智庫

少小不知日方長，向晚更覺惜時光。

六十權當四十作，只緣尚有志未酬。

6.3-1 決策諮詢事業的奠基人

話再說回 1985 年 6 月，國務院決定將其幾個研究機構合併，由馬洪來組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這個中心不是專門作理論研究的學術單位，而是一個為國務院確定大政方略提供依據和建議的諮詢機構。它的工作具有超脫性、超前性、綜合性、中長期性以及較強的可操作性這樣一些特點。

自成立以來，發研中心參與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一系列重大經濟決策的研究論證。有些決策在國務院正式討論前，先由中心召集有關方面討論、研究，然後再拿出初步意見供高層決策時參考。

那時候，發研中心不僅靠自身研究，而更側重組織研究。中心裡的諮詢人員聯繫各部門各研究機構 200 多名專家，組成了專業組。這些專業組經常與中心保持聯繫，參與相關的項目和課題的研究。合作研究的單位有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所

屬的十幾個研究所，所聯繫的單位有各部委的數十家規劃院、設計院。而且，中心還設立了顧問組，聘請社會上知名的科學家和專家提供意見、建議。就這樣，發研中心應運而生，以其精幹的新型組織形式，依靠、整合了中國當時具備的科研力量，靈活地發揮了極高的效能，適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需求。

馬洪認為，搞現代的政策諮詢研究，必須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結合起來。這體現了馬洪對科學技術是社會的第一生產力的認識。在實踐中，馬洪非常重視應用現代的科學研究方法來為決策諮詢服務。

上世紀 80 年代初，發研中心恢復了“文革”期間幾近荒廢的宏觀經濟模型的研究。他領導李伯溪等研究人員設計了模型體系，其中包括遞推規劃、控制論、投入產出、計量經濟、綜合要素分析、系統動力學、兩個部類等模型；他們邀請中心、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天津南開大學機構等參與研究，對各個模型進行了精心設計，既有專門目標又有一定的交叉；遂將各個模型的結果，集中統一分析之後再提出結論。這對研究報告，起到了系統支持的作用，增加了研究的科學性。

同是 80 年代初，馬洪提出把國外的可行性研究引入中國，並結合國情進行改進，形成中國的方法。為此，發研中心組織全國有關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與建設項目參數的研究工作，起草了《可行性研究案例》供有關部門參考。自此，可行性研究就進入我國投資決策體系，後來成為它的經常性的工作。

總之，馬洪帶領中心的研究人員進行了大量的、富有開創性、

涉及面很寬的研究和諮詢。他們的工作主要在這三個方面：

- 一. 關於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研究；
- 二. 為現實的重大經濟決策和政策提供諮詢意見；
- 三. 受國務院委託，研究一些具體的經濟問題。

6.3-2 經濟改革應當突破“條條塊塊”

有關中長期的發展戰略，前面一些章節中，已分別敘述了結構改革、企業自主權、技術改造、《2000 中國》和新技術革命遠景規劃等內容。這裡將集中闡述有關“中心城市”和“區域經濟”這兩個重要的方略。

“經濟活動不應靠行政命令來指揮，而要尊重經濟規律，讓經濟本身的特點及其內外連繫來發揮作用。”所以，經濟改革應當突破部門和行政區劃的“條條塊塊”——這便是馬洪在規劃“中心城市”和“區域經濟”時的主導思想。

馬洪認為，“中心城市”在全國作為經濟的龍頭，要發揮其固有的地理、歷史優勢，只有尊重經濟規律才能發展經濟。對於中心城市的發展戰略，馬洪具體分析了深圳特區的示範作用，大連背靠遼南工業基地、東鄰日韓的地理優勢，廣州毗鄰香港、擁有大量僑資的特點，但尤其強調了上海作為通商口岸、金融中心在全國和國際上的地位。本文“中心城市”的方略以上海為例。

對於“區域經濟”，馬洪特別注意因地制宜，尤其是對偏遠、

落後地區，他強調趨利避害，揚長避短，但仍要尊重經濟規律來發展當地的經濟。像山西，他主張不必千篇一律向以貿易為主的東南省市看齊，也不必率先一味追求全面發展，而應優先發揮煤多的地利，通過挖掘煤炭的潛力，來帶動全省其他產業日後的發展。像大西南，他在闡述其優勢和劣勢之後，對比中國東、西兩部的差異，找出互補和轉化的方案。像隴蘭經濟帶，他聯繫長江經濟帶，談到一南一北，一水一陸，是貫通我國經濟的兩條大動脈，並進一步指出隴蘭經濟帶成為新亞歐大陸橋的前景及其戰略意義。像“環渤海”，他提出遼寧、山東、河北具有出海口，依近日韓，也可以利用這個優勢，建立像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那樣的經濟協作區。“區域經濟”的方略，本文以山西的能源開發為例。

馬洪當年的設想，許多在今天已經成為常識或者現實。可當年，“大而全”、“小而全”以及按行政（即“條條”，如從中央到地方的工業部門、農業部門、輕工業部、外貿部門等等）、區域（即“塊塊”，如大區、省、專區、市、縣等等）分割經濟的教條，是觸犯不得的聖經、聖旨。如果提出異議，就好像從老虎嘴上拔毛，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忌諱，又會觸犯某些集團或者個人的既得利益。正如馬洪晚年所說：現在改革已成為很時髦的事了，當年還不知道是不是要掉腦袋呢。

1, 上海的宏觀規劃(中心城市):

1984年7月，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和社科院院長馬洪一起主持制定了上海經濟發展的宏觀規劃。

歷史上，上海是作為一個通商口岸發展起來的，在此基礎上，逐漸成為了國內外的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和輕工業中心。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使上海喪失了對外開放門戶的地位；而國內政策的偏差，照搬蘇聯模式，用行政層次和行政區劃來組織經濟，條塊分割，自成體系，更使得企業間的橫向聯繫被割斷，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被排斥，導致了上海的多功能的經濟能力日漸萎縮。同時，上海雖作為全國最大的直轄市，市政府的機動權力卻很小；多年來財政上對上海實行統收統支的辦法，又使得地方留用的收入短缺。所以，為了恢復上海作為我國對外開放最重要門戶的地位，為了使上海能夠早日振興，無論是行政上還是財政上，都需要給上海大大鬆綁。

現實中，考慮到上海的綜合經濟效益比全國的平均水平高，例如它的勞動生產率和投資淨產值約比全國的高出一倍左右，如把資金投放上海，對國家也很有利。據此，該戰略研究提出，幫助上海解決困難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給錢、給物；二是“給政策”。在第一方面，鑒於當時全國財政尚未根本好轉，預算上還有赤字，同時全國各地建設都爭著要錢，中央能給上海的錢畢竟有限。因此，更重要的出路還在於“給政策”：放權，給生財之道，使上海能夠發揮自己的特長，從發展第三產業中找到“活錢”，自養自發。

當時上海每年上交中央財政 150 多億元。馬洪在上海發展戰略中建議，上海可留下 40-50 億元用於本地的發展，這一意見被中央採納。而這一決策，對上海的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該發展戰略還提出，上海的經濟發展要注意外向，要加大第三產業

的力度，並提出建設跨江大橋、發展浦東新區、把上海建成特別市的種種設想。

1986年，國務院為了進一步發揮上海的功能，組成了由中央14個部委、包括銀行在內陣容強大的振興上海的工作組，由馬洪帶隊，赴滬作深入的研討。馬洪在主持工作組活動時，組織專人搜集上海百餘年來發展的歷史資料與數據，來探索上海經濟發展與功能轉變的軌跡。經過反覆討論，馬洪認為，隨著我國經濟市場調節因素對經濟發展促進作用的不斷加大，上海市有必要從單一的老工業基地，向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萬商雲集的多元的國際化大都市轉變，從而明確了振興上海所要求的功能轉變的目標。

然後，馬洪又組織討論實現功能轉變所需要的政策優惠。這由上海市提出要求，同參加工作組的中央各有關部門成員反覆討論協商，來確定優惠政策的目標與逐步實施的方案。其中，最關緊要的是上海市的財政分成比例，因為上海市實現功能轉變所需要花錢的方面很多，在當時實行的財政分灶吃飯包幹體制之下，給上海市財政分成比例增加一些，上海市能辦的事情就多一些。通過多次協商，在當時中央財政也很緊張的狀況下，財政部慷慨應許給上海的財政分成比例翻了一番，由原來的13%增到20%以上，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轉型。

在主持討論時，馬洪並不陷入一般的討價還價，而是組織工作組計算上海經濟發展加快一個百分點時，所能增加的財政收入；又計算在不同狀況下，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幅度，來講清雙贏的道理，從而使財政分成比例這塊當時認為最關鍵而又最難啃

的骨頭，被順利地啃了下來。後來，馬洪在主持對外開放，從沿海擴大到沿邊界全方位開放的課題研究時，也是這樣做的。

2, 山西的能源開發(區域經濟):

1982年4月，馬洪在親自調研的基礎上，主持制定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五年發展規劃》，國家遂決定建設以山西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基地。馬洪認為，把山西建成能源重化工基地，符合山西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因為，山西最大的優勢是煤礦，其他省份都沒有這一優勢。如果當前充分發揮這一優勢，就可以促進山西省經濟日後的全面發展。經濟的全面發展，固然符合人民當前和長遠的利益，而對山西人民來講，把山西建成重化工基地，則是發展山西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怎樣做才能成為重化工基地？這不是一個單一目標，而是一個目標系統。其中，既要以煤炭開發為中心，又要相應地發展與煤緊密相關的電力、煤化工、交通運輸、金屬工業、機械工業等分目標；而農業、輕工業和人民的消費也應包括在內。只有建立了合理的經濟結構，山西的國民經濟才有可能在良性循環的軌道上前進。然而，合理的經濟結構是逐步形成的，要分幾步走，所以要進一步研究山西年產2億噸、3億噸和4億噸煤時不同的結構和對策。

經過科學的論證、策劃和實施，在1985年、1993年、2002年、2004年，山西的原煤產量，先後突破了2億、3億、4億和5億噸大關，佔到全國原煤產量的1/4。至2007年，原煤產量達6.3億噸，為1978年的6倍以上，煤炭出省量增加到5億多噸，煤炭

工業上繳的稅費基金佔全省工業企業的45%以上，繼續發揮著對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和帶動的作用。晉煤工業的快速發展，又帶動了電力、冶金、建材、化工、機電等相關產業，使山西逐漸建立起以煤為基礎的經濟運行體系。而晉煤的開發，也隨之帶動了交通運輸，特別是鐵路、公路大規模的興建，為山西交運網絡的建設創造了良機。山西能源的發展從規劃到實施，都發揮了晉煤固有的優勢，使其成為我國能源的基地；而在晉煤開採、外運的過程中，又加速了山西省整個經濟運行體系的現代化。

某些重大的經濟政策的決策諮詢，有關寶鋼和二汽的論證、深圳如何移植香港的經濟法規以及海南的建省已在本章第一節中涉及。

6.3-3 改革在解決一個個難題中前進

1, 山東城市企業的利潤包幹經濟責任制:

1981年秋，馬洪隨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到山東開會。該省為落實當年財政任務，在城市企業新推行一項重大改革措施：借鑒農村聯產承包制經驗，實行利潤包幹經濟責任制，即企業完成上繳利潤後，餘下的盈利則歸企業所有，正如承包農戶所說“交夠集體的就是自己的”，以此來激勵企業完成國家計劃的積極性。當時中央有關主管部門認為這是一個好經驗，一定會像農村那樣，“一包就靈”。在全國改革大興的風氣下，這種把農村的經驗移植到

城市的呼聲甚高，副總理萬里甚至說這是“抱了一個金娃娃”。於是中央決定當年全國經濟工作會議移師濟南，聽取介紹，在全國推廣。趙紫陽意識到此事關係重大，會後要馬洪留下來作調研。

馬洪隨即帶領幾位同志到山東幾個城市和工礦區，進行比較全面和細緻的實地調查。調查組的馬泉山等同志發現情況並不像省裡領導機關說的那樣，其實財政任務並沒有被真正包住，有的企業明顯留有缺口，有的名包實缺，暗留欠賬。其原因主要是在承包基數上：企業千方百計用隱瞞生產能力、誇大增支減利因素，來討價還價；而在儘量壓低承包基數後，企業又在賬面上做手腳，以暫不列支或暫少列支待攤費用，來虛增利潤、假入庫。這表面上超額完成國家任務，企業可以多提留，“名利雙收”；實際上卻隱藏著一筆筆虧空，會釀成日後的被動。由於城市複雜的企業與農村較簡單的自然經濟有明顯差別，所以城市企業的承包也會與農村的承包大不相同。

回京後，馬洪要調查組每人寫一份報告，特別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把情況如實地反映出來，不必強求一致的看法。調查組中馬泉山提交的主報告，集中反映了對這項改革措施的保留態度，認為對它的利弊得失需要權衡、觀察，不宜過分誇大它的作用而放鬆對經濟的調整與企業內部的管理。鑒於中央財政目前較為困難，報告建議今後應較多重視國家增收減支這一頭，企業提留的增加必須建立在改善經營的基礎上，不能單純在分配上打主意。這顯然與主流意見相左，馬泉山不免有些猶豫。不料，馬洪看過報告後很支持，當即轉呈。他認為，調查研究貴在講真

話，不如實反映情況，就算不上正確的調查研究，更無助於工作的改進。出乎馬泉山意外的是，國務院領導看後批轉有關部門，召開京、津、滬、遼、魯五省市經濟責任制座談會，研究補救辦法，並制定相應文件。趙紫陽事後認為，1981年那次搞的經濟責任制不成功。

2, 晉煤外運：

80年代初，由於改革開放的推動，國民經濟發展迅速，能源成為了“瓶頸”，制約了生產的進一步發展。為解決能源問題，國務院派馬洪主持山西能源開發的論證。但一開始，研究人員把較多的精力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儲量”的問題上，專家之間爭論不休。馬洪聽了幾次討論後，堅決扭轉了這種研究方向。他說，山西的煤炭究竟夠用30年還是50年不要再爭了；關鍵是有了煤，然後就是如何能夠把煤運出來的問題。在馬洪的引導下，論證會抓住了影響全局的關鍵：我國最大的能源是煤礦，最大的煤礦在山西，而問題的癥結卻是晉煤的外運。所以，如果解決了晉煤的外運，我國的能源即能得到保障。

既然解決晉煤的外運是保障我國能源的關鍵，那麼，對於如何外運晉煤，又成為高層領導反覆考慮的問題。於是，某部門專家向國務院提出了管道輸煤的建議，簡言之，就是將晉煤研成粉末，與水混和，製成水煤漿，泵入管道運出山西。當時世界上僅只美國俄亥俄州有幾十公里試驗性的輸煤管道在運行。遵照國務院領導指示，馬洪領導中心諮詢人員開展了晉煤外運管道輸煤方

案的論證，組織十多個部委的專家學者進行了反覆的研討。為掌握第一手資料，王慧炯、于偉加等人隨同馬洪親赴山西調查研究，一路風塵僕僕。他們深入到晉西北尚未開發的平朔煤礦礦區實地察看，住宿平陸縣城，到神頭電廠考察，又轉赴晉東南，瞭解水資源情況，沿途除了深入煤礦調研，還去老百姓家中查訪。那時的山西公路條件很差，途中馬洪乘坐的轎車險些發生車禍，幸虧司機機敏，與大卡車刮蹭而過。大家都為馬洪的安全擔心，他卻泰然處之，仍然不辭勞苦地繼續奔波。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馬洪能夠鑒別和支持正確的意見。在國務院進行輸煤管道論證時，幾乎絕大部分部委的與會者都表示贊同，僅有少數專家持不同意見。而研究單位之一鐵道部的一位同志，明確地表示了不同意見。馬洪找他作了詳細瞭解後，鼓勵他在某個國務院及各部委領導都在場的會議上，作時間充分的發言。此舉扭轉了當時可能出現的錯誤決策。鐵道部的那位同志，多年後還念念不忘馬洪的為人及他當時所作的決定。在大量研究國內外有關資料和實地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我國技術條件、山西煤炭和水資源情況，馬洪主持完成了對管道輸煤方案的論證，並上報國務院，從而避免了一項重大工程項目投資決策的失誤。

3, 平朔露天煤礦的合資：

1980年代初，山西平朔露天煤礦與美國哈默財團合資進行開發。在作此合資項目的論證時，馬洪派剛到中心工作不久的丁寧寧參加會議，事先囑咐他兩點：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資料，二是

自己一定要親自算一遍，這樣才能知己知彼，心中有數。根據馬洪的指示，丁寧寧等用計算器算了整整兩週。最後的結論是：平朔項目合作 28 年，在保證外方 20% 收益率的情況下，經常性費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資的 6 億人民幣則不可能收回。

可是，主持論證會的中方代表不接受丁寧寧等人的結論。馬洪在問清情況後，立刻將他們的報告報送國務院主要領導，同時語重心長地對丁寧寧說：你們起草了可行性研究條例，這次派上了用場。可有些事情不能只算經濟賬，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而態度不要過於激烈。1992 年，哈默先生去世，原來合作的美方撤資。平朔煤礦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央打報告，要求把島西公司留下的債務由中國銀行承擔下來，其數額為 6.02 億元，這和中心研究人員當初計算的結果基本一致。

4, 《2000 中國》：人口指標和女職工就業指標

在策劃《2000 中國》這一重大課題中，青年研究人員魯志強所負責的課題是關於 2000 年時中國的人口和就業，但他遇到了兩個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2000 年人口總數的預測與中央決議不同。中共十二大決議提出了 2000 年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奮鬥目標，同時，還提出了一個約束性指標：“到本世紀末，必須力爭把我國人口控制在 12 億以內。”而中心的研究結論卻是，即使嚴格控制人口出生，我國 2000 年人口總數很可能將是 12.5 億，稍有不慎就會達到 12.8 億。魯志強等人的意見是，建議中央放棄人口控制在 12

億以內的指標，將控制目標修改為 12.5 億。但這個觀點當時遭到不少人的反對，幾乎成了政治問題。一些人認為十二大的決議不能改動，一些人則擔心放棄“12 億以內”，會導致計劃生育工作的鬆懈。

第二個難題是，研究顯示出 1990 年代中國將進入就業洪峰。而傳統的安置就業模式，已不能解決中國就業的難題，政府需要從就業觀念、產業結構、就業形態、就業機制等各方面改變思路，預做準備。這些結論也受到了非議，有人把他們的主張總結為“全民變集體，農民進城來，婦女回家去”，就是針對當時報告中有關章節內容的諷刺。魯志強等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業投資彈性係數遠小於集體和私人企業，所以，需要大力發展非公企業，來應對就業洪峰；而如果想解決農業釋放的大量勞動力的問題，城市則必須對農民開放；同時，就業壓力對婦女也將日趨嚴峻，因此應對婦女採取更為靈活的就業制度和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業、非正式就業等措施。

面對反對意見帶來的政治風險，馬洪既沒有責難，也沒有責令課題組修改意見，而是要課題組仔細斟酌結論是否科學，數據是否可靠，表述是否準確全面。當聽到他們肯定的答復後，馬洪就同意了課題組意見，並簽發了上報中央的材料。後來，“12 億以內”淡出中央文件，15 年後的 2000 年中國實際人口統計數是 12.6583 億。而關於就業的這些意見，現在都已成為社會上的常識和順理成章的政策取向。

5, 經濟回升時的微調:

1989年開始,我國的經濟由過熱轉入低谷,因此在中心裡,宏觀的策略便由原先的抑制過熱轉向如何去啓動經濟。到了1991年,為了進一步刺激經濟,搞活國有的大中企業,國務院對外公開宣布了20多條措施,其中一條是繼續下調利率。中心的宏觀部接到指示後,將對此進行調研。這時候,馬洪對他們說,“不要管上面是怎麼說的,一定要按照你們自己的調研,拿出自己的意見。”魏加寧等人隨即走訪了中央和地方的銀行、企業、商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經濟正處在‘大起’的前夕”,所以建議“利率以不調為宜”。該報告上遞後,國務院則未對利率作下調。果然,1992年經濟回升。這種早期的微調(此例為“不干預”),對經濟的回升起了積極作用。

中心是應改革之運而生的。當初馬洪聽從時代召喚,順應歷史潮流,開創了我國的決策諮詢事業。在中國經濟的轉型時期,他領導中心的研究人員,參與制定了許多重大的經濟決策和經濟發展戰略。這些經濟決策和發展戰略對我國國計民生帶來積極和長遠的效益,這正是馬洪一生的追求。

6.4 他帶出這麼棒的一群年輕人

由於馬洪自己在革命隊伍裡的經歷,他格外愛惜人才,愛護

青年。

屆時，馬洪已年過 60，可他超強的工作能力早成為了中心裡的傳奇：兩米高的文獻材料，經他過目，便刪到不足兩千字；他邊聽匯報，邊將冗長繁瑣的報告，幾分鐘之內壓縮到一頁紙，且字體遒勁、文理清晰。可真正讓馬洪與這些青年親和的卻是：他始終有一顆年輕而好奇的心，對世界上的新鮮事很敏感，也有濃厚的興趣。馬洪及時認識到微電和電腦的影響，啓動並主持了“新技術”的對策；還在 80 年代，便從中心 200 萬元的經費中，撥款近 40 萬，給單位配置電腦，使中心起步走上信息化。這比起全國的政府上網，早了五六個年頭。

6.4-1 讓青年人充分發揮作用

馬洪大膽起用年輕人，放手讓他們工作，讓他們逐漸成熟成才，能夠獨當一面。每一個剛來到中心工作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都能得到機會單獨地負責聯繫一個領域的工作，像這樣的激勵和鍛煉，並不是所有單位都能提供的。1984 年，與國家經委聯合請世界銀行舉辦一個學術講座，中心的八九個同志前去聽會，到會才發現會議的準備工作出了問題。當時無須指令，也無須請示上級，中心所有的青年都立即主動地放棄了聽會，幹起了會務。會後，參與合作的一位經委到會的老司長驚奇地說：從哪兒找來這麼棒的一群年輕人！

還是1984年，總理趙紫陽轉來一封信，反映兩個年輕人提出利用銀行貸款加速電力建設的意見，卻得不到有關領導的支持。馬洪立刻召集會議，請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來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展開討論。一開始，馬洪只是仔細地聽，並不發表意見；幾次會議後，一錘定音：銀行貸款不准搞基本建設是以前蘇聯的做法，其他經濟發達的國家並沒有這種規定。我們可以先拿出5個億搞試點；成功了繼續擴大規模，失敗了也影響不大。會後，在馬洪的提議下，成立了“青年經濟分析小組”，由中年幹部負責，而剛從清華畢業不久的丁寧寧做聯繫人。這個小組的主要活動內容，是對體制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研究、討論，並將結果報送有關部門。國務院各綜合部門的不少年輕同志，都參加過這個小組的活動，其中一些人後來走上了領導崗位。

1991年，我國市場上出現了許多商品滯銷的新情況，這和生產一定程度的發展有關，也和消費受限制有關。馬洪當時提出了“中國已開始出現一定程度的買方市場”的觀點。這時，中心的一位同志寫了一篇《買方市場乎，市場疲軟乎？》的經濟評論文章，針對馬洪的觀點提出了反對意見。馬洪不僅認真聽取了這位同志的見解，而且在不同場合，多次讚揚了這個同志敢於提出並勇於堅持不同意見的精神。

6.4-2 保護他們不受傷害

馬洪對青年的呵護、破格提拔，不只表現在為他們寫推薦信，逐字逐句為他們修改論文，更表現在“左”風甚囂塵上之時，他從來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從來不整人。幾十年來，對於部下，尤其是年輕人，馬洪不僅從不斥責他們，而且還會對他們備加呵護，熱情鼓勵。

1956年，28歲的王篤從人大政治經濟學系研究生剛畢業不久，被調到國家經委的政策研究室工作，馬洪正是政策研究室負責人。王篤比馬洪小八歲，為人率直，不愛說奉承話；但他思想不拘泥，筆頭又快，任務緊了，就連開夜車，一點不拖沓。馬洪認為王篤肯幹又實誠，很欣賞他。

1957年“反右”鬥爭時，王篤因為對保密制度提了些意見，被打成“右派”。王篤積鬱成疾，診斷為肺病。1958年春，北京大批“右派”被遣送北大荒勞改，經委的“右派”們臨上車時，馬洪對王篤說了這麼一句：“你身體不好，不要去了。”於是，他被改為發配石家莊煉鐵廠勞改。

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王篤到馬洪家辭行。臨走，馬洪送王篤到門口，低聲說：“老王啊，我不認為你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先去，過些時候，我想法把你調回來。”50多年過去了，王篤仍然記得馬洪的山西口音，那“老王”聽起來就像“老汪”，就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一樣。1959年年底，馬洪又設法給王篤捎去50元錢。然而，那年月運動或政治風暴一個接著一個，馬洪不但沒能幫助王篤調回來，連他自己幾年以後也被強行調離經委。

直到1979年，“文革”結束後落實政策時，馬洪得到王篤的音

訊，曾給他去信，希望他能來京一起工作。雖然王篤沒有接受馬洪的邀請，但他很珍重馬洪對他的友情，至今還保存著他們之間來往的信件。

眾所周知，當年和馬洪一起工作，被馬洪提攜重用，後來又對之伸出援手的“青年人”，王篤不是唯一的一個。今天這些人也都有80開外了，90年代的總理朱鎔基算其中突出的例子。

1980年，馬洪已復出，任工經所所長。當時工經所應聯合國工發組織邀請，派人去奧地利訪問。訪問期間，代表團中某負責人，向馬洪打小報告，告其他兩位成員的狀，說他們“跟外國人接觸多”。當時改革開放才不久，文革餘毒還挺深，馬洪不得不把這兩位“被告”從工經所調往其他單位，以免受糾纏。有意思的是，這位告狀者本人後來移居美國，作為一個外國人生活在“外國人”之中，多半是他自己也“想通”了吧。

到了1983年“反精神污染”時，中心的一些同志聽完傳達報告後回機關，憂心忡忡，以為又要“抓典型”了，又要搞人人自危的“運動”了，於是噤若寒蟬，工作放不開手腳。馬洪在中心裡頂住這股風浪，對業務人員不做行政干預，使他們安下心來做研究。

1993年，就改革而言，俄國以政治改革為先，中國以經濟改革為先。一次，在匯報完金融方面的工作後，青年魏加寧向馬洪斗膽坦言：有些政治體制的問題不解決，金融方面的一些問題也不好解決。直言後，魏原以為會招來馬洪的一通批評與訓斥，不料，馬洪卻和藹地說：“小魏，我大體上也同意你的意見。不過，能否將這政治體制改革，換為‘行政體制改革’？”多年後，魏加寧仍然

回味著馬洪的語重心長。

當年，黃速建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馬洪要求他論文要切合實際，針對改革開放的問題，解決國企改革的組織形式問題，要成為一本專著。那時30萬~40萬字的論文都是手寫稿，由於馬洪工作非常忙，黃速建將論文交給他以後，以為馬洪只是過目一下而已。但是，等論文批回來以後，黃速建發現馬洪作了許多批註，每一行每一個字都看過，甚至還改了註釋，對於原文版本的一些疑問，他也會畫上一個問號。

馬洪非常樂意同青年人交往，傾聽他們的意見。在馬洪看來，同中老年經濟學者相比，他們雖經驗不足，但較少保守思想，又較多地掌握新知識，正可以互為補充，提高研究工作的質量。馬洪當時兼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格外繁忙，求見的很多，並非都是談工作，有的年輕同志是為解決個人問題來尋求幫助的。秘書馬泉山曾建議可否婉拒一些，但馬洪不同意，讓儘量安排，不可拒人千里之外。他說，從與別人的談話中也可以瞭解許多情況，得到新的知識，吸收新的營養。馬洪還理解無名之輩的難處，理解有的人求助是出於無奈，因此儘量幫助解決。這是他一貫的不“拿大”的平民作風。

在馬洪主持的會議上，所有的人可以平等地發表意見，包括對他本人的批駁。有一次討論會上發生了爭執，年輕氣盛的丁寧寧手指著包括馬洪在內的全體與會者說：你們這些人不讀書、不看報……而馬洪只說了句“說話要有根據”，依然穩坐，恬然地繼續開會。當年，中心研究人員所作所為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被包容

諒解；給人的感覺是，年輕的研究人員似乎都是馬洪的孩子。青年們也一直以“老馬”相稱，直到他暮年也還是這兩個字，只不過順序顛倒，改稱“馬老”。正是因為馬洪的寬容，中心“研究無禁區，發布有紀律”的規則，才可能成為一種潛意識和氛圍。

6.4-3 關心他們的生活

馬洪不止在事業上關注青年人的成長和進步，對他們的生活也關切。

楊世偉記得，當時他的一個師兄結婚，馬洪知道後，第一反應是把口袋裡所有的錢，大約是幾百塊，都給了他這位師兄。

在王海波接觸的領導中，馬洪級別最高，年齡最大。而王海波在 1999 年患了腰椎間盤突出，意想不到的，第一個來看望他的竟然是馬洪。馬洪自己也得過這個病，是在 301 醫院看好的。所以當馬洪得知王海波的病情以後，就幫他介紹了 301 醫院的醫生。王海波還記得，每次到馬洪家匯報工作告別時，馬洪總要親自送到門口。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間，王海波去看他臨別時，馬洪也堅持要護理人員扶他送到電梯門口。王海波說，不但在討論學術問題時，完全感覺不出馬洪有領導的架子，僅是一個平等的學者；而且他這種對下屬的關懷，也是在其他領導中少見的。

馬洪平易近人。無論在出差的火車上，還是在飯後散步的路上，都能看到他有興致地與普通工作人員聊天討論的情景。這已經成了他的工作習慣，是他瞭解情況、相互溝通的重要方式。所

以，青年研究人員可隨時打電話找他，也可以隨時來訪。只要不是開會或處理緊急公務，他會放下手中的工作，很樂意與來人攀談，傾聽呼聲，交換意見；即使是反對的意見，他也聽得很耐心。在他的影響下，中心形成寬鬆、和諧的工作氛圍，普通工作人員，包括新來的青年研究人員，與馬洪見面時都親切地直呼“馬洪同志”，然後便是愉快自然的交談。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儘管馬洪當時擔任著中心總幹事、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顧問等重要職務，但他更是同事和朋友，有什麼話都可以跟他講。那時，國務院領導同志交辦的任務很多，承擔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研究任務也不少，時間緊，責任重大，人人加班加點。那個年代，也沒有什麼課題費。可是于偉加等年輕人，跟隨著馬洪忙碌的身影，毫無怨言，精神抖擻，意氣風發，都有一種能為國家、為改革出力的自豪感，好像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升華。

據當年的這些“小青年”說，在外地搞調研時，早上他們一覺醒來，發現馬洪已經在戶外跑步鍛煉。馬洪常年穿著一身洗得褪色的灰滌卡，冬天外加一件綠色的軍大衣，因此他身邊的司機常常會被誤認為“首長”。以至於這位心寬體胖的司機一出現，就被馬洪家裡的人開玩笑：“首長來了，首長來了！”有一次，在列車上，列車長對一位西服革履的隨行人員，敬稱“馬院長”，弄得那位同志怪不好意思的，馬洪倒蠻理解地笑了。

6.4-4 改革是為了人民

回想當初在同蒲路，馬洪剛剛有意投身革命，鄉裡的開明士紳牛誠修先生，出於愛才之心，曾好心勸告：“共產黨雖然發動工農，可主事的都是些大學生和留過洋的……”言下之意，以馬洪的學歷背景，在那裡做事不容易。

果不其然，上了延安，上了馬列學院，班上的佼佼者，鄧力群來自北大、宋平來自清華。果不其然，後來到了社科院，院內不少高學歷的人士，對一個農村高小畢業（延安馬列學院不算數）的“土八路”當院長不服氣。果不其然，當中央有人提議派馬洪去上海主事時，中央又有人說，上海是一個現代化大都市，以馬洪的學歷似不能勝任，作為否定的理由。所以，即使在共產黨內，出身貧苦，也並不總是馬洪的優勢。

馬洪雖然沒有上過洋學堂，沒有條件在早年拜讀亞當·斯密或凱恩斯等西方經典著作，但是他一貫刻苦自學。參加革命之後，馬洪更利用一切機會，豐富自己的知識。尤其難得的是，他有下層的經歷，瞭解人民的疾苦，使得他能從國情出發，理論引導實踐，而絕不嘩眾取寵，無的放矢。所以，在1984年，馬洪能挑戰恩師陳雲的“鳥籠經濟”，提倡商品經濟；到了1987年，在一片“大幹快上”的呼聲中，他又反其道而行之，呼籲“冷卻、壓縮”，警惕通貨膨脹。為什麼馬洪會這樣做？因為他的出身和經歷決定了他不忘老本，往往能從外向內，從下向上看問題，所以難免與既成的觀念和體系有出入。

1993年，馬洪退下來了。一些中青年幹部，不禁懷想馬洪寬容的作風，和他溫熱的人格魅力。而年長的一些人，更懷想他宏大的思維力量：建國之初，他協助勾勒了全國的五種經濟形態；“困難恢復”時期，他整理出《工業七十條》；改革開放，他倡導鳥出籠、魚破網，讓經濟鬆綁；而經濟搞活以後，他又主張適時的、必要的國家干預。這不僅需要綱舉目張的眼量，不僅需要高屋建瓴的膽力，更需要始終不渝為國為民的忠誠和堅忍不拔的意志。難怪中心裡一些“青年”感嘆：馬洪同志直到最後，還是求真務實，憂國憂民。

馬洪從尊重價值規律出發，從推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到推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不同的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利用所處的地位和影響力，以其特有的智慧和毅力，很實際地、一步步地推動認識和理論的進步，並把這種進步體現在經濟政策的調整上。有時候，由於他見解的超前，不被別人所理解，甚至遭受左右兩派的夾擊，但這些絲毫沒有動搖他對中國改革的信念，因為在他看來，無論當初的革命，還是後來的改革，都是為了人民。

第七章

晚年



古有夸父杖，古有精衛石。
朝朝與暮暮，永遠不停息。
生年不滿百，夙心未曾改。
天涯小兒女，不誤東方白。

7.1 “八九”風雲

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來不懷疑自己代表著多數人民的利益。但是，幾乎無人能預想，改革會引起國內不同階層的對立、黨內的分歧，甚至社會的動蕩。其實，即使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也不是完全使用和平的手段。但是，雙軌制改革帶來的投機套利行為，確實動搖了社會主義的公平形象。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先是農民，後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明顯改善，而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首先損害了拿固定工資的公務員和沒有工資的學生們的利益。遺憾的是，此時正忙於改革的黨和政府，還沒有建立起溝通民意和階層對話的渠道，以致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未能得到及時的疏導，終於激發成黨內的鬥爭。1987年，在高層對政

治和經濟改革都有決策性分歧的情況下，思想解放、作風清廉的胡耀邦去職，被社會上的部分輿論理解為是對抗雙軌制下“官倒”和腐敗的危機，這使得中國的政局進入了改革後的一輪動蕩。

7.1-1 天安門廣場局勢失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由於社會上對胡下台的程序和理由難以理解，青年學生使用悼念胡耀邦的形式，來發泄他們對腐敗和“官倒”等現狀的不滿；當時的通貨膨脹也使得許多市民不安；於是群眾再次聚集到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遊行。但一般說來，要求是和平的，基本上屬於請願的性質。

當局中以李鵬和陳希同為首，強調了當時社會矛盾的性質是反動派要推翻社會主義，因而主張採取強硬措施；以趙紫陽和胡啓立為代表，則認為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主張應讓矛盾化解。但是，雙方都低估了社會轉型期的複雜性。在此節骨眼上，趙出訪朝鮮，李鵬成為處理危機的主角。而4月26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使一些學生領袖像柴玲、吾爾開希等，感覺上面已經定了調子，要抓“一小撮”。驚恐之餘，他們決定，要麼“魚死”，要麼“網破”，得用激烈手段來迫使官方讓步。陰差陽錯地，恰趕上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學生中有人認為，中國政府為了面子，肯定會向學生讓步，便想抓住這絕好機會來討價還價；如果當局不退讓，就幹脆把事態鬧大。於是廣場上成千上萬的

普通群眾，便成為少數人手頭的政治賭注。5月15日，當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又吐露出中國的事他做不了主，拍板的其實是鄧小平。這雖說的是實話，可在那特定場合下為何作如此說，的確也令人疑惑。

當初，鄧小平用趙紫陽取代胡耀邦的主要原因，就是胡對學生鬧事處理不力。至1989年春夏之交，天安門前聚集的學生和市民越來越多，事態到了失控的邊緣，鄧小平一開始同意讓趙紫陽試試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可是，群龍無首的學生沒有任何妥協的跡象，反倒步步升級，而趙紫陽應對無力。這便在鄧小平和黨內其他一些主要的元老看來，趙如此再三退讓，甚至有意讓黨內的矛盾公開化，最終會導致共產黨領導權的喪失。鄧對此非常惱怒和失望。基於幾十年的革命經驗，加上十年動亂血的教訓還歷歷在目，鄧小平不能容許天下大亂。從4月起他已經開始集結部隊，以防萬一，後來又不斷地增援兵力。

7.2-2 鄧小平決定鎮壓

在景山後面的庭院中，鄧小平來回踱步，頻繁地吸煙。連日來，他的心思分外沈重：“幾年來，我們忙著搞改革，忙著改變落後面貌，而對一些問題大意了。黨內的一些同志，像胡耀邦，甚至趙紫陽，工作熱情是有的，有時想法也不錯；但現在看來，對一些形勢的估計還是不足的。國內外總有那麼一股勢力，想搞垮我們，唯恐天

下不亂，由他們取而代之。我看這次動亂就有 CIA 和台灣特務的參與。而在我們黨內和社會上，也總有一些人，迷信洋人、想搞全盤西化，這起碼是頭腦簡單……

“孫中山、蔣介石，誰個不想讓中國強大？可是沒有靠得住的軍隊、沒有得力的國家機器，人民成了一盤散沙，外國勢力就要趁虛而入。再看看南韓、台灣、日本，哪一個不是美國的傀儡和工具？……不能再大意了，不然就成敗家子了，‘仔賣爺田不心疼’！……沒有領袖的魄力是不行的……”

鄧小平那通常看去輕鬆的神氣，由開朗轉陰沈，就像當時北京陰雲密布的天空一樣。

5月17日，鄧小平邀請全體政治局常委到他家開會，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全體出席，楊尚昆列席。鄧提出實施戒嚴，會議空氣頓時緊張，常委中只有趙紫陽一個人明確表示反對。鄧在會上說：“如果實行戒嚴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己倒下來。我現在認識到，我在這個時候恰恰不能倒下來……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賬上……不能再讓，再讓中國就完了。”

7.1-3 陳雲作鄧小平的後盾

就在這年春夏之交，陳雲也從外地提前回京。5月26日，中顧委將召開常委會，以統一平息動亂的思想，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請主任陳雲主持會議。遲至5月25日下午，陳雲還不想主持此會：

“這些年來，有人說跟我‘談不攏’，而且叫人傳話：‘只能有一個婆婆’。對黨內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反社會主義的東西，我本人一直很有意見，一再提出警告、一再抵制，可是沒有人聽，釀成如今的大禍。誰來收拾這個攤子？現在又要採取過激措施，很可能會後果嚴重，弄不好還引火燒身……”

然而，陳雲畢竟久經風雨、千錘百煉，經過徹夜深思熟慮，終於做出他影響中國政局的又一決斷。

5月26日，陳雲親自來到中顧委，主持召開了常委會。他一到會場，先與各位老同志握手，問他們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參加的革命，家裡人和戰友都犧牲了幾個，然後說：

“謝謝老夥計們，我和大家是同一代人，我們都是在毛主席的帶領下參加了中國革命……為了社會主義的江山，一共死了2400萬人……與其說我們這些人是兩萬五千里長征走過來的，還不如說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社會主義江山來之不易，我們應當珍惜。

“但現在有人要另起爐灶，我提議我們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頭子的黨中央，贊成的請舉手。”（後來講話發表時，“頭子”改為“核心”）

陳雲還說：“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共和國。”

這一表態，對於平息動亂，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可是，對“六四”風波，陳雲似乎又保留自己的看法。當時幾名中顧委委員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李銳由於反對鎮壓，遭到批判，中央顧問委員會還醞釀著開除他們的黨籍，但此事被陳雲制止。

他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這樣，在此決定中國共產黨命運的生死關頭，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中共巨人攜手，同舟共濟，捍衛了紅色江山。

7.1-4 鄧小平堅持深入經濟改革

為了進一步穩住形勢，鄧小平提倡“不爭議”。這“不爭議”的觀點，同“韜光養晦”一樣，本是在改革初期就國際關係問題提出來的，意思是中國應當保持低調，悶頭搞好經濟，以積蓄力量。鄧曾說：“不搞爭論，是我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甚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八九”後的艱難時世，對國內事務，鄧小平基本上也採取了同樣態度，表現出他大政治家能屈能伸的本事。

中國政府當時沒有管理外國傳媒的經驗，由於西方媒體的現場直播，全世界目睹了“六四”的清場，鄧小平為此付出了沈重的政治代價，損害了他改革開放以來的形象。海外許多人，以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此告終。但是，在蘇聯土崩瓦解和中國經濟起飛之後，不少人對比中國和東歐以及前蘇聯的轉型道路，權衡利弊，認為這些血的代價也許是難免的。這千秋功罪，仍有待於後人來評說。

而對於改革和鎮壓“六四”的功過是非，拿鄧小平自己的話來說：“過去有些人認為我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保守派。我是改革

派，不錯；如果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等到了1992年南下時，鄧小平重新強調“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計劃、市場都是手段”的論點，提倡“致富光榮”，並進一步聲稱：“誰不改革誰下台。”於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再次起動。

7.2 青山不老

7.2-1 改革這條大船不能翻

“六四”期間，馬洪徹夜不眠，和億萬中國人民一樣，憂心如焚地注視事態的發展。當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動亂”被平息以後，他此後數日沈默不語……然而不過一週，馬洪決定去上班。他這個舉動，使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身邊熟悉的同志，甚至家裡的親人。那天早晨，馬洪的老伴陳伯林率領子女，堵在門口流淚阻攔，申明大義。而馬洪依然乘車離去。當那黑色的紅旗轎車，載著馬洪隆隆而去，那汽車的車輪，不僅軋過院內汽車甬道的石板，而且軋過陳伯林的心，其實，更重重地軋在馬洪自己的心頭。

馬洪不被周圍人所理解，這並不是第一次。高崗垮台，他滿可以拉扯別人，以開脫自己；被彭真等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擊排斥，他不妨消極怠工、坐吃“皇糧”；改革初期，他又有便利緊跟“恩師”陳

雲，捍衛“鳥籠”，既保險又光榮；初睨通膨之兆，他也盡可隨大流，至少裝聾作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可是每次馬洪都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個人的利害得失之上。

“八九”後，馬洪馬上意識到，趙紫陽犯了嚴重的錯誤，甚至可能被扣上種種罪名。馬洪本人對此並非完全陌生。馬洪深知，改革開放以來，趙紫陽同胡耀邦一樣，叱吒風雲，立下汗馬功勞，功不可沒。然而此刻更為重要的卻是，如何將改革的大業繼續下去。雖然改革不盡完善，但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改革的這條大船本身絕不能翻。而且，自己手下多少也有一批人，他們需要保護。趙紫陽本人或許會從政治舞台上暫時消失，可他曾經制定的、和可能將要制定的許多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一定要貫徹執行下去。這樣，中國的改革才不至於半途而廢。至於馬洪自己，早已將個人的榮辱置之度外。回顧歷史，多少改革者都是這樣承前啓後、前仆後繼的。

7.2-2 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八九”以後，中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的地位。為了打破僵局，中國政府決定主動地“走出去”，重建以往的關係。89年12月由李鵬、吳學謙、唐家璇等人組成代表團，前往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便是這樣一個例子。因為馬洪是當時唯一與該組織有聯繫往來的高層人士，於是馬洪成為代表團的向導。在訪問途中，李鵬向

馬洪詢問了“高崗事件”的始末。

在達沃斯，西方的媒體、群眾和海外的華人集會抗議李鵬的來訪，以雞蛋和西紅柿等“迎接”李等一行。馬洪年紀較大、腿腳不靈，被擲物擊中。而代表團全體成員，均被海外人士抗議的激烈程度所震動。

仍與“八九”事件相關，那時期中國的經濟低迷，GDP 從 1988 年的 20.8% 降到 1989 年的 8.5%。實際上，從 1989 年 9 月起出現負增長，一直持續到 1990 年 1 月。鄧小平急於擺脫困境，要求李鵬加快增長速度，把 GDP 定為 15%。這時，李鵬徵求馬洪的意見。馬洪說，儘管紫陽下台的原因複雜，但他把 GDP 定為 12%，也給時局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馬洪向李鵬建議：GDP 應定為 6%，並且主張應當以此維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

1993 年，針對“八九”平息“動亂”，社會有些人借此要否定十三大的成果，進而否定改革。因此，江澤民主席特地指定馬洪，主持編寫《甚麼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書，並由他本人親自作序，來肯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馬洪與孫尚清，組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的工作人員，通力合作，歷時數月，終於成書。這對宣傳教育廣大人民，更好地理解與擁護市場經濟，起了積極的普及作用。就此，馬洪以 1984 年上書黨中央，提倡“商品經濟”為頭，以 1993 年宣傳和普及“市場經濟”為尾，替中國的改革在理論上做出了他自己的貢獻。

7.2-3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回顧 1987 年剛開完十三大，馬洪去看望鄧力群。十三大前，李銳給中央寫了一封告狀的信，指控鄧力群是改革的絆腳石，並涉及鄧早年私事，用以說明其品質有問題。雖然當時沒有互聯網、微博之類媒介傳播，但此消息如春風野火，燒遍高層。據鄧力群判斷，這是趙紫陽從中作了手腳。總之，原預計鄧力群將進入政治局，甚至當總書記，結果連中委也沒當上。當時馬洪的子女問他：“社會上正風言風語的，你為甚麼現在去看他？”雖然眾所周知，自改革以來，馬、鄧二人對一些問題，有明顯不同的見解，馬洪卻回答：“我認識老鄧幾十年了，他是我的朋友。”

人年紀大了，與老同志、老戰友的相會，往往是在醫院裡。“八九”之後，馬洪有一次在北京醫院碰見趙紫陽，他人蒼老多了，兩人只是遠遠地拱手問候。又一次遇到鄧力群，他幾乎已經雙目失明。也許意識到機會不多了，鄧力群握住馬洪的手，連聲共勉道：“無愧於黨、無愧於社會主義！”

事也湊巧，不久，在美國定居的女兒馬雅跟她的兒子，看了有關斯諾當年訪問延安的文獻片，挺興奮地打來越洋電話，告訴馬洪，他的外孫已經知道延安，知道那是當年阿公阿婆十幾歲時為了抗日救亡而奔赴的革命根據地。馬洪聽後，感慨萬端，可嘴動了半天，勉強僅說出一句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大洋彼岸的女兒似乎沒有聽懂，半晌沒接茬兒，馬洪遂掛上了電話。他殷切盼望兒孫們以後能理解老一輩的理想和心願。

時過境遷，筆者才領悟出馬洪的深意。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認同西方價值和西方模式，認為是現代化的普適道

路。但是，原蘇聯和東歐廣大人民在自由化民主化的旗幟下，政治上的選擇是多了，經濟上的地位卻下降了。中國是否能為發展中國家走出一條新路？馬洪對此探索終生，並初見成果。而路漫漫其修遠兮，馬洪相信每一代人都會有他們上下求索的空間與自由。

7.2-4 “‘三個代表’就是‘全民黨’”

馬洪那時還有兩件事，頗能代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面臨的難題。

江澤民主席提出“三個代表”，並在十六大上寫入黨章。接著中央邀請一些老同志座談，同時電視轉播。據悉，在此之前，有一位在劍橋攻讀博士的一位海外學子，所作的論文是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當他認真閱讀英文和對照德文的版本之後，才發現原來在國內學習的中文版，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而俄文版的《資本論》，被列寧和斯大林根據俄國形勢的需要，刪除了一些內容。譬如，馬克思所講的理想社會，並非僅由勞動人民組成，而是由全體社會成員構成的。此學子將他對《資本論》的新發現反映到國內，這也許促成了“三個代表”提法的出現。

總之，在那次座談會上，到會的多數人講了一些擁護的話，輪到馬洪發言時，他卻說：“我五十多年前加入黨，是在鐮刀斧頭下宣的誓，為工農利益、為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奮鬥終生。現在‘三個代表’的提法，我認為就是‘全民黨’的提法。那麼，我們黨與國民

黨，或者歐洲的社會民主黨還有甚麼區別？……”電視轉播座談會時，馬洪的發言被刪去了。

耐人尋味的還有，馬洪又更改 50 年代的初衷，在晚年曾向女兒馬雅談起，對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重新認識。眾所周知，毛澤東當年反對這個觀點，文化革命也是他堅決要反對這個觀念的繼續。馬洪當初成為“高崗集團”的重大罪狀之一，其實就是與毛澤東、高崗站在一道，反對劉少奇的這個主張。然而，隨著中國革命的繼續深入，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中，整整一代改革者“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馬洪意識到，在中國生產力低下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劉少奇當初的這個主張應當予以重視。而且，黨內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現象，應當允許討論。

這樣，馬洪就必然面對矛盾。一方面，他力主改革，主張擺脫單一的計劃經濟，尊重價值規律，而引導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他看到伴隨市場經濟而來的兩極分化等等社會弊病。究竟如何搞好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如何搞好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究竟如何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保持和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這些問題在晚年馬洪的心際縈繞，有探討、有反省、也有疑問。其實，馬洪內心的衝突，也是當今世界沒有解決的矛盾。

7.2-5 創辦一家民間研究院

雖然出於歷史原因，馬洪幾十年來一直當大大小小的官，但

他在衙門裡親身體會到它的種種弊病，其一：封建制度的殘餘，如等級、人治、特權、文牘和任人唯親。其二：受自然經濟和小生產的狹隘觀念的制約，因循守舊、重農輕商，導致閉關鎖國、夜郎自大、輕視知識、目光短淺、不思進取、安貧樂道、聽天由命。其三：體制僵化，譬如將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對立，崇尚平均主義，安於抱“鐵飯碗”，吃“大鍋飯”。因此，馬洪認為，改革後的中國，未來的中國，將是從封閉型走向開放型，由中庸保守轉向崇尚創新，擯棄嫉賢妒能的小人心態和怕冒尖、怕出名的庸人哲學，增強時間效率。

也許有人會把馬洪的這些改革社會的理念看成是“烏托邦”；在“看破紅塵”人士的眼裡，不過是老生常談。但是馬洪自己身體力行，並勸動其他人也放下官架子，走出衙門，到民間去。1989年2月，馬洪和蔣一葦在深圳創辦的綜合開發研究院便是這樣一種走新路的嘗試。馬洪主張，諮詢機構應當由向政府提供決策諮詢的單一職能，逐步轉向為在市場上尋找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實現為政府、為市場提供諮詢服務的雙重目標；應當廢除濫竽充數、獎罰不明等官方機構的弊端；應當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手段，提高諮詢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馬洪認為，只有以改革的精神，明確民間諮詢的功能與定位，轉變其職能，才能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2005年他將所獲首屆“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的獎金，全部捐贈給綜發院，以贊助民間諮詢和獎勵提攜青年後進。2011年，他去世以後，綜發院的李羅力等人繼承他的遺志，成立了民間的馬洪基金會。基

金會的工作之一，是利用民間智庫對政府的工作進行評議，這是對綜發院保持民間性和運作民主化的繼續努力。

自1989年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成立，25年以來，發展變化諸多，讀者可觀其網站，對比今夕，作出自己的判斷。

7.2-6 “高崗事件”了猶未了怎麼看

2002年，“五虎上將”之一的郭峰，給中央寫信，請求重新審查“高崗事件”。他事先徵求馬洪的意見。馬洪讀過信後，回覆如下：

郭峰同志：

看了你所寫的《我對54年“高崗問題”的歷史交代》，你在文中所講的幾個問題很重要，我都同意。此外，我有三點意見，供你參考。

第一，你在“關於‘高饒事件’的性質”一節中提到：“我認為‘高饒事件’仍屬於黨內矛盾。至於他們要‘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不是事實，是一種邏輯推論，指的是一種發展的可能性。對其進一步分析批判可以，但不能作為錯誤事實來定性”。

我認為，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一個所謂的“高崗集團”及其要“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事實，因而那種“發展的可能性”也是虛構的，故以不談“邏輯推論”為好，以免使人產生誤解。

第二，在此節中，是否可以加上這樣一段：對“高饒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從此以後，黨內凡出現不同意見，特別是對各級主要負責人有不同意見，就往往被視為反黨，或打成反黨集團。在全國，幾乎每一個省或其下屬地區都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到後來，更有了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和震撼全國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關於東北局內是否存在‘高崗反黨宗派’問題”一節，我認為似應寫得更具體一些。可以你的親身遭遇（你是怎樣被打成“高崗親信”和成為“高饒聯盟”的證據的）事實真相為例，說明所謂的“高崗集團”和“高饒聯盟”實際上都是不存在的。因時間過去已久，知情人漸少，現在舊事重提，應使組織對此有詳細而全面的瞭解。

祝好

馬洪

2002/12/16

這是筆者手頭存有的馬洪手寫的最後的文件，明確地表示了他對“高崗事件”這樁了猶未了的公案的態度。“高崗事件”是那個時代強加於馬洪身上的包袱，他想迴避都無法迴避。而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馬洪本人更看重他在改革開放中的經歷。



馬洪, 1989年。



馬洪與李鵬, 1993年。



馬洪與江澤民，1992年。



馬洪與江澤民，1993年。



馬洪夫婦與馬雅一家, 1994 年。



馬洪夫婦與馬雅和外孫, 攝於芝加哥總領館, 1994 年。



退休後的馬洪，攝於
九十年代中期。



北太平莊家中，2000年。



北太平莊院內, 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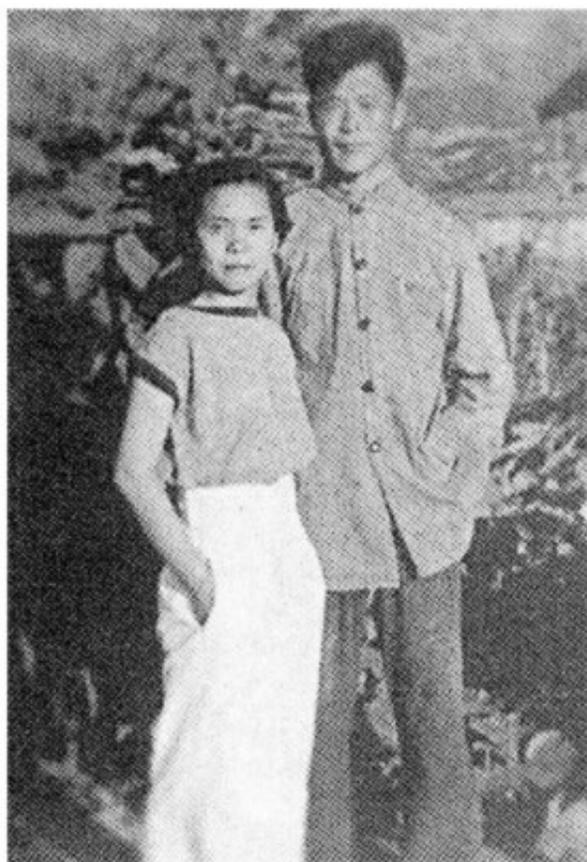
紀念中共建黨 80 週年時, 馬洪與馬雅在人民大會堂, 2001年。



陳伯林，攝於梧州，1937年。



陳伯林，攝於延安，1944年。



陳伯林與馬洪，延安，1945年。



陳伯林（前左二）、馬洪（後左一），攝於抗戰勝利後的延安，1945年。



陳伯林，熱河，1946年。



陳伯林和嬰兒馬雅，熱河，1948年。



與陳伯林，清華街
家中，瀋陽，1950年。



馬洪夫婦與馬洪的父親（前右），陳伯林的母親（後左），攝於瀋陽，1950年。



陳伯林和馬雅，瀋陽，1951年。



周恩來授予陳伯林的委任狀，1956年。



陳伯林，1982年。



退休後的陳伯林，攝於90年代末期。



馬雅與母親，萬壽路家中，2006年。



馬洪夫婦與馬雅，北太平莊，2002年。

7.3 疾病·親情·友誼

7.3-1 中央保健局不允許他對疾病背水一戰

也許在冥冥之中，上蒼早已作出安排，馬洪並不知曉，他仍然像年輕的八路軍戰士一樣，穿上灰色的軍裝，打好綁腿，整裝待發。也許馬洪早已知道，命中注定地某種厄運在等待自己，但馬洪並不是甘心，也不氣餒。他勇敢地向命運挑戰，哪怕是破釜沈舟，也要咬牙背水一戰。

命運之手又作干預，而這一次是疾病。1995年，馬洪在北京醫院被正式診斷為帕金森氏綜合症。這是一種進行性運動神經元退化的老年疾病，一般說來，病程緩慢。

馬洪又在同時間賽跑。但對於帕金森病的治療，口服藥已經慢慢失效。於是在2002年，有的專家建議一種新的外科治療方法“DBS”，即用一根細長的探針，插入大腦深部刺激，來激活退化中的運動神經。由於這種手術新，故有較大的風險；在國際上試驗治療的病人，年齡均在80歲以下，而當時馬洪82歲。為了換回有質量的時間，馬洪甘願以生命冒此風險。但是，他的健康和身體顯然不屬於個人。經過幾次認真慎重的會診，並徵求了家屬的意見，中央保健局決定此手術對馬洪不適宜。然而，這種不聽天由命、不苟且偷生的處世態度，馬洪幾十年來貫穿始終。

7.3-2 “仁權子一家子多虧有他媳婦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馬洪的病情發展，從手腳活動不靈便，逐漸變為說話表達有困難。因為他一直頭腦清醒、思維活躍，這種無法跟外界交流的阻礙，給他內心帶來極大的痛苦。而老伴陳伯林的心身也日益衰退，坐上了輪椅。

望著伯林漸漸稀疏的白髮，慢慢暗淡下去的目光，馬洪不禁回想起在延安初見時，那遍野的黃刺梅，那漫山的山丹丹，伯林滿頭烏髮，眉眼深秀，總給人一種南國的熱力。

她原名楊瑞英，在家鄉梧州考上了廣西大學，但為了抗日救亡，1938年奔赴延安；先入抗大和延安女大，1941年進中央研究院新聞研究室工作。1944年元旦，馬洪和她在延安中央黨校結婚；然後一同去東北，一同來北京，幾十年同甘共苦。有時，馬洪內疚地想到，其實伯林與自己同甘不多，共苦卻不少：

一解放，伯林便設法從山西老家找到多年音訊全無的父親和弟弟，把他們接到瀋陽。只因“老西兒”在城裡住不慣，才又主動回鄉。

高崗出事後，馬洪被揪鬥，接著下放。岳母陳譜蘭，城市平民出身，當初女兒投身革命，十幾年杳無音訊。陳靠給人家做針線活，靠她的一個年幼的姪女去工廠當童工，老少相依為命。陳譜蘭則因憂困交加，患了胃潰瘍。直到解放以後，她才得以與女兒團聚。沒想到沒幾年又有大禍臨頭，陳擔驚受怕之下，胃部大出血，住院動手術。當時馬洪只有兩三歲的女兒馬怡和兒子馬佳，因

無人照應，立即被送入全託幼兒園，一年半載不得回家。又因馬洪降級降薪，家庭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對這突來的巨變，6歲的馬雅不懂事，每當從幼兒園回到家裡，還在飯桌上大聲嚷嚷著：“要吃好吃的……”

可伯林硬著頭皮，不但支撐全家，還繼續在經濟上接濟老家和外地的親戚。孩子們大些了，伯林帶領他們去參觀魯迅紀念館和官廳水庫，給他們念安徒生童話，為他們訂閱兒童讀物。她還親自選料裁衣，使孩子們上小學和過生日也能穿上新衣裳。

歷經多次政治運動，馬洪眼見過多少人離婚改嫁，和“有問題”的配偶劃清界限，且不說無中生有的批判揭發。連剛上小學的馬雅，都被同學堵到牆根，扔石頭、啐口水，可以想見，伯林在機關裡和社會上得頂著多大的壓力。還是待陽村老家的鄉親們說得好：“仁權子（馬洪在老家的原名）他一家子，多虧了有他媳婦子！”陳伯林在家鄉是有口皆碑。

即便“文革”風風雨雨，伯林照樣沈得住氣。當時馬洪白天挨鬥，晚上寫檢討，伯林就為他抄成大字報；造反派逼著馬洪揭發谷牧，伯林堅持道：“人家谷牧是好人，咱們可不能給他胡亂栽贓！”這給馬洪吃了定心丸。1975年鄧小平搞“整頓”，伯林由於“問題少”，可優先聽取中央文件的傳達。當她從北京展覽館聽完報告回家，目光閃閃，好像又回復了延安時期的風采。搖動著手中的筆記本，伯林興奮地對家裡人說：“小平同志立場堅定、態度鮮明。我就是要擁護他！”

“文革”結束，伯林作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首任主編，主

持了包括《當代中國》、《古蘭經》、《中國佛學史》、《國外經濟名著叢書》等大型書刊的出版，為國家和社會繼續發熱發光。

退休以後，伯林曾教誨子女，要善待從鄉下進城做工的女孩子們，她提醒說：“你姐姐去美國，不也就和這些小姑娘到我們這裡來打工一樣嗎？”

晚年，伯林常在家裡寫大字，那清秀而飄逸的柳體依舊，好像心靈不甘於囚禁在衰病的軀體。她一首首抄錄著《琵琶行》、《長恨歌》……這又讓馬洪記起：在三里河計委宿舍，週末的早晨，夫妻伉儷，一同朗誦唐詩宋詞，仿佛是獨具中國特色的男女聲二重唱……一晃眼，竟是 40 多年前的往事了。

7.3-3 自己真的不如媽

筆者對母親陳柏林也有鮮明回憶：

在瀋陽，我還不到 4 歲，媽媽給我念《海的女兒》。我為小人魚的命運悲傷，媽媽摸摸我的頭：“你是一個容易傷感的孩子。”

還是在瀋陽，爸爸媽媽帶我去北陵公園。我努力爬上一座小草坡，卻站著不敢下來。爸爸媽媽鼓勵我：“馬雅，勇敢！馬雅，勇敢！”我就自己跑下來了。

1952 年，當我 4 歲時，我們全家來到北京。記得那應是 1954 年的夏天？爸爸媽媽突然到北海幼兒園來看我，一起合影留念，這引起同班其他小朋友的羨慕。可是到了週末，別的孩子都被接走

了，卻不見有任何人來接我。在一個風雨如晦的下午，我終於盼來了媽媽，爸爸沒有來。我們母女被安排在一個空空的大禮堂裡，媽媽一邊給我剝荔枝，一邊眼淚刷刷地往下淌。我不知道媽媽為什麼這樣無聲地飲泣，卻也懂得不應當問，只記得禮堂外面的暴雨如注……

我所在的幼兒園每年夏天去北戴河。記得仍應是1954年的那個夏天，我接到媽媽給我的信，讓我好好曬太陽，她等著我回家，盼望能見到一個又健康又聽話的好孩子。我那時還沒學認字，由阿姨念給我聽。但我記得媽媽的一筆字寫得特好，連阿姨們都誇。那是在高崗事件的高潮中。

1955年臨上小學，媽媽帶我去勞動人民文化宮。50年代，常常有一些展覽會或交易會之類的活動。那次在公園裡的集會，可能是趕在開學之前推銷一些婦女和兒童的商品。媽媽替我選了白底綠點的泡泡紗布料，為我上學做了一條連衣裙。

當時我家住在三里河計委宿舍。我曾在浴室的水泥牆上用粉筆畫了一個小人，戴著個斗笠，像個農夫。但小人被淋浴的水沖刷，漸漸變得模糊不清。有一天，我發現那小人又清晰起來，於是很驚奇地報告媽媽，她微微地笑了。

我上的是計委子弟小學，學習成績很好，老師都喜歡我。可因為爸爸的事，有的同學欺負我。我想轉學，轉到育才去。媽媽不願傷我的心，可又不得不實話實說，育才不會要你的。

我中學上的是師大女附中，那在當時是全北京甚至全國數一數二的女校。“文革”前，在高中快考大學時，媽媽又給我潑冷水，

讓我做好精神準備，不一定能夠如願以償上一個我理想的學校。

我 18 歲的時候，“文革”來了，揪這個揪那個，爸爸當然首當其衝。“紅八月”前，我們學校拉去軍訓。記得我往鏡子裡一照，也許是青春年少？不管天下或家裡怎麼亂，我的臉還是紅撲撲的。多年後，我曾問過媽媽，我小時候什麼時候最好看，媽媽說就是你去軍訓的那年。

後來，我不常在家。但媽媽的一些事我總記得很清楚。當時她已經退休了，一天她突然對我說：革命革命，就是要革你的命呀！

對媽媽印象深的還有，她穿什麼衣服都特有樣，即使在延安時代也是如此。我這些在“新中國”長大的女性，從小不懂。後來也不事梳妝打扮。即使我去了西歐和北美，但是比起當年的媽媽，總是顯得“土”。

1994 年她來美國看我，就住在我大學的宿舍裡，那年她 75 歲了。臨走時，她把床鋪得整整齊齊。我心裡真的覺得自己不如媽。

她的晚年，我在國外。回國探親，父母已經垂暮。而且聽人們說，媽媽已經腦筋糊塗了。一天，我從醫院看完爸爸回來，和媽媽誰在一張大床上。媽媽一邊撫著我的臉，一邊說：你人沒有瘦，但老了……我記得她的眼睛圓圓的，眉毛又彎又細，臉也很光潔，就像一個孩子。

7.3-4 分分合合老夥計

季崇威曾經與馬洪在國家經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事。早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期，季崇威以《大公報》名記者的身份，與國民黨鬥法。1946年，他披露了當時行政院院長的某親信，企圖利用經濟危機，大搞投機倒把，大發國難財。此醜聞一見報，朝野大嘩，對搖搖欲墜的反動政權起了摧枯拉朽的瓦解作用。蔣介石對其內幕的公布於世，極為震怒，曾親下手令緝捕季崇威。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季崇威則受命策反國民黨政府的工業部門的官員和技術人員，起義成功。這樣，電子工業等重要部門沒有被遷往台灣，使得建國後南京熊貓無線電廠等工廠能即時投產，促進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季崇威的“書生氣”是有名的，他一輩子因此吃盡了苦頭。1959年廬山會議前後，由於大刮“共產風”，中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時任國家經委企業管理局副局長的季崇威，在經委召開的幹部會會上，根據他調查整理的材料，做了實事求是的、系統的長篇發言。當他聯繫到群眾的疾苦時，言辭十分激烈，以至於坐在他身邊的馬洪，不得不在桌子底下用腳輕輕踢他，提醒他注意分寸。可季崇威旁若無人，繼續慷慨陳辭，全然不計個人得失。也許他忘記了自己屬於這個執政黨，仍像當年自由的報人一樣，對不良時政進行抨擊；也許他明知即使自己屬於這個執政黨，可是爲了這個黨本身的健康和純潔，他也應當忠誠地向黨說出良心話。儘管事後已有種種跡象表明，如此“倒行逆施”，下場肯定不好。季

崇威卻一不做二不休，在會上發言之後，又把幾萬言的文字報告遞交各級領導，決意為民請命。

其後果可以想見。季崇威被打成“右傾分子”，下放工廠勞改三年。直到“七千人大會”後，他才得到甄別平反。順便提一句，“廬山會議”期間，替老百姓說話而丟官受罰的幹部不計其數。筆者當時在計委子弟小學讀書，回憶起來，同學和朋友中父母在局級以上的，十有五六因此被發放外地，黑龍江、陝西、河南，乃至新疆，留下來的也噤若寒蟬，“汲取經驗教訓”，以期自保。而當一隻“不倒翁”或一棵“常青樹”不是季崇威的宗旨，他一如既往，“以身試法”。

斗轉星移，至1989年，改革開放已見成效。但因社會轉型而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未能得到合理的及時疏導，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蕩。

“動亂”前後，季崇威恰在日本訪問。當聽說天安門廣場上的危機愈演愈烈時，他連夜疾書，向國務院、人大各單位與他工作有關的領導進言，力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極力阻止使用暴力，來避免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季崇威這種憂國憂民奮不顧身的精神，再一次給他個人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他被留黨查看，長期不准過組織生活。

1959年，馬洪與季崇威對時局有共識。但馬洪1954年才經歷了“高崗事件”，僅在國家經委任政策研究室負責人，且沒有正式頭銜，所以他對季崇威在“反右傾”後的處境愛莫能助。30年過後，馬洪已復出，在季崇威所在的單位當頭頭，有一定職權。所

以，他這次助了季崇威一臂之力。有一次，江澤民接見外賓，馬洪陪同，他設法讓季崇威也同時參加。這招很靈：既然最高領導接見外賓時季崇威參加了，也就說明上面認可他“沒事”了，也許這就是中國的作法。總之，季崇威“沒事”之後，得以在中國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方面繼續做出貢獻。

2001年，季崇威被診斷有肝癌。他對此前景的從容，令他的家人都感覺驚訝。馬洪聞訊趕去醫院探望，這兩位飽經滄桑的人兩手緊握，長達一個多小時之久，使在場者都唏噓不已。季、馬同樣平生坎坷，而兩人同樣精銳不減，夙志不改，在緊急關口，都能公而忘私，不惜引火燒身。更使在場者有感觸的是，在垂暮之年，他們不是惦念自己的病情和子女，而是對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對政府和黨內存在的嚴重貪腐，痛心疾首。他們不能容忍一生一世為之奮鬥的大業付之東流，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憂心所在。

在季崇威去世之後，馬洪寫下《弘揚季崇威同志的浩然正氣》一文以悼念。當時馬洪因患病許久，寫字已相當困難。在寫那篇悼文時，他的字越寫越小，字擦字，行擦行，模糊不清，難以辨認。但馬洪並沒有通過口述或是讓秘書代筆，而是堅持要親自動手寫，以此來弘揚正氣，來表達他對這位剛直不阿的老同志的哀思。

如前所述，梅行本與馬洪有幾十年的交情。但是改革以後不久，這對曾經患難與共的老友卻一度分道揚鑣了。原因是馬洪提倡商品經濟，是堅定的改革派。梅行卻主張繼續執行計劃經濟，是所謂的“保守派”。政見不同，水火不容。當時，多數老幹部，

即馬洪當年多數的老戰友都同梅行見解一致，可是梅行的旗幟極其鮮明，這又是其個性使然：他既能“士為知己者死”，又嫉惡如仇。他典當了大清朝的“龍票”等等多年珍貴的收藏，作為籌備金，與其他同志創辦了《中流》雜誌，作為思想界的中流砥柱，來抵制當時資本主義思潮的氾濫；並把對“鳥籠經濟”持有異議的馬洪，視為“叛徒”。兩人之間斷絕了私交。

然而，1987年4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馬洪發言預警通貨膨脹，當場受到趙紫陽的嚴厲指責。會議結束，梅行熱淚盈眶的前去與馬洪握手，連連稱他為好同志，大力表示道義上的支持。

後來，梅行住萬壽路，馬洪住太平莊。住得不近，便往來不多。那個“改革”與“保守”之爭，多少也使他們兩人之間的友情添了裂痕。但也許是念舊，馬洪80歲時，兩個老頭子還是在一起吃了頓飯。而每每當馬洪的子女請梅行題字，他也總是欣然命筆。

馬洪去世以後，馬雅去拜訪鄧力群。老人家90幾歲了，精神還好，底氣也足，只是眼睛看不見東西了。他對她說，當初你爹只念過高小，後來卻能為國家的經濟出了那麼多的主意，除了他腦筋好，總結概括能力強以外，還同他本人一貫的刻苦和努力是分不開的。而特別不容易的是，儘管趙紫陽重用他，他還是同趙紫陽保持了距離……

馬雅想請老人家在他的回憶錄上題字，可惜他已經雙目失明，

因此十分抱憾。可過了沒幾天，老人家的秘書打電話傳來好消息：老頭子歇了歇，攢足了勁頭，在眾人的扶持之下，在幾盞聚光強燈的照射下，終於哆哆嗦嗦地給題了字，還對工作人員們說：這是老同志的子女嘛。

警衛員受老人託付送來了書。當馬雅翻開《12個春秋》的扉頁，看到那歪歪斜斜、幾不可辨的“鄧力群筆，9/25，2009”的這幾個字時，捧著書好半天說不出話。

7.3-4 回首平生

自從2004年入院以後，馬洪一直沒能再出院。有時他從窗口望著外面的秋色，漸由深紅轉濃褐，大自然的輪迴呵。馬洪由衷感到，他是多麼地熱愛生命，多麼想再為國家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

他雖然久病，卻始終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前途充滿信心。當兒孫們去醫院探望他時，馬洪樂觀地向他們預言：中國在二三十年內，將在國民生產總值上趕上或超過美國。

那時馬洪的病勢已經相當沈重，可每當談話涉及到國家大事和人民的疾苦，他的眼睛就點亮起來，就好像他仍然是一個能為國家和人民效力的青年……被醫護人員攙扶著，他常在房間內來回踱步，仍然思潮澎湃，仍然斷斷續續地向周圍的親友和學生說：“中國已經在經濟上走出了與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現在應當

從理論上加以總結和提高……”

儘管被病體拖累，馬洪依然用他銳利的眼光，試圖透視歷史的風雲：“從前，我們曾經把自己的‘五年計劃’，拴到了蘇聯的援助上，結果人家撤走了專家；現在我們又用大量的國家資金，去購買美國的國債……經濟全球化不是一體化，由於各國不同的條件，經濟發展不會採取同一種模式。世界經濟將是多體共存的全球化，而不是由某個超強國家主宰世界的一體化……發達國家還利用它們的‘軟實力’，輸出它們的價值觀，以求在根本上確立其長期競爭優勢，推行其文化全球化，建立文化霸權和政治霸權……”

同時，當聽說社會上漸漸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趨勢日益嚴重時，馬洪擰起了眉頭，這使得他本來就紅的臉膛漲得更像個關公。熟人都知道，這是他心煩的表示。馬洪想起，當初參加革命，至少是為了勞動人民能夠當家作主，建成一個平等、公正、人人有尊嚴的社會……

也就在這個期間，他盡力克服著說話的困難，鄭重地向兒子馬佳強調：“關於解放初期的五種經濟形式的劃分，現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是我寫的。文章確實是由我執筆的，但思想還是聞天同志的，應當向大家講清楚。”這表現出馬洪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以及他在道德上和治學上的標準。

馬洪的頭腦一直很清楚，身體卻被困在床上。空閒的時間多了，回憶往事也難免多：

兒時，蹲在村口的大槐樹底下，聽老漢們講從前的故事：祖上

原姓呼延，因在朝廷裡獲罪，落荒而逃，到待陽村來安家落戶，因此改名換姓……

兒時，母親身體不好，可家裡沒錢醫治；曾經想長大以後當一名醫生，好給窮人們看病。

而少年時，先去同蒲路，後去延安，母親為此哭瞎了眼。她病病歪歪地站在村外的土路上，癡心地等待出遠門的兒子回家……

三月裡，春風吹，楊柳飄，和游軍告別，相約到延安重聚，她的臉就像粉紅的桃花……

清涼山的寶塔之下，伯林迴眸一笑，明眉秀目，映著延河水亮亮的波光……

來北京，籌建國家計委，加班加點。下夜班肚子餓了，就和宋平他們幾個，在北河沿一帶，找個小飯鋪吃頓夜宵……

同伯林一起，懷裡各抱著新生的兒女，一年之內，家裡竟添了兩個孩子！馬雅站在地下沒人抱，她張開兩隻小手，眼巴巴地問：“我呢？我呢？”

……

夏天，盛開的白薔薇從一樓爬到二樓他的陽台，還繼續往上爬，一直爬向三樓梅行的窗口；直到“除四害，講衛生”時，把院裡的花草全部鏟光，房前屋後變為禿裸的不毛之地……

就算這一輩子坎坷，可生逢這風雲際會的大時代，趕上了抗日、解放、建設、改革……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歸根結蒂還是能為國家和人民做些實事……

這不是，又風風火火地披上軍大衣，大步流星地，和趙紫陽

一起到下面跑，一起作改革的規劃去了……可一覺醒來，明白紫陽已經走了，頓時好像波濤凍結在寒風之中……

北京的臘月，寒風刺骨，北京醫院裡卻溫暖如春。家裡人心細，按不同季節，送來各種馬洪在家時喜愛的花草。這回趕上隆冬時節，親人送來的是一盆仙客來。記得還是從前在三里河的計委宿舍，每每過年前後，室外冰雪，室內溫馨。家裡常常有那清香而亭亭玉立的水仙，也有這白裡透粉的盆花，襯托著玻璃窗上的霜花。用馬蹄給仙客來施肥，那也是跟老友梅行學來的呢。

特護大柳特別善解人意，看到馬洪目不轉睛地盯住這盆花，便將陽台的百葉窗打開，又將房間的紗簾也拉起，把這“仙客來”擺到窗台正中央，好讓它恰恰映進馬洪的眼簾。這花好像上下翻飛的蝴蝶，這花好像來回飄舞的仙子，這花有心思，有眼睛，這花也會同人說話……

三尺冰凌掛窗沿，兩寸雪蝶繞台前。
有問仙子飄飄去，卻道仙客冉冉來。



鄧力群與馬雅, 2009 年。

鄧力群與馬洪在當代中國討論會上, 1985 年。



朱鎔基探望馬洪,
北京醫院, 2005 年



朱鎔基夫婦與馬洪部分子女, 2009年



馬洪與馬雅在深圳, 2000年

7.4 宋平回憶馬洪

2007年10月28日凌晨的北京，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忽地一聲炸雷，一道紫光，某親王府庭院內一株參天老樹攔腰而折，轟然落地，幾乎把大殿上的琉璃瓦震落下來。頃刻間，警勤人員一齊出動，以防不測，院裡一片嘈雜。警衛連長壓低了嗓門：“不要喧嘩，別影響首長休息”，眾人方才肅靜下來。當士兵們協力搬走沈重的樹幹之後，府上逐漸回復安寧，只剩下唰唰的清掃樹葉的聲音。

其實，宋平並沒有被驚擾——他在這風雨之夜一直輾轉難眠。這幾天，他睡得很輕，“也許是因為年紀”，他對自己說。他這個人舉重若輕，尤其是中年以後，凡事想得開，得以長壽。可是近來有些事情仍讓他掛心，特別是經濟過熱的問題。自換屆以來，雖然胡錦濤比較穩，也關心群眾生活，可這“過熱”是歷屆黨政領導人常犯的老毛病。50年前是這樣，20年前也是這樣。記得當年陳雲同志與小平對此曾有爭議。就在1987年那次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馬洪的發言被趙紫陽打斷，事後通貨膨脹失控。想到馬洪，宋平的心不由得微微一動，他不由自主地輕輕拍了一陣腦門，使心緒慢慢平靜，這才伴著有節奏的風雨聲入睡。

次日，庭院已清掃乾淨，看不出有過暴風雨的痕跡，甚至在正堂的入口處，又重新擺放了幾盆鮮艷的秋菊，反襯著陰霾的天空。宋平退下來多年了，早不料理任何日常事務，只參與重大的決策。田秘書見宋平今晨起身遲，所以下午才把有關文件送進書房。

宋平年屆 90，形貌清癯，身心都算靈便，看去只有七八十歲。可是今天，他的眼袋微黑，顯然睡眠不足。當宋平翻閱文件時，田秘書靜候辦公桌前，聽待吩咐。只見宋平過目了若干文件後，目光停留在簡報最後一頁的下角一行重體小字上：“馬洪於昨日病逝”。宋平一動不動地呆坐在那裡，拂開了多年塵封的記憶。

7.4-1 難忘當年的友情

1938 年的馬列學院。馬洪高高的個子，紅臉膛，臉上常帶微笑。當時在延安的黨校、抗大、魯藝、女大、陝北公學，幾乎人人都知道有個馬洪。因為一次趕上延河發水，他不會水，從上游一直沖到平坦的河灘。幸虧他緊緊抓住雨衣和雨傘，才保住了性命。傳說在那以後，他就變成了紅臉。

宋平回想道：馬洪和我同在二班，他當幹部科長，我當組織科長，鄧力群當宣傳科長。雖然馬洪只有農村高小的文化程度，但我們這些北平、天津、上海甚至從海外歸來的大學生，從前學過的那些數理化也用不上。大家都得從頭學起，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政治經濟學，學習中國和世界的革命歷史。馬洪聰明，概括總結能力強，人又很努力，儘管他年齡小幾歲，但我們很快成了朋友。

黨校離縣城挺遠，得走一二十里路。每到星期天，我們學員就一起逛縣城，花一毛五兩毛，吃一碗放了紅辣椒的羊肉泡饃，改善改善；對其他的日用小百貨，買不起，只能看看。後來我得了傷寒住

院，馬洪到醫院來看我。我跟他吹護士怎麼偏向我、照顧我，起初他還不相信，直到我跟他分享了延安平時稀罕的糖果。那時候我們都是年輕人呵，好朋友之間，也愛說一些知心話……

1946年我分到東北，路過冀察熱遼，當時馬洪在寧城縣當縣長。自從我1941年去重慶，我們有幾年沒見面了，久別重逢，自然高興。他跟我說起前一陣他從縣城突圍撤退，警衛員犧牲了，文書也失散了，敵人的一顆子彈打中了他，好在打在盒子槍上，這才又撿回一條命。我倆都笑了，覺得能活著見面挺值得慶賀。

1952年成立國家計委，我們一起調到北京。主席對計委特別重視，我後來的勞動部副部長是總理任命的，可我當初計委的勞動局局長卻是主席的親自任命。當時計委的主席、副主席，還有委員，大多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馬洪是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他實際上是計委的當權派。後來，高崗出事了，馬洪受了處分。我和李正亭也有風險，但馬洪沒有牽連我們……

因為我在廬山會議上的小組發言，1960年我從國家計委調往西北局計委。那階段馬洪在國家經委薄一波下面工作，職務不高，但經常參與國家經濟方面的文件起草。每年我到北京開計劃會議，我們都要聚一聚，我也就此瞭解一下上面的動向。

“文革”來了，我在老幹部裡算好的了，只是靠邊站。後來我從西安調到甘肅省國防工辦掛個閒職。一天，我接到馬洪的女兒馬雅的來信，詢問兒子宜昌的情況。他倆是小學同學，小時候都住在計委大院。當時舜瑤在清華，馬洪下放基層。我和宜昌在院裡散步時，常常會碰倒馬洪的愛人陳伯林也帶著馬雅散步。馬雅看去

挺聰明，聽宜昌說，在班上學習是數一數二的。現在馬雅該有 20 歲出頭了，看來人家女孩子是有意思的。1972 年我上北京開計劃會議，正好馬雅從插隊的山西回家探親。她高高的個子，大眼睛，挺精神的。我跟她聊了聊，她愛看書，也愛幻想，估計能跟宜昌合得來。於是我把馬雅帶回蘭州，和宜昌見了面。事後，我同舜瑤聯名給馬洪和伯林寫信，替兒子提親。馬雅回鄉時，為了表示鄭重，我們還為老家的爺爺和叔嬸帶去一塊草綠色柞蠶絲背面，作為聘禮……

7.4-2 兩人夾在鄧小平和陳雲之間

由於馬洪的逝去，幾十年來彼此間私交公誼的往事一齊湧上宋平的心頭：

“文革”結束，我調回北京，馬洪也復出了。可是我們夾在陳雲同志和小平之間，雖然已是兒女親家，關係反倒不如從前了。宜昌和馬雅也不融洽，看來事情不能盡如人意……

但是，儘管在改革上持有不同政見，馬洪的一些事總讓我不能釋懷。首先，“高崗事件”時，他受了那麼大的打擊，卻仍舊能情緒飽滿、一心一意地去把工作做好，這點真是不容易。後來，像在“文革”後作經濟調整時，他不怕冒犯余秋里、康世恩，主張對“以鋼為綱”的經濟結構進行改革；為了節約國家極有限的開支，他反對寶鋼倉促上馬；像在上海的戰略規劃中，堅持開發浦東特區……這都

是逆流而上，要冒風險的。還記得在1979年的“務虛會”上，老幹部們歷經文革的浩劫，暢所欲言。當時正趕上小平要對越南開戰，大多數與會者踴躍擁護，當然這也和小平即將出掌大權的背景是分不開的。想不到馬洪在會上提出異議。他說“文革”剛剛結束，國家和人民剛剛能喘一口氣，好重振國民經濟；一打仗，就要勞民傷財、影響老百姓的休養生息。雖然馬洪的意見沒有被採納，但給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我跟馬洪的分歧主要在“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這個焦點上。究竟是馬洪說服了趙紫陽，還是趙紫陽利用了馬洪，我搞不清楚。總之，他們聯手，由馬洪出面給中央寫信，終於把“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這條寫進黨的文件，正式開放了“市場經濟”的口子。我贊同陳雲同志的“鳥籠經濟”，認為還是應當以“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這樣比較穩妥，比較符合我們中國的國情。可是小平同志相當激進，重用胡耀邦和趙紫陽，進逼我主管的計委，壓力很大。胡和趙各有各的問題，問題的程度和性質也有所不同，但依林和我同心同德，把他們給頂住了。

我在重慶時期，親身領教過總理的鬥爭藝術，有理有利有節，很講求策略，這使我一輩子都受益匪淺：1986年老同志們給胡耀邦開了生活會；1989年更是一點不鬆弦。幸虧我們黨有陳雲這樣的老同志，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多次能在關鍵時刻把住方向，必要時甚至和小平協手，殺伐決斷。而當他臨終，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還緊緊地拉住我的手，肩上的擔子很重呵……

7.4-3 最終的認同

當初，宋平和馬洪分歧的實質是中國要不要搞市場經濟。現在，中國社會以驚人的速度每天都在變化，儘管包含著明顯的、未知的政治風險，但經濟上長足的進展是不容否定的。宋平繼續回顧：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雖然力主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但對“文革”後的新形勢也有思考，認為馬洪主張的“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在新的歷史時期，也有它在理論上和戰略上值得探討的獨到之處，畢竟解放了生產力。我有時感到，和馬洪比較，我的職位做得高些，一生不像他那麼坎坷，而如果論起創新和建樹，有些地方還是不如他的。回想當初“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爭議，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馬洪等於直接向陳雲同志提出異議，這至少對他個人很不利。馬洪幾次有機會但始終沒有成為“副字號”，陳雲同志確實有過表示。

我記得最清楚的倒是，在1987年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馬洪和趙紫陽的衝突。按說馬洪受趙紫陽重用，馬洪卻在會上作與趙（其實是鄧）意見相左的報告，警告經濟過熱，應當及時進行冷卻壓縮。沒想到，趙大怒。不過，這也許是趙想借題發揮，因為原來定的是姚依林作這個發言，後來依林讓馬洪替他發言。趙打斷馬洪的講話，指責他對“改革喪失信心，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這可以看作是鄧陳營壘的一次交鋒。以至於會後，梅行上前，緊握馬洪的手，熱淚盈眶，連連稱他為“好同志”。在那之前，梅行已經把馬

洪看成了背棄“計劃經濟”的叛徒。國家有困難的時候，是要有人站出來說話啊。

同時這更說明，馬洪在關鍵時刻，是主張國家干預的。而我一貫堅持，國民經濟的大頭要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國家才不會亂。

後來因為世事的紛擾、位置的懸殊，我們的來往幾乎全無了。當國民經濟出問題的時候，我有時會想起馬洪，想起當年我們剛進北京，組建計委，加了夜班就在北河沿一帶的小飯鋪吃夜宵。當年我們不過 30 來歲，粗茶淡飯之間，商議國家大事。如果現在還有同樣水平的人，具備同樣的眼量和胸懷……然而時過境遷了。

兩三年前，聽宜昌說，馬洪病重住院，恐怕不起。我和舜瑤聽了，乘車前往北京醫院看望。到門口，被傳達室的公務人員攔住，說馬洪肺部有感染，說“這可能會影響首長的健康”。我也沒有堅持……

(一)

平生風雲促，巨事細事叢。
迴首思故舊，一任水向東。

(二)

誰言夢依稀，陰陽絕昏曉。
花開似有意，花落總無心。



2007年11月7日，在向馬洪遺體告別儀式上，宋平與馬雅握手。



胡錦濤慰問馬筠。



習近平與馬佳握手。



李克強與馬怡握手。

7.5 送他最後一程

2007年11月7日。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長安街沿路戒嚴。宋平到達八寶山時，警犬仍在大廳的前後搜索。宋平近年不大參與這些活動，太興師動眾，而且難免傷神。但馬洪的事，他是要來的，事先還特地給胡錦濤打了招呼：馬洪一輩子不容易，我們要紀念他。

宋平走進追悼會的大廳，遠遠望見正前方掛著馬洪的遺像：背倚黑暗，卻面向光明，跟一般追悼會的標準像不一樣。“他們滿可以選一張比這個更好的嘛……”他思量著。

宋平漸漸走近，看見馬洪躺在蒼松翠柏之間，身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即使躺下了，他的身材仍然顯得高大，即使停止了呼吸，他的面容依然透露著威嚴……而宋平忽然像看見那個高高的，紅臉膛的北方小夥子，站在延河邊上衝著他招手微微笑，宋平自己也幾乎要上前去打招呼……一晃快70年了罷……

他跟馬洪的兒子馬佳握手，見馬佳已滿頭白髮；下來是馬雅，好像沒大變，可這怎麼可能呢？她對我說：“爸多保重”……

宋平收斂起自己的心緒：“我這一輩子，經歷的事情太多了。今天，我為馬洪辦了後事，我來向他道別，是讓全黨承認馬洪對國家和人民是有貢獻的。但以前的一些事太複雜了，牽涉過多，不容易理清。我為他也只能做這麼些。另外，我還有別的事要操心。馬洪會理解。他要和我換個位置，他也會這樣做的。”

哀樂聲中，胡錦濤、習近平、李克強、朱鎔基、薄熙來等陸續入場。而宋平不事張揚地悄然離去。

筆走龍蛇六十年，
國士勤耕牛中黃。
自古興亡多少事，
盡在愚公智叟前。

後記

我是一個共產黨人的後代。而作為馬洪的女兒，由於高崗事件，我從小就與其他人的經歷不同，因此對一些“正統”有質疑。我想，經過了“文化革命”，尤其“六四”，有質疑的共產黨人的後代，是有增無減了。

但馬洪是一位共產黨人，我是為一位共產黨人寫傳記。

父親出身貧苦，他參加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更是因為當時國難當頭。在革命隊伍中，他受到培養和鍛煉，得以後來在國家的建設和改革中，參與了一些大事。儘管在其中，他遭受磨難，但他相信是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是鄧小平使中國富起來，因此他咬緊牙關沒有離隊。並且，因他來自下層，又屢經挫折，所以他從來沒有脫離群眾，始終關心群眾的疾苦，理解他們的心聲。他希望在國家富強的同時，老百姓應當有福利、有權利、有尊嚴，應當享有法治的保障。這是他參加革命時的初衷，也是他畢生的追求。

父親是一個開通的人，並沒有把他的意念強加於我。而他的一生坎坷，卻不改初衷，讓我在對他的追思之中，加進了對自己的反思。

馬雅

2014年4月

主要參考文獻

東北局高幹會議大會發言紀錄，1954年4月3日。

馬洪：東北局高幹會議上的檢討，1954年4月23日；第二次檢討，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1954年4月；國家計委12級以上幹部學習7屆4中全會時的檢討，1954年5月26日。

馬洪起草：高崗在財經會議的發言，1953年7月。

馬洪的檢查，1966年6月23日。

馬洪簡歷：1967年11月23日。

劉少奇：天津講話，1949年5月31日。

劉少奇：對安子文、張秀山等人的談話，1950年1月23日。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大風出版社，2008年12月。

李力群給中央的信，2006年3月29日。

李力群：《高崗生命的最後五年》，選自《憶高崗同志》，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8月。

張秀山：《從西北到東北——我的85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年。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一，二期。

《遼沈決戰》，《遼沈決戰》上卷；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下卷，附錄五，人民出版社，1988年。

《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編，1949年10月。

“毛選”五卷：《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人民出版社，1977年。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

鄧小平對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1980年3月19日。

《陳雲年譜》中卷。

周恩來在座談會的總結發言（根據趙家梁和張明遠的紀錄整理），1954年。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

《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馬洪（撰稿人之一）：《米脂縣楊家溝的調查》，延安新華書店，1943年；人民出版社再版，1980年8月。

馬洪（主要編寫人）：《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196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5月。

馬洪：《我所瞭解的在釣魚台起草七千人大會文件的一些情況》，1968年8月2日。

牛中黃（馬洪筆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青年出版社，

1956年12月；《我國國民收入的積累和消費》，青年出版社，1957年11月；《社會主義再生產與國民收入的分配》，青年出版社，1958年；《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民收入》，青年出版社，1958年6月；《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生產和消費關係》，財政經濟出版社，1959年2月；《盡快完成我國農業的技術改造》，天津人民出版社，1960年；《我國農業的技術改革》，青年出版社，1963年。

《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公報》，1962年8月。

馬文桂（馬洪筆名，與陸斐文，桂世鏞合寫）：《論我國國營工業企業的性質和任務》，《人民日報》，1964年3月3日；《論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機能問題》，《人民日報》，1964年3月28日；《論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幾個基本原則》，《人民日報》，1964年6月3日；《論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幾個基本制度》，《人民日報》，1964年；《論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群眾路線》，《新建設》雜誌，1964年；《論社會主義工業企業計劃的特點，任務和方法》，《經濟研究》雜誌，第七期，1964年7月。

馬洪：《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1968年。

《李雪峰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

林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解放軍報，1966年1月25日。

林彪文選（1968年9月）：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

上的講話。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中共九大黨章，1969年4月。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97年。

《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8日。

姚文元：〈回憶與反思〉，2002年。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8月3日。

鄧力群：《12個春秋》，126頁，大風出版社，2006年3月。

陳雲對《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

鄧小平報告：《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80年1月16日。

陳雲：對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見，1983年8月9日。

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84年10月。

鄧小平：《改革是發展中國經濟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

趙紫陽：《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馬洪：《充分發揮企業的自主權》，《光明日報》1978年9月9日。

馬洪：《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與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在中共中央黨校所作的報告，1979年8月。

馬洪：《關於改善我國經濟結構的意見》，給國務院的建議，1980年。

馬洪：《滿足人民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崇高使命》，《紅旗》，1981年第14期。

馬洪：《對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為他參加起草《國務院關於加強我國技術改造的決定》後撰寫的文章，1981年。

馬洪：《關於目前基本建設規模問題》，在國務院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的發言，1983年2月9日。

馬洪：《略論社會科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合作》，在中國科學院“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技術攻關”論證會上的講話，1983年2月24日。

馬洪：《關於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綜合規劃的幾個問題》，在“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技術攻關”上的講話，1983年6月23日。

馬洪：《上海經濟發展的幾個重要問題》，1984年。

馬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在中宣部做的形勢報告，1984年11月22日。

馬洪：《新技術革命和我們的對策》，在“新技術和我們的對策”研討會上的講話，1985年。

馬洪：《略論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和功能》，1986年。

馬洪主編《2000年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經濟日報出版社，1987年。

馬洪：《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央國家機關黨委舉辦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系列講座上所作的報告，1987年3月25日。

馬洪：《向市場經濟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大變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小組會上的發言。

馬洪：《中國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經濟管理》雜誌，2002 年第 3 期。

《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鵬日記：《關鍵時刻》，2010 年 6 月 7 日。

其他參考文獻：

《馬洪文集》12 卷，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 年 10 月。

劉世錦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73 卷：馬洪，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杲文川、黃德志、周用宜：《懷念總編輯陳伯林》，《人物春秋》，2008 年 6 月 11 日。

作者簡介

馬雅係本書傳主馬洪的長女，現定居美國。1966年從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文革”中到山西農村插隊；1976年以“工農兵學員”從北京醫學院畢業，被發配四川簡陽。1978年恢復全國統考後，被公派出國讀研究生，先後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和美國斯坦福大學學習、進修；後獲美國普度大學生物系碩士學位。曾用筆名“伍月”在美國和香港發表過短篇小說。



作者馬雅與父親馬洪



馬洪被控與高崗“同謀反黨”

閻錫山對馬洪禮賢下士

毛澤東用高崗試探劉、周的實力

高崗撒謊，犯了欺君之罪

毛澤東對馬洪說“久聞大名”

薄一波重用政敵高崗的這個大筆杆子

和鄧力群等一起當黨內“秀才”

彭真怒喝：“怎麼這個人也能參加會議！”

胡耀邦找上馬洪一同乘機去湖南

馬洪與趙紫陽穿錯對方軍大衣

“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馬洪不識陳雲抬舉

與宋平私交再好，政見還是各說各

鄧小平對馬洪說了幾句私房話

馬洪發言不到一半，就被趙紫陽打斷

首創中國智庫，制訂長期戰略

ISBN978-1-940004-64-8



9 781940 004648

定價：HK129 NT429